

【記憶歷史叢書】

# 文革名人 徐景賢最後回憶



【記憶歷史叢書】

# 文革名人 徐景賢最後回憶



文革名人

# 徐景賢最後回憶

徐景賢

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文革名人  
徐景賢最後回憶

ISBN 978-988-994570-1

I. 文... II. 徐... III. 文化大革命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開本\228×152mm

2013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Thinker Publishing 2013  
香港柴灣豐業街14號啓力工業中心B座11樓2室

發行代理\田園書屋 電話\2394 8863  
定價\港幣\$140 \新台幣\$450

# 目 錄

懷 念——代序	xxiii
朱永嘉	
<b>第一章</b>	
文革前的人生經歷	1
• 家庭影響	
• 學校生活	
• 社會活動	
• 閱讀經歷	
• 參加革命	
• 寫作實踐	
<b>第二章</b>	
上海市委寫作班的來龍去脈	19
• 上海市委寫作班成立的背景	
• 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成立經過	
• 市委寫作班的“寫作程序”	
• 市委寫作班的文章筆名	
• 解剖我到寫作班時的心態	
• 結 束 語	
<b>第三章</b>	
紅衛兵運動對我的衝擊	39
•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	
• 紅衛兵打、砸、搶和“漕溪北路事件”	
• 我成了群眾運動的對立面	

- 我和北京紅衛兵交上了朋友

#### 第四章

### 我見證了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

53

- “安亭事件”的發生
- 陳伯達發來了電報
- 張春橋飛赴安亭
- 我陪張春橋到文化廣場談判
- 張春橋簽字同意“五項要求”
- 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

#### 第五章

### 我是怎樣起來造反的

66

- 復旦紅衛兵到市委寫作班抄家
- 姚文元來電保護“羅思鼎”小組
-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復旦大學“留學”
- 寫作班開會對我“逼宮”
- 我終於下決心和市委決裂
- 姚文元是寫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 尋求“中央文革特派員”的支持
- “火燒”“揪出”“打倒”“砸爛”四個口號的提出
- 《造反才知主席親》發言稿的難產
- “市委真的‘心臟爆炸’了！”
- 陳丕顯“造訪”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
- 毛主席表態支持上海機關幹部造反

#### 第六章

### 昆山歷險

103

- “昆山事件”的前奏
- 王洪文和我一起進昆山城

- 把縣委書記架上廣播車
- 我當上了講“上海話”的廣播員
- 路遇持槍民兵的攔截
- 在蘇州動員赤衛隊回上海

## 第七章

### 毛澤東與上海“一月奪權” 116

- 毛澤東在生日宴會上肯定上海造反
- 中央文革調查員張春橋、姚文元來滬
- 《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
- 《緊急通告》發表前後
- 毛澤東下令向上海發賀電

## 第八章

### 李先念挨整 125

- 李先念繞文化廣場一周
- “他有什麼資格繞場一周？”
- 李先念哭了三次
- 李先念在中央作了檢查

## 第九章

### 馬天水“出山” 131

- 張春橋示意“解放”馬天水
- 張春橋要我找馬天水單獨談話
- 馬天水苦於寫不好檢討
- 為馬天水“出山”提供亮相機會

## 第十章

### 毛澤東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啊？ 146

- 郭仁杰成了市委寫作班造反的帶頭人
- 張春橋密談毛澤東對“紅革會”的指示

- 郭仁杰同情“紅革會”挨整
- 寫作班“老戰友”和郭仁杰集體談話
- 郭仁杰被人揪走了
- 郭仁杰在專案組挨毒打
- 郭仁杰終於跳樓自盡

## 第十一章

### 從張六吉一案看文革專案

163

- 上海專案辦公室的成立經過
- 專案成風嚴重破壞法制
- 張六吉專案設立的前因
- 市委機關聯絡站“心臟爆炸”
- 借張六吉專案挾私報復
- 關於“王少庸現象”的思考

## 第十二章

### 王洪文的班底

181

- 王洪文的“班底”掌控上海的黨政大權
- 黨員工人造反派的代表——王秀珍
- 王洪文向張春橋推薦王秀珍
- 我要寫作組代王秀珍寫文章
- 王秀珍到北京立了一功
- 王秀珍成了王洪文的“總管家”
- 非黨工人造反派的代表——陳阿大
- 陳阿大死保王洪文得到了重用
- 陳阿大是上海市革會裏的“阿混”
- 張春橋、姚文元讓陳阿大“突擊入黨”
- 上海人給陳阿大編的笑話
- 張春橋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老頭子”



### 第十三章

#### 毛澤東說：武裝上海十萬工人

207

##### ——砸上柴“聯司”的前後經過

- “聯司”人員夜闖興國路招待所
- “聯司”提出“改組”上海市革會
- “聯司”和“阿東”形成兩大派
- 毛澤東從武漢來到上海
- 王洪文決定動手砸“聯司”
- 電影攝影師拍下砸“聯司”的全過程
- 毛澤東巡視上海並觀看砸“聯司”的紀錄片
- 砸“聯司”的實質是兩派權力鬥爭的繼續

### 第十四章

#### 我擅自發表毛主席最新指示

227

- 毛澤東在上海做出“最新指示”
- 我同意《文匯報》刊登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 張春橋的批評和補救措施

### 第十五章

#### 毛澤東下達逮捕令

231

-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的一些政治動向
- 周恩來通過許世友告訴我們林彪出逃的消息
- 中央緊急通知王洪文秘密去北京
-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國四方”
- 王維國、陳勵耘兩個人的經歷
- 王維國首先束手就擒
- 陳勵耘的車掉到海裏去了
- 王維國、陳勵耘的最後命運

## 第十六章

### 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 254

- 姚文元佈置朱永嘉標點《李襲吉傳》
- “反右英雄”姚文元自覺地做毛澤東代言人
- 姚文元成為文革時代“李襲吉”

## 第十七章

### 近距離接觸姚文元 260

- 毛澤東肯定了姚文元和他的寫作班子
- 我與姚文元的交往
- 姚文元的寫作道路
- 上海市委書記處為姚文元的文章集體討論定稿
- 我們全力配合姚文元猛攻海瑞戲
- 姚文元丟了稿費、上交遺產
- 《海瑞罷官》批判的悲劇

## 第十八章

### 張春橋斷片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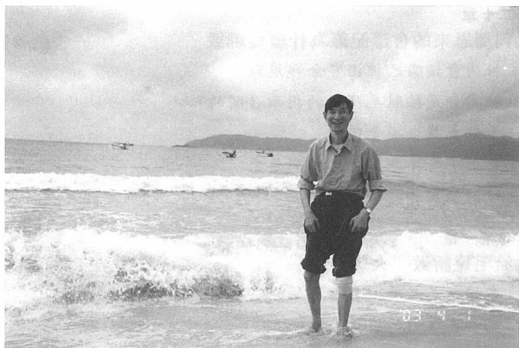
- 張春橋生活儉樸
- 毛澤東想恢復“供給制”
- “我一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寫一部《毛澤東傳》”

## 第十九章

### 我在上海接待黑格將軍 283

- 黑格帶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
- 毛澤東要“頂一下”美國人
- 周恩來駁斥黑格的口信
- 黑格一行訪問上海
- 黑格對我“失禮”
- 毛澤東決定“升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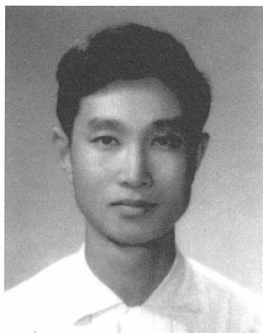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批判周恩來的會議記錄為什麼要燒毀？	296
• 批周會檔案已被證實全部燒毀	
• 批周會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的	
• 毛澤東為批周會定調	
• 鄧小平既捧毛澤東又誅周恩來	
• 燒毀批周會記錄原因何在？	
第二十一章	
我給毛遠新做“大媒”	308
• 毛遠新是怎麼聞名全國的	
• 我和毛遠新的交往	
• 我意外地成了毛遠新的“大媒”	
• 毛遠新的大起大落	
後 記	316
父親的最後歲月（徐遙）	327
一份研究上海文革史的珍貴資料	334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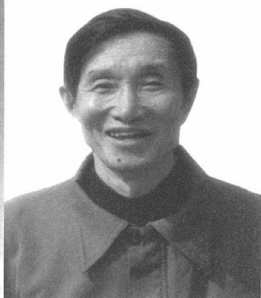
徐景賢攝於海南島



徐景賢攝於杭州



青年徐景賢



老年徐景賢



1963年，徐景賢所著《黨的兒子穆漢祥》一書被北京《人民中國》刊物譯成日文轉載，日本友人花田稔的來信及徐景賢在穆漢祥墓前代為獻花的留影。



1964年，與老寫作班同志們在當年寫作班舊址前（現丁香花園東樓）合影，後排右四為徐景賢，右五為葉以群。



1965年9月，徐景賢隨同中國青年文藝工作者代表團訪越，受到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的親切接見。



1971年夏，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第二次訪滬，徐景賢陪同前去第六人民醫院參觀，由斷肢再植術後的青年女工表演拉手風琴，演唱由親王譜詞作曲的“懷念中國”。



1972年1月，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準將來滬，徐景賢會見。



1972年在上海中山公園，與外賓一起歡度“五一”勞動節（右一姚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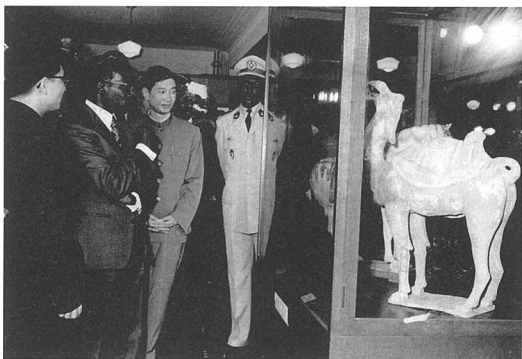


1973年3月，徐景賢會見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同志訪問上海。





1973年11月，徐景賢會見法國共產黨（馬列）政治書記儒爾蓋第三次訪滬（中為中聯部趙宗學）。



1974年5月，西非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訪滬，陪同參觀上海博物館。



1974年8月，尼日利亞總統戈翁將軍一行在上海市南匯縣周西公社棉田裡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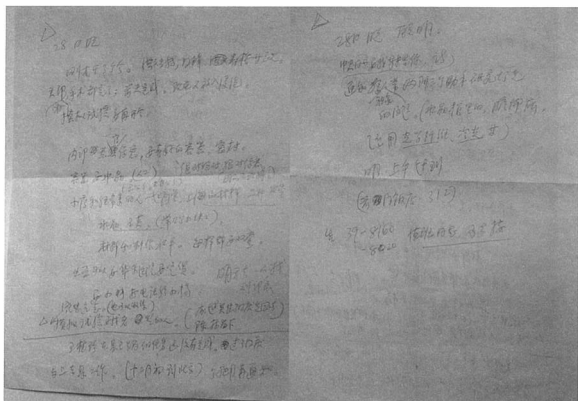
1974年9月，陪同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參觀上海中藥三廠。



1976年5月，陪同英國外長參觀上海汽輪機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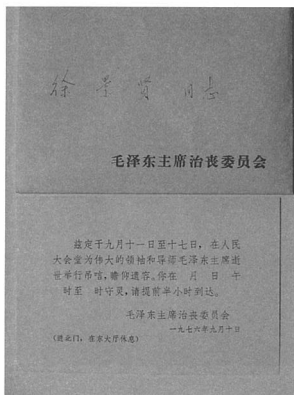


1976年9月，接待美國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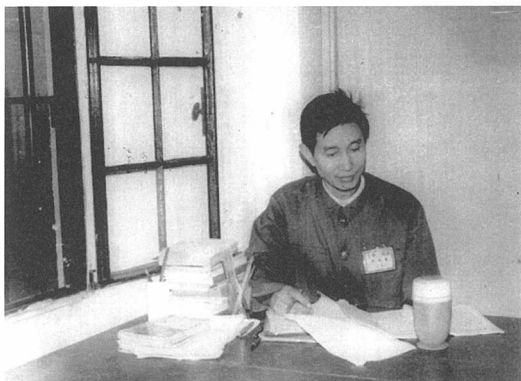


上：徐景賢“關於毛澤東主席遺體保存情況”手跡說明

這兩張紙是當時討論時記錄的手跡。其中：小廖，廖祖康，王洪文秘書；小張，張家龍，徐景賢秘書；小楊，衛生部劉湘屏部長的秘書；應越英（上海第一醫學院研究病理學）、陳、林，三位是上海派去研究遺體保存的專家；王桂珍，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1965年培養的第一批衛生員——赤腳醫生，擬調衛生部工作；顧明，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蔡祖泉，上海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領域的專家；39-8160、39-8020，紅色電話機（保密機）號碼



下：1976年9月28日晚，在北京參加了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研究部署關於毛澤東遺體保存問題有關事項，責成上海負責進行的幾項工作。



1985年12月在提籃橋監禁期間，為監獄中的電視大學中文系學生備課。



1986年春節，監獄舉辦迎春茶話會。



2005年秋，原《紅旗》雜誌組稿小組成員聚會於王知常家中（左一蕭木、左二王知常、左三朱永嘉、左四徐景賢）。



2006年在上海家中與老朋友趙煒（鄧穎超秘書）合影。



2006年10月，原上海市委寫作組部分成員及家屬合影。



2006年12月，徐景賢在全家人的祝福聲中度過73足歲生日。



2007年10月27日，生前與老朋友們的最後一張合影。



2007年10月31日因突發心臟病去世，11月6日由家屬和部分親友一起舉行了遺體捐獻告別儀式。徐景賢安臥於鮮花叢中。



## 懷念——代序

朱永嘉

我記得我們與景賢最後一次相聚是在二〇〇七年的十月二十七日，景賢夫婦、蕭木夫婦、冀德夫婦，我與夫人張惠娟及她弟媳小陸和我兒女一起在我家門口，以宿舍的大門作背景，留下了幀合影，景賢坐在那張籐椅上，我夫人坐在輪椅上，那時景賢精神尚好。合影以後，我們一起驅車去了浦東外高橋的濕地公園，在那裏景賢夫婦與我及蕭木還留下一張合影。那次我們計劃上午去浦東的濕地公園，遠眺長江；下午去吳淞口濕地公園，與外高橋的濕地公園夾着黃浦江的吳淞口看長江之滾滾東流。我還記得上一次去吳淞口濕地公園，在江邊棧道上，我與蕭木二人即長江之景試着背誦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我念上片，他接下片：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為什麼會想着背誦這首《念奴嬌》？因為它講的景和情，與我們當時在江邊的情景太貼切了，不禁引發出那份古今之情

懷。這次想重遊吳淞口濕地公園，無非想再體驗一次大江東去的情景。

結果卻因有某首長在園，閒人免進。我們只能轉而去一旁的臨江公園。路上景賢還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們現在是‘腳長’，當然沒有‘首長’大了。”接着他還在車上與我講起他輾轉找到了當年他在市委機關聯絡站成立大會上的那個發言稿。當時，大會出了特刊，是馬天水批准印了幾萬份，現在要再找到這張特刊確是很不容易了。我知道他那次發言，在寫作班討論時被炮轟，推翻了二次，第三次才定稿的，實際上也是一次集體創作，不能完全由他個人負責。

我們從臨江公園大門進入園內，走向沿長江的堤岸，這條路有一點坡度，開始景賢躊躇不前，看到我們都下到了堤岸邊，向他招手，他奮力前行，終於與我們匯合在了一起，靠着堤岸，遙望大江東去。往回走的時候，他似乎有些累，一路走，一路緊靠在我身上，我覺得他身上有一些微熱，我讓他在江邊的椅子上坐一會兒，讓我兒子設法把車子開到近江邊的出口送他回家。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次給他送行竟然成了永別！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他就突然離去。待我趕到他的寓所，他已靜靜地悄無聲息地躺在自己床上，安詳自然。此時此刻，南齊江淹《別賦》中：“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的詩句湧上心頭。更何況三天前的暫離，竟然成為永訣，此景此情，怎不使人黯然銷魂。

景賢的夫人葛蘊芳告訴我，景賢發病是在那天下午二點三刻左右。他曾張大着嘴，直睜着眼，似在呼喊着什麼。蘊芳在一旁拼命地叫喚景賢、景賢；他張着口，卻發不出一點聲響。等我看到他在床上安詳地靜臥，已是她們母女輕輕撫摸他眼口

以安的狀態。這又使我想起同是江淹的另一首賦，《恨賦》中的最後的兩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景賢臨終的那個狀態，也許正反映了他抱恨而發不出聲的那種痛苦的內心。飲何恨？吞何聲？我可以感覺得到，“飲恨”、“吞聲”也許會有種種其它，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這部尚未最後定稿的回憶錄續集。因為他還有許多材料需要補充，還有許多話要說，而生命卻在瞬間戛然而止！焉能無憾？！所幸，經過夫人蘊芳二年多的整理和補充，這部遺稿終於得以較為完整的付梓，該是可以告慰景賢的。

我之所以見到景賢臨終之狀就記起江淹的《別賦》與《恨賦》；是因為這二篇賦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澤東通過姚文元下達要我找人設法標點注釋，在五月下旬即上送老人家讀的。他老人家這時候找江淹這二篇賦，正反映了為即將降臨於自己與這個國家和人民之永訣而黯然銷魂。我當時的心情是沮喪、無奈，又不能有任何聲張，對未來茫茫然不知所終的哀傷，預感到來日不多了，對自己而言只能抓緊僅有的時間和機會，為老人家，為平民百姓多做一點有益的事以衝淡自己的感傷。我與景賢相交數十年，工作上磕磕碰碰的事，時而有之，但在為老人家，為平民百姓多做一點有益的事情這一點上，互相引為知己。往事歷歷。今痛失良伴，亦平生之一大憾事。

景賢去世以後，有不少人，帶有各不相同的目的，關心景賢是否留有遺稿的事。據我所知，初時，家人們忙於喪事，沉湎於傷痛，根本無暇顧及。痛定思痛之後，蘊芳在整理景賢遺物時，才陸續發現一些未曾公開發表過的文稿。於是，起心集稿，誓必完成景賢之遺願。有人看到由蘊芳集編而成的景賢的遺著《十年一夢續》之後，邀我為之作序。從何說起呢？記得景賢於2003年出版的回憶錄《十年一夢》，出版前前後後

幾經周折。蘊芳對此續集的出版，談之色變。我則以毛澤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通過姚文元要我們標點注釋《後漢書》中的《李固傳》的故事相告。

李固是因皇位繼承問題得罪了梁冀而被殺的，《李固傳》末講到：“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跡，以為《德行》一篇。”當時李固的弟子還是能為他收集作品，編成文集，故《隋書·經籍志》的集部，著錄有《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在東漢那個時代，為當時遭遇不幸的士大夫編文集是一時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魏晉。如《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後漢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少府《孔融集》九卷，後漢丞相主簿《楊修集》一卷，魏中山大夫《嵇康集》十三卷等等，可以列舉的相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就曾將《李固傳》（還有《黃瓊傳》）批示中央諸領導：“送劉、周、鄧、彭一閱。”“送陳毅同志一閱。”並在李固給黃瓊的信上批註說：“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讀。”可見，這些文集的出版，對後人評述歷史是非常有益的。

東漢魏晉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都還比較崇尚名節，所以在那個時候，國家有緩急之難，還有人敢於冒難挺身而出，撐柱傾危。如果為人連這點氣節都不讓講，只許有奶便是娘，那麼這個王朝也就離衰亡不太遠了。從這一點講，景賢家人為這本書的出版所付出的艱辛努力，那種執着的精神還是可欽而又有益的，這也是促使我冒昧受邀為此書作序的一個原因。

最後，我還想到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要我們標點注釋宋人張元幹所寫的詞《賀新郎》一首，這是張元幹為胡銓送別的詞，為這首詞，還挨了秦檜的整。其上闕的末尾兩句

為：“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是說高層的意思從來很難問清楚，人老了，容易動感情，那種悲傷也難以向他人訴說。“更南浦，送君去”的典故出於江淹《別賦》的“送君南浦，傷之如何？”藉以表達為胡銓送別的意思。其下闕的最後幾句云：“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意思是想起當年我們共聚一屋，對床夜語，如今你去的方，大雁不到，再沒有辦法傳書與你了，只能眼望青天，心懷今古，怎麼還有什麼必要去與小兒輩糾纏和談論過去那些恩恩怨怨呢？大白，指酒杯；《金縷》是《賀新郎》詞調的別名。意思是告別時我們還是碰杯乾了眼前這杯酒，聽我唱響《賀新郎》這首詞吧。後來，毛澤東聽蔡瑤仙錄製的這首詞的時候，正是董必武去世的日子。在那一天，毛對這首詞反反復復地聽了許多遍，將最後“舉大白，聽《金縷》”改為“君且去，休回顧”，借此為董必武送別。

景賢，你若地下有靈，我在你去世快三年的時候寫這篇序，也只是為了給你送別，“君且去，休回顧。”書出版後，你的遺願也就完成了。至於那些往事的是是非非，讓歷史和後人去評述吧，又何必與小字輩去議論過去那些恩恩怨怨呢！



## 第一章

# 文革前的人生經歷

人們常常問我：你這樣一個普通的土生土長的上海青年，怎麼會在上海解放初期就進入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工作？又怎樣在文化大革命中當上上海市委書記的？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不得不敘述一下我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演變，包括我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

我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徐宗駿是上海郊區奉賢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化學系，解放前一面從事教育工作，一面與共產黨的革命活動有過聯繫。他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在家鄉奉城鎮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又脫黨來上海市從事教育工作，進交通大學和南洋模範中學教書。解放前我隱隱約約地知道，父親當時在奉城辦曙光中學時參加過一些革命活動。我的母親戴秋楠，當過小學教師，一九二七年參加了家鄉奉賢蓬蓬勃勃的婦女運動，當選為國民黨奉賢縣黨部的委員，以後隨父親來到上海，成為典型的賢妻良母。

## 家庭影響

也許在解放前父親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他想保護自己以及全家，所以他在我面前從來都不議論共產黨，也對我隱瞞了他加入過共產黨的這段歷史。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終只是一個正直、敬業的教師。他給我的影響，主要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一顆愛國心，熱愛祖國，要有民族感情，不

忘記民族氣節；在學業上要有進取心，要能夠不斷地掌握知識，要出人頭地，有一個比較高的文化層次。他曾對我說過希望我將來繼承他的事業——潛心化學研究。他是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的副教授，家裏有很多化學書籍，包括外國原版的化學書、辭典等，還有一些做化學實驗的設備。他原來想傳承給我，因為我是家裏的長子，我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姐姐當時讀上海商學院，弟弟在讀小學，於是父親希望我能延續他的願望，將來從事化學專業。

父親讓我去比較好的小學、中學讀書，將來可以依照他的意願考進交通大學。所以他安排我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上海天平路上一個比較簡陋的復華小學考入南洋模範小學。南洋模範中、小學當時都很貴族化，學費昂貴，一學期要交付相當於十幾擔大米的費用，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本來是難以負擔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交大被汪精衛偽政府接管，變成偽交大，父親憤而辭職。南洋模範的校長沈同一知道他拒絕受聘於偽交大，又是比較優秀的化學教師，就聘他到南模教書。按當時的規定，南模教師的子弟進校可以減免一半學費，如果成績優秀，還可以減免另一半，我因符合這兩個條件，在南洋模範就可全免學費了。

我進南洋模範小學以前在復華小學念書的時候，就愛好看書寫文章，按理說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對寫作接觸的機會不多，但是，我家裏訂閱了《小朋友》雜誌，人家也送了好多兒童讀物，使我有條件看比較多的書籍，看了以後就萌發念頭：人家看書能寫出文章來，我也要寫文章。在小學裏的時候，復華小學編了一個小刊物，是油印的，我就在上面寫點小文章。由於愛好看書寫作，語文好，其他功課也不錯，我到三年級下學期考南洋模範小學的時候，在入學考試的新生中考了第一名。在



南模小學，我的成績一直比較好，父親鼓勵我一定要好好讀書，只有考到前三名，才能減免學費，才能在南模從小學一步步地讀到初中、高中。

在南模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候，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題目是《我的父親》，當時父親的教師生涯對我來說真是太熟悉了，我就在作文裏着重寫了父親清苦、辛勞的教師生涯。當時教師的收入較低，雖然父親在中學教書，但要維持一家的生活很不容易，每天要工作到深夜，我晚上從睡夢中醒來，總是看見他在昏黃的燈光下，僵僵着背，批改學生的作業，寫着寫着，他的右肩上鼓起了一個大瘤。有感於此，我在作文的最後寫了兩句話，針對當時人們都說教師是清高的職業，我寫道：“清高，清高，喊的人真不知道教師心中真正的悲苦呢！”一個低年級的小學生寫出了這樣的作文，在教師中引起很大的共鳴，都說這個學生的作文說出了教師的心聲。我的這篇作文先在小學教師中傳閱，然後作為範文佳作刊登在小學的公告板上供大家閱讀，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寫了這樣一篇作文，居然能得到這麼多的讚揚和嘉獎，從此我對看書、寫文章的興趣更加濃厚了。

我很感激我的學校，當時南洋模範小學有一個圖書館，學生可以借書，我借得很起勁，把學校圖書館裏有關文學的書差不多都看遍了，又向同學借閱《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孟加拉民間故事》等。另外，我有一個同學叫唐雨門，與我家同住在廣元路上，是在一條叫“義合坊”的弄堂裏，我後來才知道他是作家唐弢的兒子。唐弢先生當時編《萬象》雜誌，抗戰還未勝利，在上海能有《萬象》雜誌看，這是非常難得的。唐雨門不告訴他的爸爸，就把每期《萬象》雜誌悄悄地從家裏拿出來給我看，還有當時出版的《文藝春秋》、

《雜誌》等其他刊物。我從小學起就可以閱讀很多的課外書籍，包括魯迅、張愛玲和柯靈的作品等等。當時有機會讀到這些文學書刊，對於我這樣的小學生來說，是平凡的生活裏一種莫大的喜悅。我有幸在小學階段受到文學環境的影響，加上學校的幫助，老師的愛護，對成績好的同學每年有所鼓勵，作文等經常被公開展示，培養了我對文學的濃厚興趣。然而也養成了另外一種思想，就是老想要出人頭地，揚名天下，在思想上頑強地想表現自己，這種念頭從小學開始就有了。

## 學校生活

當時由於抗日戰爭的影響，學校裏民族獨立的氣氛很強烈，比如日本鬼子曾經到學校裏抓老師，學校為此停課，大家就罵日本鬼子，我甚至在作文裏寫上：“打倒××帝國主義！”當時老師們也都容忍了。這個學校雖然很貴族化，但校風一直很嚴謹，它不允許官吏、富豪的子弟來校時穿得豪華或者吃得考究，大家都一樣，穿着非常普通，女生一律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不穿皮鞋，不准燙髮，沒有任何化妝，男生也是，當時還有穿長衫的。我小學時曾穿過一個時期長衫。雖然有的學生家裏很有錢，但學校反對家裏用黑色人力包車或者小汽車把學生送到學校來炫耀，所以學校風氣比較好。學校裏大家看起來都很平等，學風也好，只有品德好、成績好的學生，才會受到老師的表揚。

當時社會生活環境非常艱苦，我家裏一度經濟很困難，由於日本軍隊的封鎖，上海缺少糧食。當時米價奇貴，我們這些小學生也只能半夜起來，跟大人一起去擠“戶口米”。半夜十二點鐘就去排隊，排隊的人都擠在米店門口，擠得肚皮貼背皮，小孩擠在裏面呼吸都非常困難，排隊後店員在我們肩膀上

寫粉筆字，比如我是二零六號，後面是二零七號，憑這個粉筆字，下半夜再到米店去蓋藍色圖章，圖章敲在手背上。然後隊伍散掉，到天亮以後拿米袋去買“戶口米”。“戶口米”基本上是碎米，價格比較便宜，但每人也只能買一升，我和姐姐、母親一起去擠、去排隊，當教師的父親就在家裏留守。

由於買回來的“戶口米”不夠吃，還得在黑市上買一些。黑市米是由米販子從郊區日本兵封鎖的地方偷帶回來的，縫在衣服裏面，從棉襖裏抽出棉花，在衣服夾層裏縫出一長條、一長條的布袋，把米藏在裏面，到市內再把線拆開，把米倒出來，這種米價格比較高。米販子告訴我們，他們是冒着生命危險販米的，有人被日本人的刺刀捅過，有人被狼狗咬傷。有一個時期米實在不夠，家裏就用麥粍(麥子的皮或麥子的頭)混在碎米裏，或者灑在碎米上，敷一層再煮，這是像麩皮一樣的東西，很硬，難以下嚥。還有一種六穀粉，就是玉米粉，黃黃的帶有霉味，也成為每天的食糧。

那時候，因為生活的苦就產生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恨，父親的經歷也是對我的一種民族氣節的教育。他不願意到偽交大去教書，有一段時期失業在家。到南模教課後，家裏生活仍很困難，只能賣掉睡覺的床和部分傢俱來維持生活，同時出租家裏的一部分住房，以房租來減輕一點經濟負擔。那時，我們對抗日戰爭的勝利抱着一種很強烈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我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我對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我家住的廣元路石庫門弄堂裏，我還發動同一里弄的中、小學生舉辦了一次慶祝抗戰勝利聯歡會，大家自己佈置會場，把蔣介石頭像和孫中山頭像一起高懸在銀色的V字中間，我自己做主持人，組織鄰居的孩子們演出節目，慶祝抗戰勝利。蔣介石到達上海的時候，我還

曾經與母親一起到延安路去看，當時延安路取名叫中正路，我看到他坐着汽車開過，對他很敬佩，認為他是抗日英雄。

進入中學以後，周圍的政治環境很快發生變化，南模是一個進步的學校，後來我瞭解到學校裏有中共地下黨的組織，他們帶領學生參加一些進步活動。交大從四川遷回上海以後，又讓我父親回去教書，父親就一面在交大化學系教書，一面兼着南洋模範中學的高中化學課，我們家就住在交大附近，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到交大去。我是交大教師的子弟，交大有許多進步的學生運動可以讓我參加，這樣就使我逐步消除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幻想，開始傾向進步。

## 社會活動

抗戰勝利後，交大與南模的學生自治會組織了尊師、助學活動，上街義賣，我就有機會到社會上去參加一些活動，我當時感覺到是大哥哥、大姐姐帶我去接觸社會、瞭解社會。當時教師的生活很困難，因為抗戰勝利後社會經濟情況又很快惡化了，為了解決老師的一部分生活困難問題，學生發起尊師運動。學生付不出學費，就開展助學活動。怎麼尊師助學呢？學聯先到上海有關的工廠去募捐一些商品，如痲子粉、卷糖(水果糖)等，另外還製作了一個尊師助學的紀念章，拿到馬路上、居民家裏去義賣，這些社會活動引導我們去關心群眾的疾苦。我一面在學校裏學習，一面就參加這些活動，活動結束以後，進步同學帶領我們參加各種集會，在集會上學唱《團結就是力量》、《山那邊呀好地方》等歌曲。

一九四六年以後，交大學生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等地的學生六千多人，在南京舉行反饑餓反內戰聯合大遊行，遭到國民黨當局鎮壓，釀成了南京

下關“五·二〇”慘案。上海交大學生組織營火晚會，抗議“五·二〇”慘案，我參加了交大學生組織的活動，親身感受到反美反蔣的強烈氣氛。我覺得父親給我的影響只不過是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家庭教育，而交大進步的學生運動則讓我瞭解當時的社會，受到革命的教育。

有一次，交大學生在華山路示威時被國民黨軍警打傷了很多人，國民黨特務還用狼牙棒打人，學生事後開了控訴會，我們學校也組織聲援，我還寫了一篇文章《路是人走出來的》表示支持。當時看到交大學生受到鎮壓，我們都充滿義憤。學校進步同學就進一步對我進行引導，讓我參加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學生自治會當時開設了一個消費合作社，是學生們自己集資舉辦的，為學生服務，賣一點文具、小食品等，我被吸收到消費合作社去值班。後來學生自治會成立了一個學藝部，我因為學習成績比較好，又成為學藝部的成員。到高中階段，我參加競選學生自治會的執行委員，當選以後，接觸到更多的進步學生。

有一個比我高一年級同學叫徐惟誠(解放後調到解放日報當過副總編輯，後來又擔任過中宣部副部長)，經常到我家來找我。我父親看到我參加了進步的學生運動，擔心我出事。他自己因為有着一段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參加共產黨、後來又脫黨的經歷，擔心我跟着共產黨走有危險，勸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但我因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仍偷偷到交大去參加進步的學生運動，我溜出去，他又阻止不了。有一天，當徐惟誠找到我家裏來叫我出去的時候，我父親把我擋在家裏，他自己出門對徐惟誠講：“你以後不要來找徐景賢了。”徐惟誠也是他的學生，老師正式通知他下次不要來找了，徐惟誠不好違背，以後他就不敢到我家來了。

雖然我後來還是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但是我感到，這些進步學生(後來知道他們是地下黨員)就很少來找我了。因為他們的老師又是我的父親直接進行了干預，所以我的父親當時的思想狀況是明哲保身。他曾經在解放前跟我們講過一句話：以不變應萬變。他就是以這樣一種中間的態度來迎接解放。我在學校裏也僅僅有局限地參加一些進步學生活動，沒有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新青聯”(“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由於父親的影響，加上我自己的猶豫，我沒有很積極地去追求，所以後來有一個時期我總是後悔當時的“思想覺悟不高”。

## 閱讀經歷

在我的中學時代，有一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一位同學介紹我去參加了復光課餘圖書館，地點在盧灣區重慶路萬宜坊一個同學的家裏。這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屋，整個客堂擺滿了書架，架上的圖書都是各校學生捐贈的，免費供給讀者借閱。由於創辦人的讀書品位較高，所以館內的圖書都是有相當質量的。抗戰勝利以後整整有三年時間，我幾乎每週都要騎着父親留下的“老坦克”自行車，從徐家匯趕去圖書館兩次，每次可以借回家兩本書。等到我被批准為館員，可以進入圖書館內部為讀者服務以後，我又獲得了自由上架選擇圖書和每次借書五本的權利。我正像蜜蜂掉進了糖缸裏，有吮吸不完的蜜汁。在這段時間裏，大大提高了我的閱讀量，擴大了我的閱讀視野。我讀到了魯迅、茅盾、葉聖陶、郁達夫、冰心、巴金等人的現代文學作品，看遍了從老托爾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到高爾基的大量俄羅斯文學，也接觸到了狄更斯、杰克·倫敦、海明威、史坦倍克等英、美文學。在圖書館裏，我還有機會讀到描寫學生運動的作品《新生代》和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

《李有才板話》。同時，我也接受了四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影響，施濟美的柔婉、徐訏的森冷、無名氏的狂野，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時沉迷於福爾摩斯、亞森羅賓和斐洛·凡士探案，饒有興趣地閱讀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這種借閱圖書的方式，培養了我的閱讀習慣，豐富了我的知識，提高了我的審美趣味，也為我今後從事寫作奠定了基礎，閱讀使我畢生受用。

上海解放了，我當然很高興，因為周圍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南模中學是第一批建團的學校，我也第一批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學校裏我用辦報紙、辦刊物來謳歌新的生活。解放前學生在學校裏辦的牆報、壁報比較多，有一種進步報紙叫《學生報》，有油印的，也有鉛印的，是地下黨辦的，我看得比較多。解放以後我感到自己應該來辦報紙，在學校裏也出現了大量的牆報、壁報。當時比我們低一屆的同學辦了《青鋒》壁報，有一個編輯向毛澤東主席寫了封信，毛澤東給他們題了“青鋒”兩個字。我和其他幾個同學則辦了一份鉛印的刊物，叫《同志》，不定期出版，我在上面寫論文、散文、小說，什麼都寫。

解放給我提供了寫作的一個更廣闊的天地，我覺得不僅要在學校裏寫，還可以向外面投稿。我就給上海的報紙寫學校通訊稿，不僅寫南模，還寫交大的活動，因為解放後我仍和交大有着密切的聯繫，我把交大、南模等學校的政治活動啦、聯歡活動啦，寫成通訊向報紙投稿。同時，我擔任了《解放日報》、《文匯報》、《大公報》的通訊員，還參加了《大眾電影》的讀者聯誼會，給電影刊物寫文章。當時我有很多機會可以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如《解放日報》、《文匯報》舉辦的講座和通訊員學習班，大大地開闊了視野。我是南模的通訊組組

長，接觸面更加廣泛，稿件寫得比較多。我萌生了一個志願：要用自己的筆來歌頌祖國的變化。

## 參加革命

一九五一年，我們高中畢業了，南模的同學們紛紛報考大學，我父親也要我去報考大學的化學專業，我還正式報了名。但就在大學入學考試前夕，上海市號召知識青年參加市政建設。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們面臨着兩種選擇，一個是考大學，一個是放棄考大學，參加上海市的市政建設，這就算參加革命了。當時市裏需要一批年輕知識分子充實市政建設的隊伍，市委機關、市政府、市公安局、上海電力公司、市衛生系統等都需要一批知識青年。我當時思想鬥爭很激烈，因為在學校裏學習成績比較好，總想讀大學，如果參加市政建設，當時就算參加革命了，必須放棄上大學。我與父母親商量，他們不是很贊成，因為我考大學應該是很有把握的，放棄了可惜。但是，他們也比較開明，最後還是表示尊重我自己的選擇。當時整個年級五個畢業班裏大約有四十多人報名參加市政建設，相當全年級人數的五分之一。參加市政建設的同學把大學報名單撕掉了，我還被邀請到位育中學去現身說法，介紹自己為什麼要參加市政建設，以及參加革命的思想演變過程。

參加市政建設前，我們先進一個訓練班進行培訓，班址設在上海中學，班主任是周原冰，後任上海市行政幹部學校校長，是倫理學家。他請了很多人給我們上大課，包括副市長潘漢年等。市政建設訓練班結業時，很多人被分別分配到市公安局、市電力公司和衛生局，我是最後一批分配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分到什麼單位去。事先我填寫過志願，並把自己當過《解放日報》、《文匯報》通訊員的簡歷，以及寫過哪些文章



等，在表格裏做了比較詳細的注明，希望能夠被分配到發揮自己寫作專長的單位去。訓練班裏幾乎所有的人都已經分配了，最後只留下三個人，這一天組織通知我去上海市委宣傳部報到。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是共青團員，還不是共產黨員，而市委宣傳部是黨的領導機關。領導找我談話，說一方面是考慮到你寫作上的特長，另一方面宣傳部也需要青年人，這樣我就從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直接調到市委宣傳部工作。報到那天，我被分配在宣傳部文化藝術處，處長是丁景唐，我就在丁景唐領導下成了文藝處的幹事，這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份的事。

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到了宣傳部文藝處，黨組織卻很信任我。在黨的高級領導部門工作，首先分配給我的具體任務是檢查報刊上的文章，從中找出問題。我記得我檢查的第一份刊物是上海市的《群眾文藝》，看看其中存在什麼問題。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當時柯藍主編的《群眾文藝》刊物，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看過以後，把這份刊物上的文章內容有哪些不妥，句子有哪些不通，文字有哪些錯別字，標點用錯了的地方等等，詳細地寫了一篇彙報，交給處長和處裏其他人審閱。當時處裏有一位老同志叫汪震宇，他看了我的彙報後對處長丁景唐說：“這個徐景賢蠻厲害的。”他認為我一個小青年，看了《群眾文藝》以後，居然能寫出一大篇東西來。我聽了很高興，同時覺得在這裏工作使我得到了鍛煉，因為過去從來沒有人讓我系統地閱看報刊，從中發現問題和指明失誤。

在領導機關工作，很快就暴露出我的幼稚和局限性。我是直接從學校來到黨的首腦機關的，沒有任何基層工作的實際經驗，不知天高地厚。當時市委第二書記劉曉的夫人張毅也在文藝處工作，有一次，她聽到我給文化局打電話，我在電話裏用了“責成”這個字眼：“這個工作責成你們一定要完成。”張

毅聽了以後感到非常刺耳，在處裏開會時提出來：“小徐給人家打電話，怎麼可以用責成你們怎麼樣怎麼樣，帶有一種命令的口氣，很不妥當。”這個批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到機關，實際年齡不到十八周歲。十八歲能夠調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又跟自己的興趣愛好一致，我很自得。在機關裏也給報刊寫一點文章，比如在文匯報發表《正確認識團是黨的後備軍》一文，當時自己只是團支部書記，連共產黨員都不是，但那篇文章卻是教育廣大團員怎麼樣正確認識自己是黨的後備軍的。實際上，寫這樣的文章與自己當時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身在黨的領導機關，又用這種口吻寫文章，說明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情緒，這種情緒在給下級單位打電話時就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來了。

一九五三年，因為我在黨的機關工作比較積極，又是團支部書記，黨組織開始考慮發展我入黨。同年六月，我被批准為預備黨員，入黨介紹人是丁景唐和徐嘯，他們很慎重，專門到我家對家庭出身、父母情況進行過調查。發展我入黨後，我有點忘乎所以，進一步產生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入黨不久，宣傳部組織工作隊到大隆機器廠搞民主改革，由處長高原帶隊，我是工作隊成員。工作隊裏幾乎都是正式黨員，只有我是預備黨員，但是黨組織很信任我，在大隆廠的民主改革和建黨的過程中都把我當黨員骨幹用。一九五四年七八月，在我預備期滿一年後，宣傳部總支開始討論我的轉正問題。對於轉正，我當時很不認真，也很不嚴肅，按理每個人在轉正會上都要如實地把入黨一年來的表現向大家彙報，而我在轉正報告中大講自己的進步，大擺自己的成績，對缺點則輕描淡寫，結果支部會一下子哄起來了，那天有兩個人轉正，前面一個人很快通過了，輪到我的時候，很多黨員投反對票，不同意我轉正。這一

下，丁景唐也很被動，因為事先他已教育過我，在會上你要認真地做一個思想總結，給大家彙報一下，而我稀裏哈拉就講開了，從學校畢業談到參加工作，一切都很順利。那天晚上沒通過預備黨員的轉正，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當時我正在與葛蘊芳談戀愛，葛蘊芳解放以前是上海市立女師的學生，在學校參加了共產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並於一九四九年初加入共產黨，是地下黨員。解放後，她曾在市委黨校學習，後為當時任市軍管會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市委宣傳部部長夏衍的機要秘書，是解放以後夏衍的第一任秘書。後來夏衍調到華東局宣傳部，她就留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做部長室機要秘書。我在宣傳部與她認識，兩個人開始談戀愛了。她看我連預備黨員都不能轉正，對她也是很大的打擊。當時我感到她是地下黨員，我現在連黨員都不能轉正，與她談戀愛就大受影響了。她當時向我提出，你一定要認真改造思想，提高對黨的覺悟，爭取轉正，我才能與你繼續發展戀愛關係。

受到這個挫折後，我認真地考慮了自己究竟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地方，以後下廠工作就比較扎實了。一九五五年，宣傳部總支正要重新討論我的轉正問題的時候，“反胡風”運動開始了。部長彭柏山作為胡風集團嫌疑分子被關押審查，處長丁景唐被認為與胡風一案有牽連，連帶審查宣傳部裏有沒有類似胡風的小集團，就集中火力搞丁景唐小集團，把丁景唐身邊的人都審查一遍。我因為是被丁景唐發展入黨的，也被當作審查批判對象，有一段時間沒分配我工作，為此我一直很惶恐。後來，決定把我調到上海市文化局審查反動淫穢荒誕書刊辦公室，跟着束韜秋工作，他後來擔任新民晚報總編輯。這個工作結束後，我被調到市委文藝工作部，一九五六年，文藝工作部下設社會文化處，束韜秋任處長，我是幹事。同年六月，我才

轉正為正式黨員。

到文藝工作部後，我有機會認識了張春橋。當時張春橋是文藝工作部的部長，下面還有幾個副部長，我作為幹事雖然跟他接觸不是很多，但感覺他對文藝工作還是比較瞭解的。當時柯慶施設文藝工作部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所以把文藝處從市委宣傳部劃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部，下設文學處、藝術處、社文處、幹部處等，由張春橋主管。到文藝工作部以後，我深感自己的學歷不足，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瞭解太少，我就向領導提出要求參加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函授學習，每週還要有兩個半天到校聽課，我先後聽了徐震鐸、程俊英、施亞西等老師的中國古典文學及作品選讀課，得益不少。文藝工作部成立後，搞了一段時期政治運動，如反胡風，搞大批判，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思想等，時間不長，張春橋擔任部長也不過一年時間。一九五七年，文藝工作部被撤銷了，我再回到市委宣傳部。主持宣傳部日常工作的先是谷牧，後是石西民。我在石西民領導下工作的時間比較長。

## 寫作實踐

一九五七年，我在宣傳部文藝處寫了一篇文章：《破教條主義的戒，開群眾文藝的花》，發表在群眾文藝刊物《演唱》上。文章發表後，正好“反右派”開始了，《演唱》刊物上登了兩篇批評我的文章，說我的文章中“破教條主義之戒”等言論像右派說的，搞得我很緊張。處裏當時也對我進行批評，說你怎麼寫這樣的文章。當時處長任幹、章力揮等在上海市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作過一個發言，對文藝工作中黨的領導也提了一些意見，他們當時正忙着檢查自己言論的不當。外界對我的文章進行批評後，他們才跟着批評了我。我這篇文章如果是下屬

單位的工作人員寫的話，一定會被劃成右派，後來沒有把我劃成右派，我想可能是因為處長們忙於檢討自己，我這篇文章的錯誤性質與他們的發言相比又好像輕了一些。所以我在反右運動中以挨批評過了關，但這件事在我思想上造成一個錯覺，即無論如何一定要學姚文元，寫文章的姿態要左。姚文元當時總是寫批評別人的文章，我感覺到自己要在寫評論文章時站住腳，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運動的前列來批評別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現，才能被領導視為革命左派。因此反右派運動正式開始以後，我就寫了一篇批評右派言論的文章，即批判沈雁（記者沈涯夫）在解放日報上的右派言論，後來我得知，沈雁被劃成右派並被流放到青海去了。這是我當時以文章傷人的一例。

我除了寫一些評論文章外，還想寫出一點好的文學作品，覺得這樣影響才大。一九五八年，黨號召大家搞群眾創作運動，大寫民歌，人人寫詩，後來發展到發動群眾寫散文、小說、劇本等。那時我被臨時調到上海作家協會群眾創作辦公室工作，群眾寫的小說、劇本等都送到群眾創作辦公室，當時有一個劇本叫《香飄萬里》，通過群眾創作辦公室的幫助準備拍電影，還有老幹部朱道南的回憶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是經過群眾創作辦公室幫助後出版成書的。當時我既組織過群眾文藝，又輔導過群眾創作，還負責編過《上海民歌選》，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連續編了三本。當時我認為，既然我編過書，又輔導過群眾創作，為什麼不可以自己動手來寫呢？我決心自己動筆寫一部作品。在我的生活經歷中，解放前的交大學生運動對我的影響最深最大。在交大，像穆漢祥烈士這樣的大哥哥帶着我們搞學生運動，反對蔣介石國民黨，搞民主夜校，那些轟轟烈烈的場面經常在我腦海裏

浮現。我覺得寫學生運動很有特點，就請了十天創作假，一口氣寫出了一部傳記文學作品，最初的名字叫《黃浦江畔的風暴》，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一九五九年寫成，一九六零年連載，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和《上海文學》選載了部分章節，接着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出版時改名為《黨的兒子穆漢祥》。由於當時黨很強調革命傳統教育，共青團上海市委組織了“紅旗讀書運動”，團市委書記陳啟懋還在報上寫了推薦文章，這本書被列入“紅旗讀書運動推薦書目”，並被譯成外文出版，發行量很大，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部作品於一九五九年完成，上海作家協會就發展我成為會員了。宣傳部長石西民看到了我的書，當時正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裏面有一篇《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提到“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石西民看到毛澤東如此高度地評價解放前的學生運動，就來找我，說你能不能把這部《黨的兒子穆漢祥》改編成電影劇本，配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我當然很高興，他還批准我請了較長的創作假。石西民的妻子吳偉是海燕電影製片廠的黨委書記，她向我約稿，決定把原作改編成電影劇本後讓海燕電影廠拍成電影。他們還物色了上海的老作家于伶參與劇本改編，于伶寫過電影劇本《聶耳》、《大李、老李和小李》等，解放後他受潘漢年、楊帆案件牽連，一直沒有受到重用，以生肝病、身體不好為由，在家裏休息。他在劇本創作上很有經驗，所以海燕電影製片廠指定于伶和我一起合作，把《黨的兒子穆漢祥》改成電影劇本。後來市委文藝處的副處長章力揮對這個題材也有興趣，於是三人一起改編電影劇本，由我執筆，

起名《曙光在前》，一九六三年劇本完成，在《電影劇作》上正式發表。

這個劇本原本要拍成電影，後來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要大寫解放以後的十三年，他批評當時的創作題材裏洋、名、古的東西太多，要大寫表現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這樣一來連寫革命烈士的作品也吃不開了。電影廠把它擱置下來，調過頭去組織大寫解放後十三年的作品。當時柯慶施看中了話劇《年青的一代》，這是上海戲劇學院教師陳耘寫的初稿，基礎比較好。為配合大寫十三年，一九六四年底舉行華東話劇匯演，華東各省市都要拿出作品來，柯慶施就決定把《年青的一代》作為上海的重點，調我和章力揮去幫助陳耘修改《年青的一代》。在這過程中，周總理也看了這部劇本，把劇本中林育生念父親遺言的一段親自作了修改。那個時候創作都要強調領導、作家、群眾三結合，領導都是直接抓的，柯慶施親自抓，抓得很緊，甚至在劇本的排練過程中，柯慶施聽說主要演員曹雷（飾演林嵐）扭傷了腰，還當場派車要我送曹雷到華東醫院請推拿專家治傷。

這個劇本是我們三人合作的，主要的作者還是陳耘，在原作的基礎上，我們修改後上演，獲得了全國話劇優秀作品獎，華東話劇匯演上也得獎了。接着就改編成電影，由張春橋親自抓，拍成後在全國發行，影響越來越大。張春橋時任上海市委常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直接管文藝，抓一些重點創作，他是柯慶施的所謂不管部部長，幫柯慶施抓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自從石西民調北京文化部以後，張春橋又兼任宣傳部部長，我兩度在他領導之下工作。

張春橋對我比較欣賞，他當了宣傳部長，我寫了文章送他審查，他總是順利通過。我除了寫文藝評論、劇本外，還給報

刊寫散文、雜文、報告文學等。當時覺得哪個地方可以體現領導意圖，我就緊緊跟上。比如當時柯慶施稱讚科學家彭加木的事蹟，樹立彭加木為標兵，我就馬上去訪問彭加木。當然這些都是業餘寫作，由於我在市委宣傳部工作，有便利的條件。訪問他以後，我寫了長篇報告文學《生命似火》，發表在《萌芽》雜誌，後來又收入《萌芽》叢書，影響很大。由於我在上海文學界比較活躍，市委就提名我和黃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青年文藝工作者訪問越南，到戰火紛飛的前線去，還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見。

一九六五年，我把寫過的散文、報告文學集中起來，又出了第二本書，以《生命似火》為書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當時文藝界已經受到很厲害的衝擊，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已經下達了，文藝界其他人都岌岌可危，紛紛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檢查自己跟“裴多菲俱樂部”有什麼關係等等，我的書卻能夠出版、發行，這充分證明我已經成為上海文藝界“左派”中的一員。這些寫作成果也為我進入上海市委寫作班奠定了基礎。



## 第二章

# 上海市委寫作班的來龍去脈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有一種奇特的政治文化現象，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到基層單位，紛紛調集“無產階級的筆桿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寫作班子，以各種各樣大批判寫作組的名義，撰寫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發表在中央和地方的報刊雜誌上，或刊登於本系統的內部刊物及壁報上。

這些寫作班子中較有影響的如：“丁學雷”、“羅思鼎”（均為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筆名）、“梁效”、“柏青”（清華、北大寫作班子的筆名）、“初瀾”、“江天”（文化部寫作班子的筆名），還有“池恒”（《紅旗》雜誌寫作班子）、“唐曉文”（中央黨校寫作班子）等等，連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也在空軍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

如今，對於當時全國各地的寫作班子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樣一種中國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現象，追本溯源，作一些分析回顧，對瞭解這一段歷史是頗有意義的。

### 上海市委寫作班成立的背景

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成立於一九六四年，雖然不算是全國寫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但也可以說是各種各樣大批判寫作組的“領頭羊”。在這裏要說明的是：本文着重剖析的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寫作班，而不是文革時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這二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前者是當時撰寫各種批

判文章的寫作集體，後者除了擔任大批判寫作任務外，又成了奪權以後的權力機構，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市委宣傳部的職能。剖析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寫作班，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怎樣揭開的？遍佈全國的“革命大批判”是如何形成的？“筆桿子”是如何在這場政治鬥爭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的？

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成立，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對國際國內修正主義思潮的背景和任務密切相關。從一九六零年中蘇關係緊張開始，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級的“秀才”調到北京釣魚台，撰寫反修文章。至一九六三年止，總共寫出了九篇著名文章——“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這些中央級的“秀才”，包括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中聯部副部長王力，中宣部副部長姚溱，紅旗雜誌副主編范若愚等，另有陳伯達、喬冠華等人參與部分工作，這可以說是解放後中共黨內第一個最高級別的寫作班子。組織這樣的寫作班子，目的是為國際反修鬥爭服務，以後又投入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

一九六一年，劇作家孟超創作的鬼戲《李慧娘》上演，雜文家廖沫沙寫了一篇《有鬼無害論》，為鬼戲辯護，毛澤東看後提出了批評。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指責小說《劉志丹》美化高崗，提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一九六三年初，毛澤東觀看京劇《李慧娘》，作出了要對“鬼戲”進行批判的決定。同年二月，江青在上海錦江飯店會見張春橋，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戲劇；同時要“立”，建議改編滬劇《紅燈記》為京劇。三月

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進和加強劇目工作的報告》和《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點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這一年的五月，毛澤東提出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提出：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一九六三年七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至此，國際國內兩條戰線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就同時展開了。

上海，在全國意識形態領域批判“封、資、修”的任務中，充當了“先鋒”的角色。一九六三年新年，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出席了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號文藝會堂舉行的文藝界新年團拜會，他在會上提出了“大寫十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二)”的口號，他說：“今後在創作上，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江青對柯慶施的舉措讚賞有加，她對張春橋說：“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掛帥，可以成為‘基地’。”

果然，根據毛澤東和江青的意圖，柯慶施指示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有江南“四才子”之稱的俞銘璜，寫了一篇《“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辯護文章《有鬼無害論》。文章經張春橋修改後，用“梁壁輝”的筆名，發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匯報上。筆名是柯慶施取的，寓“兩枝大筆一揮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響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槍。

## 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成立經過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在柯慶施呈送的上海舉行故事會活動的報告上批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又在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此時，即將展開的全國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一九六四年初，柯慶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個報告，動員在思想理論戰線全面開展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與會的是由市委宣傳部選定的五百多名理論隊伍及文教系統的各級領導，復旦大學到會的就有三十多人。為了具體實施批修鬥爭，柯慶施決定在上海實行“兩手抓”，一是抓成立《未定文稿》編輯部，二是成立上海市委寫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屬中共中央華東局的重要內部刊物，面向華東各省市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任主編，後由張春橋任主編，周原冰任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由華東局政策研究室主任龐季雲擔任，姚文元、金沖及、沈竹、欽本立(後任《世界經濟導報》主編)等任副主任。專門物色華東六省一市的筆桿子，撰寫批判意識形態領域國際國內修正主義思潮的大塊文章，先在《未定文稿》(我們口頭簡稱“內刊”)上刊登，等待時機成熟時再在公開報刊上發表。

至於成立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直接負責。一九六四年初，以撰寫一篇文章為任務，石西民在華山路丁香花園先後曾組建過文

學、經濟兩個寫作班子。到四、五月間，這兩個寫作小組的任務完成，小組成員下廠下鄉參加四清工作隊之後，石西民把我和當時文學研究室的主管葉以群找去，告訴我們，決定成立市委寫作班文學組，並由葉以群任組長，徐景賢任副組長，從各個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等調集寫作力量，人員的條件要求必須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政治身份以外，還必須是筆頭硬紮，有過寫作成果，參加過批修鬥爭實踐的。

葉以群當時任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上海文學研究室工作，他首先提出把文學研究室的一批青年理論工作者調來，他們都是各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其中有戴厚英(華東師範大學畢業)、高玉蓉、吳聖昔、吳立昌(均為復旦大學畢業)、高彰彰(南京大學中文系)、陳冀德(上海師院中文系)等人。同時，又從華東師範大學調來中文系教師王紹璽，從上海師範學院調來中文系教師徐緝熙。至於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一些老的研究人員，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紹文等都被留在室裏，未能到批修第一線。

文學組人員陸續到位後，隨着文藝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屬的電影局、電影廠派駐工作隊和工作組，開始揭露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條漢子”的問題。中宣部決定在文藝界首先開展對“毒草”電影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同意“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一些別的，都需要批判。”於是，在原定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鋪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寫作班文學組面臨着撰寫大量重點批判文章的任務，由於人手不足，決定再

從上海電影系統調集“筆桿子”，他們是《大眾電影》編輯部主任楊振龍，海燕、天馬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編輯蔡建平、趙志強、范維珩等，在丁香花園又成立了一個電影組。“戰鬥”最緊張的時候，還動員一些友鄰的“秀才”協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葉子銘，當時被“內刊”調來撰寫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的文章，適逢國內大批判打響，我們就動員他和文學組一起撰寫批判文章；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的湯大民，當時是上海文學研究室負責人郭紹虞帶教的進修教師，也被調來撰寫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工作的胡錫濤，當時已調任“內刊”文學組幹事，在“戰鬥”打響之前，也由市委寫作班文學組安排撰寫批判《早春二月》的重點文章。借調來的作者還有戲劇家協會的王一網等。市委寫作班文學組的全盛時間，總共有二十多人。

歷史組的成立時間，比文學組還要早一些，成員有金冲及、朱永嘉(他們兩人都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分別擔任過復旦大學團委書記、學生會主席和歷史系總支的領導工作)，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青年教師吳瑞武、王知常、朱維鏗等。早在復旦時期，他們就組合起來撰寫過關於討論“乾嘉學派”的文章，引起了石西民的注意。然後由《內刊》向他們約稿，要求撰寫一篇批判俄國老沙皇對華擴張、侵犯我國疆域的文章，配合反修鬥爭。《內刊》為了便於討論、修改文章，索性把他們調到丁香花園成立歷史組。以後，戚本禹在北京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認定太平天國名將李秀成為“叛徒”，引發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上海丁香花園歷史組的幾位筆桿子支持戚本禹的觀點，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大節、氣節、晚節》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參與論戰。最後毛澤東批示：

“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歷史組的文章也得到了領導的肯定。

歷史組最初由金沖及任組長，後因北京中央文化部整風深入，周揚已不能擔任文化部的領導工作，中央決定調石西民去北京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臨走時需要帶“筆桿子”，就把金沖及一起調去北京，上海就由朱永嘉接替金沖及擔任了歷史組的組長。一九六四年，上海市委寫作班成立以後，歷史組統一歸寫作班領導。

文學組和歷史組原來是各管各的，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也沒有嚴密的組織生活，領導管理也比較鬆懈。比如葉以群當了文學組組長以後，強調作家協會那邊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學》刊物的稿子，又要寫評論文章，沒有空到丁香花園來，就讓文學研究室的學術秘書王道乾有時來關心一下，但也只能蜻蜓點水。我的黨員組織關係還在市委宣傳部，不便對文學組外來的黨、團員指手劃腳。所以，當時由組織比較嚴密的華東局“內刊”黨支部一併管理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團組織生活。

有一次，南京師範學院來的湯大民和上海作協文研室來的戴厚英互相開玩笑，他稱她為“才女”，戴厚英還之以“才子”的稱號。這種調侃式的玩笑話傳到了“內刊”支部書記林學淵的耳朵裏，他一本正經向“內刊”副主編周原冰作了彙報。某一天，周原冰鄭重其事地來到了寫作班文學組所在的丁香花園東樓，把大家召集起來作了一次訓話，告誡大家不要搞低級趣味，要做“戰士”，不要做“院士”，等等。大家只好聽訓，不敢出聲。

因為這個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寫作班的張春橋和宣傳部長楊永直商量，把寫作班的兩個組(文學組、歷史組)的黨

員合編成一個支部。以後又增加了哲學組和自然辯證法組，哲學組的成員有從華東政法學院哲學系調來的郭仁杰，從市委黨校調來的程綺華、謝宗範等，自然辯證法組的成員有從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調來的沈竹、市科委調來的李寶恒、社科院調來的紀樹立等，都是黨員，由我擔任寫作班的支部書記，郭仁杰擔任副書記。於是，寫作班的黨支部進一步擴大了，組織關係隸屬市委宣傳部總支。

寫作班的“戰鬥任務”，由市委書記直接佈置，選題和文稿也由書記確定和審查。寫作班的黨團員組織生活，則由市委宣傳部總支管理。這樣，市委寫作班的領導關係、組織關係等，總算正式確定了。當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來到了市委寫作班以後，成了寫作班最重要的人物，我們又全力以赴，配合他寫文章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 市委寫作班的“寫作程序”

當時，上海市委對於理論隊伍、寫作隊伍有一條方針，就是“以戰鬥任務帶動戰鬥隊伍”。“戰鬥任務”是由毛澤東、黨中央和市委確定的，如發動對幾部“毒草”電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下達通知的。中央沒有提及的影片，各地不得擅自發動批判，中央沒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擅自提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北大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公開發表以後，上海市委為了爭取主動，發動對上海市黨內黨外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賀綠汀(中共黨員、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周信芳(中共黨員、上海京劇院院長)、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為歷史學



家、民主人士)、王西彥(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專業作家、民主人士)、瞿白音(電影局副局長、《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共黨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等，都是由當時的市委書記處討論後作出決定，把他們定為“牛鬼蛇神”，由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在六月十日召開全市大會予以宣佈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的。

“戰鬥任務”確定以後，市委寫作班子就進入“戰鬥”狀態，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編資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過上海電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這幾部影片的劇本要來，內部排印成冊。然後再印原著，摘編有關這些作品和影片的評論文章，例如印了夏衍改編的《林家鋪子》的電影劇本，還要印出矛盾的原著，加以對照，看看影片的編導對原著作了哪些增刪，同時還要把過去報刊上關於影片《林家鋪子》的評論文章中的論點，加以分類摘編，供批判用。

批判三十年代“國防文學”的口號時，首先要找到當時贊成“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和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彙編成冊，還把劉少奇為這場爭論所作的總結文章也編進去了。

為批判周揚的需要，寫作班把周揚在過去各個歷史時期所寫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寫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報的幾篇作品，全部編印成冊，以此作為批判用的“彈藥”。我曾在彙編資料的基礎上寫成《周揚在延安的反黨鐵證》一文，大量引述了原文加以批判。

在為姚文元撰寫《評“三家村”》一文做準備時，寫作班歷史組、文學組、哲學組全面動員，選編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吳晗、鄧拓、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及《燕山夜話》，還

分類摘錄了這些文章中有“問題”的觀點，編印成冊。

以上這些資料，全部交給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廠及文匯、解放兩個報社，印成大字本，標明“內部資料”、“供批判用”等字樣，上報給市委領導。同時在寫作班各組內部使用，並留存一部分由兩個報社提供給市委寫作班以外的社會各界特約作者撰寫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擬出批判文章選題。選題有的是由市委寫作班各組自擬，有的是和文匯、解放報社合擬。每一“戰役”都有一個選題計劃，除了重點文章以外，還有其他的配合文章。

例如姚文元的《評“三家村”》一文發表以後，歷史組就和文匯報理論部共同擬出選題：《“三家村”黑店是怎樣開張的？》、《反共知識分子的狂妄叫囂》、《“三家村”黑店如何惡毒攻擊我們偉大的黨？》等等。其中又分重點文章和配合文章，重點文章往往由市委寫作班撰寫，配合文章除寫作班承擔一部分外，再由報社約社會各界的人士寫作。這些社會作者也都是和報社經常有聯繫的“左派”人士，分佈在各高等院校、各文藝協會、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各所及市委黨校等單位，大都是年輕作者。

選題擬定以後，就要給寫批判文章的作者提供條件。像批判“毒草”電影時，除了提前給作者專場放映“毒草”影片以外，我還專程去北京，到中國電影資料館借閱資料，調看夏衍、田漢等人三十年代創作的影片《狂流》、《三個摩登女性》等，以便讓作者們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時深挖這些“祖師爺”們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開座談會。批判文章選題由市委領導批准以後，由報社出面，邀請市委寫作班人員和社會作者參加，討論選題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匯兩報和《大

眾電影》需各發一篇打頭陣的重要文章，分別由我、胡錫濤和電影局調來的幾個人撰寫，其他的配合選題就由與會各界作者分擔。

重點文章經報社排出小樣，由領導寫作班的市委書記直接審定。先是由石西民審查，石西民調走後就由繼任領導的張春橋、楊西光審定。有時他們寫下審查意見後，由寫作班執筆人員反復修改，再由報社派人來取，有的稿件不斷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後清樣，送市委領導終審決定何日刊登，這樣才打響了某次“戰役”的第一槍。

由於頻繁地發稿、排印、改稿，兩個報社的交通員有時一天要到市委寫作班來回好幾次，他們為了要趕速度，是開着輕便兩用車（類似現在的助動車）送稿樣的。當時兩用車在社會上還是稀罕物，報社交通員在等待取稿的過程中，寫作班的幾個青年作者心裏癢癢的，紛紛輪流騎上車，在寫作班的院子裏蓬、蓬、蓬地學開兩用車，一段時間下來，幾個人都學會了駕駛，可見當時報社和寫作班來往之密切。

### 市委寫作班的文章筆名

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決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狠抓階級鬥爭的產物，體現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要在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最高指示”。上海市委寫作班這個名稱，就是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起的。當時參加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心中都十分自豪，認為自己是黨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願地做黨的喉舌，用自己的筆積極投入思想戰線的階級鬥爭。美其名曰“遵命文學”，實際上全是奉命寫作。這一點，從寫作班所寫文章的筆名上也可以看出來。

寫作班成立初始，正值全國開展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高潮。寫作班除了寫大塊文章的姚文元由領導決定用真名外，其他的人寫文章，基本上都不用真實姓名，而是用集體筆名，特別是重點文章，更是領導意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一概用筆名。寫作班文學組的重點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歷史組的重點筆名是“羅思鼎”，意思是“學習雷鋒，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學雷”、“羅思鼎”的文章，就知道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聲音。大批判文章的語境也是居高臨下的、以勢壓人的、主觀武斷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討的、說理的、商榷的。這種學風和文風，正是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產生的特殊文化產物。

除了“丁學雷”、“羅思鼎”以外，寫作班各個組還用過很多筆名。從文革前的市委寫作班到文革期間的市革會寫作組，用過的筆名不下幾十個。比較有影響的如歷史組用過的筆名“康立”（武康路歷史組的諧音），這是從丁香花園搬到武康路，後來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學組除了“丁學雷”以外，有的集體文章要另起筆名，我曾建議說：“我們剛剛開始做毛澤東的學生，就起一個叫‘方澤生’吧！”後來又寫了另一篇較有份量的文章，我又給起了筆名“方岩梁”（毛澤東詩“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諧音）。

因為寫作班一開始住在丁香花園，文章的筆名姓丁的特別多：兩人合寫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寫的叫“丁川”，多人合寫的則又用過“丁影”、“丁聞”、“丁葵”等名字。這些署筆名的文章，在寫作的時候，往往由一個人先執筆起草初稿，另一個人修改，集體討論後又有人作進一步加工，直至最後完稿、定稿，其間往往要經過很多人的手，所以，現在要來

回顧哪一篇批判文章是誰獨自完成的恐怕很難，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區別了。像後來市革會寫作組《魯迅傳》編寫組的十一個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筆名集體寫文章，正是繼承了這樣的傳統。

即使完全是個人寫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種各樣的筆名，使對手摸不清底細。比如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以後，姚文元又在武康路二號寫了一篇批判“清官”問題討論中的不同意見的文章，發表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文匯報上，題目是《奇妙的邏輯——錄以待議》；接着，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文匯報上又發表《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一文，狠批歷史學家李平心。兩篇文章都以“伍丁”作為筆名。當時姚文元正和寫作班歷史組同在二樓辦公，歷史組的基本班底是四個人：朱永嘉、王知常、吳瑞武、朱維錚，都是從復旦大學調來的。姚文元寫完後，開玩笑說：“你們歷史組四個人，加上我是五個人，共同來批李平心，所以文章的筆名就叫‘伍丁’吧！”這就是“伍丁”筆名的來歷。因為“伍丁”出手太狠，在文章中給李平心扣上“反共老手”的政治帽子，使李平心不能承受這樣沉重的政治壓力，以後又接受不了沒完沒了的批判，就在家中開煤氣自殺了。姚文元還曾給文匯報寫過幾篇批判文章，他說：“毛主席廬山仙人洞詩中有‘暮色蒼茫看勁松’的句子，‘勁松’這兩個字含義很好，就用勁松做筆名吧！”文章發到報社去，除了我們以外，只有文匯報總編輯陳虞蓀一個人知道，他把“勁松”文章發在顯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當時在盧灣區工作，姚文元寫文章時也用過“金文”、“金兆文”做筆名。

寫文章除了“名”，還有“利”，我們為了和“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決裂，在市委寫作班提出寫戰鬥文章不要稿費。

我們既然宣稱自己在丁香花園學雷鋒，而且要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我們既然認為調到寫作班是非常光榮的事，是黨在思想戰線前沿的戰士，現在黨號召的戰鬥打響了，黨指向哪裏，我們就衝向哪裏，那麼，寫這樣一類文章怎麼還能要稿費呢？於是，從寫作班一九六五年遷到武康路二號之後，我們就通知報社停發我們寫作班的稿費，而且把早期寫的幾篇文章收到的稿費，上交給市委作黨費。

從上海和全國來講，解放以後取消過兩次稿費：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報刊都取消了對所有作者的稿費，但到一九六二年，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以後，隨着各項經濟政策的調整，稿費又恢復了。第二次全國和上海廢除稿費制，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但我們寫作班早在文革之前就提出不要稿費了，表示我們最“革命”。而且我除了在寫作班提倡不拿稿費以外，還和上海戲劇學院教師陳耘、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章力揮商量，把我們三人合作的得獎話劇《年青的一代》的出版稿費，總共人民幣一千二百元全部上繳。當時的一千二百元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因為我每個月的工資只有八十二元五角。

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看到我們夜以繼日，寫作很辛苦，就讓市委秘書長李家齊來找我，說是要“慰問慰問寫作班的同志們”。怎麼慰問呢？燒幾個好菜。當時我們不管在丁香花園或是在武康路二號，大部分人員住集體宿舍，而且沒有自己的伙房，一日三餐都是從延安西路市委伙房裝上黃魚車用棉被蓋住拖來，讓大家自掏腰包買飯票吃飯。李家齊秘書長覺得過意不去，就用我們上交的稿費，犒勞我們，要延安西路市委伙房的大師傅做了三桌菜，什麼松鼠鱖魚、脆皮鴨子等，送到武康路二號樓下大廳裏，放在幾張乒乓球桌上。我把寫作班各組的人

員全部召集攏來，把姚文元也請來，共同聚餐，皆大歡喜。

### 解剖我到寫作班時的心態

當初上海市委決定成立寫作班，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和宣傳部長楊永直商量，決定從宣傳部調我去寫作班工作的時候，我的內心是興奮的，因為我感到自己越來越受到黨的領導的重視，而且覺得自己這幾年走的這一條寫作道路走對了。

一九五一年我到市委工作時還不滿十八歲，在黨的高級機關工作了幾年之後，深感黨內的論資排輩和等級思想非常嚴重，像我這樣的年輕幹部，又是解放後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在黨的機關裏脫穎而出，簡直難上加難。我曾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徐平羽的秘書孫錫鈞議論過：像我們這樣有點“志氣”的人，能不能做到：二十歲當幹事，三十歲當科長，四十歲當處長，五十歲當部長，六十歲當市委書記。兩人估量機關的形勢後，一致認為：不可能！因為領導機關裏“老資格”太多了：有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有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這個階段還分“三八”式的(抗戰前期)和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抗戰後期)，至於解放戰爭時期的南下幹部和上海的地下黨員，在機關裏比比皆是，大量的人只能當一般幹部。每次提拔幹部，都要“論資排輩”；住什麼房子，吃什麼灶，甚至連用什麼辦公桌，坐什麼椅子，都要講職務，按級別，不得逾越。所以像我們這樣解放後參加工作的新幹部、新黨員即使自認為有能力，有才幹，但想要在仕途上謀求發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於是，我選擇了從事寫作的道路。

在黨的領導機關裏要從事寫作，從組織上說是不鼓勵以個人名義寫東西的。首先要求你的寫作應該和工作結合起來，我作為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幹事，平時要寫情況反映、調查報

告、工作總結、報刊述評……還有就是為領導寫各種各樣的文章和發言稿。例如我們曾為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起草《上海民歌選》的序言，為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石西民撰寫《上海新兒歌選》的序言。此外，我還得接受有關領導佈置的寫作任務，比如：宣傳部主持工作的常務副部長陳其五，要我為他起草評論上海文藝創作傾向性問題的文章，刊登在《上海文學》刊物上；宣傳部副部長兼電影局黨委書記楊仁聲，要我為他撰寫綜述上海電影創作的文章，刊登在解放日報上。用了他們的名義，報刊寄稿費來，有的領導(如柯慶施、石西民)把稿費轉給我們，有的領導則請我們吃一餐飯，還有的領導竟然署了名還收下了不應屬於他自己的稿費，我們也都無話可說。

在完成上述工作任務之後，自己當然也可以用個人的真名實姓寫一些文章，但由於我們在黨委機關工作的特殊身份，即使個人寫文章，也要經過領導審查同意，特別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章。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要打破對權威的迷信。當時巴金是文學界的權威，他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法斯特的悲劇》，對寫過著名小說《斯巴達克斯》的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宣佈退出美國共產黨一事，表示了惋惜和同情。我當時認為巴金的觀點和感情是錯誤的，就寫了一篇長文《法斯特是萬人唾棄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實際上以商榷為名，批判為實。但對於像巴金這樣一個黨外知名人士能不能進行批判，我沒有把握，估計報社也不敢登。我就把文章報送石西民審查，石西民閱後同意發表，並在送審稿上簽名，經過領導批准，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文匯報就用整版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長期以來，在從事寫作的過程中，我深受黨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與薰陶，在意識深處，時時、處處、事事要做黨的馴服工



具，要讓自己的筆桿子聽從黨的指揮，要為“輿論一律”做出自己的貢獻。所謂黨的指揮，具體來說，就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令，就是中宣部的指示，落實到上海，也就是柯慶施的講話和上海市委的精神。我看張春橋當時為柯慶施起草文章和報告，就是這樣做的。姚文元寫文章，更是亦步亦趨：在一九六四年華東話劇匯演期間，柯慶施看了戲，認為安徽省選送的表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話劇《毒手》，是一枝大毒草，姚文元得知後馬上寫了長篇文章加以批判；柯慶施認為南京軍區參加會演的話劇《第二個春天》是個好戲，姚文元又寫了一整版的文章加以讚揚。我們美其名曰“遵命文學”，實際上完全以貫徹領導意圖、揣摩領導思想、緊跟領導精神作為我們寫作的基本信條。

不過，體會領導意圖也有體會錯了的時候：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各條戰線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對黨的文藝政策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提出了意見。誰知道反右派鬥爭一開始，有人就撰文批評我的“右傾言論”，差一點被劃成“右派”。這段經歷使我嚇出了一身冷汗，讓我得出了了一個教訓，就是：左比右好，教條主義反不得；領導上提倡左，我寫文章要比領導更左；“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這是我長期以來的認識。我暗自思忖，要向姚文元學習，他解放初期就在《文藝報》上批判上海的滑稽戲《活菩薩》，以後又在反胡風鬥爭中批判胡風等人，直至在反右派中寫了大量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我要像他那樣，要始終高舉批判的旗幟，自覺成為黨的喉舌和黨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實行全面專政的工具。

這種思想文化的影響所及，不但深入寫作者的靈魂，而且滲透到幾乎每一個報社、雜誌社、出版社、廣播電台、電視

台、電影廠、劇團、學校和各個社會科學、文化藝術單位，這些單位的黨的領導者都要誠惶誠恐地打聽領導意圖，揣摩領導精神，據此指導自己的工作，嚴重地扼殺了自由思考和獨立精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由於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次次階級鬥爭，由於一個又一個的大批判運動，造成的後果是：完全聽命於某一個人或某一級組織的指示和號令，誰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這種思想文化影響深遠，我認為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動的思想基礎。

至於我自己在反右派的後期，接受了“教訓”，馬上調過頭來，一連寫了好幾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左些，再左些”，決心堅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陣營這邊。除了寫評論文章，在文學創作方面，我也決心堅守革命題材，我寫出了謳歌革命烈士的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出版後被列為上海“紅旗讀書運動”的必讀書。上海戲劇學院教師陳耘寫出了話劇《年青的一代》的初稿，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又把文藝處副處長章力揮和我調去，合作修改劇本，正式發表、出版、上演並拍成電影，風靡全國，並得到了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創作獎。我還寫了一批散文和報告文學，結集出版了《生命似火》一書，在後記裏我這樣寫道：“黨一再教導我們：要把筆當作槍刺，毫不容情地對資產階級的腐朽勢力和反動思想進行猛烈的射擊；要把筆當作號角，永不停歇地為無產階級的英雄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吹奏嘹亮的壯歌！”這就是我和“右傾”思想的決裂宣言；這就是我在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的寫作誓言。

當時有人見我既搞創作又寫評論，就罵我是“兩棲動物”，我對姚文元說：“他們越是這樣罵我，我越要用十八般武藝和他們鬥！”經過多次思想戰線的鬥爭，我感到像姚文元這樣專寫評論，更能直接地貫徹執行黨的意圖，更能尖銳地揭

示資產階級腐朽勢力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反動思潮，所以我對寫作評論文章格外重視起來，撰寫了多篇批判文章，加重了天平的這一端。這次市委領導正式把我調到寫作班，委我以重任，我覺得這正是對我的左派地位的確證，是對我的高度信任，因此我當時的心情是愉快和興奮的，我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戰鬥。

以後，我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積極投身文革，賣力參與上海一月奪權，直至身處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高位，是和我在上海市寫作班這一段經歷緊密相連的，是和我長期接受共產黨的文化的薰陶和教育，形成一套根深蒂固的極左世界觀密不可分的。

## 結束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將我列為江青集團的重要骨幹，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當我從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上跌落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的“煉獄”底層以後，坐在潮濕的水泥地上，握着冰涼的鐵柵欄，我終於要獨立思考，對人對事要有自己的見解了。我們曾經努力地去響應和實踐毛澤東的號召：無產階級要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專政。在毛澤東的統帥下，姚文元成了全國的輿論總管，我則成了上海的輿論總管。我所信奉過的“一言堂”，我所嚮往過、鼓吹過的“姚文元道路”，實際上是一條文化專制主義一統天下的道路。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管轄和控制下，人們往往“以言致罪”，“以文致罪”；在社會上只能“輿論一律”，只能聽從“最高指示”，只能容得下一家之言，不允許有自由思想，不允許在媒體上存在不同的聲音，更不允許批評領導人。當時許多自稱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卻容不得言論自由，更容不得出

版自由，而馬克思卻一針見血地指出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們真是愧對“老祖宗”了！

我期待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臨！

### 第三章

## 紅衛兵運動對我的衝擊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一張大字報，上海也跟着亂起來了。六月十日，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佈公開點名批判八名黨內外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接着，各單位一批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紛紛挨整、遭受批鬥，社會上的抄家、打砸搶成風。

張春橋、姚文元去了北京。臨走前，張春橋把上海市委寫作班交給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領導。可是，因為復旦大學運動的興起，楊西光分管教育衛生系統，忙於處理復旦大學的事務，就顧不得我們這邊的工作了。我記得，這段時期他也曾和我一起到《解放日報》、《文匯報》去為幾篇重點文章定稿，但總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我感到他的日子比較難過。

###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

我們寫作班隨後寫的一些大批判文章，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大家都把注意力轉移到政治鬥爭方面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北京紅衛兵就開始南下串聯。陸續到達上海的有大學紅衛兵，也有中學紅衛兵，都是自發的，沒有嚴密的組織。他們到上海後散住在各個學校，並到市委上訪，要求瞭解上海市的運動情況。市委成立了專門的接待站，也指定寫作班派人參與接待，我就同意把從華東師大選來的寫作班文學組成員王紹靈，調去擔任紅衛兵

接待站政宣組的組長。我自己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紅衛兵。

當時，上海市委對外接待的基本口徑是：上海市委不同於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緊跟毛主席、黨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確的。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來煽風點火，市委就佈置我們以這樣的口徑對外接待、宣傳。我以寫作班筆名“丁學雷”的名義接待北京紅衛兵的時候，總是強調上海市委領導了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質的不同。上海市委也樂意利用寫作班作為應付北京紅衛兵和上海群眾的擋箭牌。市委辦公廳還要我安排寫作班的成員到延安西路三十三號市委機關大門口去值班，歷史組的人值上午班，文學組的人值下午班，有的人還要值通宵班，擋住來勢洶湧的紅衛兵。

可是，這樣的局面維持不了多久，市委大門口就越來越亂。北京紅衛兵傳來了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他們主張對上海市委也要“炮打”。他們說：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以後自然會有結果。可是上海市委組織了大批工人和農民到市委延安西路大門口，和北京紅衛兵展開大辯論，上海一方的觀點是：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現在的上海市委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不應該“炮打”。雙方各執一詞，爭論非常激烈。

我們守在市委大門口，和上海工人持同樣的觀點。北京紅衛兵到上海的學校等基層單位串聯，認為上海的運動是捂蓋子，和前一階段的北京情況相仿，因此強烈要求上海市的領導人接見表態。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市委書記處的幾個書記到場，和三千多名北京紅衛兵見面。曹荻秋的講話剛剛結束，北京紅衛兵就衝上台，指責市

委把上海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見面會變成了聲討會。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紅衛兵的代表來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門口，要求市委單獨接見，履行昨天大會上的承諾，雙方發生了衝突和爭執。北京紅衛兵越聚越多，堅持了好幾天，就發生了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關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發生的這一事件，有一位直接指揮這次活動的當事人，在二零零五年八月當面找到我，向我詳述了事件經過。他姓孫，當時是來滬的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簡稱“北航紅旗”)這一組織的紅衛兵。為了力求保存事實的真相，我把他的口述內容記錄如下：

一九六六年，我在北京航空學院讀四年級。毛主席“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以後，我以“北航紅旗”紅衛兵的身份，到上海串聯。我們感到上海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幾個人一商量，決定到延安西路三十三號上海市委，要求面見當時主持工作的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可曹荻秋就是不見，我們就在市委大門口靜坐。

從九月一日到三日，市委門口北京的紅衛兵越來越多，有大學的，有中學的，都來聲援我們。市委調來了許多工人隊伍、農民隊伍，把我們包圍起來。有的老工人、老農民還哭着勸說我們，說解放以後虧得共產黨，才使他們翻身得解放，要求我們把隊伍撤走，不要為難上海市委。到後來調來的工人隊伍越來越多，有幾千人，把我們層層包圍起來，和我們辯論，指責我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們還發現背後還有市總工會的領導和區委書記等到現場指揮。他們把我們當作“洪水猛獸”，不讓我們吃飯，甚至不讓我們大、小便。我們晚上睡在馬路上，躺在大雨裏，堅持不散。

在形勢最嚴重的時候，我設法擠出包圍圈，這天晚上，我和賀龍的兒子賀鵬飛以及北京的中學紅衛兵彭小蒙三個人在南京西路靜安寺的一個轉角上碰頭，商量下一步怎麼辦。賀鵬飛說他要乘飛機回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向江青阿姨彙報上海市委的情況，只是我們幾個人身邊都沒有錢，沒法買機票。賀鵬飛就說附近有一個有錢的資本家，去抄他們的家，抄到了錢買飛機票趕回北京去。我們就分手了，不知道他後來是不是去抄了家，怎樣回了北京的。

我返回到上海市委大門口，北京來的中學紅衛兵越來越激動，他們主張衝進去，我不主張衝。市委的值班人員看到我是領頭的，就把我請進市委機關辦公室，拿出很多麵包請我吃。我堅持要求曹荻秋接見，遭到拒絕。我回到馬路上告訴大家上海市委的態度，這時已經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了，北京的中學紅衛兵們按捺不住，就集體往市委機關裏衝。機關工作人員拼命阻擋，當場發生了衝突。北京紅衛兵們揮舞着皮帶衝了進去，有的還一直衝到辦公大樓的樓頂上，樹起了旗幟。這件事震動了全上海，這就是所謂衝擊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 紅衛兵打、砸、搶和“漕溪北路事件”

上海市委在這段時期不斷向中央發電報，指責北京紅衛兵太無組織，搞亂上海，衝擊市委，要求中央採取措施。市委還組織老工人、老劳模像楊富珍等人聯名向中央發電報，因病一直處在幕後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又直接多次向周恩來總理打電話，反映北京紅衛兵來滬的情況。接着，上海市委就張貼出了大字報，說周總理在電話中表態：“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確的。”於是，又一次引起北京紅衛兵和上海群眾的激烈爭論。



關於周總理的電話真假，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到北京參加中共“九大”時，在預備會議上見到周總理，曾經當面詢問他有沒有這回事？周總理回答：“我是說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為當時它畢竟領導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嘛，但我決沒有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因為誰都犯過錯誤，連我都犯過錯誤。怎麼能說自己是正確就不能接受群眾的批評呢？”

結果，“周總理的電話”仍阻擋不了來勢洶湧的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的黨政機關。在上海市委的一再要求下，中央發了一個通知，決定一方面組織各地紅衛兵上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和檢閱，另一方面決定有組織地安排北京紅衛兵去外地串聯。於是，就在九月十日由國務院組織第二批紅衛兵來上海，人數達幾萬人，其中很多是幹部子弟。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揚言：“這批紅衛兵是來保上海市委的！”

這批紅衛兵統稱“南下兵團”，分成十幾個中隊。上海市委對他們的到達非常重視，專門派車隊迎接，由摩托車開道，一路十分威風。他們一到上海，就大肆宣傳“血統論”的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市委安排他們到各區、縣，為他們召開座談會。他們提出的問題是：上海怎麼批判牛鬼蛇神？怎麼鬥地、富、反、壞、右和反動資本家？怎麼抄家？有哪些成果？等等。總之，他們的矛頭大都指向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和“階級敵人”。

同時，上海本地的一批紅衛兵也和他們結合起來，有些高幹、軍幹部子弟鬧得很兇，像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兒子帶着一批紅衛兵，穿着長皮靴，開着摩托車，揮舞着皮帶到處打人。市委怕北京紅衛兵把火燒到自己頭上，不敢管束他們，乘勢儘量把他們引到社會上去。而這批來上海的紅衛兵有不少是幹部子弟，他們也不會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對準自己

的叔叔、伯伯們，因為要保護他們老子的利益。這樣，掌權者和紅衛兵雙方都把火力集中用來對付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這些紅衛兵在上海以破“四舊”為名大搞抄家和打、砸、搶，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隨意打人，造成一個所謂“紅色恐怖”的局面。

我很反對紅衛兵打人，就組織寫作班歷史組和文學組的成員寫大字報，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寫完後由王知常、朱維錚等人連夜張貼到北京紅衛兵居住比較集中的黃陂路等處，向他們作宣傳。這批紅衛兵在上海鬧得天怒人怨，市委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反映，中央就趁國慶節到來的機會，通知北京紅衛兵回去過國慶，這總算使上海在國慶節前後又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

北京和外地紅衛兵在上海的打、砸、搶行為，還釀成過一起“漕溪北路事件”，出了兩條人命，引起上萬人的圍觀和辯論，市委不得不派我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前去處理。漕溪北路是在上海徐匯區的一條馬路，聚居着很多居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有八名外地紅衛兵，都是軍幹子弟，有幾個是師長、團長的兒子，來到上海揚言要整“牛鬼蛇神”。他們闖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報，看到大字報上點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張炳生是“反動資本家”（實際上張只是小業主），又以張的兒子張俊發在工作單位天馬電影製片廠表現不好為理由，找到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幹部，要求提供材料，並直接上門“教訓教訓”這一對父子。然後，他們就闖進張家，嚴刑拷打張炳生父子，把他們兩人活活打死，還砸爛了屋內的傢俱物件。這一事件激起了眾怒，有上萬人天天圍堵在漕溪北路抗議、辯論、貼大字報。市委怕局面失控，趕緊派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組前去平息事態，並派市公安局林德明副局長配合我。

我到漕溪北路天福里現場去調查的時候，只見這一條老式的石庫門弄堂內，裏三層外三層擠滿了人，大家都在激動地議論，有的指責打人者手段殘忍，有的埋怨里弄幹部向紅衛兵提供了材料，還有的責備派出所嚴重失責。為了平息局面，我們決定先由公安局對打人者和有關里弄幹部、民警採取保護性拘留措施。但是，事態還是無法控制，在北京紅衛兵和上海電影製片廠造反派的策動下，在文化廣場召開了批判漕北地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萬人大會，從此在上海刮起了一股批鬥里弄幹部之風。一直蔓延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之後，我要文匯報發表了《不准批鬥里弄幹部》的社論，才算把這股風煞住。漕溪北路事件中的打人者後來也移交給原籍公安部門處理。

我當時的政治態度是要盡心盡力地維護市委的領導，市委也很重視寫作班所能起的特殊作用，特意安排我出席全市的國慶招待宴會，還讓我以“丁學雷”的名義，在十月十九日文化廣場舉行的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作了專題報告。國慶節期間，市委秘書長李家齊找我，說市委決定從寫作班派一個人到北京去，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常住在上海市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專門負責搜集中央首長的講話和北京市的運動情況，及時回饋給市委，供市委作決策參考。由於歷史組朱永嘉在《海瑞罷官》批判期間和張春橋、姚文元較為熟悉，最後市委決定派朱永嘉前去擔當此任。

## 我成了群眾運動的對立面

隨着運動的發展，市委分配給我們的額外任務，把我們推上了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例如一九六六年國慶節以後，上海市文藝界和電影界的造反派都起來了，他們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要求市委領導到場，可是市委書記和市委常委都推諉不

去，叫我代表市委去。那些造反派見市委領導都避而不見，怒氣衝天，就拿我當作批鬥靶子。市委派車送我到文化廣場，可一進了會場，我就變成了對立面，被推搡到台前。他們揭發市委的問題，要我站在台上聽，還要我表態，結果我成了整個批判會的“鬥爭焦點”。他們說：“丁學雷，你是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具，市委把你送到這裏來做擋箭牌！”我想：這話不錯，我真成了一塊到處替市委抵擋群眾運動的“擋箭牌”了。

電影廠的造反派在大會上給我拍照示眾，手裏拿着拍電影的聚光燈，把燈具放在我腳下的地板上往上打光，拍出來的照片使我的臉拉得很長，臉上還有一團團的黑影，顯得很醜陋、很恐怖。他們後來還把這些醜化我的照片拿給我看過。我心裏直埋怨市委領導，覺得自己是代人受過。造反派還要求市委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的，造反是有理的，我一個小小的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沒有得到授權，既無法承認他們的組織，又不能批經費，更不能簽字，什麼任務也沒有完成。他們轟了我一通，把我批判一番，就打發我回去，我心裏感到十分委屈。

回到市委，見到市委書記們、常委們，一個個苦着臉坐在康平路小禮堂裏，惶惶不可終日。這裏、那裏，各條戰線都要開批判會，都指名要他們去。我感到，他們的日子固然難過，我自己又何嘗好過呢？從前我們在寫作班參加“戰鬥”的時候多麼光榮，能夠完成一項又一項的寫作任務，能夠直通中央，到現在怎麼變成了這種狀況？所以，有相當一個時期我的心裏非常苦悶，不知道出路在哪裏。

我很想直接聽到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對於北京傳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開始時我是將信將疑的。那時我在市委門口值班，北京紅衛兵把《炮打司令部》抄成大字

貼在接待站裏。我很奇怪：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麼會讓非黨的北京紅衛兵帶來？黨組織為什麼不逐級傳達？所以一開始懷疑它不是真的。我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居然不能從正常渠道聽到毛主席的聲音，覺得不正常。但看看這份大字報的口氣完全是毛主席的，我真有點暈了。去問市委領導，他們也不否認有這張大字報，而是默認了。我便認定毛澤東的大字報是真的，但奇怪它為何不在黨內正式傳達。我又想：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而上海市委基本上總還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吧！我在思想上、感情上還沒有把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開。我多麼想直接找到張、姚呀！

可是，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以後，從不跟我們主動聯繫。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在文革中首當其衝，受到文藝界造反派的圍攻，我曾為他幾次解圍，從造反大會會場上把他解救出來。他很感激我，對我說：“你要與姚文元多聯繫，多一點信息，我們現在很被動。”楊永直知道我和姚文元交情不錯，讓我在市委宣傳部給姚文元多打電話，部長室就有保密的電話紅機子，但打過去姚文元不接。多次打電話打不進去，說明姚文元不願意聽電話。只有一次，于會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劇現代戲，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要把他揪回來，這事鬧到市委宣傳部，究竟怎麼處理？楊永直急死了，要我以于會泳有急事要請示姚文元為理由打過去，姚文元總算接了一次電話。他在電話中說：于會泳前一時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樣板戲的，不要隨便揪人。姚文元在電話中給于會泳做了一次證明，才避免了于會泳被揪鬥。

我想，姚文元不肯接電話，總有他的理由。在上海的時候他就守口如瓶：江青怎麼接見他？毛主席怎麼審改他的文章？他從不向寫作班的成員透露。調到中央以後，他更是滴水不

漏。就在我為了于會泳的事情和他通電話時，他也表露過這個意思：“我這裏不方便直接跟你們經常聯絡。”我知道那時中央政治局已經不大起作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了毛澤東直接領導文革的決策機構，我打電話找姚文元，主要是為了打聽中央文革的精神，他也清楚我的意圖，所以對我採取迴避的態度。我心裏明白，因而更加不願意多找他。

我和張春橋、姚文元無法直接連上線，朱永嘉派到北京後也沒有機會和他們直接接觸，所以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我們市委寫作班成員也是我的苦悶期，日子比較難過，文章也很少寫。因為報紙上登的文章已經不是一般的思想戰線方面的鬥爭了，而是直接進入政治鬥爭的領域了。分管寫作班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被紅衛兵到處揪鬥，再也沒有人管我們了。整個寫作班單獨懸在那裏，所有成員除了參加學習、開會、接待、值班以外，不知道幹些什麼才好。我還被曹荻秋叫去參加市委常委會，代他起草檢討，以應付中央和紅衛兵的責詢。我還沒有決心和市委決裂，這一時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 我和北京紅衛兵交上了朋友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以後，第三批北京紅衛兵來到了上海，和第一、第二批大不一樣的是：他們基本上不是幹部子弟，沒有“貴族血統”，而且在北京自己的學校裏都經歷了黨委和工作組對他們的壓制，後來又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對他們的支持，因而有着比較豐富的鬥爭經驗。他們來上海不是去社會上掃“四舊”、揪所謂的“老吸血鬼”，而是把矛頭直指上海各級黨的領導，重點批判的是鎮壓群眾、打擊壓制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在紅衛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接待北京紅衛兵時，和幾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了較密切的交往，他們是中國科技大學的許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學的胡軻等人。他們比別的紅衛兵要早些來到上海，早在八月份他們就到上海機器製造學校支援學生造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反，以後又到上海文藝界、醫務界進行調查研究，直接介入青年話劇團、黃浦京劇團和青年報社的運動，支持那裏受壓制的造反派。他們成立了一個“齊衛東戰鬥隊”，寫了許多《一評造反派》《二評造反派》的文章，分析全國和上海的形勢，在上海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中引起了轟動和爭論。他們和那些在社會上衝衝殺殺的紅衛兵不同，他們從不參與打、砸、搶和抄家，而是經常在海關學校和華亭路一個醫務界的據點裏找人談話，研討問題。他們能言善辯而又勤於思考，很快贏得了我的好感。

許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頭，比我要小十來歲，戴着眼鏡，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但討論起問題來卻十分認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們在紅衛兵接待站遇到了我，知道我是市委文革小組的成員，開始時對我還抱有戒心，經過幾次接觸，發現我不是黨的高級官員，而只是市委寫作班的一個普通的支部書記，就和我逐步接近起來。他們約我到“齊衛東戰鬥隊”住的海關學校去，給我看他們撰寫的文章，邀我到華亭路他們的工作據點去參加辯論沙龍，給我講述他們的南下理念。甚至還讓他們身邊的中學紅衛兵找到常熟路瑞華公寓我的家裏來，給我送各種資料。我的強烈感覺是：他們要對我進行造反的“啟蒙”教育。

我並不厭煩他們，相反我覺得他們無私、真誠，沒有個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傳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他們告訴我：毛主席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目的，就是

要通過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都檢驗一下，看他們能否過得了社會主義的關。

我對他們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不能隨便“炮打”，還是應該分清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不然我們會犯一九五七年右派犯的錯誤。

他們說：今天的形勢和一九五七年不同了，那時資本主義改造剛剛完成，共產黨的政權還需要進一步鞏固，現在則是黨的領導地位已經絕對鞏固了，鑒於蘇聯變成修正主義的教訓，毛主席在“二十三條”和“十六條”中都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反修防修的大演習，和反右派時的階級鬥爭形勢根本不同。

我說：有些地方、有些幹部因為對文化大革命這樣搞法不理解，對毛主席號召群眾起來搞大民主的形勢不適應，所以執行了壓制群眾的錯誤路線，我們應該說明他們而不是一概“炮打”。

他們說：現在的體制和機制都是保護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的，他們長期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搞特殊化，還憑藉自己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地發號施令、鎮壓群眾，聽不得不同意見，所以群眾一起來，他們因為害怕群眾，就執行了壓制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對他們進行“炮打”，猛擊一掌，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也讓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我說：這樣搞法豈非天下大亂了？

他們說：對！我們的前提就是要亂一亂，打亂原體制的陣腳，打碎它原來的一套。不然，這些領導幹部一貫認為反對他們就是反對黨，而且有原來體制的保護，他們有恃無恐，根本



不會來理睬你。我們通過群眾的批判和監督，搞得他們很狼狽，使他們不得不放下架子，他們才會聽你們的。大多數人才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堅定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我問：那末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究竟是什麼？

他們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要把社會主義的命運，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群眾手裏。現在群眾覺悟高漲，需要通過群眾說明幹部，把他們的立場轉變過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通過文化大革命確立反修防修的機制，建立群眾今後有監督領導的權利制度，建立群眾有充分發表意見的大民主制度，這才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這才能保證我們的江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啊！

我感到這些大學生真會思索，真有“思想”。他們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們的年齡很不相稱。我至今還記得：“齊衛東戰鬥隊”的許小昆在和我辯論的時候，目光灼灼，神態堅定，他直盯着我的雙眼逼問：“你願意做上海市委反動路線的工具，還是做一個真正和群眾站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不得不垂下頭來，從內心表示折服：這些年青年人來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飯食，晚上睡在教室裏的硬課桌上，沒日沒夜地找人談話，調查研究，鼓動群眾，就像“五四”時期南下宣傳的北京大學生一樣。我暗自思忖：他們圖些什麼？他們什麼也不圖，他們只是想宣傳他們最忠誠堅信的毛澤東思想，他們只是想將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付諸實踐。當時他們對毛澤東的學說表示無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們一模一樣，對毛澤東的每一條“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執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佩服這一些紅衛兵和大學生們的踏踏實實的工作，而我

也不滿意一些人下車伊始、哇啦哇啦、指手劃腳的作風，所以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奉毛澤東與中央文革之命來到上海的時候，我聽說了她的一系列講話，對她抱有成見，根本沒有和她見面。我寧願到海關學校的小屋裏和“齊衛東”們促膝談心，也不願意聽“老佛爺”的喋喋不休。

說實話，我和北京紅衛兵的友誼，對我後來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確實起了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許小昆更不會想到：就是他的一個電話，使我和來到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接上了頭，從而引出了一場關於張春橋簽字同意“工總司”五項要求的大爭論，直接驚動了毛澤東，並且影響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進程。

## 第四章

# 我見證了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天剛濛濛亮，我家裏的電話鈴聲急驟地響起來。

我拎起電話，是中國科技大學來滬的紅衛兵許小昆打來的，我和他在上海市紅衛兵接待站相識並有過交往。他在電話裏急切地說道：“我剛從安亭回來。你知道嗎，幾千個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要求市委接見並承認這個組織，市委不予理睬，他們就乘火車北上告狀，被困在安亭車站。中央文革派張春橋同志趕到現場處理。昨天工人們已經接受張春橋同志的意見返回上海，張春橋對他們有過承諾，他們不放心，這批人現在等在文化廣場，一夜沒睡覺，要求張春橋見他們，但沒有辦法和張春橋聯絡。張春橋回到上海後在家裏休息，請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他，轉告他安亭回來的工人們正在文化廣場等他。”

我知道在安亭發生的事件鬧大了，心中也非常着急。

### “安亭事件”的發生

安亭是京滬線上的一個小車站，地處上海市嘉定縣的南翔鎮附近。一個小站發生的事件怎麼會驚動北京的黨中央呢？這還得從文革中的上海工人運動說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來滬的紅衛兵和上海的大學紅衛兵的策動下，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王洪文、玻璃機械廠的潘國平、良工閥門廠的陳阿大、合成纖維研究所的葉昌明等

人，參加了一個“上海工學串聯經驗交流會”，會上確定要成立一個全市性跨行業、跨地區的工人造反組織，定名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據王洪文後來告訴我，在促進建立“工總司”的組織中最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是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派來的紅衛兵名叫包炮，當時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

成立組織可是一個敏感問題，在當時的體制下，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全國總工會和各地的工會組織都由官方籌建，下屬各個產業工會和地區工會，決不允許有與此相並行的跨行業、跨地區的工人組織存在。因此，當“工總司”發起單位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認這個“合法組織”並通知市委領導人參加成立大會時，市委立即向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鑄請示，陶鑄答覆“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總司”在陝西南路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在會上通過了《宣言》，聲稱“工總司”“要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對於這樣的組織，上海市委採取的態度是“三不”政策：不承認、不支持、不參加。

市委的態度激起了工人造反派的義憤，會後幾千工人列隊到市委請願。那天我正好從延安西路三十三號市委機關下班，看到工人們舉着紅旗，排成整齊的隊伍，從淮海中路折向常熟路朝市委前進。工人隊伍沒有呼喊口號，在沉默中前進，頗有點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的悲壯的意味。我當時在思想上是傾向市委的，但看到這樣一支隊伍，也從內心感到震懾。

工人們在延安西路市委等了幾個小時，要求領導接見，當

時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因病休養，他們便要求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接見，等了幾個小時，沒有見到市委領導。夜深了，他們又前往南京西路上海展覽館，要求市委領導接見，結果只出來一個上海總工會的領導勸他們回家。他們激怒了：市委不承認“工總司”，我們就到北京去告狀。工人隊伍衝到北站，潘國平帶人佔領了兩節客車車廂開往南京，王洪文帶人登上了六〇二次列車準備上北京。清晨，六〇二列車啟動北上，但開出不久，列車就被阻在安亭火車站，引入岔道並被上了鎖。天下起雨來，工人們饑寒交迫，據縫紉女工徐美英後來告訴我，工人本來沒有準備上北京，她自己腳上只穿了一雙布鞋，在寒風冷雨中凍得直發抖。工人們決定孤注一擲，就在安亭鐵軌上臥軌攔車，造成重大影響。中午十二點，從上海去北京的十四次列車被迫停靠在安亭。從此開始，京滬線交通全線中斷共達三十一小時三十四分，上海站內三十四列火車不能開出，開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貨列車被迫滯留在沿線各站，嚴重影響了京滬沿線的交通和生產，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來鐵路交通系統第一起重大事件——“安亭事件”，震驚全國，驚動了黨中央。周恩來和陳伯達都表態認為阻斷鐵路交通是錯誤的，要求工人們返回上海。

### 陳伯達發來了電報

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向上海發來了電報，全文如下：

陳伯達給在上海安亭火車站的工人的電報

陳伯達一九六六.十一.十二

直送上海安亭火車站

工人同志們：

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管理局爭持不下，我們打了個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志，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的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但是，據說有些工人同志還是留在車站，不願意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一切人們都在注視着我們，注視着我們的活動，注視着我們的國家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志是為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革命，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都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

我們絕對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的利益，因為有些人一時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

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這是我們再三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

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最高敬禮。

上海市委收到電報以後，立即大量翻印。我覺得這是中央的指示，就佈置市委寫作班的成員連夜把電報抄成多份大字報，張貼到靜安公園的大字報專欄去廣為宣傳。

### 張春橋飛赴安亭

十一月十一日晚十點多鐘，張春橋受中央文革委託，從北京飛到上海，立即在北京紅衛兵駐滬聯絡站成員包炮等人的陪同下，趕赴安亭，和“工總司”代表王洪文等見面，潘國平聽說張春橋來了，也從南京趕到安亭。在安亭的汽車修理廠裏，張春橋先找“工總司”的幾個負責人談話，向他們傳達了陳伯達寫給工人的電報，想說服他們帶領工人們返回上海。可是工人們開始時不接受陳伯達的電報，他們認為這個電報只強調了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指責這次行動“影響了本單位的生產”，“影響了全國的交通”，為今後上海市委“秋後算賬”處分工人埋下了伏筆，提供了依據。根據“反右派”等運動的政治經驗，工人們知道就這樣回到上海去再分散到各工廠，肯定會挨整。工人們向張春橋控訴：他們所以要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組織，是因為前一時期他們在各工廠、企業，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所以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是“革命的”、“合法的”，至於這次到安亭來，是“被迫的”，責任全在上海市委。

張春橋和工人們的談判通宵達旦，談得非常艱難。王洪文、潘國平堅持自己的意見，而且有交通大學“反到底”等組織和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的紅衛兵為他們撐腰，所以一直談不下來。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們把張春橋請到一輛卡車上，在安亭車站和群眾見面。張春橋又一次宣讀了陳伯達的電報，動員工人回上海。工人們在現場“控訴”上海市委，反復強調自己的行動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說穿了，工人們害怕自己回去被打成“反革命”。張春橋站在卡車上淋着雨聽完了工人們的“控訴”，據他後來告訴我：他覺得工人們的過激行為是有因的，同時他們要求成立這樣的組織是符合憲法的，也是符合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精神的。張春橋覺得，聽了工人們的發言，原來他來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也許是應當改變的。

在和廣大工人見面以後，張春橋的態度有了改變，他和王洪文、潘國平等商量，要他們先帶領工人返回上海，然後再討論工人們提出的各項要求。王洪文、潘國平覺得這是一個下台階的機會，最終同意了張春橋的建議，但他們剛向在場的工人宣佈談判的結果，就被別人轟下了台。結果王洪文和潘國平帶了大部分工人回上海，另外一個中泥造紙廠的工人耿金章帶了一千人去了蘇州。張春橋也於當天下午返回上海。但回到上海的工人覺得人身安全沒有保障，既然張春橋承諾回上海後再討論其他各項要求，他們就直接去了文化廣場要求和張春橋見面。

這就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清晨接到從安亭回來的北京紅衛兵許小昆的電話之前所發生的驚心動魄的“安亭事件”的概況。



## 我陪張春橋到文化廣場談判

我在家裏接到許小昆的電話後，立刻趕往武康路二號市委寫作班，因為在那裏市委給我裝了一個紅色保密電話，可以直通市委各個領導人。我撥通了張春橋家裏的保密電話，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接了電話，她說張春橋半夜才回家，還在休息。我說情況緊急，從安亭回來的工人們聚集在文化廣場，等候張春橋接見。這時，張春橋自己來聽電話了，他說他正在發燒，在安亭和工人談判，聽工人發言，淋了一夜雨，感冒了，但是工人們既然等在文化廣場，他還是準備去和他們見面。他要我先找到他們的頭頭，以便談判，他上午還要和市委商量一下。他和我約定下午二時在文化廣場後台見面。

放下電話，我趕往文化廣場，那裏的工人告訴我，他們的負責人叫潘國平，現在去了鉅鹿路“工總司”總部。我又趕到鉅鹿路，找到“工總司”佔領的一幢三層樓花園洋房，原來住的資本家已經被他們趕走了，只見總部裏人來人往，亂哄哄的，誰也不知道潘國平在哪裏。我亮出了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才有負責警衛的人告訴我潘國平在三樓睡覺。我摸到三樓的一個小房間，叫醒了睡眼惺忪的潘國平。他赤着腳從床上爬起來，穿了一雙布鞋接待我。這才看清了這個上海玻璃機械廠的青工只有二十多歲，方臉盤，小眼睛，說起話來節奏很快。我通知他下午兩點張春橋去文化廣場和工人見面，要他一定趕過去。

下午，我陪同張春橋來到文化廣場，我們從永嘉路的大門進入後台。文化廣場裏簡直是一片混亂，幾千工人等在大會場裏，後台的化妝間、小會議室裏，擠滿了各個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和“工總司”的代表。潘國平已經先行到達等候我們了，但這次談判的整個過程，沒有見到王洪文。警衛員護着張春橋硬

擠過人群，進入一間談判用的小會議室，我跟在他們的後面擠了進去。可是這間房間太小，工人和紅衛兵的代表有二、三十個人，都想參加談判，根本擠不下。於是，臨時決定改換大會議室，又鬧騰了很久才開始談判。

說是談判也根本不像談判的樣子，紅衛兵搶過工人的話頭，要上海市委保證工人們回到工廠去不會挨整，不被扣工資。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組織的紅衛兵申明全把張春橋罵了一通，指責他沒有站到造反派工人的立場上來。有一個北京電影學院的紅衛兵，手持一隻照相機，向張春橋提出：“陳伯達的電報是不是真的？會不會是上海市委偽造的？”這時，張春橋從他穿的軍裝胸袋裏，掏出幾張折疊起來的紙張，把它們展開，向在場的人展示說：“你們看，伯達同志起草電報的手稿都交給我帶來了！你們應該聽從中央文革的意見。”大家看到了陳伯達用鉛筆字在幾張白紙上寫下的電報全文，北京電影學院的紅衛兵如獲至寶，趕緊把電報稿拿過去平鋪在桌子上一張一張地攝影。誰知他拍完照片，竟把原稿收到自己的口袋裏不肯交還了。張春橋向他索要，他也不肯拿出來。我看到張春橋有些着急了，就主動去和那個紅衛兵交涉，我告訴他：“中央文件的底稿都是要存檔的，不能由個人保存。”磨了很久，他才把電報稿交還。我趕緊遞給張春橋，張又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胸袋裏。

這時，潘國平發言了，他事先已經和北京以及上海的幾個大學紅衛兵商量過，他提出：這次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市委壓制工人造反造成的，一切後果應該由上海市委負責。現在工人們都聽中央文革的話，返回了上海，張春橋同志在安亭說有什麼要求回上海以後再討論。現在陳伯達同志在電報裏說我們工人“忘記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這

樣上海市委就可以根據電報來整我們這些回廠工人。張春橋說，伯達同志在北京，不可能瞭解現場的具體情況，所以中央文革派我來直接處理。現在上海市委決定向各基層單位發文件，對回廠工人表示“歡迎”，“不要指責，不要扣帽子”。但潘國平堅持說這樣的文件是非不分，一定要承認我們“工總司”是革命組織，我們到安亭去的行動是“革命行動”。張春橋說成立全市性的跨行業工人組織將對全國造成影響，勸他們遵守中央的規定，但參加談判的工人和紅衛兵們堅持自己的意見，談判僵持了一個多小時沒有結果。

### 張春橋簽字同意“五項要求”

談判進行到這個時候，有人向潘國平遞去一張紙，上面寫了幾項要求，潘國平看後交給了張春橋。我站在張春橋的身後，看他拿着這張紙猶豫、躊躇了一陣子，然後拿起筆在紙上寫了一些文字，並在最後簽上“張春橋”的名字。

張春橋簽完字說：“那就叫市委印成文件下發吧！”

我拿過這一張寫在撕下來的筆記本上的紙片，上面寫着“工總司”的“五項要求”：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二、承認“十一·九大會”以及工人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張春橋在第二條“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後面加寫了一句話：“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派少數代表”。最後是他的簽

名和日期、地點：“張春橋一九六六.十一.十三於上海”。也就是那個北京電影學院的紅衛兵，拿起照相機攝下了這個張春橋簽字的鏡頭。

當時，我還不知道那天上午張春橋在接到我的電話以後，曾就下午如何和“工總司”談判一事，參加過市委常委會，在會上，常委們的意見是：不能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不能承認在安亭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下午在文化廣場，市委辦公廳還派來一個秘密聯絡員，到現場瞭解談判的進展情況。他看到張春橋在“五項要求”上簽了字，趕快打電話向康平路市委書記處彙報。曹荻秋等人大為惱火，指責說張春橋去了中央文革，是否還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要不要執行市委常委會的決定？

但是，談判會場裏的工人代表和紅衛兵們，看到張春橋終於在“五項要求”上簽字了，一致興高采烈，紛紛拿出自己身上的《毛主席語錄》，讓張春橋簽名留念。潘國平更是興奮萬狀，他急於向堅持在文化廣場大會場裏的工人們報喜，便邀請張春橋到前台去和工人見面。於是，一群人簇擁着張春橋從後台走到主席台上。台下苦熬了好幾天、疲憊不堪的一千多名工人渴望知道談判的結果。潘國平向大家宣佈了張春橋簽字同意的“五項要求”，台下一片歡呼。張春橋在歡呼聲中作了簡短的講話，鼓勵工人們回到單位去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工人們大聲呼喊口號：“向中央文革學習！”“向中央文革致敬！”從此，上海“工總司”的頭頭們把張春橋看成他們的“恩人”，用張春橋自己的話來講：“他們把我當成他們的‘老頭子’了！（“老頭子”是舊社會上海幫會成員對總頭目的尊稱）“

大會結束以後，張春橋和我回到後台，但他很快又被人群包圍起來，各個組織紛紛要他簽字，刻制圖章問題，解決經費問題，買摩托車問題，發紅袖章問題等等，圍得他沒法脫身，人們把門都堵住了。這時，市委警衛處的警衛員很機智，看到會議室有個視窗，很快搬幾張桌子到窗前，扶着張春橋上桌子，從會議室視窗爬了出去，我也跟着翻窗戶，外面有警衛員接應，把我們塞進轎車，一口氣開回康平路市委。

### 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

回到康平路，張春橋徑直去了大院裏他的家，沒有到小禮堂去和等候在那裏的市委常委們見面。我走進康平路小禮堂，看到市委常委們都分散坐在沙發裏，他們已經聽取了派往文化廣場的辦公廳聯絡員回來的彙報，知道張春橋簽字同意“五項要求”了，曹荻秋一副氣鼓鼓的樣子，嘴裏在不斷地埋怨，王少庸猛地吸着煙，瞪着眼睛不作聲，楊西光被復旦大學的學生揪鬥過了，精神萎靡地蜷縮在沙發裏。公務員老李悄悄問我：“吃過飯沒有？”我這才想起還沒有吃午飯，老李給我下了一碗卷子麵。我吃完麵條，看張春橋還是沒有來，我在這裏也插不上什麼嘴，就回家了。

後來才知道張春橋回家去給陳伯達打了保密電話，彙報了他談判“五項協定”的經過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當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討論並同意了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認為他對“五項要求”的判斷和簽字是正確的。作為對立面，市委的其他領導則認為張春橋的處理決定沒有和華東局及上海市委商量，他擅自簽名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也在這天晚上，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向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陶鑄打電話告狀，陶鑄聽了電話認為：張春橋簽署“五項要求”是錯誤的。

這樣，中央政治局在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聽取了彙報，一捶定音，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意見。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張春橋勝利了，“工總司”成了革命的合法的組織，造反成了革命的行動，原來的組織觀念、紀律觀念都被顛覆了。本來，毛澤東派到各地煽風點火的紅衛兵已經讓各級黨委頭痛了，但是因為工人、農民都沒有動，各地的黨組織還穩得住大局。現在不行了！由於一個跨行業、跨地區的“工總司”組織的出現，並得到張春橋的承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准，最後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裏面那個從魔瓶中放出來的怪物一樣，一股工人造反派的力量出現在中華大地上，再也收不回去了。

從此，上海大亂！從此，全國大亂！

有人在敘述這段歷史時，說張春橋是個“投機分子”，投對了，飛黃騰達；投錯了，身敗名裂。我覺得這種分析流於膚淺。固然，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以後是說過：“我當時是提着骷髏頭(上海話讀成“骷郎頭”，即腦袋)簽字的。“在他的身上有着巨大的壓力，除了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以外，還有中央的周恩來、陶鑄等人，原來都是不同意成立全國性的跨行業工人造反組織的，而且張春橋被派來處理“安亭事件”時，手中並沒有握有毛澤東所授予的“尚方寶劍”。但他在聽取了工人們的發言以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頂着撤職、坐牢的風險，毅然簽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五項要求”，是因為他從一九六六年年中調至中央文革小組任副組長以後，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他深深體會到毛澤東的意圖是要放手發動群眾，衝破一切陳規和習慣勢力，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毛澤東已經通過紅衛兵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燒向全國，但按照他一貫的思想：學生運動如果不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所以，張春橋敢於在“安亭事件”中簽這個字，說明他善於審時度勢，真正“吃透了”毛澤東思想。此後，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果然一發而不可收，十一月十三日，陳伯達提出了一份關於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明確提出“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等條款；十四日，周恩來同意召開工交座談會討論工交系統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周恩來在會上說：目前的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十二月六日，林彪出來做結論了，他在工交座談會上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業、進入到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我認為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刹”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個革命席捲全國每一領域，滲透每一領域。

由此看來，張春橋敢於簽字不能說是什麼投機，更主要的是他善於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做出了毛澤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範圍內把群眾發動起來，更廣泛地動員群眾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證這場運動的勝利。

毛澤東果然批准了張春橋“可以先斬後奏”，雖然這是事後授予的“尚方寶劍”，但更能說明張春橋善於體察、領會毛澤東的真實思想意圖。從此以後，張春橋一直深得毛澤東的垂青和重用。

## 第五章

# 我是怎樣起來造反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張春橋處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徬徨起來：我怎麼辦？我們市委寫作班怎麼辦？……

張春橋在上海總共只逗留了兩三天，我和他只在文化廣場的後台匆匆見上一面，雖然我見證了簽字同意“工總司”“五項要求”的歷史時刻，但我根本沒有機會和張春橋深談，更不用說向他請示我們這個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請示，他也只能原則地回答：要到群眾中去，要和群眾站在一起。這些話十月間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見到朱永嘉時就說過了。當時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況，總算見到他們一面，傳回來了這樣的幾句話。我很惶惑：什麼樣才算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紅衛兵接待站接待北京紅衛兵，或是在市委機關延安西路大門口值班，顯然不能算到群眾中去，連“安亭事件”以後我陪同張春橋在文化廣場接見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眾站在一起，因為在別人看來，我充其量只是張春橋的一名聯絡員。

何況，市委仍不斷找我，一忽兒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組去處理“漕溪北路”事件，一忽兒讓我列席市委常委會準備為曹荻秋市長起草檢討，有時還要讓我代表市委領導去文化廣場參加群眾大會接受批判。我感到厭煩和苦悶，內心不願再為市委做“擋箭牌”，可是我一時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寫作班的同事們和我一樣，大家都知道閉門寫作已經不能適應外界風雲激蕩



的政治形勢了，可是我們怎麼辦？前景不明，人心渙散，歷史組“羅思鼎”小組的成員大部分回到復旦大學去了，文學組“丁學雷”小組的青年們也紛紛返回作家協會，大家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分頭參加到這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去。

### 復旦紅衛兵到市委寫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寫作班發生了一件大事：復旦大學的紅衛兵貼出大字報，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復旦大學參加運動。復旦大學黨委報告了市委，市委找我，我就電話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蘇無錫人，原來是復旦大學畢業生，留校研究中國古代史，又是共產黨員，擔任過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總支委員，分管統戰工作和學術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幾個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一起調到丁香花園，後來成為“羅思鼎”寫作小組的組長。當時，正值全國學雷鋒的高潮，他們寫作時就以雷鋒的話“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為諧音，取筆名為“羅思鼎”。在張春橋的領導下，市委寫作班“羅思鼎”小組為姚文元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做了許多工作。可是，現在復旦大學的運動深入了，歷史系的兩派紅衛兵為了爭奪批判系領導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把矛頭對準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後，歷史系的紅衛兵召開大會，批判他參加撰寫的、用“羅思鼎”筆名發表的《從“投獻”看吳晗的“自我批評”》、《〈論清官〉質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的黑文，執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綱”的路線，並抄了他住在復旦大學宿舍的家，可是抄不到什麼東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氣勢洶洶的紅衛兵隊伍衝進武康路二號，要市委寫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來。我是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心想我

們前一時期是張春橋、姚文元領導的，怎麼能抄家抄到這裏來？我當然要對此負責，不肯交材料。紅衛兵看了我們貼在會議室裏的批判市委的大字報，說你們寫作班是“老保”，專門保市委。他們拿不到材料，就衝上二樓去，把歷史組的門強行打開，把朱永嘉等人的辦公桌撬了，把所有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裝進麻袋揚長而去。

這樣事情就鬧大了。當時我們認為，張春橋、姚文元領導的市委寫作班居然也成了抄家的對象，而且來抄的是復旦大學的造反派“紅革會”，這怎麼得了！當天趕來的是郭仁杰，他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總支副書記，後來調去華東政法學院，大批判過程中又調到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副書記和哲學組組長。他當時已從寫作班返回復旦大學，是復旦大學的中層幹部中造反比較早的，與“紅革會”關係非常密切，“紅革會”請他當了顧問。現在，復旦大學“紅革會”衝到武康路造寫作班的反，他也趕過來，對我們說，你們應該支持小將的革命行動；對紅衛兵，他也做一點工作，希望他們把搶走的材料送回來。他表示：小將們來抄家事先他並不知道，復旦大學“紅革會”也不太瞭解寫作班、朱永嘉等和張、姚的關係，意思是誤闖“白虎堂”了，他想對兩邊做工作起一些調節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兒裝紅面孔，一忽兒裝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紅衛兵把批《海瑞罷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們怎麼向領導交待？我擔心資料裏面有很多保密的東西，隨便搞走外泄，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所以，我馬上打電話把這件事報告了姚文元。

### 姚文元來電保護“羅思鼎”小組

張春橋、姚文元的反應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迅速和果斷：

十一月二十九日，張春橋找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商量，張春橋感到：名義上是搞市委寫作班，整“羅思鼎小組”，實際上矛頭是對着他的。他們都感到事態嚴重，姚文元表現得特別激動，提出必須馬上表態。他們商量以後，決定由姚文元直接打電話給上海市委寫作班。對此，我的筆記本上有着當時的詳細紀錄：

“二十日晚，姚文元給丁電話(當時我對外都叫“丁學雷”)，聽說復旦大學黨委頑固地執行資反路線，搞羅思鼎小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紅衛兵，只講復旦黨委)。張春橋、姚文元非常驚訝，關鋒、戚本禹十分氣憤，戚本禹還說要到復旦來貼大字報(注：這是電話原話)。有幾個問題你記下來：第一個問題要追根的問題，你話要講得硬，追根就是應該追到本單位、本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一月份以來，《文匯報》的方向是正確的、革命的(注：因為《文匯報》搞了《海瑞罷官》的批判，而現在復旦大學要批發表了“羅思鼎”文章的報紙)。第三，朱永嘉的問題為什麼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張春橋。(要我記下原話回答他們)你可以轉告復旦大學，整朱永嘉是錯誤的，我跟春橋同志商量的了，復旦大學要追“羅思鼎”小組的根子，你去告訴他們好了，根子就是張春橋，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誰要揪，到北京來揪好了！”

這是在整個文革期間聽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強硬的表態。因為當時復旦大學有些人把貫徹毛主席意圖、為張、姚服務的寫作班子，說成是執行了彭真的錯誤路線，這使張、姚怎麼能夠容忍？怎麼不跳起來？同時，張春橋、姚文元還懷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領導人在背後策動這件事。所以，他們作出了如此強烈的反應，而且整個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幾乎都表態了，一致非常

重視這件事。這在後來王力所寫的回憶錄裏也有記載。

我當時接了電話感到很興奮：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態度如此強硬，對上海市委寫作班的評價這麼明確，完全可以把寫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護下來了。姚文元在電話裏還跟我講，要用“丁學雷”的名義，對復旦大學所有紅衛兵說，“羅思鼎”小組在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線是對頭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還要我說，寫作班在前一個時期，是張春橋直接領導的，跟楊西光沒有關係。那天姚文元給我打電話，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他到北京以後給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個電話。他這樣說，完全把我們作為張、姚自己的嫡系部隊，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電話後，我馬上向郭仁杰以及“羅思鼎”小組成員吳瑞武、王知常、朱維錚作了傳達，把姚文元電話記錄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們，要他們記下來後詳細地告訴復旦大學黨委和紅衛兵。我還在華山路市委接待站約見復旦大學造反派紅衛兵，向他們宣讀了姚文元的來電記錄。當時朱永嘉還關在復旦大學，不知道喜從天降。那天我很激動，我感到姚文元代表中央文革的來電，給了我們一把“尚方寶劍”，我們再也不用擔心了。

那兩天，復旦大學正在召開批判朱永嘉的大會，兩派紅衛兵都到場，一派是復旦黨委扶植的紅衛兵，他們也要舉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來造反的“紅革會”和“紅三司”。會議中間，朱維錚和王知常衝上台去，責問保守派追後台要把矛頭指向哪裏？造反派紅衛兵衝了會場。吳瑞武接着在會上一字一句地宣讀了我傳達的姚文元來電記錄，指出要揪朱永嘉、追“羅思鼎”小組的後台的話，後台就是張春橋、姚文元，後台就是中央文革！這樣一來會場大亂，保守派對黨委當場反戈一擊，批鬥會再也開不下去了。

##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復旦大學“留學”

朱永嘉原來是復旦大學的中層幹部，和復旦大學黨委、歷史系總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很難站出來，張春橋在北京也對他說過：“諒你也不敢造反！”現在，經過紅衛兵這麼一衝，姚文元這麼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來，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說，他有了那麼硬的後台，就在復旦大學宣佈造反了。從此，整個“羅思鼎”小組在復旦大學和郭仁杰聯合起來，一起造復旦大學黨委的反，同時造分管教育的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的反。他們在復旦大學造反後，感到市委寫作班再也不能像目前那樣為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服務了，他們共同商量以後，決定殺回市委寫作班，敦促我起來造反。因為他們的造反範圍畢竟只能在復旦大學，而我如果能帶領市委寫作班起來造反，將會在全市和全國造成較大的影響。

但是，我當時對造反仍是猶猶豫豫，下不了決心。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我認為上海市委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過程中，包括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中，整體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覺得：市委主要領導從柯慶施到後來的陳丕顯，作為第一書記都積極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陳丕顯還參與領導了對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討論，這是我親眼所見。而且，周總理也說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對這樣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覺得理由不夠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從市委宣傳部調到市委寫作班以後，市委對我非常重用，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由於我參與創作了話劇《年青的一代》，撰寫了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出版了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又寫出了一批評論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黃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

年文藝工作者訪問越南，見到了胡志明主席。我從原來的副科長，變成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從原來宣傳部文藝處的一般幹部，變成市委直接領導下的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市委讓我參加重要的會議包括列席市委常委會，讓我出席上海市的國慶宴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廣場舉行的上海市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會上，市委又讓我以“丁學雷”的名義，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長篇發言。市委對我的確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負義，感到一下子難以和市委決裂。寫作班的大量批判文章發表以後，在社會上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文化界、文藝界都知道徐景賢是寫作班負責人，又是“丁學雷”的頭。我對自己已經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捨不得丟掉。

第三，長期以來黨內有一種思維定勢：群眾運動起來以後，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來，當時的市委領導也說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後期，上海也好，全國也好，要抓他幾十萬個右派。我擔心，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會不會像反右派那樣，先發動大家鳴放、造反，到最後來一次總算帳和大反擊，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誰帶頭的話，說不定將來會劃成右派或者什麼分子。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已被說成是跳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了嗎？我經歷過反右運動，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餘悸的，這也是我對造反一直處於猶豫不決狀態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來黨一直教育我要遵守黨的紀律，特別是因為我在黨的高級機關工作，更覺得要注意保守黨的機密，注意黨內外有別，注意一言一行的影響，顧及黨的利益。至於首腦機關像省、市委這一級能不能造反，這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市委的領導人也一再強調這些觀點。長期以來共產黨的教育所灌輸的這些觀念，更使我變成了黨的“馴服工具”，所以，在

造反的問題上顧慮重重。

由於我的猶豫不決、舉棋不定，郭仁杰就和朱永嘉以及“羅思鼎”小組的幾個人，多次到武康路二號來找我談話，反復強調他們已經豁出去了，沒有再回頭的可能了，你呢，直到現在還沒有亮出旗號來。“我們現在需要一面從市委裏面殺出來的旗子”，這是郭仁杰的原話。他還說，你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只能到靜安公園看看大字報(市委在靜安公園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報欄，各種各樣的大字報貼在那裏)，但公園裏兩派的觀點都可以貼出來，看不到尖銳性、揭露性的大字報。你有沒有看到學校裏那種如火如荼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形勢？最後，他動員我到復旦大學去“留學”。

那幾天，正好市委辦公廳副主任蘇超急着找我，要我去給曹荻秋市長起草檢討，我就給寫作班的值班人員作了佈置：凡是市委通過保密的紅機子來電找我，就說我外出了，不知道去哪裏了！其實，我真的到復旦大學“留學”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杰等人陪我一起觀看了復旦大學校園裏的大字報。復旦大學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報貼滿了，一直貼到學生食堂。那些大字報確實與靜安公園裏的不一樣，學校的情況與北京的文革運動互為呼應，首都來的消息非常多，大字報對市委的批判一針見血，使我受到很大震動。看完大字報，郭仁杰、吳中杰、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維錚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樓前的院子裏小坐喝茶。郭仁杰是“紅革會”的顧問，吳中杰是“紅三司”的智囊，他們都算是復旦大學教師中的老造反。吳中杰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師，他的妻子高玉蓉參加過市委寫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們幾個人就輪流勸說我“揭竿而起”。

之後，郭仁杰等又陪我到校園裏第一教學樓的大教室裏，

向我介紹認識了“紅革會”的負責人馬立新、勞元一，“紅三司”的負責人安文江，他們現身說法，講了自己當初怎麼受壓制、後來怎麼起來造反的歷程，還送我兩句話：“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他們說，我們紅衛兵本來感到北京那麼遙遠，黨中央那麼遙遠，但造反以後，到北京去，毛主席接見我們，做我們的紅司令，給我們作指示，指揮我們戰鬥，我們就覺得毛主席特別親，假如你老徐起來的話，你一定也會有這樣感受的。看了他們的大字報，聽了他們的介紹，又想到姚文元這次來電話給我們撐了腰，我開始有所觸動了。在一千二百號樓的教室裏，我和哲學系、中文系正在開會的紅衛兵們見了面，聽了他們的發言，我也作了一個簡短的表態，我說自己是到復旦大學來“留學”的，復旦大學確實像“解放區”一樣，紅衛兵小將就像高爾基所說的，是暴風雨行將來臨前的海燕，我要虛心地向你們學習。

### 寫作班開會對我“逼宮”

從復旦大學回來以後，郭仁杰、朱永嘉催促我召開寫作班全體成員會議，討論我們面臨的形勢和應該走什麼路。就在武康路二號二樓的玻璃棚陽台上，寫作班的全部成員十多人一起開會，發言非常熱烈。這些成員分別來自高等院校、文藝協會，電影系統和社科院、黨校等，只有我一個人是市委機關的。大部分人的發言是勸說我、啟發我，也有人的發言是炮轟我、對我“逼宮”的。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爭取我呢？因為如果寫作班從市委機關裏殺出來造反，其中連一個市委機關的帶頭人也沒有，對外就算不上市委機關內部造反。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又是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我能起來反戈一擊，對上海市委將是致命的打擊。郭仁杰在會上一定要我下最後的



決心，他分析形勢說，我們寫作班何去何從？現在是關鍵時刻，關鍵的關鍵是看徐景賢怎麼樣。他還指着我說，你要觸及靈魂，不觸及不行，這樣才能割斷和市委千絲萬縷的聯繫。應該說，在促使我決心造反的過程中，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動作用。

其次影響我比較大的兩個人是朱永嘉和程綺華。朱永嘉當時給我分析，我們寫作班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在張春橋、姚文元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確的；後一階段，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們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眾運動的對立面，基本上都是充當滅火器、擋箭牌。朱永嘉說徐景賢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紅衛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說我是折中主義。朱永嘉還“現身說法”，他說：我這次站出來是靠張、姚，沒有他們的擔保，我是出不來的。現在寫作班沒有別的路好走，看樣子只有走造反這條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張、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綺華是一個解放前的地下黨員，她是從黨校哲學教研室調到寫作班哲學組來的，為人正派，我比較信任她。她因為經常去市委黨校，對外面整個大氣候感受較深。她當時也對我作了幫促發言，她說我們後期實際上執行了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包括你還為曹荻秋寫檢討。她說你想想看，你變成什麼樣子了？你本來是寫大批判文章的，現在去給曹老頭寫檢討，你不是變成資產階級保皇派了嗎？當時《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兩種選擇嚴峻地擺在人們面前。程綺華等人直截了當地說：“丁學雷”被你糟蹋了！你還打着“丁學雷”的旗子，“丁學雷”現在究竟做點什麼事情？

當然，他們的發言雖然尖銳，還是說理的，我比較聽得進

去。也有人的發言那就毫不客氣了，簡直是指着鼻子痛罵。罵得最厲害的是歷史組的王知常，外號“小老王”。他原來在南京軍區當兵，後來考進復旦大學歷史系成了調幹生，所以年齡比較偏大，戴了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頭頂都有些禿了，朱永嘉當過他的老師，但兩個人年紀相差不大。王知常畢業後留在復旦大學當教師，主攻近代史，知識面比較廣博，記憶力特好，調到寫作班歷史組以後，我稱他為“萬寶全書缺只角”。這次在復旦大學衝擊會場、解救朱永嘉的過程中立了功，就擺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勢，說起話來霸氣十足，他在會上站起來衝着我說：“要說造反，我們造得最早，批《海瑞罷官》就是造反，我們不是比聶元梓還早嗎？可是，你這個支部書記把寫作班帶到哪裏去？後來，我們整天在市委門口值班，遭人圍攻，歷史組被抄，朱永嘉被綁，整個寫作班成了市委的擋箭牌、消防隊。你這樣做對得起誰啊？對得起春橋、文元同志嗎？對得起我們嗎？你再這樣‘老保’下去，我們一拍兩散，對不起，只能在對你的批鬥會上見！”說罷，他還氣得雙腳在地上跳了跳，把樓板踩得咚咚作響。我只好聽任他“發格”，埋頭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做記錄。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叫做“觸靈魂”，聽王知常這種發言，可以說是真正的“觸靈魂”了。

這樣，十多個人人人都發言表態，一圈兜下來，局面比較明朗了：寫作班的歷史組、哲學組全部主張造反，文學組的陳冀德、吳聖昔等贊成造反，作家協會來的吳立昌和電影廠來的劉景清開始時不贊成造反，主張繼續寫文章，後來看到大勢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見。最後，就等着我一個人表態拍板了。

## 我終於下決心和市委決裂

寫作班的會議持續了兩天，第一天開了一個下午，第二天

上午、下午、晚上一直開到下半夜兩點多鐘，連續對我“炮轟”。夥伴們要我狠觸靈魂，有的人演“紅面孔”，有的人扮“白面孔”，分別對我又勸、又逼、又拉、又打，說穿了一句話，就是敦促我決心打出造反的旗幟。

經過兩天的幫助，我的思想鬥爭非常激烈，會議結束後通宵不眠，反復思考利弊得失。我顧慮黨的機制還是強大的，萬一自己出頭露面和市委對抗的話，風險很大，將來可能會有很糟糕的下場，我這十幾年來在市委機關裏所做的努力將付諸東流，既得利益不去講了，自己的聲名也毀了，所以總是難下決心。但是另一方面，從我多年的感受來看，我對當時黨內的很多情況相當不滿意，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對黨內的特權思想不滿意。斯大林逝世以後，揭露出蘇聯許多黨的高級幹部大搞特權，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別墅，帶了家屬一起度假，大搞特殊化。我認為中共在建國以後，和蘇共的情況差不多。我有機會受上海電影製片廠之約，外出訪問寫電影劇本，又受上海《解放日報》的委託，讓我做它的特約記者，到外地採訪寫報告文學。我到過雲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過杭州、南京、蘇州、無錫、揚州等城市，發現這些地方的黨委都建造有高級的招待所，專給中央領導人和各地的負責人居住，這些招待所佔有最好的地塊，設施齊全、環境優美，四周都有廣袤的園林，首長和他們的家屬在這裏休息宴請，或是小病大養。招待所備有大批的服務人員為首長們服務。所有的高級招待所都是警衛森嚴，老百姓連接近一下都沒有可能，更不用說打聽內情了。上海在這方面也決不後人，除了專門建造的給中央首長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還有虹橋俱樂部、興國路招待所、瑞金花園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陽路招待所……

有一個市委的領導人生了病，就佔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還為他專門進口了最好的醫療設備，組建了最強的醫療班子。這些特權階層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所以，毛主席提出發動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黨的高級幹部進城後脫離群眾了，工資高，有洋房，有汽車，有服務員和廚師，貪圖享受，而且對群眾擺架子，群眾對他們心裏有氣，所以要衝擊他們。這些話我最聽得進去。

其次，我對黨內的等級制度不滿意。長期以來，我感到黨內等級森嚴，什麼東西都要講等級。我結婚時申請住房，先是叫我們住到部長家後面的僕人住房裏去，只有六平方，沒有窗戶，進出還要走僕人的專用樓梯，我很生氣，拒絕接受。後來，分配給我的房子非常小，因為當時我還不是科級，不能住稍微大一點、朝向好一點的房子。夏天熱死，冬天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為級別不夠，就不能分給你。而那些部長們，則住着成套的大洋房，還有花園，我為此憤憤不平。舉凡衣、食、住、行，都要講等級，食堂吃飯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發展到用什麼辦公桌，坐什麼椅子，都要講等級。我想：參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麼現在等級越來越森嚴，封建餘毒越來越厲害。所以，當毛主席號召要反對黨內的不平等作風，主張上下級平等、官兵平等的時候，張春橋跟着寫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鼓吹軍事共產主義的好處，歷數等級制度的弊病，我是十分贊成的。

除此之外，我對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市委的表現更不滿意。這個市委自恃一貫革命，一貫正確，對於革命的群眾運動抱着嚴重的抵觸情緒。凡是北京紅衛兵或是上海的群眾對市委提出比較尖銳的意見，或是貼出批評、炮轟的大字報，市委就要派專人外調，追查別人有沒有政治歷史問題，企圖把他們打

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們把保市委的人封為左派，調動工人、農民和一些勞動模範站出來保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市委又把我們這些機關工作人員推到第一線，而領導人自己卻躲在幕後策劃指揮，把我們作為擋箭牌和滅火器。市委領導人還把一批知識分子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拋出來，把一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作為反動資本家拋出來，到後來實在混不過去，就把一些部、局級和大專院校的黨員幹部作為修正主義分子拋出來，而自己卻想蒙混過關。我認為市委執行的是一條打擊群眾、壓制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背道而馳。

我通宵不寐，反復考慮，覺得自己對這個黨、對上海市委還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應該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黨內的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和幹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燒一下，把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相揭露出來，特別對那些犯有走資派錯誤的幹部，來一次衝擊，正像毛主席所說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 姚文元是寫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後，我的心裏還是不夠踏實，因為寫作班的重大行動還沒有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決定給在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打電話彙報一下。我給張春橋打電話沒有打通，我給姚文元打了幾次電話後才打通，我將寫作班開會的情況向他作了介紹，說我們寫作班打算起來造反了，徵求春橋同志和你有什麼意見。

姚文元聽了不直接表態說我們支持你們，只是說，你們願意革命，我們總是贊成的。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兩個

字，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說，你們始終要把矛頭對準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又提到中央在開過工交座談會，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在會上發表不同意見，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使生產都受影響了。在這個會上，馬天水受到了林彪的嚴厲批評，張春橋做了馬天水工作，動員他不要與市委持同樣態度，應該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會對生產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姚文元說，從中央工交座談會看出，上海市委對文革的態度是錯誤的，對待群眾的態度也是錯誤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時期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包括壓制北京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矛頭對準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還說要爭取馬天水，讓馬天水從市委裏分化出來。另外，他告誡我要多注意做輿論方面的工作。因為當時上海剛剛發生過《解放日報》事件，即“紅革會”要求把他們編的造反報紙《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解放日報》不同意，紅革會就衝擊並佔領了《解放日報》社，使《解放日報》停刊幾天，“工總司”又衝進去支持紅衛兵，事情鬧得非常大。上海當時分成兩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報》，一派要看《紅衛戰報》，前者是多數人，後者是少數人，分頭在全市遊行、發傳單。事情來得比較突然，老百姓說：《解放日報》是黨報，為什麼要同《紅衛戰報》一起發行，從群眾的輿論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這個行動。姚文元大概感覺到這是個問題，所以他指導我說要多做輿論工作。實際上他是為我們出主意的，我們如果“揭竿而起”宣佈造反的話，在輿論方面要做得周到一點，爭取群眾。

在打出造反的旗幟之前聽到姚文元的表態，我就放心了。我想：他們現在在毛主席的身邊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們同意我帶領寫作班和市委決裂，我就有了強有力的後

盾和靠山，足以抵禦市委的壓制和打擊了。與姚文元通過電話以後，我正式召開寫作班的全體會議，宣佈我接受大家的批幫和督促，正式決定造反了。我向大家傳達了和姚文元通電話的內容，並說希望寫作班全體造反，不要像別的地方形成兩派。會上大家贊成我的意見，再也沒有人說不要造反了。接着，大家繼續討論究竟用什麼方式亮出我們的旗幟，這就具體進入到寫作班造反的籌備階段。

關於市委寫作班全體造反的問題，當時和事後有一些造反組織曾經提出過疑義，因為當時幾乎沒有一個單位是全民造反的。人們的認識不一致是正常現象，所以各單位也不存在統一行動全民造反的現象，因此有的組織曾經說你們寫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哪一個單位是全民造反的？實際上，寫作班的造反確實是一個特例：寫作班的地位比較特殊，張春橋曾是寫作班的直接領導，姚文元又在寫作班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他們兩人現在又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組員，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揮下工作。寫作班和他們有這樣的歷史淵源，現在他們真正成了寫作班的背景和後台，因此當時大家最後都贊成舉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通過什麼方式宣佈造反、向市委開火了。我們議論了多次，覺得市委寫作班的造反和紅衛兵、工人造反派不同，應該揭露出市委機關的內幕，亮出那些市委領導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暗箱操作”壓制群眾運動的真相，方能震動全市，並取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這個揭露和反戈一擊的任務，首先就落到我的頭上了。因為我是市委文革小組的成員，又是“御用”的市委寫作班子的頭頭，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還可以列席市委常委會，瞭解許多黨內機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來和市委決裂，在全市將會起到重大的影響。所以，

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建議說：你要準備一個重點發言，在全市人民和機關幹部面前亮相，我們這些人裏面只有你一個人十幾年來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條件作這個發言，你拋出這個“重磅炸彈”，才真正是市委“心臟爆炸”、“後院起火”了。

但是，光是我一個人代表寫作班作重點發言還顯得有點勢單力薄，我們覺得應該聯合市委機關內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動，才能造聲勢。據我們瞭解，當時市委機關內部也有一些小組織、小派別起來造反，比如復旦大學“紅革會”支持市委辦公廳下面的黨刊編輯部的革命造反戰鬥隊，造了《支部生活》領導的反，後來又宣佈要造市委辦公廳的反，但他們始終在機關內部活動，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衛部、宣傳部和市委黨校也有少數人跟外面串聯，但都沒有打出過旗子。紅衛兵們向我們建議，你們寫作班要把市委機關裏各部、委、辦的造反派都串聯起來，各自準備自己部門的發言，然後開一個萬人以上的大會，可以放在文化廣場開，正式宣佈從市委機關內部殺出來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這樣就轟動了。以前上海還沒有一個造反組織能夠把市委主要負責人統統叫到會場接受批判，他們開會批的都是個別領導人，比如復旦大學要批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就把楊西光叫去批判；工廠裏要哪個工業部部長到場，就通知部長去。市委書記處書記很少去哪個會上聽意見，第一書記陳丕顯更是以生病為理由從不在公眾場合露過面。市委機關幹部如果打出造反旗幟，一定要把市委書記、市委常委特別是市委第一書記叫到會場來聽取批判，這個影響就大了。

我對這樣的建議很聽得進去。我曾經參加過很多紅衛兵召集的會議，看到過他們的批判架勢，感到他們有經驗，唯一不贊成的是他們動手武鬥，揪頭髮，搞“噴氣式”。關於他們提議的要把所有市委書記、市委常委都叫來挨批，我想只有我們



市委機關幹部起來造反才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當時的書記、常委們都已惶惶不可終日，每天東躲西藏，而他們的藏身之所只有我們這些機關幹部知道，如果我們決定什麼時候開會，他們是躲不過去的。我覺得紅衛兵的主意不錯，我決定採納他們的建議。

### 尋求“中央文革特派員”的支持

這時形勢已經十分緊迫，市委一直在找我，問我到哪裏去了。我怕時間拖久了消息洩漏出去將會出現很大的阻力，就趕快串聯市委某些部門已經露頭的造反派，請他們一起來共商大事。我自己打電話到市委辦公廳，找黨刊編輯部的造反組織。當時他們的負責人是陳坤生，由王承龍負責對外聯絡，我打電話去正好是王承龍接電話，他原是黃浦區五金行業的支部書記，後調到《支部生活》編輯部當記者，我告訴他市委寫作班決定起來造反，現與你們聯絡，想要共同籌開一個大會。他聽了很興奮，馬上帶了一個叫朱玉佩的女編輯趕來。我又打電話給宣傳部造反派劉耀宗，進行串聯。寫作班的其他人也分別打電話給教衛部、市委黨校、社會科學院的造反派，把他們都請過來，在十二月十五日開了一次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上決定參加全市批判大會的各部門，各自準備一個發言，形成揭露市委全面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勢。同時，準備成立一個聯合的造反組織，名稱叫“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把原來比較分散的力量組織起來。而且就在寫作班宣佈造反的大會上，同時宣佈“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正式成立。事不宜遲，大會召開的時間定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只有三天時間了，討論了一下分工：郭仁杰負責會議的組織和發言內容、程序，王承龍負責會議的後勤工作，包括

會場佈置和通知發放等，程綺華和朱永嘉負責申聯市委機關造反派，吳瑞武負責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聲明》，我算總負責，拍板、協調各項籌備進程，但要集中力量準備好自己的發言稿。大家認為，我的發言是整個會議的重中之重，我的發言中，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演變、心路歷程講透，同時要揭發市委在幕後搞的一系列活動，這樣才能取得全市紅衛兵和造反派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就在籌備大會的過程中，我找到了《解放軍報》駐上海的記者甄文君。他是一個師級幹部，穿着軍裝，年紀有五十多歲，模樣顯得非常穩重。他可是當時上海的重要人物，我在市委書記處多次見到他，市委書記們對他都非常尊重，向他介紹文革情況，他只是“嗯、嗯”地聽着，從不表態；而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也紛紛找他反映情況，稱他為“軍報記者”、“中央文革特派員”。一個記者怎麼會有這樣特殊的身份呢？原來在軍報駐上海記者站的背後，確實有着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出的政治背景：一九六六年八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軍報創辦一份內部刊物，定名為《快報》，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動態。這份直通最高領導的內部刊物，發行量雖然只有幾十份，但必須最迅速、最直接地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彙報各地和各系統的重大情況。為此，中央文革向解放軍總政治部提出，從全國調集一百名團以上的幹部，派往全國各地，以中央文革聯絡員的身份，到各地收集情況並上報。《快報》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為了提高效率，最後甚至把《快報》編輯部的辦公地點搬進釣魚台，與中央文革辦事組一起辦公。甄文君當時就是派到上海擔任駐滬記者站的負責人。市委領導人和造反派的頭頭都知道他的特殊身份，都想通過他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情況。我要王承龍找到甄

文君，告訴他市委寫作班的造反打算，甄文君馬上趕到武康路二號，和我密談了一個小時。他很認真地傾聽了我們對市委的一系列看法以及籌開造反大會的各項安排，熱烈地緊握着我的手，同意立刻向中央文革彙報。我從內心感到他是支持我們的，而且我們的動向可以通過他直接反映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我更放心了。

召開大會的籌備工作有了眉目以後，我又打電話給姚文元，彙報我們寫作班已經和市委機關的有些部門進行了聯絡，決定聯合召開大會批判市委，同時宣佈寫作班造反。大會的名稱就按照姚文元過去提醒我們的主題，定名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會上由我做重點發言，還組織了其他幾個單位的發言，之後宣佈成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會場擬設在文化廣場，那裏可以容納一萬多人，把市委書記、常委全部叫來接受批判，影響大一點。姚文元非常謹慎，他仔細聽了我彙報，對會議的名稱、批判的內容、叫什麼人來接受批判等都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他最後說是否要開這麼大的會，是否能小一點，放在市府大禮堂開就可以了。我說按大家的意見，要開就開大一點，他還是不很贊成。經他這麼一說，我很為難，籌備會上大家決定會要開得大，市府大禮堂只有一千多個座位，紅衛兵首先不贊成，工人造反派說要派幾千人來參加，一千多人的位子怎麼容得下？再說，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也不止一千多人。所以姚文元對開會的規模說了兩次，我在電話裏不好反對，只好說跟籌備小組再商量一下。隨後，我將姚文元的意見向大家傳達，所有人都不贊成，大家都說，我們開，開起來，開大的，只有文化廣場容納得下。這樣，在會議的規模上違背姚文元的意見也顧不得了。

## “火燒” “揪出” “打倒” “砸爛” 四個口號的提出

大會的主題是徹底批判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批判市委領導人的具體口號怎樣提呢？大家又進行了討論。因為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從來沒有出席過全市的批判會，他當時患鼻咽癌在西郊養病，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第一線工作都是由市長曹荻秋負責，陳丕顯一直在幕後指揮，我們覺得這一次不能再讓他躲在幕後，一定要他到場聽取批判，逼他到前台來。而他是第一次公開露面，還沒有激起群眾義憤，所以批判的溫度不好太高，口號就叫“火燒陳丕顯”。當時毛主席講過，所有的革命幹部都要在偉大的群眾運動的烈火中“燒”一下，考驗一下，所以我們對陳丕顯提了一個“火燒”的口號，至於“燒”成什麼樣，“燒”過後是不是要打倒，待“燒”了以後再定。至於曹荻秋，當時我們認為他推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因此北京來滬的紅衛兵和上海的造反派對他的意見特別多，他一直在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被罵為“曹老頭”、“麵包老頭”（專門給紅衛兵和造反派發麵包的），民憤較大，所以對他就提“揪出曹荻秋”的口號。還有一個分管文教的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當時在上海名聲已經很“臭”，復旦大學造反派揭露楊西光耍手法打擊壓制復旦大學的幹部和群眾，並把復旦大學黨委拋出來，所以復旦大學造反派已經對他喊出了“打倒”的口號。我們寫作班對他印象也不好，因為他接替張春橋分管寫作班以後，沒有抓什麼批判文章，反而讓我們做了市委的擋箭牌，為了和復旦大學的口徑一致，我們對楊西光也宣佈“打倒”。最後確定了三個大會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

口號擬定以後，就派朱維錚去借會場。朱維錚當時是“羅思鼎”小組最年輕的成員，組裏其他人都都是黨員，他是共青團

員，衝衝殺殺的勁頭十足，好多事情都派他去打前站。那時候，文化廣場每天都安排召開各種各樣的大會，一會兒復旦大學，一會兒華東師大，一會兒又是哪個系統，都排滿了。我們以市委寫作班的名義去定十二月十八日的會場時，他們說已給人家定掉了。一打聽，那天將是華東師大紅衛兵召開的對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原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的批判大會。華東師大紅衛兵是屬於“紅革會”系統的，朱維錚就直接衝到華東師大去了。他說我們市委寫作班要宣佈造反，市委機關要召開大會成立聯絡站，這是大事，你們一定要支持我們。

朱維錚在華師大碰到了北京大學的李醒塵，李是聶元梓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七名起草人之一，北大哲學系的教師。當時聶元梓派他到上海，留在北大駐滬聯絡站，就是要鼓動華東師大紅衛兵共同批鬥曾在北大蹲點的常溪萍的。聶元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來過上海，沒有跟我見過面，有的回憶錄和文章說，聶元梓到上海來的時候策動我造反，沒有這回事，可能是把李醒塵當成聶元梓了。那次朱維錚到師大借會場的時候，李醒塵與朱維錚見了面，他打聽市委寫作班是什麼人造反，朱維錚就說是徐景賢帶領寫作班起來造反，徐是支部書記又是市委文革小組成員。一亮底牌後，李醒塵和華東師大“紅革會”商量同意把會場讓給我們使用，但提出的條件就是要與我見一次面，看我們是真造反還是假造反。朱維錚就把他請到武康路二號，當時一起見面的有我、郭仁杰和朱維錚。我把自己正在準備的發言稿的內容跟他說了，還介紹了我們申聯市委機關的一些部門造反派的情況，他才相信了。我邀請他參加十二月十八日的大會，因為會場是他們讓出來的。華師大紅衛兵提出希望當天要把常溪萍也揪到會場來，我們說這完全可以辦到。他們又要求大會的口號要跟常溪萍有關，因為他們的

會議本來是集中火力批鬥常溪萍的。文革以前，常溪萍從上海調去參加過北大的社教運動，我們認為他早已是被打倒的“死老虎”了，上海市委也保不住他。按照常溪萍的職務，還不夠我們這次造反大會的級別，我們通知到會聽取批判的都是市委書記、候補書記和常委這一檔次的，我們想大會的口號已經用了“火燒”、“揪出”和“打倒”，再加上一個常溪萍，口號還能升級到哪裏去呢？琢磨琢磨，比“打倒”再厲害的就是“砸爛”了，為了照顧華東師大出讓會場的情義，我們臨時同意再增加一個“砸爛常溪萍”的口號。這就是後來毛主席所稱讚的“有區別”的四個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 《造反才知主席親》發言稿的難產

我那段時間還要起草自己在大會上的發言，幾天沒有睡覺，我感到任何時候寫文章也沒有這次寫得這麼辛苦。當時推選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勤務組，推了四個勤務員：我、郭仁杰、王承龍和程綺華。我的發言稿定名為《造反才知主席親》，來源於我去復旦大學“留學”期間紅衛兵送我的一副對聯：“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發言稿初稿寫好後，在勤務組內部就沒有通過，他們聽我念了一遍，認為造反精神不夠，他們說：你一定要講明市委是怎麼利用你的，要揭露市委的幕後活動，市委領導是怎麼策劃整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又怎麼派人背後調查那些人的材料？還要把你推出去充當什麼角色，做什麼事情，統統都要加以揭露。你在會上揭到什麼人，就當場把這個人揪上來批判，要他承認事實。你的發言稿要有力，要和整個大會的戰鬥氣氛保持一致，不能像平時的講話那樣從頭念到底，要不斷形成高潮。比如，當場追問：

“陳丕顯，你在幕後對曹荻秋下過什麼指示，你回答！”，陳丕顯就被迫出來回答，回答不老實，你就把它揭露出來，狠狠批判。而且，你的發言稿要真實地解剖自己的心路歷程，說出自己不怕丟掉“烏紗帽”決心起來造反的曲折思想鬥爭，這樣才能取信於廣大紅衛兵和造反派戰友。

我的發言稿多次修改都通不過，使得我非常苦惱，勤務組幫了幾次，最後請來《支部生活》的女記者、當時機關裏造反精神最足的女將徐桂芬，督促我改稿。在他們的集體幫助下，我的發言稿才改出來。我深深體會到：從“保皇派”轉到造反派的思想歷程是非常艱難的，比如說我覺得自己連“革命造反派”這個名詞都說不出口。當時陳伯達、康生在北京接見紅衛兵的時候，不直接稱呼革命造反派的戰士，而說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總稱叫他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發表文章時的標題也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我總覺得應該和中央的提法和口徑保持一致，我前幾天還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組的成員，一下子變成造反派了，總得有個過渡，所以我的發言稿的開頭也說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但勤務組的成員們說這個不行，這是折中主義，上台就要亮出你是造反派。要公開宣佈：我造反了，我造反造定了！就要打這個旗子！你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的不行，一點折中主義都不能留！你對市委就是溫情主義，老是割不斷你跟市委的聯繫。當時盛行“炮轟”的做法，我雖然做了勤務組的頭頭，對於我的發言稿，一會兒這個人“炮轟”，一會兒那個人“炮轟”，意見非常敞開。我只得照聽照改。

等到稿子修改定稿，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了，十八日就要召開大會，文化廣場足足可以容納一萬多人，怎麼通知有關人員出席？時間緊迫，一方面由市委辦公廳通知當權派，一定要

他們按時到會聽取批判，另一方面趕緊組織群眾隊伍。有一些中學紅衛兵組織非常積極，派出很多人給市委機關造反大會到馬路上公開貼海報，讓全市都知道。“工總司”派了工人隊伍到文化廣場壓陣，“紅革會”調來三千紅衛兵到場維持秩序，壯大聲勢。當時市委機關還沒有完全癱瘓，只不過有些部門的工作人員都從延安西路三十三號轉移到外面了，例如宣傳部轉移到思南路辦公，組織部又轉到另外一個地點，首腦部門怕紅衛兵、造反派衝擊，不能正常運轉，都有點轉入“地下”的味道，但通訊聯絡是保持暢通的。機關外面的人都找不着門道，但瞞不過我們這些機關內部的人，我們經過串聯，市委機關本身的大多數普通工作人員聽說寫作班和市直機關的好幾個部門聯合起來造市委的反，都很驚奇，區、縣、局黨委的機關幹部也聽到了這個消息，紛紛聞風而來，想聽聽我們到底說些什麼。

一切準備就緒，我已經幾天幾夜沒有回家了，只是在武康路二號的小房間內臨時打個盹。十二月十八日凌晨，在我決心邁出這關鍵的一步的當天清晨，我獨自走到武康路二號樓下大客廳裏的壁爐旁，四顧無人，我就拿起爐台上的電話機給我妻子葛蘊芳打去電話。我已經好幾天沒有回家了，她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告訴她這幾天我們寫作班開會的情況，我說我們再也不能像現在這樣下去了，我們決定造市委的反。葛蘊芳在解放前就加入了黨的地下組織，解放後曾經在市委機關工作，後來又被調到市人委文教辦公室工作。她覺得市委就是黨的化身，在她思想上認為對這樣一個市委是不能造反的。因此，當我告訴她我們今天要開會宣佈造反時，她很吃驚，問：“你怎麼造反？”我說在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下，我們要在文化廣場開一個大會，我將要在會上作一個發言，揭發市委。她擔心這樣做的後果：“這麼一開會，市委要對你採取措施



的。”我說：“無非是最後把我下放到農村勞動去，我現在的職務，最多也就是寫作班的支部書記，我再也不能做市委的擋箭牌了，我已經做好各方面準備，希望你支持我。”我動員她下午到文化廣場去，聽一聽會上的發言是怎麼回事。我跟她講話的時候比較激動，在電話裏的聲音都有些顫抖，帶有悲壯的味道。這說明，就在召開大會之前，我對自己的政治前景還是沒有十分把握的。

**“市委真的‘心臟爆炸’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全國第一個省、市委機關的造反大會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了。

所有的上海市委書記和常委，破天荒地第一次全部到場聽取批判。這次大會由於是市委機關幹部自己起來造反，“勒令”所有市委書記和常委都要到場，所以他們一個也沒有缺席。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馬天水、王一平、梁國斌、王少庸、楊西光、宋季文、李干城等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因病處在後台，這次也被迫站到前台來了。陳丕顯後來回憶他第一次參加批鬥會的心情時說：“這是我第一次作為群眾批鬥的對象站在群眾的面前。文化廣場是市裏過去經常開大會的地方，這主席台是我經常做報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為被批鬥對象站在了這裏。自參加革命以來，在黨組織的關心下，我似乎沒經歷過什麼明顯的‘逆境’，一直是處在‘順境’之中，沒想到今天竟會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境，此中心境，難以言表。”

和陳丕顯等同時到會聽取批判的，還有二十多名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級幹部，不過他們只能站在主席台的台下，聽候點到自己的名字才能上台揭發、交代。

大會由寫作班支部副書記郭仁杰主持，他宣佈：“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現在正式開始！”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口號聲，領呼口號的一男一女是朱維錚和戴厚英，他們兩人在寫作班合演過相聲，嗓子響亮，普通話標準，呼口號時此起彼伏，配合得十分密切：“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被批鬥的人也跟着舉手，呼喊這幾個口號。

接着，我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的身份，作了題為《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重點發言。我發言的時間用了一個半小時，採取提到哪個人就叫哪個人交代的做法，我時時不忘記把揭發的重點放在陳丕顯、曹荻秋身上，比如我揭發市委要在這次運動中“抓跳出來的反面教員”，而且說“五七年反右時，全國揪出幾十萬右派，這次可能還要多一點。”我要陳丕顯、曹荻秋當場交代，陳、曹兩人都推說“不知道”。我緊接着就要市委秘書長李家齊站出來揭發，他當場指證陳、曹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講過這些話，他自己又如何向下傳達的，揭穿陳、曹的“謊言”。我又讓陳丕顯的秘書出來揭發他如何接受陳的佈置，向機關黨委瞭解北京紅衛兵的情況，說明陳丕顯稱病躲在幕後指揮的真相，搞得陳丕顯十分狼狽。

除了我的發言以外，市委辦公廳、市委黨刊編輯部、市委宣傳部、市委黨校等單位的造反派代表紛紛發言，拋出大量材料，揭發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相，他們都成了市委“心臟爆炸”的“爆破手”；吳瑞武還代表“羅思鼎”小組和“丁學雷”小組在會上宣讀了《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聲明》。當時，坐在主席台上的“工總司”王洪文、北京大學李醒塵以及各個大學的紅衛兵頭目，聽得非常有力。他們說：

市委機關幹部造反，內部材料就是多，擊中了市委的要害，這次真的是市委“心臟爆炸”了！後院起火了！復旦大學“紅衛會”的負責人馬立新代表北京、上海等各紅衛兵司令部和各造反組織在大會上發言，對市委機關造反派殺出來表示堅決的支持。這說明我們的行動也取得了全市造反派的信任。

這個會對上海市委的打擊非常大，確實起到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作用。過去，黨的機關特別是高級機關對它的工作人員的要求非常嚴格，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市委給我們強調過幾條，第一是“內外有別”，內部的東西不能弄到外面去；第二是嚴守紀律，不得擅自表態；第三是顧全大局，個人和小單位都要服從和照顧大局的利益；還有一條是高度保密，不得洩露黨內機密。我們的造反大會一開，就把這幾條都衝破了。黨是靠組織紀律維繫着的，黨的首腦部門更是如此，現在把它內部的東西一下子捅出來，紅衛兵和造反派興高采烈，說徐景賢知道那麼多東西，現在大膽揭發出來，真正是“起義”了。但是市委領導人卻非常惱火，說我這樣做是“叛變”，成了黨的機關的“叛徒”，完全違反了黨的紀律，背離了“內外有別”的原則。事實上，不僅在華東地區，甚至在全國省、市委一級的黨委機關中，內部起來造反的，我們上海是第一家，成了名符其實的“領頭羊”。

大會前，上海市委已經處於四面楚歌的狀態：北京紅衛兵的衝擊，上海的大學裏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工人造反組織的建立，使上海的整個形勢比較混亂，市委已經難以招架。但因為機關裏的人心未散，從市到各區、縣、局的建制還比較完整，所以日常工作還能維持。但我們的大會一開，一切都亂了套。那天會場裏擠得滿滿的，除紅衛兵、工人造反派的聲援隊伍外，市、區、縣以及各局級機關的幹部也來了，他們參加大會



文革初期，中央派來上海的中央文革特派員、解放軍報記者甄文君返京，新聞系統各單位負責人前往機場歡送（左五甄文君、左六徐景賢、右三朱永嘉、右四徐海濤）。

後感到非常震驚，當時在他們眼裏，市委文革小組是市委的一個領導部門，而這個部門裏的一個成員居然宣佈跟市委決裂，豈不是很震動？當時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由在市委領導下的市委文革小組出面處理各種事情的，先由張春橋擔任市委文革小組組長，張春橋調去北京以後，由王少庸任組長，而那天王少庸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判，說明市委已經沒有威信了。在上海的機關幹部眼裏，市委寫作班是整個市委的輿論班子，是市委的喉舌和代言人，現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部門都整體起來造反了，而且理由是要抵制市委的錯誤領導，宣佈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就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堅決反對市委推行的錯誤路線，這樣就把一大批機關幹部都鼓動起來了，市委機關很快就陷入了癱瘓狀態。

關於這次造反大會的影響，後來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在他的回憶錄裏有如下的描述：

“徐景賢等人‘後院起火’、舉旗造反之後，在廣大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矇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機關部門的一些人紛紛仿效徐景賢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許多造反組織。這股造反風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區、各縣黨政機關，一時間機關內造反組織林立，他們揪鬥單位領導幹部，批判‘資反路線’，搜查所謂‘黑材料’，衝擊檔案要害部門，‘奪權’之聲甚囂塵上。許多機關都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秀才’造反和群眾造反確實不一樣。這些‘秀才’原來大都是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進了寫作班子之後又長期接觸市委機關工作，瞭解大量市委機關的核心機密。他們根本無視黨紀國法，把大量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和被歪曲的事實散發到群眾和社會中去，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 陳丕顯“造訪”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

那天大會發言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一直在硬撐，心力交瘁，幾天沒有很好休息，上台以前幾乎有點支持不住了。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發言發好，自己既要勇於揭發市委，表達與市委決裂的態度和決心，又要真誠檢查自己過去做市委工具的錯誤，取得各造反派的諒解。這確實是一件兩難的事。

效果總算還好。那天，“工總司”的負責人、北京和外地各派紅衛兵駐滬聯絡站的代表以及上海各級紅衛兵組織的頭目都來了，坐在主席台上。過去我曾代表市委文革小組和他們打過交道，如今他們又來聽我發言，看我究竟是不是真造反。我在發言中特別坦陳了我在造反過程中的矛盾心理，我說：“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萬怕，歸結起來就是一

句話，怕喪失自己的既得利益。”這是我內心思想的真實寫照。我發言完後，他們紛紛上前和我握手，我覺得渾身乏力，汗濕衣衫，人像癱掉一樣，但是心裏感到很欣慰。

在回武康路二號的路上，市委黨刊編輯部來的王承龍顯得非常興奮，他說：“今天的會開得很成功，今後要把所有上海的造反組織都統一在我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旗子下。”他忽然講出這麼一句話，我當時感到很突然，聽後的第一個反應是感到不妥當，我們只是上海的一個群眾組織嘛！但我們的隊伍中當時就有人冒出這種念頭，說明有些人確實懷有一統上海天下的野心。

大會以後，雖然在上海造成了很大影響，但我想起姚文元在電話中曾經着重提醒我們：要造輿論，這樣才能爭取更多的群眾。我意識到：光靠在大會上的發言，或是散發一些傳單，這種輿論是不夠的，我們要充分發揮寫作班的優勢，編出一期報紙作為大會專刊，廣為散發，才能把影響擴大到全市、全國去。我說馬天水在市委的幾個書記中態度比較好，又可以代表市委批印東西，我們把大會發言稿和造反聲明等編一張報紙，名稱就叫《上海市委機關造反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專刊》，大量印發。編輯者名義是“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這時“紅革會”提出，我們紅衛兵支持你們這麼多，又給你們會場，又幫你們忙，我們要和你們聯合編報。“紅革會”當時辦了一張《紅衛戰報》，有一套班子，我就同意由市委機關聯絡站和“紅革會”合編。事實上的執行編輯是朱維錚。他親自撰寫了消息，用了大字標題：

市委心臟爆炸 曹家後院起火

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召開大會炮轟上海市委

消息用顯著的位置刊登在《大會專刊》上，同時把我的發言稿，以及市委辦公廳、市委黨刊編輯部、市委黨校、市委宣傳部等造反組織的發言，還有市委寫作班的造反聲明等都登了上去，消息、發言、評論加上照片，像大型報紙一樣編了兩個整版，完全符合姚文元要我們多造輿論的要求。接着，我拿去叫馬天水簽字，一次印十萬份，在《解放日報》排版並用滾筒機印刷，用最快速度印出，大量散發，轟動全市。

大會以後，武康路二號熱鬧非凡，這裏變成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人們川流不息地來，有串聯的，有瞭解情況的，也有打聽張春橋、姚文元的消息的，門庭若市。我們商量，這個地方長期搞對外接待恐怕不行，就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對外接待部門搬到淮海中路市委黨校，那裏交通便利，地方又寬敞，便於對外。內部的勤務組辦公機構還在武康路二號，我也用較多的時間留在武康路，統籌安排整個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工作。

大會以後，市委各部、委如宣傳部、組織部、教衛部、工業部、交通政治部、財貿政治部等紛紛殺出造反隊伍，與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掛鉤，很快形成了從上到下的市委機關的造反系統，幾乎所有的部門都有造反隊，一直到市委最基層的工勤人員中連食堂裏都成立了造反組織。最有意思的是市委警衛處的警衛人員也造反了，他們成立的造反組織起了一個名稱叫“紅色警衛員”造反隊。警衛處的任務本來是保護首長的，群眾剛起來時，要找首長談判、開批判會，都由警衛員保衛；首長躲在什麼地方，紅衛兵、工人造反隊根本找不到。現在警衛員一造反，你要陳丕顯、曹荻秋他們到場，警衛員一下子就把他們找來了。這樣一來，整個市委機關亂了套。

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午，陳丕顯的秘書打電話到武康路

二號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說是“丕顯同志要來看望你們”，接着，他就乘汽車到達了。說心裏話，當時我實在不願意接待他，一是他已成為我們的批判對象，我們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建立什麼說不清的關係，二是他此刻主動來找我們，肯定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所以，我就拉了幾個聯絡站的工作人員，把他堵在屋外的院子裏，不請他進室內，幾個人就這樣站在露天開始了對話。陳丕顯當時已按中央的指示停止養病、到第一線工作，但整個市委機關已指揮失靈，他感到舉步維艱，先是想扶植機關裏的保守派，但已經拉不起有影響的隊伍來，於是他又調過頭來想靠攏造反派。

陳丕顯一反往常的首長派頭，顯得很謙恭、很親切，就在院子裏站着和我對話，其他的人就圍在身邊。陳丕顯說：“前一時期我一直在養病，市委的工作由荻秋同志主持，所以我對有些情況也不是很瞭解。你們起來造反我表示支援，有什麼需要我做的事情請儘管提出來。”

我聽他這樣說，就故意問他：“那你對我們提出的‘揪出曹荻秋’到底怎麼看？”因為在我們看來，曹荻秋前一時期一直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根本無法主持工作了。

“這個，荻秋同志處在第一線，他也有他的難處……”陳丕顯已經決心拋出楊西光和常溪萍，但對於曹荻秋，他不敢明確表態，因為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兩個商量決定的。

陳丕顯拼命把話題扯到別的方面，他說：“現在市委機關受到衝擊，工作很難開展，我有一個建議：市委和你們機關造反聯絡站可不可以合署辦公？不過你們這裏地方太小，可以考慮換一個地方，房屋、車輛我都可以提供，經費也沒有問題。”

我一聽就知道這才是陳丕顯此行的真實意圖，我們豈能上他的這個圈套，如果聯絡站和受批判的市委合在一起辦公，那



我們還造什麼反？全市的群眾組織又會怎麼看？我就斷然回答：“這個問題不能考慮！”

站在旁邊的程綺華、朱永嘉等人插嘴說：“我們不需要房子、汽車和什麼經費！”

陳丕顯看看談不下去，訕訕地說：“那我們多保持聯繫吧。”就告辭走了。

陳丕顯一走，武康路二號裏就炸開了鍋，有的說：“想要和我們合署辦公，休想！”有的說：“他提供什麼房子、車子、經費，這是要收買我們！”只有黨刊編輯部來的王承龍說：“車子、房子，為什麼不能用？只要造反需要，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 毛主席表態支持上海機關幹部造反

十二月十八日大會以後，我們並沒有發電報或寫信把會議的情況向毛主席彙報，但開會的那天，《解放軍報》駐上海記者站的記者甄文君就坐在主席台上，他聽取了會上的全部發言，會後很快就把大會主要內容和所提口號，寫了一個動態消息發在中央文革的《快報》上。毛澤東看到了這條消息，迅即做出反應，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們寫作班昨天剛剛吃過為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祝壽的長壽麵，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號的草坪上，商量怎麼進一步揭發批判市委的問題時。忽然，文學組一個青年從樓裏奔出來叫我：“老徐，北京有長途電話！”

我趕緊跑到辦公室，拿起電話聽筒，裏面響起了夾雜着上海、浙江口音的普通話：“徐景賢嗎？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傳達一下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到了北京工作，也像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口稱“主

席”，省掉了“毛”。今天，他主動打電話給我，而且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令我喜出望外，我趕緊掏出小本子準備記錄。

姚文元在電話裏一反平常冷靜的語調，用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語氣說道：“昨天晚上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都到主席那裏去了，祝賀主席生日，給主席敬酒。主席很高興，他平時很少喝酒，昨天和我們乾杯了。主席對上海的形勢很關心，他從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看到了你們造反的消息。主席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我問主席：上海市委強調‘內外有別’怎麼辦？主席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邊聽，一邊“嗯嗯”，把姚文元電話傳達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心裏激動得熱血沸騰。

姚文元接着說：“主席很欣賞你們的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主席說：‘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這幾個口號的提法有區別，好！”

姚文元最後說道：“主席在和我們碰杯的時候說：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一期《紅旗》雜誌將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發表元旦社論，你們要很好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一次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一起過生日並祝酒，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他向來不提倡祝壽，但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七十三歲生日這一天，卻邀請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共度生日，那天並沒有邀請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員參加，這說明毛澤東越來越明顯地想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早在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和各大區負責人談話的時候，就

說過：“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佔領不了的。”從這次祝壽活動來看，他正是有意從組織上開始實現這個目標。當然，祝壽宴很普通，按照毛澤東吃飯的慣例，四菜一湯，每人一小碗麵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此外，據姚文元說，每人還有一小杯葡萄酒。毛澤東興致很高，在祝酒時說了一大篇話。除了姚文元給我在電話裏傳達的內容以外，據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錄》一書中回憶，毛澤東還說：

“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

“現在，對這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叫他懸崖勒馬，如果再搞兩面派，他們就是和走資派同流合污，或者他們就是走資派。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澤東在祝酒時對文革運動的規律做出這樣的評價：“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我想：毛主席肯定和支持我們機關幹部造反，就是希望我們和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相結合。他肯定上海的形勢很好，就是因為工人、學生和機關幹部都發動起來了！

我聽到姚文元的傳達和王力的回憶的不同之處，就是據姚文元當時告訴我，毛澤東在最後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而王力回憶毛澤東說的是：“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我更傾向於前者。因為一、這更符合毛澤東的口語和風格，他後來還多次說過“全面內戰”這句話；二、我是當時聽的傳達並作了記錄；三、我立即向市委寫作班的核心成員作過傳達，他們可以作證；四、我後來又和姚文元作過核對，姚文元確認當時是這麼說的，但後來在起草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元旦社論時，為了文字更準確、更嚴密，改成了“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

“全國全面內戰”也好，“全國全面階級鬥爭”也好，實質都一樣。

我們就在毛澤東號召和指引下，全力投入全面奪權的一九六七年。

## 第六章

# 昆山歷險

昆山是江蘇省靠近上海市邊境的一個小城，也是京滬鐵路上的一站。一九六六年的歲末，昆山被捲進了上海文化大革命中兩派尖銳衝突的旋渦，爆發了一起“昆山事件”。而我，則是“昆山事件”的親歷者。

### “昆山事件”的前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張春橋從中央文革返回上海，簽字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為“革命的合法的組織”等五項要求，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援，上海市委對此不滿，就拉起了一個保市委的全市性組織“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簡稱“赤衛隊”，發動各工廠企業的黨、團員參加，一下子發展到80萬人，成為“工總司”的對立面。

赤衛隊成立後，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條要求。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當場簽字表示同意。八條的內容除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的群眾組織以外，還要求市委制止“工總司”搞打、砸、搶，反對張春橋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項要求，要張春橋回上海作出檢查等。這一下就惹火了“工總司”，王洪文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召開大會，要求曹荻秋撤銷承認赤衛隊八條的簽字，曹荻秋被迫同意宣佈八條無效。

曹荻秋這樣“翻燒餅”，使赤衛隊大感委屈，好像親生兒子被自己的父母甩掉了。於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幾萬名赤衛

隊員進駐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喊出了“打倒曹老頭！”“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工總司”調十萬大軍包圍康平路大院，發生了全國第一起大規模武鬥。關於康平路大武鬥，我已有專文回憶。

工人赤衛隊挨了打，赤衛隊總部被解散，各區的赤衛隊分部大都被砸，工人赤衛隊當然是不肯善罷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衛隊頭頭鼓動二萬多名隊員，離開生產崗位，衝進上海北火車站，準備上北京請願、告狀，火車開出後被阻在江蘇昆山。赤衛隊負責人王玉璽本身就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頭頭，在他的指揮下，調度所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離開了崗位，致使滬寧鐵路全線停運。這件大事驚動了周恩來總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周總理從北京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停止養病，到第一線工作，先把王玉璽抓起來，並和各群眾組織負責人一起商量恢復滬寧線交通；同時，張春橋也從北京打電話給我，傳達了中央和周總理的指示。張春橋怕陳丕顯說話沒有人聽，要我做做各造反派頭頭的工作，共同以大局為重，設法把昆山的赤衛隊弄回來，抓革命，促生產。

於是，當天深夜陳丕顯去處理了王玉璽的事以後，在東湖賓館和我們開了一個通宵的會。會上，剛從昆山趕回來的“工總司”二兵團頭頭耿金章說：赤衛隊有上萬人想從昆山乘火車去北京，現在被“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包圍在昆山城裏，要想辦法把他們弄回來。

大家商量以後決定，由幾個紅衛兵組織的代表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了一份《急告上海市人民書》，另外，通知各廠派車去昆山接赤衛隊員，並由王洪文、耿金章和我一早趕到昆山去，動員赤衛隊回上海堅持生產。

## 王洪文和我一起進昆山城

天濛濛亮的時候，幾個紅衛兵正在起草文件，陳丕顯在一旁等着，因為要他簽字後報社才能印成傳單廣為散發。我們卻等不及了，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帶上其他幾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立即奔赴昆山。耿金章從“二兵團”調來一輛兩噸重的敞蓬小卡車，招呼我和王洪文同他一起跳上車向昆山進發。耿金章個子很矮，幾天沒有刮鬍子，活像一個小老頭。他是部隊轉業軍人，轉到造紙廠當工人，這時身上穿了一件藍色的海軍大衣，腳上登了一雙長統皮靴，自從當上了“工總司”二兵團司令，說起話來連王洪文也不放在眼裏。這時候大家開了一通宵的會，肚子餓得咕咕叫，耿金章卻說有辦法，他告訴開車的開到天山路附近裝食品。耿金章原來的單位是造紙公司，但他把其他幾個公司像禽蛋公司、食品公司等都吸收到“二兵團”的旗下，所以當他的車開到天山路以後，只聽他一聲號令，很多人就扛着裝有麵包、桃酥、米花糖等各種點心的食品箱，一筐一筐地往車上搬。大家的肚子正唱“空城計”，見到點心紛紛狼吞虎嚥起來。我對耿金章說：“你真有辦法！”王洪文說：“他不但把造紙廠、食品廠控制起來，還控制了上海民航、飛機場，把民航造反派納入他‘二兵團’的範圍，要坐飛機特別方便。”

一路上，王洪文心神不定，他穿着一身半舊的綠色軍裝，戴着一頂海虎絨翻毛軍帽，搭拉着腦袋，一方面是一夜沒有好好睡覺，另一方面是感冒了，鼻子嗡嗡地，一支接着一支抽煙。王洪文告訴我，他已經下令要“工總司”把上海的赤衛隊總部和各區的分部統統砸掉了。現在，張春橋又要求我們趕快把跑散在外的赤衛隊從昆山弄回上海，王洪文覺得不去也不行，因為他帶造反隊在安亭鬧事的時候也是被張春橋勸回來

的。但他在車上總是在想什麼心事，車子剛開出上海市區，他就對隨行的上棉十七廠青工廖祖康說：“小廖，你先回去，給我到廠裏領兩百塊錢買張飛機票，明天我要到北京去反映上海的情況。”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周總理的指示，張春橋的電話，都給你轉達了，怎麼又要到北京去？但他已經打定了主意明天上北京，我勸不動他。

我們的車子開到昆山城外的一座公路橋邊，就沒有辦法再往前開了。半邊公路全部都是首尾銜接的車輛，都是各廠造反隊開來的車，把昆山城裏的赤衛隊包圍在裏面。另外半邊公路上只見一車一車的人從昆山城裏出來往上海方向開，看得出是各廠造反派把本廠赤衛隊裝回去了。當來車與回車交匯的時候，來車的造反派就痛罵回車是“死老保，臭老保”，回車上的人都灰溜溜地不出聲。當時雙方的對立情緒非常嚴重，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是來做人家工作，動員人家回去的，不能採取這種辦法。當時的我身上造反派的感情也許還沒有他們這麼強烈，要我罵人家“臭老保”總覺得叫不出口。

汽車既然開不進去，我們幾個人就索性步行進縣城。路上一道道封鎖線，都是造反隊佈置的，赤衛隊員想要單個或少數人從裏面出來是不可能的，只能一車一車給裝回上海。最後幾道防線都是“工總司”二兵團的，耿金章說，他已經派二兵團隊伍插進昆山城，把赤衛隊分割瓦解，有些人被他們強行押上卡車返回上海，用的是抓俘虜的辦法。但是他也說，有相當一批赤衛隊員被衝散了，現在已經躲進昆山城的各個角落，甚至躲進居民家裏。赤衛隊在昆山已經做了很多宣傳工作，說他們在上海時，上海市委不承認他們；到市委去，市委領導不肯接見；他們造市委的反，又遭到造反隊毒打；被打出來後要到北京告狀，又沒有火車，希望昆山居民聲援他們。昆山居民很同



情他們，對後進來的上海“工總司”造反隊很反感，有的造反隊員還挨了昆山人的打。

我們到達昆山的時候正好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上午，我想正如姚文元在電話裏給我傳達過的：毛主席說一九六七年的“全國全面內戰”，大概就這樣開始了。昆山城裏面亂糟糟的，一部分造反隊員已經衝進去了，赤衛隊員大部分也在裏面。我們再進去有沒有危險呢？大家正在議論時，“北航紅旗”的一個紅衛兵說：“怕什麼？我們已經來了，就要進去看看。”他提議到縣委機關去，直接找縣委書記，向他傳達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縣委通知居民，讓居民動員赤衛隊員返回上海。大家贊成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的意見，我們二十幾個人準備一起進城。當時其他人都帶着造反隊的袖章，而我們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還沒有發紅袖章，下屬各部委的造反隊也不戴袖章，現在我要進昆山城裏去，同行者說你沒有袖章不行，要通過層層設防的造反隊的檢查，一定要戴袖章。當時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的幾個人和我們同行，其中的一個人拿出一個“新革會”的袖章給我戴上，我說：“很光榮，第一次戴袖章，我成了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的戰士。”我就帶了“新革會”的袖章和大家一起進入了昆山城。

### 把縣委書記架上廣播車

進城以後，發現街上氣氛很緊張，東一簇、西一簇都是人，每一簇人群裏都有人在發表演說，有赤衛隊的，也有造反隊的。赤衛隊員控訴他們怎麼在上海受壓、受打擊；造反隊員則揭露赤衛隊是保皇組織，宣稱他們大方向錯了。比較起來，赤衛隊的演講受到的歡迎更多一些，因為圍觀鼓掌的人比較多，造反隊演講時還有人在一旁發出噓聲。我們估量形勢，感

到從整個的力量對比看，造反隊還不佔優勢，所以我們決定趕快到縣委去。

城裏的單位都關門了，商店也停止營業。在路上走的時候，行人都要來看袖章，看你們是造反隊的，有人開口就罵。為了方便和安全，我們又把袖章取下來，一路找到縣委。縣委所在地是一幢西式的兩層樓洋房，門口掛着“中國共產黨昆山縣委員會”的招牌，門內是一個大院子，四周牆上刷滿了標語，但屋內人去樓空，只有兩個接待人員在值班。王洪文和我亮出身份，要求他們幫忙找縣委書記，接待人員走了出去，過了一刻鐘左右回來說縣委書記找不到。我們很嚴肅地對他們說，我們是來傳達周總理指示和中央文革的電話精神的，不要在我們上海造反派面前耍這套花招，勒令你們在半小時內把縣委書記找來，不然一切後果要你們負責。他們一看我們這種來頭趕快又去報告，過了幾分鐘縣委書記就來了。

縣委書記約莫四十來歲，瘦瘦的，見了我們很客氣，說對不起，剛才接待另外一批人來遲了。北京紅衛兵質問他，上海來的造反派在昆山城裏挨了打，挨了罵，你知道嗎？他回答不知道。北京紅衛兵就向他提出強烈抗議，主要是給他一個下馬威。然後由我向縣委書記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要求上海赤衛隊員返回生產崗位，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同時要求昆山縣委把赤衛隊負責人扣留起來。我說：中央文革張春橋同志要求上海各個組織配合上海市委做好這個工作。現在我們要求昆山縣委配合，動員赤衛隊回上海。那個縣委書記表示很為難，說你們上海兩派到昆山來，我們昆山怎麼辦？王洪文很生氣地說：這有什麼不好辦？你昆山縣委究竟是支持赤衛隊，還是支持造反隊？這樣吧，你跟我們一起走，到廣播車上跟昆山老百姓說清楚，叫他們不要反對我們上海的造反派，要動員赤衛隊回到

上海去。那個縣委書記怎麼也不肯和我們一起上廣播車，我們就說：“你不去不行，你要對中央首長的指示表明態度！”

於是，我們二十幾個人把縣委書記挾在中間，排成一列長方形的隊伍朝城外的廣播車走去。縣委書記看看溜不掉，只好跟着我們走。兩個接待人員也跟着走了一段路，不曉得我們要把縣委書記帶到哪裏去，就偷偷溜走去通風報信了。我們走到大街上，圍觀的人很好奇：怎麼有一支隊伍把縣委書記挾在中間走着？有人就喊：“縣委書記給他們抓走了！”這樣一來，跟着我們的人就越來越多，在旁邊又形成兩條長龍。同濟大學當時有幾百個紅衛兵進了昆山城，一看這架勢，就來做我們的保鏢，在旁邊維持秩序。昆山人在旁邊罵罵咧咧：“你們上海人跑到我們昆山來做啥？”“為啥這樣對待我們的縣委書記？”我手裏正拿着當時與縣委書記談話紀錄的筆記本，本子裏還夾着一支筆，有人就衝進來伸手來搶我的本子，我一掙，才沒讓他把本子搶走。人群已經憤怒地想要動手了，同濟大學的紅衛兵在一旁保護着我們，不讓他們擠進來，也不讓縣委書記跑掉。

廣播車是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開來的，上面裝了九個大喇叭，我們叫它“九頭鳥”，準備通過廣播動員赤衛隊回上海。這車子原來是大客車，現在把後面幾排位子拆了，裝上馬達可以發電，一發電九個喇叭可以發出非常宏亮的聲響。王洪文和我跟着二十幾個人一起擠上車，把縣委書記也挾了上去，幾百名紅衛兵在外面保護。車上的紅衛兵說，赤衛隊正在昆山城裏對人們造謠煽動，有一部分赤衛隊員已經從昆山轉移到蘇州去了。有一個昆山青年聽了造反派宣傳後，表示同情，赤衛隊員就衝進他家，把這青年打了一頓，我們得知此事後都很生氣：這個地方居然還有白色恐怖！

這時廣播車外面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大家正在商量下一步

怎麼辦的時候，一個造反隊員跑來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來了，聽說來的是韓哲一和馬天水，現在正在城外的大客車上，想要找赤衛隊頭頭談話。王洪文一聽韓哲一和馬天水來了，就說我要和他們談判去。他對我說：“這地方你負責一下，我跟他們談，談得成就談，談不成我就到北京告狀去。”說着，他急衝衝地下車走了，我當時很不高興，我想，我們大家一起商量好來處理“昆山事件”的，這麼嚴峻的場面擺在面前，你倒走了，這局面叫我怎麼處理呢？

我考慮，車外人圍得這麼多，只有一個辦法，即利用廣播向崑山人做宣傳。我對同濟東方紅兵團負責人說，你們二百個“同濟東方紅”的戰士要把廣播車保護好，不然要被人家砸掉的。坐在車前駕駛座旁邊拿着話筒的廣播員，是個同濟大學女學生，梳着兩隻小辮子，她只會用普通話宣傳一些“十六條”的內容，什麼“不要挑動群眾鬥群眾”啦，“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啦，這些抽象的東西，崑山人根本不要聽。我說，讓我用上海話來廣播，講上海話崑山人比較愛聽，由我來介紹赤衛隊跑到崑山來的前後經過，再讓縣委書記表態，做做崑山人的工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

### 我當上了講“上海話”的廣播員

商量定後，我就爬到駕駛座隔壁的廣播員的座位上，用上海話講開了：“崑山縣的鄉親們，你們好！”我的上海話口音跟崑山話比較接近，九隻高音喇叭響得不得了，我第一次感覺到這些廣播設備的音量是如此強大，整個城市都為之震動，而且廣播後馬上傳來回音：“崑山縣的鄉親們，鄉親們，你們好！你們好！……”全崑山城都聽得見廣播的聲音。接着，我講了赤衛隊與造反隊的矛盾，是上海市委內的走資派挑動的，

現在赤衛隊要上北京告狀，造成鐵路交通中斷，給昆山帶來了壓力，所以上海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到昆山來，是來與你們並肩戰鬥的。我們共同的任務是啥？是根據周總理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精神，動員赤衛隊員回上海去抓革命、促生產，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我用上海話宣講的時候，窗子外面安靜下來了，我最後說，昆山人民一定能夠堅決執行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把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司令部，指向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各地的代理人。同時我也向赤衛隊員宣佈：上海已經開來幾百輛空的大卡車，準備把你們接回去，我們保證不打不罵，不侮辱你們的人格，保護赤衛隊員的人身安全。

我講完後，要昆山縣委書記講話。那個書記很謹慎，在我廣播的時候，他寫了一個簡單的稿子，他說：我們昆山縣委堅決擁護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決定，我們要跟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在我們要堅決按照周總理和中央的指示辦，希望赤衛隊員立刻返回上海去，就地鬧革命。他講的都是一些原則性的話，總的意思是希望赤衛隊返回上海。我和縣委書記講話後，廣場上、大街上氣氛還不錯，我覺得廣播有了效果。

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車上有兩個北京的紅衛兵嫌縣委書記講話的調子不高，要他在廣播裏承認昆山縣委挑動昆山人民鬥上海造反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方向錯了。那個縣委書記當然不肯。這一來就鬧僵了，當場就在車裏爭執不休。我提了一個折衷的辦法：由紅衛兵把這些話寫下來，叫縣委書記在紅衛兵寫的東西上簽個字，由我們代為廣播，那書記還是不答應。書記說我要下車了，紅衛兵硬把他堵在門口，雙方就吵起來。下面的人看到了就喊：“不准扣留縣委書記！”這時，縣委的兩個接待員從外面動員了好多人來，圍在

車子旁亂叫：“把縣委書記放下來”！“我們要縣委書記！”一邊叫一邊有好幾百人擁上來，車外負責保衛的紅衛兵簡直沒法招架。我一看情況不妙，就說趕快放人算了，再不然要出大事情了。車門嗤啦一開，書記趕緊溜下去了。駕駛員慢慢開動車子，外面圍着的人在車身上敲呀，打呀，追個不停，罵個不停。二百多個同濟紅衛兵手挽着手，保護了廣播車，這才慢慢讓車撤出昆山城。

### 路遇持槍民兵的攔截

車駛出昆山後，我們把在昆山的赤衛隊交給“工總司二兵團”，由他們負責送回上海，但另外到蘇州去的那一大批赤衛隊員，還必須把他們動員回去。車上的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利用這輛廣播車，到蘇州去繼續做赤衛隊員的動員工作。於是廣播車又朝蘇州方向開去。

時近黃昏，大家感到又餓又累，大部分人開始在車上打瞌睡了，我也靠在廣播員的座位上閉目養神。突然，大家被急剎車驚醒，一看車前有幾十個民兵拿槍對着我們。這是怎麼回事？原來昆山縣委的那幾個人跟下面的公社都有聯繫，我們的車子開出後，他們就打電話到公社，叫農村的民兵在公路上堵截我們。有幾個拿槍的民兵，上車就把駕駛員和同濟大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帶走了，等了很久也不見他們回來。

天色昏暗下來，車子前後都有拿槍的民兵看守。車廂裏很黑，只有車頭上亮着一盞很小的燈，大家的心情都很緊張，不曉得兩個人被帶走後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同時也擔心會不會把全車的人都押到公社裏去。正在這時，一個北京紅衛兵悄悄地跟我說：“有一個‘備用’的駕駛員，剛才正好在車子後座上打瞌睡，民兵沒有發現他。”這正是天無絕人之路，那位駕駛

員也悄悄地跟我講：“等一下趁民兵們沒有防備，我開車就跑。”我當時覺得，這個辦法不太好，萬一我們走了，那兩個被他們扣下來的人怎麼辦？北京紅衛兵說：“沒關係，只要我們的車一走，他們就可以脫身的。”

車上大家都靜悄悄地等着機會，裝出打瞌睡的樣子。過了很久，車外民兵看車裏沒有什麼動靜，有點鬆懈下來。開始他們還在車門外兜來兜去地巡邏，到午夜就開始打呵欠了。天氣很冷，他們在外面不停地跺腳，接着，前面的幾個民兵又拿着槍到車後找人聊天去了。抓住時機，後座的駕駛員輕手輕腳地從後邊爬到駕駛座上，猛然一踩油門，發動了汽車，汽車“轟轟”地震動幾下就往前開去了。車上的人都有準備，下面的民兵卻想不到車子會突然發動，他們慌了手腳，在後面奔着追，邊跑邊叫：“快停車，快停車，不然我們開槍了！”北京紅衛兵膽子很大，在車上對他們喊：“量你們也不敢開槍！”果然他們不敢開槍。駕駛員加大油門，一口氣開出好幾公里。這樣，大家總算逃出了昆山地界。

天濛濛亮時，大家看見公路邊豎着“到蘇州××公里”的標誌，都感到脫離險境了，我也鬆了一口氣。車子進了蘇州城，駕駛員找了一家麵館，滿車的人下來，唏哩呼嚕地每人吃了一碗麵，然後把車開到蘇州醫學院，與那裏的紅衛兵聯絡。我進蘇州後，看到公共汽車站、大路轉彎處等已經貼出了用毛筆寫的大字報，內容就是周總理給陳丕顯的指示、張春橋給徐景賢的電話等，我心想上海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已經把宣傳工作做到蘇州了。我們因為一夜沒睡，都累死了，可是蘇州醫學院的紅衛兵說：“住的地方都滿了，沒辦法招待，委屈你們在車子裏休息一下，車子就停在我們院子裏。”這樣，大家只好坐在車上打了一個盹。

## 在蘇州動員赤衛隊回上海

太陽升起來以後，我們就開始行動，向蘇州各方面瞭解情況，進行宣傳。當時跑到蘇州的赤衛隊員大約有一千多人，有的還留在火車站，但大部分人已跑散掉。我們的任務就是動員他們返回上海。我找到“工總司”設在蘇州火車站的一個聯絡站，負責人正好是上海國棉十九廠的工人詩人李根寶，和我很熟悉的，我們就一起商量由他去和鐵路局打交道，調動車頭和車廂把滯留在蘇州的人送回上海。我則繼續做宣傳工作，那天我整天坐在廣播車的播音員位置上，請駕駛員開着車子在蘇州市區裏沿着不同街道、不同路線不停地繞行，我用上海話反復地廣播，我發現蘇州人都聽得非常注意。當我們到昆山和蘇州宣傳以後，蘇州和昆山兩地的居民也形成兩派：一派支持赤衛隊，一派支持造反隊。當時我們還自豪地說這次把昆山和蘇州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實際上是把上海的大亂亂到昆山和蘇州去了。

經過勸說，在蘇州的赤衛隊員們被集中到蘇州郊區的一座大廟裏，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下午四點多鐘，陸陸續續有六、七百名赤衛隊隊員在那裏報到。“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和上海“工總司”都在那裏設立了接待點，赤衛隊員在那裏報到後，給每個人發麵包，分別編組，最後由造反隊訓話。赤衛隊員們當時已士無鬥志，他們到了蘇州後，鐵路已經中斷，到北京告狀在事實上已無可能，所以也都歸心似箭。有些赤衛隊員還買了采芝齋糖果、蘇州豆腐乾，拎了大包小包，急着返回上海。

由於鐵路中斷，上海到昆山、蘇州、南京的火車都停開了。我們派人與鐵路造反聯合同令部(“鐵聯”)聯繫，從下午四點多鐘一直談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弄到一列從蘇州發往上海



的火車。那輛列車裏的燈全部是幽暗的，好像鬼火一樣，火車不屬正常運行，也不是正式班次。赤衛隊員們紛紛擁上車，造反隊員、北京、上海的紅衛兵和我們也都上了車。火車開開停停，速度非常慢。我想，總算把這七、八百人拉回上海，也算完成了任務。聽說，昆山的那部分人經韓哲一、馬天水在那裏做了動員工作，已經被耿金章的“二兵團”送回上海。至此，“昆山事件”基本上告一段落。

從蘇州回上海的路上，火車上擠得滿滿的，大家都很累，有幾個青年索性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睡覺。我也感到實在太疲勞了，就拿了一個麵包，跟着他們爬到行李架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火車行李架上睡了一個好覺。一月三日早上，火車開到上海，我趕快讓同濟大學紅衛兵問了一下，回答是那兩個給昆山民兵抓走的司機和紅衛兵已經被放了出來，他們比我們先回到了上海，我這才放心來。

我回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馬上找來了《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仔細讀了幾遍，看到裏面傳達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全國全面內戰開始！”只是在文字上稍有修改，改成“全國全面階級鬥爭開始！”我心裏想：我已經在江蘇昆山嘗到了全國全面內戰的味道啦！

“昆山事件”是上海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對保守派的最後一次大較量，自此以後，上海最大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就徹底瓦解了，上海的文革進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的新階段。

## 第七章

# 毛澤東與上海“一月奪權”

我的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出版以後，有的讀者在讀後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你們一九六七年在上海發動的‘一月奪權’，究竟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去奪的，還是你們自己的發明創造？”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事實。

我在文革期間最早看到“奪權”這個詞，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這份文件中，毛澤東親自撰寫的一段話：“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當時，我們對毛澤東、黨中央所作的指示、講話，以及發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細摳的，從中學習領會新的精神，所以，學了《通知》，我認為奪權的內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調動”。同年的八月五日，毛澤東又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消息傳來，我認定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以後幾個月，經過北京來上海申聯的大學紅衛兵的啟發，又受到從上海調去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動，我就決心起來造反。

### 毛澤東在生日宴會上肯定上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上海帶領市委寫作班成員

宣佈造反，召開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會，提出了“火燒陳丕顯(市委第一書記)！揪出曹荻秋(市長)！打倒楊西光(市委候補書記)！砸爛常溪萍(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的口號，毛澤東知道後當即對我們表示支持。他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為他祝壽的飯桌上，稱讚了我們提出的這幾個口號，高興地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

姚文元當場問他：“上海市委強調‘內外有別’，怎麼辦？”

毛澤東回答：“‘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市委寫作班，向我傳達了毛澤東的這次講話，並且告訴我最新的精神——毛澤東在祝酒時宣佈：“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意味着政治鬥爭要進一步升級了。

我聽了毛澤東的指示，興奮萬分，立刻向寫作班的全體成員作了傳達。我還說：“有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我們要在‘全國全面內戰’中立新功！”緊接着，我們抓緊籌備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開的徹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

### 中央文革調查員張春橋、姚文元來滬

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召開前夕，一月四日的上午，張春橋、姚文元受毛澤東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調查員的身份來到上海。他們在接見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核心成員的時候，說了很多上海市委領導人的壞話，對我們籌開的打倒市委大會表示關切，但開始時並沒有提出向市委“奪權”的問題，張春橋倒是

一再強調：“你們還是要抓住批判市委這個重點，讓各級當權派去頂在第一線，不要把什麼事都攬到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在組織撰寫一月六日大會的三項通令的時候，沒有提出“奪權”，只是宣佈：“第一，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第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級幹部堅守崗位。”

當時，在我的思想認識上，認為還是應當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批判混進黨內、政府內以及各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所以，我們在通令裏請求中央改組中共上海市委，撤銷有些人的職務，並沒有想過由自己掌權。我當時還曾和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另一個負責人王承龍一起議論，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書記到上海任職。因為，在我們的固有觀念裏，省、市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任免權一直在黨中央，不能由下邊擅自“奪權”的。

### 《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

就在張春橋、姚文元剛剛到達上海的同時，發生了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海《文匯報》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宣佈“接管”報社，並在一月五日出版了第一張“接管”後的《文匯報》，刊登了“工總司”等造反組織聯合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

由於張春橋、姚文元關照過我，他們到上海來的消息要“暫時保密”，我就沒有告訴《文匯報》的造反派。所以他們不知道張、姚來到上海，反而派人連夜趕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接管”報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援，結果沒有見到張、姚和其他中央文革的領導，只見了《人民日報》

的負責人，就返回上海了。

一月五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號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工總司”負責人的會議結束以後，我收到了“接管”後出版的《文匯報》，我馬上把報紙送給正在東廳休息的張、姚看，他們翻着報紙，感到十分意外。張春橋說：“我們事先不知道這件事啊！”我回答：“他們接管報社沒有和我聯繫。”姚文元很鄭重地說：“這件事我們還需要向中央請示彙報。”說罷，他們就匆匆返回興國路住地向中央寫報告去了。

一月五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緊跟《文匯報》，宣佈“接管”報社，還在報上刊登《告讀者書》宣稱：“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對此，張春橋和姚文元仍不表態。

然而，在北京的毛澤東看到了宣佈“接管”和“奪權”的上海兩家報紙，立即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一月八日，他對《人民日報》的負責人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又說：“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他明確地說：“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

據此，《人民日報》在一月九日轉載了奪權後的《文匯報》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名發佈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在“編者按”中公佈了毛澤東一月八日講話的主要內容。

消息傳來，我們歡欣鼓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對上海“奪權”的支持。張春橋、姚文元這時也表態支持兩報奪權了。當時我想：一個基層新聞、文化單位的權好奪，但對於



1967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掛牌後不久，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在外灘掛牌。

省、市委一級的大權怎麼奪呢？我心中還沒有底，張、姚也沒有對此作出部署。

### 《緊急通告》發表前後

這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自從一月六日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合召開了打到上海市委大會以後，從各區、縣、局到各基層單位也紛紛召開批判打倒當權派的大會。有些人打着造反的口號，提出了補發工資、提高津貼、提前轉正、發申聯費等經濟要求，而各級當權派中的某些人又根據市委“經濟上放寬一些，政治上可以爭取主動”的指示，紛紛簽字同意發放錢款和

滿足某些人的經濟要求。如此一來，天下大亂，銀行的錢款在幾天中幾乎被提取一空，一些重要崗位的職工大量外出串聯，港口、鐵路的運輸物資嚴重積壓。

有一天晚上，王洪文帶了“工總司”的幾個頭頭來到武康路二號，說是要找張、姚緊急彙報情況。由於只有我知道張、姚在興國路的紅色保密電話的號碼，我就幫王洪文撥通了電話，王洪文匯報說：“剛才到發電廠去，上海只剩下四天剩煤了，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可是，張、姚聽了彙報也毫無辦法。

由於張、姚到上海後曾經面告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結束病假出來工作，並說明這是中央的指示，陳丕顯不得不站到第一線收拾殘局。一月八日，陳丕顯在錦江飯店召開會議，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參加，共同商討制止經濟風的措施。我派寫作班歷史組的朱永嘉代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參加會議。會上，大家嚴厲批判這股經濟主義風是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決定聯合發佈一個《緊急通告》，號召全市人民起來煞住經濟主義風，以後並由各造反組織派人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來指揮全市的生產工作。這個通告由朱永嘉起草，先由各組織負責人簽名，由朱永嘉帶回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交我審定。由於通告要交市委印刷廠印二十萬份在全市分發、張貼，就讓陳丕顯在《緊急通告》上簽字。這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受到嚴厲批判的市委第一書記，在各造反組織聯名批判他的文件上簽字後才能付印，正好說明當時市委一級的權力還沒有完全奪到造反派的手裏。

我把朱永嘉起草的《緊急通告》交給兩報公開發表，並把起草的經過向張春橋、姚文元作了彙報，誰知道挨了張春橋一頓批評，他埋怨說：“你們剛剛搞了一個《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怎麼又發了一個《緊急通告》，這

不亂了套嗎？”我為此惶恐不已，還對朱永嘉說張春橋生氣了，朱永嘉也惴惴不安。

### 毛澤東下令向上海發賀電

還是毛澤東和江青幫了我們的忙。一月十日，江青給毛澤東送了兩份新華社上海分社發去的電訊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毛澤東當天就把這兩份電訊稿批給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要求在二至三日內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當時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經濟主義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時間都在一月十一日。毛澤東認為《緊急通告》好，因為由群眾組織主動提出來比黨和政府來講要主動，以賀電來支持群眾的創意更能順理成章。這個賀電據《王力回憶錄》和戚本禹的口述，是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癡一起根據毛的講話起草的，然後把賀電拿到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討論。由總理主持會議，參加討論的有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徐向前、江青、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楊成武、肖華，通過後由毛澤東簽發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在《緊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賀電。這個賀電創造了幾個“第一次”：第一次由中央向地方的造反組織發出賀電；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並



列；第一次向全國發出了大聯合奪權的號召：“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上海是在一月十一日的晚上，從廣播裏得知這份賀電的。張春橋、姚文元興高采烈地通知我：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召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他們到場，和大家商量如何慶祝中央賀電。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的數十萬人的慶祝大會上，張、姚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公眾場合亮相，通過電視發表了他們文革中來到上海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說。

一月十六日，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中，用黑體字公佈了毛澤東總結的上海工人階級、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奪權”的基本經驗：“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樣，我們才明確了毛主席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提出了要求我們向上海市委一級聯合奪權。從此，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一月奪權”的風暴颳向全國。

在中央賀電發表以後，上海的某些群眾組織大搞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爭相奪取市委的領導權，爭着為自己的組織謀取一席之地，使上海的奪權一度陷入困境。由於張春橋、姚文元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才使聯合奪權取得進展。一月十五日，“工總司”二兵團和“上三司”等組織向毛澤東發去電報，建議奪權後由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毛澤東當即批示同意“群眾自下而上的提名”，並要張、姚負責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組成名

單。這樣，張、姚名正言順地出任新的上海權力機構的領導核心，陳丕顯的第一書記實際上被罷了官。經過張、姚召集各造反組織負責人磋商，上海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建立了新的政權形式——上海人民公社。以後，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改名為軍、幹、群三結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從我所親歷的事實來看，應當確認：上海“一月奪權”的指導思想是來自毛澤東的，總體指揮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擔任的。在奪權的過程中，張春橋、姚文元充當了組織者、領導者的重要角色。而這個過程又是互動的，即毛澤東以上海為試點，上海的造反組織每有新的動作，毛澤東就立即抓住，作為典型，加以總結，進行指導，並且推廣到全國去。這就是“一月奪權”全過程所顯示的基本特點。

附記：讀者欲知“一月奪權”更詳細的經過，請參閱本書末尾附錄，我在1968年組織人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 第八章

# 李先念挨整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久，外事活動很多，國賓不斷到上海來。當時中央指定有一些領導人可以陪同外賓離開北京到外地訪問。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間，李先念副總理陪外賓訪問上海。他既然能陪外賓來，說明還沒有被打倒。在上海逗留期間，由於李先念在北京一直分管財經工作，那時上海財貿系統正好在文化廣場召開一個大會，主持會議的是上海財貿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的頭頭，他看到李先念陪外賓來上海，又是中央的領導，於是就邀請李先念到場。

### 李先念繞文化廣場一周

文化廣場坐落在上海陝西南路，解放後由跑狗場改建的，會場非常大，可以坐一萬多人，開會那天前面後面都坐滿了人。文化廣場又很寬，從旁邊和後面台階上的座位朝主席台上看，看不清楚。有人就遞條子給主持人，說李先念副總理坐在主席台上，我們看不清他，希望他能走到台下來跟大家見見面。當時人們都從電視中看到這樣的畫面：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多次走下天安門繞場一圈和群眾見面。那天主持大會的財革會頭頭根據群眾的要求，也邀請李先念到下面走一走，讓群眾看一看他。這樣，李先念就在大會主持人的陪同下，走下主席台，繞場一周，揮手向群眾致意，群眾也向他熱烈鼓掌，表示歡迎。

那一天，張春橋、姚文元和我都沒有去參加財貿系統的大

會。到了晚上，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聯絡組的工作人員來找我，說他參加了財貿系統在文化廣場召開的萬人大會，他把李先念在大會上怎麼繞場一周，群眾怎麼鼓掌，李先念怎麼向群眾揮手致意的情況告訴了我。我頭腦裏馬上有了反應，我想：中央召開重要會議發佈名單的時候，是有檔次的，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即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名單，到姚文元為止，李先念不在這個名單裏。所以，在我的腦海裏，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不包括李先念，這是一。第二，這次李先念副總理到上海來，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單獨去看望過他，我覺得有點意味深長。

根據我自己的判斷，市革命委員會聯絡員反映的李先念在文化廣場繞場一周的情況，應該向張春橋、姚文元報告。我就馬上趕到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張春橋、姚文元的住地，把那天下午在文化廣場發生的事情，向他們當面做了彙報。誰曉得，這件事情引起了出乎意料的重視。

“他有什麼資格繞場一周？”

當時，張春橋聽了情況感到非常意外，急切地問我：“哦，有這種事？是誰讓他繞場一周的？”

我說：“聽說是到會的群眾遞了條子，主持會議的財革會頭頭就把條子轉給先念同志看了，再邀請他下去的。先念同志也同意了，大會主持人陪他繞場一周，到會的群眾一面鼓掌，一面擁到過道邊擠着看李先念是什麼樣子的，會場上很熱鬧。”

這時候，姚文元用平時不大有的表情冷笑一聲，說：“他有什麼資格繞場一周？”

張春橋說：“二月份，我們到北京去的那段時間，他們這些人可兇啦。二月十六日下午，我們到中南海懷仁堂去參加總

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在門口碰到譚震林，他問我：‘陳丕顯來了沒有？’我說：‘陳丕顯正在接受群眾的批鬥呢。’譚震林又問：‘為什麼不讓他到北京來？’我當場把他頂了回去：‘這可得徵求徵求上海群眾的意見呢！’這時候，譚震林火了，說：‘群眾！群眾！你們就是把群眾抬出來，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啊，自己教育自己啊，自己搞革命啊，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整天說群眾，那麼黨組織是幹什麼的？’我說：‘上海的黨組織都癱瘓了，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科長以上的幹部統統都靠邊了。’”

接着，張春橋又說：“譚震林進了懷仁堂以後，又提出來要把陳丕顯弄到北京保護起來。他還破口大罵，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這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

張春橋說：“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夠保持沉默，所以當場跟譚震林展開了爭論。”

姚文元也插進來說：“譚震林越說越不像話，說什麼革命四十多年，現在倒落得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場。譚震林還說什麼砍腦袋、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說到這裏，他忽然拎起皮包掉頭就走，邊走邊說：‘我跟了四十多年，以後不跟了。’”姚文元說，“這明明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呢！”

他們兩個人交替着說話，張春橋打斷說：“還是陳毅厲害，陳毅馬上大叫了起來：‘譚老闆，不要走，留在裏面跟他們鬥！’陳毅這麼一說，就把譚震林從門口叫了回來。陳毅說：‘這些傢伙上台，他們就要搞修正主義的。’陳毅還講，延安整風的時候，整了許多老幹部，搶救運動整錯了許多人。”張春橋說：“他們攻擊延安整風。”

他們倆把懷仁堂發生的事情敘述了一下，又回到我告狀李

先念繞場一周的事情上來。話題原是從這地方講起的。

### 李先念哭了三次

張春橋說：“譚震林居然還講：‘他連哭都沒地方哭了。眼前有秘書，又有孩子，我只好在背地裏哭了三次。’”

姚文元說：“他哭都沒地方哭，譚震林說哭了三次，他李先念也說哭了三次，李先念還說，全國都要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樣搞法，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現在是全國範圍大搞逼、供、訊。”

張春橋說：“那天鬧得這麼兇，他們居然敢當着總理和我們的面公開這麼說，我們索性不爭了，隨他們怎麼說。後來，總理宣佈開會了，才把他們制止下來。當天晚上，我們把懷仁堂會議的情況整理了一份書面記錄，還當面向毛主席報告了，總理也向主席彙報了。我們回上海的那一天，二月十八日，主席親自召開會議，把這幾個人和中央文革成員統統都找去了。”

姚文元說：“那天，主席真是發火了，可以說是震怒了。”

張春橋說：“是啊，主席從來沒有發過這麼大的火。”

張春橋接下去介紹：“主席說：‘譚震林既然講跟了四十年，今後不跟了，就讓他走。’主席又說，‘五·一六’通知是大家一致贊成的，‘十六條’是大家舉手通過的，還算數不算數？為什麼要反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告訴我，除了這一次大鬧懷仁堂外，還有一次是大鬧京西賓館。

姚文元說：“其實他們在好幾個地方都鬧過了。那天在懷仁堂只是一次總爆發而已。之前，葉劍英在京西賓館第四會議室的軍隊幹部會議上，拍桌子大罵文化大革命，把右手小指頭都弄骨折了。徐向前當時是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但他在講話的

時候也大發脾氣，把桌子都掀翻了。”

我聽了以後，覺得中央的鬥爭太尖銳了。後來在一九六九年召開“九大”會議的時候，我和王洪文、王秀珍一起到京西賓館去，因為張、姚講的“大鬧京西賓館”的事在我腦海裏印象太深刻了，我特地找到第四會議室去看了看。會議室一角有個大地球，是絲織品，充氣的，裝在一個鋁製的支架上，可以旋轉。會議室前面有一排桌子，我對王洪文、王秀珍講：“你們看，這裏的一排桌子，就是葉劍英拍桌子拍得小手指都骨折的地方。”這件事對我們來說都覺得很新鮮，難以忘懷。

在張春橋、姚文元那裏談到李先念繞場的那件事時，張春橋還說：“主席最生氣的是陳毅關於延安整風的那些話。主席在他召開的會議上，非常氣憤地說：‘難道延安整風整錯了嗎？難道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嗎？誰想把王明請回來，我就走。你們留在北京，我帶着林彪、江青、春橋、文元到上海去。’”張春橋又說：“那幾個人看到主席那樣生氣，在會上就都改口了，當面向主席承認錯誤，做起檢討來。”那天在興國路招待所聽了他們這番話，我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你們上次到北京去，耽誤了這麼久。”

### 李先念在中央作了檢查

張、姚從北京參加懷仁堂會議回來以後，在文化廣場開會的時候，在主席台上我向姚文元談起北京農林口正在大造譚震林的反。姚文元當時朝我點點頭，拿起桌上的一張白紙，用鉛筆在上面寫起來。他是一個很慎言的人，平時較少說話，看來現在是滿腔的話，有感而發。在文化廣場主席台上，別人正在發言，張春橋坐在中間，姚文元挨着他坐，我坐在姚文元旁邊，姚文元寫好後把紙遞給我看，那是一首七言律詩：

畫皮惡魔現原形，紅日噴薄夜氣沉。  
敢橫冷眼驅白虎，豈畏熱血灑黃塵。  
雄文四卷擎天柱，人民七億鎮地金。  
大海自有飛龍在，跳樑小丑豈足論。

詩的意思是說譚震林屬於“跳樑小丑”一類人，這還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間的事情。後來我到張春橋、姚文元那兒去彙報李先念的問題，是在三、四月間，已經過了一段時候。所以我說：“當時文元同志把那首詩寫給我的時候，我理解只是指譚震林一個人的，沒想到鬥爭這樣複雜。”

姚文元連連搖手說：“不提了，不提了。”因為我提到了他寫的那首詩，“剛才談的情況你注意，不要外傳。”

聽了他們的談話，我才知道李先念在大鬧懷仁堂的過程中也是參與進去的，張春橋說：“李先念也太沒有自知之明了，他以為群眾都不知道他們那些事，我們兩個都在上海，他居然能在這裏繞場一周，他把我們當成什麼了？太過分了嘛！”

現在我還記得他顯得很氣憤的樣子。我感到張、姚對李先念這些老同志們心裏有一股恨，另外也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流露出一副輕視、蔑視的神態。姚文元當時很肯定地對我說：“這件事要向中央作報告的。”

過了幾天，我又到他們那兒去，姚文元告訴我說：“上次你說的李先念在文化廣場繞場一周的事情，我們已經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很重視，李先念已經在中央的會議上作了檢查。”姚文元說的時候，張春橋在旁邊聽着，臉色冷峻，沒有表情，也不出聲。回過頭來思考，肚量太小，情緒化的東西太多，後果不好。



## 第九章 馬天水“出山”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以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不久，張春橋、姚文元就感到上海整個權力機構運作不靈，原因是：這個機構裏除了他們兩個以外，沒有熟悉上海情況的老幹部出來參加工作。各個群眾組織的頭頭都是衝衝殺殺的造反派，剛從基層上來，對於上海各方面的工作都沒有經驗。姚、張感到“有令不行”，要想把上海的工作啟動起來十分困難，特別是市屬單位所有處級以上幹部幾乎都被靠邊審查，好多單位連科級幹部都沒有站出來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雖然是指揮上海生產運行的首腦機構，但由於缺少熟悉上海經濟工作的老幹部參與指導，並不能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有序地啟動。

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後，在宣佈上海人民公社更名為市革命委員會的大會上，就已經開始造輿論，他對原市委的幾個領導人做出評價，他說：陳丕顯、曹荻秋已經被打倒了，但是分析一下市委其他幾個書記，“馬天水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沒有什麼發明創造，人家說什麼，他說什麼”，意思是認為馬天水是跟着市委其他人走的；“解放馬天水還有點用處，他打電話也比我熟悉”，打電話是指馬天水與國務院、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都有熟悉的渠道，比如上海要煤，他一個電話打到山西，就可以把煤調運過來。馬天水是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全面分管上海的經濟工作和工業生產，張春橋感到身邊很需要這樣的人。但是當時馬天水還處在被打倒

的狀態。另一個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少庸是分管工交口的，重點抓交通，也處在完全被打倒的狀況。會後，張春橋對我講：“要想辦法，創造條件讓有一些可能‘解放’的領導幹部站出來。”

### 張春橋示意“解放”馬天水

馬天水，一九一二年出生，河北唐縣人，早年當過小學教員，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抗日遊擊戰爭，一九三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晉察冀解放區從事地方工作。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又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

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圓圓的禿頭使他的年紀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歲就被毛澤東稱為“馬老”，於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馬老”。馬天水的穿着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腳上穿着豆沙色長統紗襪和黑色圓口布鞋，不嗜煙酒，是個“工作狂”，每天要跑不止一個工廠。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企業他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個工廠，或是和幹部、工人談話，或是直接參加勞動，在煉鋼爐前鏟鋼渣，在碼頭上搬運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眾中聲望很高。

由於馬天水對計劃經濟下的上海工業生產情況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屆中共上海市委都離不開他，無論是柯慶施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或是陳丕顯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都得倚重他。到了張春橋接任上海市的主要領導以後，還是想到了馬天水。

張春橋的資格沒有馬天水老，原來在黨內的地位也沒有馬天水高。張春橋是行政八級，馬天水是行政七級；文革前他們

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時候，張春橋先當市委常委，再當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但馬天水早已是書記處書記了。文革開始，張春橋憑藉江青的推薦和毛澤東的提攜，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馬天水一度對政治運動影響生產有所不滿，曾在一九六六年全國工交會議上發過牢騷，當場受到主持會議的林彪的批評。事後，當時已經去了北京的張春橋找馬天水談話做工作，別人叫“馬老”，唯獨張春橋叫他“老馬”；希望這匹“識途老馬”及早轉彎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一九六七年三月的一個晚上，張春橋把我和王洪文、潘國平、朱錫琪等一些上海造反組織負責人，找到上海展覽館友誼電影院樓下咖啡廳開務虛會。張春橋對我們幾人說：

“最近毛主席有指示，要及時把犯了走資派錯誤的好人解放出來，並給予工作出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們看，上海市有哪些領導幹部，要市一級的，可以考慮解放。當然了，毛主席說的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好人。”他把“好人”兩字說得特別重，接下去又說，“像陳丕顯、曹荻秋這樣的，到現在還在對抗群眾批判的人，能解放嗎？”意思是他們不屬於這個範圍，“我和文元二月份到北京去的時候有人公開替陳丕顯說好話，要把他弄到北京去保起來。我當場把他頂了回去，我說：‘你要陳丕顯到北京來，總得徵求一下上海群眾的意見吧。’”

我知道，北京公開替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說好話的是譚震林，這事張春橋個別對我講過。張春橋接着說，“當然，上海市委那幾個人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對待文化大革命，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也還是有區別的。你們和他們打交道也不少了，應該說是很瞭解他們的，所以今天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張春橋是很有策略的，他自己不說要“解放”什麼人，而要我們先說。實際上，他在大會上透露的意思，我們早已領會

了，所以王洪文聽了張春橋的一番話後，馬上就說：

“我看馬天水還可以，每次開批鬥會他總是搶先檢查自己的錯誤，有時還能揭發陳丕顯和曹荻秋。”王洪文說到這裏，我們都笑了，確實馬天水一到台上，他總是先唱自我錯，每次都是這樣，給造反派的印象是他態度很好。我們笑着同意王洪文的說法，王洪文接着說：

“另外，我看馬天水這個人的生活比較樸素。有時候，造反派把他弄去了，他到處都可以過夜睡覺，沒有飯吃，弄幾個羅宋麵包，加上白開水，吃得也很香。他一口氣可以吃三個羅宋麵包哩。”說完馬天水，王洪文又說另一個市委領導：“至於王少庸呢，這個人滑得很。當面檢討，背後賴掉。”王洪文對王少庸印象不佳，引起大家的共鳴。潘國平接着講：“對！造反派把王少庸叫做兩面派。”

張春橋一聽，便對我們做工作，他說：“王少庸的作風是叫人不舒服的，但是他跟陳丕顯、曹荻秋不是一條線上的。”張春橋給我們交底：“他在山東挨過整，被關過好幾年。”王少庸後來也告訴過我，他原是青島市委書記，因為山東“向明反黨集團”一案的牽連，在山東被關過好幾年，後來是柯慶施把他要到上海來的。張春橋又說：“王少庸擔任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以後，分工抓工交口，做了一些工作。我看，有些人的思想作風要他們一下子改過來，也難。反正以後在工作實踐中間，還可以再批評他們嘛。”

張春橋的意思是王少庸和陳丕顯、曹荻秋不是一夥的，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這條線上的。王洪文聽了張春橋的解釋後，轉變了口氣：“在整個市委書記處裏面，比較起來，也就是馬天水和王少庸的態度好一點。”王洪文覺得馬天水和王少庸兩人可以考慮“解放”。

我因為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領會了張、姚的意圖，並已經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裏開始做醞釀工作了。那天聽了張春橋的這番話後，就表態說：

“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在北京的時候，就從電話中給我們具體分析了市委書記處幾個人的不同態度，你們說過，曹荻秋從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就一直抵制中央的指示，而陳丕顯是曹荻秋的後台。至於馬天水在去年十一月份中央工交工作座談會期間，開始的時候思想是不通的，後來在會上受到過林副主席的點名批評，才有了比較大的轉變，你們在北京對他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後，逢會必做自我檢查，比較能夠取得上海群眾的諒解。”

我又說：“王少庸態度是滑一點，但是他在檢查交待的時候，能夠揭發一些陳丕顯的問題，說明他們之間有矛盾，因此也是可以爭取的。根據這樣的情況，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已經佈置了兩個部門，一個是工業生產委員會，這是馬天水分管的一條線，另外一個是工交政治部，是王少庸分管的，由這兩方面的造反派，成立了‘馬王小組’，專門指定幾個人幫促馬天水和王少庸，使他們能夠比較快地轉化，爭取做出比較像樣的檢查。所以我也贊成早一點‘解放’他們。”

張春橋那天聽了我們的議論，很滿意，他最後說：“今天聽了你們的意見，與我們的設想，大致是吻合的。上海在‘解放’幹部方面也應當為全國提供一些經驗。當前上海的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方面確實需要一些熟悉情況的老幹部出來抓一下，所以我看，可以先從幫助馬天水、王少庸兩人着手。一方面要他們自己拿出比較像樣的、能夠觸及靈魂的檢查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創造一些條件，給他們亮相。你們去做做造反派的工作，特別是工交系統的造反派，叫他們不要抓住馬天

水、王少庸的錯誤不放。”

王洪文拍胸脯說：“這件事情可以包在我的身上。”

### 張春橋要我找馬天水單獨談話

那天談話結束後，別人先走了，張春橋把我單獨留下來，當面給我一個任務：“你找馬天水、王少庸單獨談一次。聽聽他們自己有什麼想法，然後把造反派考慮要‘解放’他們的信息透露一點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做出一個深刻的檢查，來取得群眾諒解，要精神振奮地站出來工作。至於還可以採取哪些方式，為一大批等待‘解放’的幹部提供亮相的機會，你們也可以研究一下。”因為如果馬天水、王少庸解放了，下面還有一大批人，包括市委常委、市委委員、部長、副部長、局長、副局長，怎麼解放法？要有一個亮相的形式。

第二天，我就趕到馬天水、王少庸住的地方。“馬王小組”把他們安排住在武康路兩號原市委寫作班樓上。“馬王小組”負責人一個叫陳久泉，是工交政治部造反派頭頭，一個叫秦學能，是工業生產委員會造反派頭頭。我先問他們：“馬天水和王少庸的情況怎麼樣？”

陳久泉、秦學能告訴我，最近馬天水希望自己能夠早日解放出來，情緒很急躁，但是他在寫檢查方面，感到使不上勁，希望造反派能夠幫忙。他們又說，王少庸思想比較消沉，精神不振，自我檢查寫了兩稿，整天抽煙，不想再動筆。

我瞭解馬、王兩人的情況後，決定直接去找他們。馬天水住在武康路兩號三樓朝南的房間裏。我去的時候，看見他低着光光的大腦袋，弓着背，把兩手反背在背後，不停地在房間裏走來走去。“馬王小組”的人員說，他每天在樓底下的草坪上，從草坪這頭走到草坪那頭，來來回回要走幾十分鐘，可見

內心的焦慮不安。馬天水見到我，感到很意外，他怔了一下，然後非常恭敬地把我迎進去，趕快讓我坐下。

我對馬天水的印象一直比較好，從五十年代在市委最初與他接觸一直到後來他抓工交口，他給我的印象是工作上實幹，生活也十分樸素，一天到晚穿一身灰藍布的中山裝，腳上一雙圓口布鞋，幾十年不變的裝束。

他的腦袋很早就禿了，兩邊有點稀疏的頭髮，可能是這個關係，他總是頭戴一頂灰色的鴨舌帽，一年到頭戴着，天氣很熱的時候，他也照戴，難得脫下來。他身材長得很高，很魁梧，容易出汗，帽子戴着時，他手裏就拿着一把黑色的摺扇，半開半掩，無論是找人談話或是開會，馬天水總是戴着帽子，不停地搖着摺扇。這把摺扇從天氣還沒有熱，一直要扇到天氣很涼。後來，京劇演員齊淑芳與我們一起參加“十大”時，在休會期間，她學馬天水的樣子：頭戴帽子，手拿半開的摺扇不停地搖，一下子就抓住了馬天水的特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連馬天水自己也笑個不停。

馬天水很早就謝了頂，五十年代毛澤東在上海見到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叫了一句：“馬老！”他就出名了，當時他只有四十幾歲，後來，連周恩來總理都當面問他：“你比我小好幾歲呀，怎麼稱‘馬老’呢？”可是，所有的人都叫他“馬老”，因為毛澤東是那麼叫的。

他的身體素質比較好，身高一米八十，典型北方大漢。他告訴我，他從小在河北唐縣農村長大，小時候幹過農活，後來做過小學教員，因為受抗戰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革命。他是一九三一年入黨的，曾在五台山一帶打過遊擊。後來長期搞地方財政經濟工作，全國解放後，做過皖南區黨委書記、安徽省委副書記，都是抓經濟工作。一九五四年，上海市市長陳毅到

中央工作，柯慶施從江蘇調到上海做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把馬天水也調到上海來。馬剛調來時擔任上海鋼鐵公司黨委書記，以後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工業生產。

他有個特點，分工給他的事情是不過夜的，抓緊不放。他要抓的事，他就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如他抓鋼鐵，一定要抓出結果來，別人的事情他不管，他只顧抓他的頭等大事，還經常把人半夜裏叫到他的辦公室去。

市委機關幹部每個禮拜都要到工廠去勞動，他在這方面很賣力。他到上鋼一廠去，外衣一脫，袖子一挽，拿起鐵鍬就幹，一干幾個小時，而有些領導幹部去勞動是做做樣子的。當時我們都說，馬天水幹活貨真價實，其他書記、常委比不上他。工交系統的領導幹部有點怕他，又很敬重他。文革前對他的口碑就是這樣：上海的工業生產中馬天水起了不小的作用。

馬天水是個工作狂，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整天在康平路小禮堂二樓他的小辦公室裏，除了吃飯，睡覺，或者到基層單位去，幾乎沒有休息時間，這一點我們都很佩服他。

他的家近在咫尺，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裏，但他很少回家。順便提一下馬天水的家庭情況：他原來在老家有妻子，很早離婚了，有個女兒與前妻一起生活在農村。馬天水進城後，在安徽與一個比他小十來歲的女幹部張秉懿結婚，張秉懿原是安徽省委辦公廳幹部，有過婚姻史，也是離過婚的，與馬天水結婚時，帶過來一個女孩，結婚後又給馬天水生了一個男孩，所以馬天水在上海的家裏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一九五八年左右，張秉懿下鄉勞動時，在勞動中挖到一個死人骷髏，一下子受刺激得了精神病，但是輕度的。從此她有了潔癖，不歡迎有人去她家，不管什麼人去過她家後，她要把地板擦了又擦，椅子擦了又擦，我們去過一次，就不敢再去了。



馬天水本人倒不太講衛生，有時候臉不洗乾淨，眼屎也不擦乾淨，居然夫妻能夠共處。張秉懿對待馬天水不是很好，當時她的母親，即馬天水的丈母娘和他們住在一起，丈母娘很會享受，據他家的阿姨說，老太太雞鴨魚肉和補品吃得很多，但是給馬天水吃的東西很差，理由是馬天水有糖尿病。馬天水在我面前也歎過苦經，說：“一天到晚吃點牛肉、炒雞蛋，實在沒有味道。”

馬天水的收入很高，幾個市委書記中他是行政七級，比張春橋還高一級。當時一般幹部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元，他每月要拿三百零五元，自己只留三十元，剩下的都給家裏。這三十元錢還要買茶葉，放在辦公室裏給客人用，還要買煙。當時外出開會吃飯，不管是收兩毛錢還是一毛五，都要自己付錢的。三十元錢交給秘書支付，一個月下來總是緊巴巴。工作到半夜，就在機關食堂裏吃宵夜，只有兩毛錢的一碗麵條，營養不好，有時候，在錦江飯店開會，可以吃得好一點，趁機給他改善一下伙食。

### 馬天水苦於寫不好檢討

我覺得，馬天水的的生活是節儉、樸素的，他的幹勁、為人以及與群眾的關係都不錯，他隨着整個市委被打倒以後，似乎不大有民憤，可以早點“解放”出來。那天在武康路兩號單獨見他時，我覺得很難稱呼他，平時叫他“馬老”，打倒他的時候，直呼其名“馬天水”，現在叫他什麼好呢？叫“馬天水”不好，叫“馬老”也不好，所以我就沒叫他。見了他，我就說：“怎麼樣？最近身體還好吧？”

他很謙恭，馬上說：“很好，很好，謝謝。”

我說：“聽說你最近在寫檢查時有點困難，春橋同志和文

元同志要我來看看你，聽聽你有什麼想法？”

他聽說我是張春橋、姚文元派來的，很恭敬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我說：“你假如確實有困難，只要你願意做檢查，我們願意給你提供幫助。”我想，要透一點信息給他。

他說：“啊喲真是，春橋同志、文元同志和你們都這樣關心我，幫助我，我非常感動，我確實是願意做自我檢查的，但就是寫不深，自己非常苦惱。”他倒是叫我了：“景賢同志，你給我指指方向啊。”

我給他交底：“你跟陳丕顯、曹荻秋共事也不是一兩天了，你們有共同的賬，也有各人自己的賬。”我打開天窗說亮話，“當然他們的問題比你嚴重，他們要負主要責任。你假如要取得革命群眾的諒解，一方面要勇於檢查自己的問題，一方面要敢於揭發他們的問題。比如去年北京開工交座談會，你怎麼會當着林副主席的面，當着中央領導的面去頂撞的？他們事先怎麼鼓動你的？你回來以後，又是怎麼跟他們商量的？”我要他不要有顧慮，把它揭出來，越具體越好。

馬天水聽了我的話，連聲說“是啊，是啊。”

搨扇子是他日常生活的習慣，他在與人家談話的時候，還有一個撕紙條的習慣，手裏或者面前有一張紙，他就拿過來，折一折，撕一條下來，然後把紙條放在手裏不停地撚，撚成一根長長的小棍後放下，等一下再撕一條，再撚。面前如果是文件，他也會把文件一條條地撕下，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所以他的秘書在有人和他談話時往往把他面前的文件收走。這是他的一個怪習慣。

那天我與他談話時，面前沒有別的紙，他就拿張報紙，一面把報紙撕下一條，撚成一個紙卷後丟掉，再折，再裁，再

燃，一面說道：“我沒有什麼顧慮，我願意揭發，只是我寫起來實在有點困難。”

我笑着說：“這大概也是確實的。”有一些領導幹部自己寫東西有很大困難，這個我見得多了。我在市委工作了十幾年，曾經給各種各樣的領導寫過一些東西。有些幹部有一些自己的意見，有想法，他先說出來，然後由你給他整理成文字。也有相當一批領導幹部，連自己的想法、說法都沒有，就讓你去寫，所以實際上，好多領導他不是自己做領導，而是秘書或筆桿子在做領導。請人寫好後，他照着稿子念，念稿子的時候也有因為念破句、念錯字而出洋相的。馬天水屬於第一類，他自己有想法，然後由別人給他寫成，然後他再看，再修改，或者他再說，人家再幫他改。

所以我覺得要他寫成一篇像樣的檢討，寫得比較深刻，也有難處。我說：“你願意揭發交待，我們歡迎，但是一定要注意，盡人皆知的東西你不要寫了，你一定要寫尖端的東西，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我調幾支得力的筆桿子給你，你講，他們整理，你再補充，然後形成一個有深度的東西。”

他連連點頭，“可以的，可以的。”

“那好吧。希望能儘早地在一兩個星期裏把你的新檢查稿拿出來。我們找人幫你，假如基礎比較好的話，我們要提供機會讓你和群眾見面。”這時候我對他就比較熱情了，“你勇敢地站出來，我們將來共事的機會很多的。”這就是暗示他要出來工作了。

他說：“是的，是的。”他是河北人，“的”字不是念輕音，是重音。他還送我到門口，“謝謝你的幫助。我檢查稿寫好以後，也請你審查、批判。”

到馬天水的房間去了後，我又拐到王少庸的房間。王少庸



1976年陪同新疆自治區主席賽福鼎在上海與群眾一起歡慶節日。（左一：馬天水，左二：賽福鼎，左三：徐景賢）。

確實精神萎靡不振，情緒非常低沉，一張長臉灰灰的，鼓着兩隻無神的眼睛，和他在華東野戰軍九兵團當領導時神采飛揚的樣子相比，判若兩人。他桌子上放着滿滿一缸煙頭，整天就是抽煙，臉色也很難看。我跟他說明來意，他歎氣道：“反正已經被打倒了，我現在躺在地下，就像辛亥革命時鑽在床底下的黎元洪那樣，準備好好地想一想，究竟還要不要站出來？”他是這樣一種態度，連站起來都不大想。

我說：“你現在不是考慮個人得失的時候，你這種態度還是屬於個人患得患失。”

王少庸又抽起一支煙，他氣管炎很厲害，咳嗽不停，又不停地搖頭，好像很後悔：“我怎麼會跟上陳丕顯、曹荻秋，我真對不起柯老(指調他到上海的柯慶施)啊！”

我說：“現在春橋同志、文元同志還是對你寄予希望的，

我們大家也都希望你能拿出行動來，你要振作精神，站起來。”王少庸經過做工作，答應重新寫檢查交待。王少庸的筆頭比較好，人家說他是大學生，只要他願意揭發交待，有決心，檢討是可以寫好的。

### 為馬天水“出山”提供亮相機會

談話以後，我就與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商量，我說：“用什麼辦法讓他們取得群眾的諒解？”他們要“解放”，我們要提供機會讓他們站出來說一說自己，讓群眾瞭解他們的態度。後來我們想到了搞電視批判鬥爭會的方法，讓他們在批判陳丕顯、曹荻秋的過程中亮相，通過電視轉播，讓全市各條戰線上的人們都看到他們每個人的態度，確實是檢查、揭發、交待得比較好，群眾就諒解他們。所以，在當時搞了一系列的電視批判鬥爭會，大多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舉行，用電視實況轉播。電視批判會採用不同的專題，比如說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以及在工交、財貿、工青婦、統戰、教育、宣傳、組織等戰線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分一個個專題開批鬥會，讓分管書記、常委或下面部、委、辦、局領導中的一些人在會上揭發批判，檢查自己，當眾亮相。這種電視批判鬥爭會搞了幾十次，影響非常大。每一次開電視批判鬥爭會，全市人民都圍着電視機觀看。

當時中央規定，省、市委一級領導人不准在公開的報刊上點名批判，我們實際上違反了中央的規定，因為在電視鬥爭會上完全是指名道姓地批，完全是公開的。外國駐上海的領事機構和商務機構，也可以從電視裏看到實況。它已經不是什麼內部活動了。

每一次電視批判鬥爭會後就出大會專刊。一九六七年夏

天，毛澤東主席來上海時，也觀看我們的電視批判鬥爭會，而且看得很有興趣，指指劃劃地問這問那，在觀看電視鬥爭時他第一次見到了主持鬥爭會的王洪文。應該說，運用電視這種大眾媒體批鬥當時要打倒的人，以這種方式讓領導幹部站出來亮相，也算是我們的一種“創造”，當時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天水就是在批判鬥爭會上得到了亮相的機會，王少庸也是。表現最突出的是馬天水，他非常激動地在會上面對面地揭發鬥爭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揭發時，對這些人咬牙切齒，手指一次指着，兩次指着，慷慨激昂地發言，甚至一連指到七、八次之多。馬天水在電視批判鬥爭會上不斷地指着人家的臉，做出義憤填膺的動作，被我們稱讚為揭發交待的態度好。除了馬天水、王少庸以外，還有市委常委的一些人，部、委、辦的一批人，都有選擇地讓他們到電視批判鬥爭會上亮相。

經過電視批判鬥爭會，馬天水、王少庸取得了群眾的諒解，然後我們在上海市政府大禮堂連續召開了兩次全市幹部大會，分別宣佈“解放”馬天水和王少庸。會上馬天水、王少庸分別宣讀了《我的檢查》，他們的檢查經過一再加工、幫助，算是比較深刻了，然後由工交系統造反派代表，分別發言。因為事先已經請示過張春橋、姚文元了，這兩次會都由我出面，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宣佈解放馬天水、王少庸，批准他們參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業、交通方面的領導工作。為了他倆的解放，又專門出了兩期專刊，全文刊登他們的《我的檢查》、工交系統造反派代表的發言以及市委會宣佈他倆解放的決定，發到全市。

馬天水等人終於重新“出山”了。馬天水和王少庸在赤衛隊大鬧康平路大院的時候，已經搬出了市委書記處的宿舍。他倆被宣佈解放後，又住回康平路大院。

接着，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開了一個會，宣佈說毛主席有一個指示：革命委員會裏要有革命的“三結合”，要有領導幹部的代表，有軍隊的代表，也要有群眾的代表，以這樣的三結合來組成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核心。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正式宣佈了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名單，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以外，原來市委書記處的有馬天水、王少庸，教衛部有陳琳瑚，地區方面有陸文才，他們都算是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軍隊方面的代表有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高志榮，空四軍副軍長姬應伍，軍隊方面是陸海空共三個人，後來姬應伍改成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群眾組織代表當時是王洪文、我、王承龍、還有《文匯報》造反派代表朱錫琪。這些人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相當於副市長。馬天水和王少庸分管工業、交通和財貿、農業，總之，經濟工作全部由他們負責抓。

馬天水、王少庸等人的“解放”，使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有了得力的助手，“一月奪權”以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軍、幹、群”“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核心終於形成了。

## 第十章

# 毛澤東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啊？

這一章，想着重說說郭仁杰之死。

郭仁杰是上海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副書記，也是寫作班哲學組組長。調到寫作班以前，就是一個有資歷的幹部。他是山東煙台人，貧農出身，解放前就參加革命，後來進入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解放區搞過地方工作。解放後進城到上海，先在復旦大學哲學系擔任系總支副書記，後被調到華東政法學院去做哲學教研組組長。他的革命經歷、黨齡都比我和朱永嘉長，所以寫作班在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哲學思想時決定成立一個哲學組，就把他從華東政法學院調來擔任哲學組組長。

他為人直率、豪爽，表裏如一，有什麼意見都要說，而且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比如說，在文革造反前他調到寫作班後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對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为二。這在當時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那時正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時候。他在學校裏就堅持這個觀點，到寫作班來以後還是堅持。當然他說的毛澤東思想要一分为二，不是說毛澤東思想有正確的和錯誤的一面，而是說毛澤東思想在現階段達到的高度還有局限性，還要不斷地發展，不斷地突破，不斷地提高。他的“毛澤東思想要一分为二”的命題在學校裏曾受到過批判，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到寫作班來以後，我們認為他的觀點是對的，並且贊成他可以保留自己的見解。



## 郭仁杰成了市委寫作班造反的帶頭人

自從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公佈以後，復旦學生緊跟而上，也貼出很多大字報，逐步形成揭發復旦黨委的一股力量。郭仁杰就從市委寫作班返回到復旦去了。當時郭仁杰對復旦黨委是不滿的，他做過系總支副書記，算是中層幹部，所以不能衝在前面。但他跟紅衛兵造反派的關係很好，支持他們起來造復旦黨委的反，而且在教師中是比較早支持學生造反的，所以他跟復旦紅衛兵，特別是最早最大的學生造反組織“紅革會”(全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以復旦的大學生為骨幹)這一派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開玩笑說：“你簡直是‘紅革會’的‘軍師’了。”

“紅革會”確實把他當成顧問，凡是重大的活動都要徵求他的意見。在復旦學生、教師紛紛起來造反的時候，郭仁杰並沒有受到任何衝擊。當時校、系一級的黨員幹部受衝擊的很多，他倒成了革命造反的一方。後來朱永嘉被復旦打成“牛鬼蛇神”的時候，也是他帶了歷史系的幾個人，根據姚文元給我的電話指示，把朱永嘉救出來的。由於他是我們這批人中造反最早的一個，我們稱他是“老造反”。

後來，他又帶我去復旦看大字報，我稱之為“留學”，推動我起來造反。哲學組的另外兩人程綺華和謝宗範在他的策動下，成了寫作班造反的中堅力量。郭仁杰把紅衛兵的話轉送給我：“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親。”並用這個主題鼓動我打出市委機關造反的旗子。

市委寫作班造反以後，他成為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二把手。當時市委機關聯絡組勤務組實際的排名是：徐景賢，郭仁杰，王承龍、程綺華。朱永嘉當時曾被復旦打成“牛鬼蛇神”，還有點小辮子被人家抓在手裏，不能擔任造反的領導職

務，所以實際上是郭仁杰在勤務組裏輔助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開始時，機關聯絡站的全盤的工作都是由我跟郭仁杰商量，程綺華負責機關內部事務，王承龍負責對外聯絡。寫作班造反要開全市大會時，由郭仁杰主持會議和籌備工作，我當時沒有經驗，會議怎麼組織？主要批判哪些人？包括口號的提出，他都很細緻地跟我商量。那時，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自己的發言稿上，所以寫作班的造反是他起了主要的作用。

“一月奪權”過程中張春橋、姚文元來上海以後，郭仁杰全力以赴抓緊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會的籌備工作。我記得，大會宣佈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級幹部堅守崗位等三個通令都是他具體策劃的，並由他和作家協會來的戴厚英和高玉蓉一起執筆起草。他在造反過程中一直是起着組織者的重要作用。

奪權以後，他和我一起商量怎樣把大批判深入下去，我們共同設想搞一個電視鬥爭會，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電視鬥爭會上。這個電視鬥爭會在全國也是一大創造。因為一個對市委領導的小範圍的批鬥會要讓全市廣大人民群眾都來瞭解，單靠報紙是不行的。當時張春橋已經開禁了，說一月六日的大會他們要看電視。這樣一下子把電視運用到批鬥會上來。上海的電視鬥爭會有主題，比如說反對經濟主義的，專門揭露市委領導人是颺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然後把各種各樣與“經濟風”有關的曾經簽過字的部、委、辦、局的頭頭，都弄到會場上來，叫他們交待、揭發，拿出罪證，當場批判。我們設想把會議放在上海展覽館的宴會廳舉行，因為與外隔絕，把當權派拿

到那裏去批判秩序比較有保障，大會揭發到什麼人，就把他拉上來要他交待、進行批判，氣氛很熱烈。當時電視機雖然沒有在全市普及，但各單位都有電視機，大家可以在單位裏集中收看。群眾能看到在市一級的批鬥會上，哪些人出來揭發，哪些人出來交待，哪些人屬於態度比較惡劣、應該打倒，哪些人表現積極、準備解放出來，在電視鬥爭會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郭仁杰和我一起策劃、主持了電視鬥爭會，但每次主持他總是縮在後面，把我推到前面，照他的說法：“我這個人不要名，不想做官。”這樣，他在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威信比較高。

第一場電視鬥爭會很轟動，我記得，鬥爭會開到一半的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就打電話到會場說：“你們在批鬥會中間休息的時候到我們這裏來一下。”我和郭仁杰就從上海展覽館乘專車直奔興國路招待所，張、姚看了電視轉播，說：“這樣做很好。讓他們狗咬狗，使他們內部產生矛盾，讓各種人都出來表演，不要怕。”我跟郭仁杰得到他們的指令以後，重回會場，索性放開了：誰願意上台揭發都可以上台，不加限制。這樣，市委書記處的馬天水、王少庸都上去揭發了，市委辦公廳的主要領導，曹荻秋、陳丕顯的秘書們都上台搶話筒，紛紛作為知情人站出來揭發，揭發的材料很有質量，有些材料我們事先都沒有掌握。這一來，全場震動，全市轟動。鬥爭會以後，郭仁杰建議，把電視鬥爭會的內容出專刊發行，把會上所有的發言及反映會場情緒的場面、當權派的表現等照片都刊登出來，還配發評論。專刊賣三分錢一張，很暢銷。有的人看了電視後覺得不過癮，還要看細節；有的人沒看到電視，都去買專刊報紙看，在上海一時“洛陽紙貴”。

但緊接着卻發生了“一·二八炮打事件”，致使郭仁杰最終陷入了滅頂之災。

## 張春橋密談毛澤東對“紅革會”的指示

關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紅革會”等群眾組織炮打張春橋、姚文元的事，我在《十年一夢》中已作了介紹，讀者不妨參閱；這裏單說說與郭仁杰有關的幾件事。

同年三月間的一天晚上，張春橋把我和郭仁杰找到興國路招待所，談話的地點是在五號樓的客廳，姚文元沒有參加，在場的還有張春橋的妻子文靜。那天，張春橋看了幾份市委機關聯絡站的簡報，也看了市委機關聯絡站由郭仁杰、朱永嘉組織人編寫的《“一·二八”炮打逆流大事記》，認為這些材料把“紅革會”和有關組織炮打張春橋、姚文元的日程和細節寫得很詳細：年、月、日，上午幹什麼，下午幹什麼，炮打經過，怎麼組織反炮打，哪些人做了交待，怎麼交待，寫得明明白白。對此，張春橋很欣賞，並關心地問：“你們收集了很多材料，‘紅革會’炮打的大體眉目出來了。最近的反逆流情況怎麼樣？”

這項工作是郭仁杰一手抓的，他原來就是“紅革會”的顧問，又感到對於我被“紅革會”綁架這件事，他也有責任，因此覺得由他把反逆流的事查清楚，是應該的。中央文革發來特急電報後，“紅革會”派人到北京去查問此事是否屬實，當他們發現電報是真的時，就搞了一個請罪活動，各學校的“紅革會”組織了卡車遊行，打出標語：“‘紅革會’戰士向中央文革請罪”、“‘紅革會’廣大戰士向上海人民請罪”。張春橋當時就對我們說：“紅革會”廣大戰士無罪，不要搞這樣的請罪活動。所以，我們在反炮打“逆流”的過程中，儘量讓“紅革會”戰士解脫，只是讓那幾個頭頭出來作自我檢查。

郭仁杰主持的大會，我去參加過一次，有“紅革會”戰士發言，批判“紅革會”頭頭：復旦大學馬立新、師範學院李功

佐(女)等都是批判對象，最後我就根據張春橋的指示精神，發言說：“廣大戰士本身是無罪的，錯的是少數頭頭。他們做了檢查，我們表示歡迎。”

郭仁杰那天在興國路招待所向張春橋彙報了各學校反對炮打“逆流”的情況，他說還組織了一個反逆流聯絡站，便於查清“紅革會”頭頭的情況。少數頭頭最後準備給予解脫，宣佈回到群眾中去。其他“紅三司”、“炮司”等幾個捲進炮打不深的組織仍很活躍，郭仁杰主張應該實行紅衛兵的統一大聯合，將來再建立一個全市的統一的紅衛兵組織。

張春橋認為：紅衛兵運動最終要實行按班級、按學校的大聯合，歸口鬧革命，復課鬧革命，決不能繼續發展分散的跨學校的組織，山頭林立，各行其是。等到各學校實行了紅衛兵的大聯合，全市召開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時機就成熟了。

張春橋對我們前一階段反炮打的工作點頭表示認可。但那天他臉色很嚴肅，很嚴峻，他說：“你們的材料我已經看過了，但我總懷疑‘紅革會’有背景。比如說，他們‘紅革會’究竟與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沒有聯繫？有沒有人在幕後指使他們？又比如說，中央文革來了特急電報後，‘紅革會’的一些頭頭居然跑到東海艦隊機關裏去，用艦隊的紅色保密機向中央文革打電話，究竟是什麼人給他們提供這種條件的？有一些頭頭又趕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裏又有什麼人表態同情他們？我總懷疑還有長鬍子的人在幕後策劃，這些事情好像都沒有查清楚。”

張春橋說話的時候，文靜在一旁插話：“當時楊西光在復旦大學掃廁所，那兩天也不去掃了，活躍得很。”

張春橋接着說：“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訴你們，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彙報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

主席很關心上海炮打這件事，主席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啊？紅革會這筆賬還是要算的。’你們對這件事心中要有底。這次炮打，我認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還沒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這些話，我只對你們講，你們不要外傳。”

當天晚上，張春橋當場決定：讓郭仁杰返回復旦主持學校的工作，整頓紅革會的組織，並查明紅革會炮打的幕後策劃者。張春橋總懷疑是陳丕顯等人在幕後挑動。

那天，我們想，我們已經把紅衛兵解脫了，毛主席又說這筆賬還是要算的，究竟怎麼回事呢？我們兩人回來後，感到這麼重大的事情，光我們兩人知道，操作起來有問題。所以我提議，是不是給聯絡站和寫作班幾個最核心的人傳達一下？郭仁杰也同意了。這樣，我和郭仁杰把程綺華、王承龍、吳瑞武、朱永嘉找來，在極小範圍裏給他們說了說，同時再三叮囑只給你們幾個人傳達，不得外傳。

### 郭仁杰同情“紅革會”挨整

郭仁杰以市革會教衛組負責人的身份到復旦去主持工作，是一樁苦差事。他要求寫作班歷史組的吳瑞武和他一起去，吳不想去，就來找我。我只好對郭仁杰說不要勉強他。後來吳瑞武同意做郭仁杰的聯絡員，郭仁杰才肩負着毛澤東要算紅革會這筆賬的使命，單槍匹馬地到復旦大學去了。

當時，張春橋對我們很信任，我至今也還相信：張春橋傳達的毛澤東有關“紅革會”的話是真實的，因為當時毛澤東對張、姚非常器重，而且姚文元後來也和我說過同樣的內容。但是到後來，毛澤東的話在上海一部分紅衛兵中傳開了。我很奇怪，這麼小範圍裏講的話，怎麼會在外面流傳呢？我一查，才

發現因為郭仁杰跟“紅革會”的一些頭頭有着難以割捨的感情，是他向他們透露的。

郭仁杰在造反的時候跟復旦“紅革會”頭頭共同宣誓過：“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所以感情非常深厚。“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姚文元後，郭仁杰是恨鐵不成鋼。他剛回復旦時，曾經斥責紅革會的頭頭搞炮打是“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叛變投敵”。但當紅革會的頭頭挨整以後，他又流露出對他們非常惋惜的情緒。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紅革會”在裏面沒有一個委員，郭仁杰說，要是他們沒犯錯的話，“紅革會”應該在裏面佔好幾個席位了。另外，他一直認為“紅革會”是老造反犯錯誤，應當說明他們重新站起來，他在思想上同情“紅革會”，希望他們能夠東山再起。他當然是為他們好，但是忘了張春橋對我們兩人的警告，把密談的內容透露給了“紅革會”，特別是復旦“紅革會”的那些人。他不但把毛主席的講話透露出去，還連續不斷地到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師範學院、上海鐵道學院等“紅革會”力量較強的單位，跟他們商議在市“紅革會”解體以後，是不是要搞一個“紅革會”市級聯絡站的問題。後來，真的搞起了一個全市性的紅革會大批判聯絡站，“反逆流”的問題無疾而終。郭仁杰在外面活動的情況，被不斷地反映到市革命委員領導層中來。

市革命委員會建立各組、辦後，郭仁杰是教衛組領導核心之一，教衛組主要負責人是老幹部陳琳瑚。郭仁杰很少留在教衛組，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大學負責鬥批工作，但他在沒有征得我們同意的情況下，重新支持“紅革會”東山再起，這個消息很快給兩方面捕捉到了：一個是游雪濤小組，裏面有反對郭仁杰的譚啟泰等人，反映說郭仁杰在外面四出活動，與“紅革

會”那些人串聯；第二是王承龍抓的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下面的聯絡組，專門出簡訊的，把郭仁杰和“紅革會”的動態在小範圍的簡訊上登了出來，簡訊都是由文靜定稿的，我也看到了。這些事情令我非常憂慮。

### 寫作班“老戰友”和郭仁杰集體談話

我趕快跟程綺華、朱永嘉商量，說郭仁杰這樣下去，一定要出事，而且會給我們大家惹事的。程綺華也感到了事態嚴重，說：“老郭畢竟和我們一起殺出來的，我們不能看着他製造麻煩，造成被動。”我們就把他請到榮昌路(後改德昌路)六十號專題寫作組，程綺華、吳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陳冀德等原寫作組的人已經等在那裏了。

我問他有沒有把毛主席的講話透露到外面去？為什麼“紅革會”都在議論？我說：“我到幾個單位去開會，他們逼着問，毛主席有沒有這個講話，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是反革命？毛主席有沒有說‘紅革會’這筆帳是要算的？他們還到北京去核對這件事，春橋同志為此很惱火，我被搞得很被動，既不好說毛主席有這個指示，也不好說毛主席沒有這個指示，我只好對他們說‘無可奉告’。”我說：“毛主席的話是在內部說的，春橋同志個別向我們交的底，你怎麼可以捅到外面去？你這樣做，‘紅革會’的廣大戰士會對毛主席產生一種什麼樣的想法呢？”

他不得不承認，說只是提醒他們：“你們要注意，毛主席都講了這樣的話，不然的話，你們要倒楣的。”

我說：“你也不能用傳達毛主席指示的這種形式去跟他們講嘛。”郭仁杰承認自己不對。另外我問他有沒有到各個學校“紅革會”那裏去說了許多同情老造反的話，有些人要變成



立“紅革會”總部，設聯絡站，你也表態同意了？

郭仁杰顯出一臉苦相，很尷尬，結結巴巴地說：“主要是同情他們，感到他們是我造反的老戰友，現在卻落得這樣的處境。”

我說：“他們回去後，不也一樣在學校掌權嘛。”

他說：“他們本來是全市有影響的大組織。”

我說：“現在打算用全市統一的紅衛兵組織來代替各派紅衛兵，而你這樣做法，完全是不對的。今後決不能再和‘紅革會’頭頭暗中有串聯，要公開地搞全市紅衛兵的大聯合。”

郭仁杰當時還同情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組織，“聯司”已把矛頭指向了市革會，郭仁杰卻對“支聯站”的人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天談話時，我當面問郭仁杰：“你說的‘虎’是指什麼人？”他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就是指張春橋。

我和寫作班的同夥們都倒抽了一口冷氣，覺得他已經和我們分道揚鑣了。但那天我們還是嚴肅而又耐心地勸他懸崖勒馬。

他當時雖也在口頭上答應，但已不能自拔，會後他到外面又和那些人接觸，那些人也不斷去找他，來往非常密切。

王承龍本來和郭仁杰不和，多次發生爭執，現在正好抓住郭仁杰的把柄，他把郭仁杰的動向編了一期內部簡報，包括他誤傳毛的指示，他和“紅革會”聯絡，準備拉出市一級的組織等等，報給張春橋。張春橋大怒，說：“這簡直不可容忍。機關內部竟有這麼一個人！”

接着，王承龍在外面造輿論，“紅革會”的對立派就在外面貼了很多大標語，稱他是“郭小丑”，標語說：“郭小丑支持‘紅革會’東山再起，絕沒有好下場！”“徹底揭穿郭小丑的真實面目！”等等。

郭仁杰與市革命委員會教衛組的關係也搞得很僵，陳琳瑚批評他，郭仁杰認為自己是老造反，陳琳瑚是自己把他解放出來的，所以不服帖，頂撞陳琳瑚。在市革命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又與王承龍衝突起來。這樣，教衛組和辦公室兩個機構都要求批判郭仁杰，逼我表態，他們說：“郭仁杰走到這地步，春橋同志已發火了，必須批。”

我心裏是想保他的，但是我如果不批判他，也有悖於張春橋的意思。所以我同意開一個批判會，當時在市委黨校的底層小禮堂，有一兩百人參加，都是機關內部各部委的造反隊代表，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也派人參加。最後我發言，希望他懸崖勒馬，不要走得更遠。

同時，各大學也紛紛開“郭小丑”的批判會，我聽說復旦大學“紅三司”開郭仁杰批判會時，紅衛兵動手打了郭仁杰。我知道“紅三司”是王承龍支持的，就對王承龍講：“今後批鬥會上不能搞武鬥。”王承龍性格粗暴，在這事上對我很不滿意，他對我瞪起眼睛，喉嚨嘶啞着說：“群眾有氣嘛，打幾下有什麼關係啊！”可見他是支持動手的。

### 郭仁杰被人揪走了

我覺得這樣弄下去很麻煩，對郭仁杰來說凶多吉少。正在這時，郭仁杰又有幾件事讓人抓住了把柄：他跟黃浦區京劇團的一個女編劇，他的山東老鄉，過去有過交往，人家說兩人有曖昧關係。同時，又傳說他在復旦大學與一個女教師有男女問題，也被傳得沸沸揚揚。有人就要追查郭仁杰的“流氓罪”。

這樣一來，我覺得很難保他。那時“紅三司”準備把他揪走。我對程綺華說：“你給他在黨校找個房間，叫他寫檢查。不要到外面去。”他就在市委機關聯絡站裏寫檢查，實際上是

想把他保護起來。不久，他的膽結石病發作了，疼痛難忍。程綺華心腸軟，想着如果隨便把他送到一個什麼醫院去，很快會被人家揪走，於是就給他用了一個化名偷偷地送到上海市公費醫院去住院。這件事她沒有告訴王承龍，但對我講過，原寫作班的幾個人也知道，對外是保密的。

誰知道，原寫作班一個人對郭仁杰有意見，他的妻子是“紅三司”觀點的，他回去告訴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在上海工學院工作，而“紅三司”的頭頭張某正好是工學院的，這樣，他們就得到了郭仁杰住院的信息。

一天，“紅三司”的人乘了一輛卡車，衝到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公費醫院，挨鋪搜查，聽說當時郭仁杰用床單蒙着臉，結果被人家把床單揭開，發現了他，“紅三司”就把他綁走了。

王承龍得到消息，拍着手，哈哈大笑，對我幸災樂禍地道：“哈哈，原來是有人把他藏起來了。現在有好戲看了！”

郭仁杰被搶走後，一直沒有音信，也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麼地方。我知道王承龍肯定是知道的，就問他：“郭仁杰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人不見了，應該派人找一找。”

王承龍對我神秘地笑笑：“接受群眾的審查嘛！”

當時，王承龍和王少庸兩人分管市革命委員會專案辦公室，前面我對他封鎖了郭仁杰到公費醫院住院的事，現在輪到他對我也封鎖了郭的消息。

一天晚上，我在市革會康平路大院辦公室值班時，辦公室有人報告，說：“上海工學院‘紅三司’負責人張某，送一份絕密件來。一定要市革命委員會領導同志親收。”

我想，既然是送絕密件來，我當然可以收的。我就讓辦公室的人把它拿來，原來這是一份《專案審查報告》，是送給王

少庸和王承龍審閱的。裏面有郭仁杰和各大專院校“紅革會”頭頭的接觸情況，還有下一階段準備深入追查郭仁杰男女關係問題的打算。署名是“一〇二專案組”。

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對郭仁杰的問題已經設立了一個專案組了。當時市革會專案辦有兩種專案：一種由市裏直接抓的，幾個市級領導的專案，如陳丕顯專案組、曹荻秋專案組，以及上海特別重大的案件；一種是用群眾專案的形式，先由各群眾組織自己先設專案組，然後到市專案辦來掛鉤。這個專門審查郭仁杰的“一〇二專案組”屬於第二種情況，即由他們自己審查，然後把審查的經過情況以及審查結果向負責專案的王少庸和王承龍彙報。至於郭仁杰關在什麼地方，報告中沒有透露。不過，既然送報告來的是“紅三司”頭頭張某，我知道，出面搞專案的一定是上海“紅三司”那批人，幕後指揮的就是王承龍。這是毫無疑義的。

### 郭仁杰在專案組挨毒打

我當時對郭仁杰的心態很矛盾：一方面覺得他畢竟是一起造反的老戰友，錯誤再大，也不能往死裏整；另一方面，又覺得他洩露張春橋跟我們的密談，對外透露毛主席的內部講話等，實在難以原諒。我希望張春橋看到這類情況，能夠出面保護他一下。

過了一段時間，《文匯報》記者摸到了“紅三司”一些人刑訊逼供郭仁杰的情況。情況寫得很詳細，說郭仁杰被關在一個密室裏，他走路的時候，腿已經一瘸一拐，情況是用現場記錄的形式寫的：

問：“你跟黃浦京劇團某某人的男女關係怎麼樣？交待！”

郭仁杰答：“我已經講過了，沒什麼。”“嘍”一拳，郭

仁杰被打倒了。

又問：“你除了和這個人的不正當關係以外，還有什麼人？交待！”

郭仁杰：“再沒有什麼人了。”訊問者把郭仁杰打翻到桌子下面去。

問一句，答一句，就打一下，甚至還記錄下摔了多少次。

最後是用鞭子抽郭仁杰的屁股，抽了幾十鞭，把皮肉都打爛了。

郭仁杰發出陣陣慘叫，也都記錄在案。

我也曉得，這裏面夾雜着一個很大的問題：上海兩大學生組織的派性。“紅三司”和“紅革會”是對立派，“紅革會”掌權的時候壓過“紅三司”，“紅三司”翻身後，就把對“紅革會”的氣出在郭仁杰身上。這個意圖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未必見得對郭仁杰本身有多大仇恨，但居然用嚴重的刑訊逼供的方式來折磨郭仁杰，這是在發洩一種派性。

我看了材料後，感到很不安，心想要出事了，這樣打下去豈不要出人命？而且郭仁杰即使有男女關係的生活問題，也總是罪不致死吧，何況專案審查的重點不應是生活作風問題。但當時專案是王少庸和王承龍主管的，張春橋還指定由王少庸主持市革會的工作，我覺得很不好辦，只希望張春橋對此事能表個態。我就把打郭仁杰的材料送到張春橋那裏，張春橋對情況是每期必看的，而且對報社送去的情況看得尤其仔細。我希望他能夠寫一個批語，這樣，郭仁杰就可以得救了。但是情況送上去，沒有任何回音。

這時又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機要秘書，叫王鋼，是從上海社科院調來的，跟我們一起在市委寫作班造反。他跟我和郭仁杰、朱永嘉等人都是很熟的。他負責管我的機密文

件，也就看到了報社送來的關於毆打郭仁杰的這份材料。過了兩天，他忽然失蹤了。我身邊的人怎麼會失蹤呢？我叫辦公室工作人員趕快到他家去找他的妻子。王鋼的妻子當時在縣裏工作，問她，她才說出王鋼原來在社科院也有過男女關係的問題。王鋼為人非常膽小，他一看郭仁杰給人揪去打得這麼厲害，心裏很害怕。他曾經對妻子說：老郭給人打得這麼厲害，怎麼辦？失蹤前，據說王鋼曾打電話找我，因為我在外面開會，沒有找到，他就找寫作班的陳冀德，告訴她：“你跟老徐說一下，我有一串鑰匙，留在辦公室裏。還有一輛自行車放在康平路。”陳冀德很奇怪，一時反應不過來他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以後，王鋼這個人就從人們的視野裏消失了。

王承龍知道後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說王鋼攜帶機密文件潛逃。他還叫上海市公安局下達通緝令，在通緝佈告上刊登了一張照片，說上海市某負責同志的機要秘書失蹤。很明顯，是借機損害我的聲譽。後來又叫機要處來查，是不是少了文件？結果文件一份也沒少。王鋼人很老實，平時言語很少。我分析，他害怕人家要算他男女關係的老賬，所以跟陳冀德交代了後事以後，就找個地方自殺了。後來海運局曾經查過出海的輪船，上船的時候賣出過多少張票，以後清點乘客人數的時候，曾經發現人少了，我們懷疑：王鋼可能是乘長江輪出海時投海了，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屍體。為這事，王承龍叫市革會辦公室查了很久，弄得我有一個時期連管文件的秘書都沒有，我自己心裏也很不是滋味：很接近的一個同志，怎麼跟我連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由此可見郭仁杰的事情對王鋼的衝擊是很大的。

這樣一來，我連自己的秘書都管不住，失蹤了。那末，在郭仁杰的事情上，我更不好說什麼了。

## 郭仁杰終於跳樓自盡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的晚上，市革會領導成員在康平路小禮堂開會，盧灣區公安分局來電話緊急報告說：關在他們那裏的郭仁杰乘紅衛兵提審他的機會，對看守他的人說要一杯開水，把紅衛兵支到室外，等紅衛兵一走出門，他就把門關上，從二樓窗戶跳下去，頓時頭部着地，腦殼破裂，氣絕身亡。

我也鬧不清楚，他怎麼給關到區公安局去了。那天晚上，我很震動。王少庸、我、王承龍都在電話記錄單上圈閱。王承龍圈閱的時候說：“畏罪自殺，通知家屬，火葬。把這事情報告春橋同志。”王承龍搞這個專案組的本身，就是要置人死地的。張春橋肯定不會出面表態，也不會說任何保護的話。

實際上，郭仁杰是上海的幹部中最早跟着中央文革張春橋、姚文元起來造反的人，最後卻死在這樣殘酷的鬥爭中。文革結束以後，人家來問我郭仁杰案的全過程，而且對我說：郭仁杰屬於造反派，不好平反，所以至今也沒有個結論。

從我內心來說，一個支持我的“老戰友”，由於違背張春橋的意志，被摧殘而死，我沒有辦法保護他，為此我一直感到不安。我認為，郭仁杰他不迷戀權力，不想當官，根本不存在爭權的問題。但他這麼死了，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悲劇。悲劇在於他起來造反，捲進這場漩渦以後，他就難以自拔了。文革中一些掌權的人不光對“走資派”、當權派下手很厲害，就是對造反派內部的“戰友”，假如一旦成為異端，馬上就採取打擊、剪除的做法，手段也是很殘忍的。

郭仁杰除了支持“紅革會”以外，他又積極支持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這也是他挨整、受打擊的主要原因之一。“聯司”不斷到市裏告狀的時候，郭仁杰代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接待過。王洪文開始時也讓“聯司”與“工總司”掛鉤，承認

這個組織，到後來感到“聯司”不符合他們“工總司”的觀點，就打壓“聯司”。王承龍是反對“聯司”的，我當時看到“聯司”反對市革會，對這個組織也非常惱火。郭仁杰接待“聯司”的時候，說了一點同情的話，他感到“聯司”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壓的。郭仁杰對受壓的人總是很同情，他在復旦的時候，紅衛兵受復旦黨委壓，他支持紅衛兵造反；後來“紅革會”受壓，他又支持“紅革會”；這時，“聯司”受委屈，到聯絡站來反映，他又多次表示同情。我對他說：“你不要攪到裏面去，你一插手，事情就複雜了。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一派支持這個，一派支持那個，這不是要鬧出大問題了。我們的方針只能是聯合，只有一個方針，不好支持哪一派。”他不同意我的觀點。郭仁杰支持“聯司”的材料又給王承龍和游雪濤弄到簡報裏去，都送給張春橋看過，張春橋為什麼不表態保護郭仁杰，與這件事也有關係。

郭仁杰被逼死亡以前，曾經留給我一封信，是用鋼筆寫在橫格紙練習簿上的，大意說：你多次勸我對很多事情不要隨意表態，我沒有聽，現在想來，你的意見是對的，可惜已經來不及了……郭仁杰就這樣地走了。

我想，就算他當時活下來了，按照他那始終同情受壓人們的性格，在文革中難免會不斷地得罪一些人，最後還是不得善終的。



## 第十一章

# 從張六吉一案看文革專案

專案成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徵之一。

文革初期，在打倒一批省、市級領導之後，各地就開始對這些人進行審查。當時，上海還沒有設專案組，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打倒了陳丕顯、曹荻秋這樣一批市級領導以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裏成立了一個材料組，當時這個組的任務是收集有關打倒對象的材料用來開展大批判。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涉及到有些人過去的歷史情況，就把這些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和現實表現聯繫起來加以批判。

材料組成立後，開始時由市委黨校的劉徹章負責，後來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也加入進去，並且取劉徹章的負責人而代之。說起來實在荒唐：如果說要收集共產黨內高級幹部的政治歷史情況，最沒有資格的應該是李文靜，理由是她自己就有比較嚴重的歷史問題。但因為她是張春橋的妻子，經過張春橋的同意，就把當時被打倒的市級領導，包括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的材料，以及華東局領導幹部的政治歷史情況、現實表現等材料整理工作，都交給李文靜負責分管。當時的材料組設在康平路大院裏。

### 上海專案辦公室的成立經過

後來情況有了變化，一是李文靜本身的政治歷史問題逐步地為人所知：她在抗戰時期被日本侵略者抓去過，向日軍自首，然後做過反對八路軍、反對共產黨的宣傳，這些事情在一

定範圍裏被人傳開了，張春橋感到不便，就把她調離材料組，調到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下面的聯絡組，讓她分管簡報。二是天津南開大學學生提出了關於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問題：抗戰時期薄一波等人經過中央批准辦了自首手續出獄，但南開的紅衛兵認為這些人應該作為叛徒處理，向中央寫了報告，經毛澤東批准，中央發了一個文件，肯定了清查出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經驗。這樣，上海市各條戰線清查幹部、群眾的政治歷史問題、設立專案抓叛徒的活動，就在更大範圍內開展了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材料組就演變成爲市革命委員會的專案辦公室——“專案辦”，辦公地點搬到高安路。除市專案辦外，各區縣、各系統也都有自己的專案辦，自上而下形成體系，一直抓到基層。當時張春橋指定，市裏由王少庸、王承龍、王維國、王洪文“四王”分管專案辦。王維國因主要分管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以後又擔任了這個系統的軍管會負責人，王洪文因大量時間要抓“工總司”和各群眾組織的工作，他們都沒有更多時間分管專案，所以專案辦主要由王少庸和王承龍兩人負責。

王少庸解放後曾任青島市市長，做過山東省的領導。他本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受向明反黨集團的牽連在山東被關押過。他告訴我，他被關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失去自由的他還有肉吃，但是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重的。他被放出來以後，柯慶施當時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爲他抱不平，就把他從山東調到上海，擔任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交通政治部。所以王少庸對柯慶施很感激，和張春橋的關係也不錯。文革初期，張春橋就佈置我比較早地把他“解放”出來，結合進市革命委員會。除繼續讓他抓交通系統外，還給了他分管政法和專案的大權，張春橋並一度要他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

導成員的會議。

王少庸每天抽兩包中華牌，煙癮非常大，臉色灰暗，氣管炎很嚴重，說話時不時引起一陣陣猛烈的咳嗽。他喜歡講一些尖酸刻薄的話，談到別人的歷史問題時，經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筆來在書面報告上嘩嘩地寫上批語：“隔離審查”。

王少庸分管專案的助手王承龍，原是市委黨刊《支部生活》的記者，但編制不在《支部生活》，他原是黃浦區小廠行業裏的總支書記，工人出身，去南京念過大學，因為文化底子比較差，在校時嚴重神經衰弱，又退學回黃浦區工作。他做過黨刊《支部生活》的通訊員，參加了《支部生活》編輯部的培訓，培訓後就留在《支部生活》做實習記者，組織關係留在黃浦區。他調到《支部生活》不久，文革開始，就在那兒造反。他與外面各個群眾組織的聯絡能力很強，善於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參加了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改選的時候被推舉上來，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工作，被選為勤務組成員之一。到市委聯絡站工作後，他就開始抓權。他批的第一個重要文件就是長壽路橋的修建工作，批文件的時候，他哈哈大笑說：“我現在的權力相當於曹荻秋市長了！”非常得意。他做了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負責人後，我考慮到他原是市委辦公廳造反派的頭，讓他分管原來市委機關內部的事情，這樣，他一下子就把市委的要害部門——機要、後勤、汽車隊、檔案室、招待處、印刷廠等都抓在自己手裏，包括原來的市委辦公廳的秘書班子都掌握在手。這樣，他就有較多的機會接近張春橋，而且又很巴結李文靜，所以被張春橋委任協助王少庸分管專案。

王承龍長得高高瘦瘦，由於睡眠不足，眼睛裏經常充滿血絲，喉嚨粗，脾氣暴，動輒訓人。開始的時候他在市委機關聯絡站裏和別人相處得還比較好，因為大家都是造反起家的，彼

此資歷差不多，腳碰腳，但後來他的權力慢慢大起來了，就經常跟別人爭吵。市委聯絡站的幾個負責人當中，郭仁杰先跟他發生衝突，接下來是程綺華，程綺華雖然不屑與他發生正面衝突，但關係非常緊張。我出面做一點調解工作，王承龍就對我也不滿。我一般不與人家爭執，但他實在欺人太甚，我也說他幾句，他居然跟我也頂撞起來。

王承龍看到張春橋比較重用王少庸，從市革命委員會建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為止，當張春橋、姚文元不在上海的時候，張春橋就指定由王少庸主持市裏的工作，所以王承龍就向王少庸靠攏。王承龍分管專案以後，曾說：“現在市裏就我們兩個王說了算。市革命委員會這一攤子，老的老，少的少，老的要人扶，少的要人幫。”“老的”是指王少庸、馬天水等人，“少的”是指王洪文、徐景賢等人。當時，王少庸對群眾的態度相對還可以，因為他畢竟是解放出來的老幹部，而王承龍卻越來越張狂，一身霸氣。

### 專案成風嚴重破壞法制

專案工作當時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叫市級專案，原華東局書記、市委書記、候補書記、常委、市長、以及副市長的專案，還有市裏的重大案子，如趙丹、白楊、鄭君里專案等，由市專案辦管。第二部分叫區級專案，由各區專案辦管，或由各局、各系統專案辦管；第三部分叫群眾專案，全市各基層單位都可以設立專案組，群眾專案需要到市、區掛號備案，有的也可以由市裏直接管理。

每一名專案對象只要有人檢舉、揭發，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由各單位設立審查這個對象的專案組，每組有若干名工作人員，負責審訊、外調和整理材料等，這種做法本身是嚴重違

反法制的。當時，市一級的專案組多達好幾十個案件，共有十七名市委書記、常委、市長、副市長和華東局主要領導，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嫌疑，分別受到關押審查。有一次，王少庸、王承龍邀我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當時的少年犯管教所去看看關押的審查對象。開始時，這些人都被關押在原單位，後來，王少庸向張春橋請示，說好多專案對象在審查時出事了，有的“畏罪自殺”，有的逃跑，這些人正在審查期間，又不能關到監獄去，所以要騰出一個專門的地方來關這些對象。這樣就決定停辦原來的少教所，把市級專案對象統統放到那裏去。但第一書記陳丕顯不是關在那裏，而是另外關在康平路的一處住宅內。

那天，王少庸、王承龍帶我們走進少教所的走廊，看到每扇門上挖一個窺視孔，用一塊小的圓鐵片遮着，掀起鐵片，透過窺視孔可以看見房間內的情景。我們除了看到被關押的黨、政幹部外，還看到白楊、趙丹分別關在裏面，當時白楊、趙丹屬市級監護。王秀珍感到很新奇，看了一次還不夠，又折回去看了一次。當時如果把市管專案、區管專案到下面條條塊塊設立的專案加起來，關押人數就非常多了。立案要一級一級報批，市專案辦的許可權可以審批全市所有的專案。

王少庸和王承龍還受命抓過一個通天的“一號專案”。開始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因為按專案工作的規矩，從中央到地方，專案與專案之間不准通氣，分管專案的人瞭解的情況，只能直接向主要領導彙報，也不得向別的領導通氣。王少庸在康平路二樓辦公，王承龍在三樓，我的辦公室在三樓最底部的一間，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看到他們經常帶人進出他們的辦公室，談話的時候房門緊閉，行動詭秘。有幾次還看到市公安局的造反派、“公革會”頭頭王維章，親自提一隻非常沉重的大

皮箱，氣喘吁吁地拎到三樓，很神秘地走進王承龍辦公室，進去以後馬上鎖門，不知他們搞些什麼名堂。

後來，我分管的電影系統在清查中有人反映，一九六六年十月份，有一批戴紅衛兵袖章的人半夜抄了三十年代電影導演、演員的家，就是後來所知道的抄趙丹、鄭君里、陳鯉庭、顧而已等人的家。電影系統的人感到很奇怪，這批紅衛兵不抄“四舊”物品，也不要金銀財寶、存摺鈔票，專門抄文字、書信、照片、舊刊物、舊畫報等，一切文字資料都要，而且說他們抄家的手法非常高明，連鏡框後面、書籍中縫都翻開來找，廚房櫥櫃的頂上，也查得非常仔細。最後帶走了好幾麻袋的材料，臨走的時候，警告被抄的人家，不准聲張，不准報告。電影系統造反奪權以後，一查，這幾戶人家重要的材料怎麼沒了？電影廠造反派到我這裏反映，要求追查。

我想：不知道這事是不是王少庸有所瞭解？我就去王少庸辦公室問他。他聽了，把自己的頭像搖撥浪鼓一樣，搖來搖去，說：“不要追查，不要追查。”

我問：“怎麼回事？”

他說：“我告訴你吧，這件事是上面派空四軍的人去抄的。老實跟你說，我現在在抓的就叫‘一號專案’，專門清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的。”這時我才明白，他們神秘地進進出出，都與此事有關。王少庸說：“你問的一九六六年電影系統抄家的事，就跟這‘一號專案’有關係。現在案子的情況很複雜，我很撓頭(很麻煩的意思)，公安系統還窩藏着江青同志的不少黑材料呢。”

我才恍然大悟，不便再問下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王承龍也跟我講：“我們一號專案是中央直接抓的，吳法憲同志已經親自乘專機到上海，把上海公安局

的材料拿走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看到北京紅衛兵的小報上，登了江青在北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江青說：“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些人還整了我一皮箱的材料。”我馬上聯繫着想起來，我看到“公革會”拎來的這一皮箱材料，肯定已送到江青那裏去了。

後來這件事才弄清楚：早在文革以前，上海市公安局發現有人寫匿名信罵過江青，公安局從保衛江青的角度出發，把有關材料集中起來，防止擴散到外面，材料包括三十年代江青拍過的電影、演過的話劇的資料及當時報紙、畫報上有關藍萍的報導、文章和照片。當時為了維護毛澤東夫人的名譽，才把它們收攏、封存，結果到了文革時期卻變成偷整江青黑材料的罪行，被誣為反革命事件。

“一號專案”建立後，凡是接觸過江青黑材料的公安系統工作人員，從公安局局長、副局長、處長到一般幹部，幾乎都被隔離審查。我住在常熟路瑞華公寓的時候，有個鄰居在公安局工作，女性，是一般幹部，因為接觸過那些材料，文化大革命中也把她關起來，審查了好多年。文革前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梁國斌，也被送到北京關押起來。梁國斌經過長期折磨，得了肺癌，回上海住醫院的時候只能用假名，一直到離開人世為止。據後來統計，這個專案曾對瞭解三十年代江青歷史的十八位文藝界人士趙丹、鄭君里、白楊、張瑞芳等進行審查，並把接觸過有關江青材料的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一位副處長押送北京，到了一九六八年二月，清查變本加厲，索性把市公安局的六名局級幹部、九名處級幹部、十名一般幹部和二十名群眾統統加以逮捕，由吳法憲直接派飛機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

最沒想到的是：搞專案的人，不久自己也成為專案的對

象。比如王維章，原市公安局“公革會”頭頭，由他負責拎了大皮箱送關於江青的絕密材料到市裏來的，等到公、檢、法被空四軍接管後，他反過來成為審查對象了，因為他接觸過江青材料屬重大機密，自己也在專案審查中吃了苦頭。

王承龍後來被張春橋涮下去，與“一號專案”裏的一件事也有關係。王承龍搞“一號專案”時很神秘，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他辦公室裏，結果等到中央要的材料都送走以後，王承龍又在他的保險櫃裏找出來一幅江青的大照片，是三十年代有人保存下來，被抄家時抄出，由基層單位上交的。王承龍忘了這張江青照片是哪裏送來的，但感到這張照片不能留在他那裏，就把它拿出來交給張春橋。張春橋一看，大怒：“這種東西你怎麼可以留在私人處？從哪裏來的？”王承龍說不出來，只說記不清了。張春橋就把照片退回。王承龍慌了，寫了一份檢討，又把照片送到張春橋那裏，張春橋再次把它退回，就是不讓他送上去。王承龍為這事緊張得不得了，又不敢把照片毀掉。當時搞專案的人如果接觸過所謂防擴散的材料，最後往往是要自己倒楣的。

但王承龍在自己掌握專案大權的時候，卻挾私報復，利用專案整人。有一個專案對象張六吉，原是黃浦區副區長，本來他的政治歷史也不會引起市裏領導的重視，要搞專案的話最多由區裏立案審查就可以了。但因為張六吉是市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程綺華的丈夫，而王承龍、王少庸與程綺華有矛盾，所以把張六吉上了市級專案。

這裏我要詳述一下張六吉專案的情況。

## 張六吉專案設立的前因

一月奪權以後，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四個負責人分工：



我是全面負責，王承龍負責新成立的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那一頭，程綺華負責市委機關的鬥、批、改，郭仁杰負責教衛系統。程綺華與王承龍的矛盾逐步尖銳起來，程綺華認為：王承龍本身水準太低，當官以後又脫離群眾。心裏很瞧不起他，根本不想與他交談。

我對王承龍說：“你別忘了，你既負責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那一頭，但是你還是市委機關聯絡站勤務組成員，不能因為你的屁股坐過去了，就不支持、不關心市委機關聯絡站的鬥、批、改工作，我現在也是市委機關聯絡站勤務組成員，我們都要支持他們。”但他聽不進去，還製造出空氣，說市委機關造反派已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徐派，一派是王派。程綺華和寫作班一批人劃在徐派一邊，他自己則拉住那些辦公廳的人。他要削弱徐派的勢力，就先拿程綺華開刀。

程綺華採取了遠避的態度，自己下到工廠參加勞動去了。機關聯絡站的工作交由凌岩(《支部生活》造反隊負責人，作為《支部生活》造反隊參加機關聯絡站勤務組代表)負責。凌岩對王承龍也是有看法的。凌岩召開市委機關聯絡站勤務組會議，寫了一份對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進行監督的條例，徵求我們意見。一看就知道，這份條例是很尖銳地針對王承龍及一些解放出來的領導幹部的，條例說領導幹部應該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不能特殊化，不能有特權；要平易近人，接受群眾組織的監督；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每個月要聽取一次市委機關聯絡站各部門的意見。這份條例發出後，王承龍暴跳如雷，到王少庸那裏去告狀：“群眾組織居然爬到市革命委員會頭上來了。”王少庸一看，對他也要實行監督，就怒氣衝衝地大罵：“豈有此理！”他們對此根本不予理睬。

我在這方面比較注意，市委機關聯絡站開勤務組會議，我

也是去參加的。我知道，他們對我意見不大，矛頭都是對着“二王”來的。

凌岩他們見“二王”不予理睬，提出要召開市委機關聯絡站整風會議，對結合進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提意見。他們認為，你們進市革命委員會當領導成員，是我們選出來的，因此你們要在我們的監督之下。這與一月奪權時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權力機構的原則是一致的，各組織應該可以隨時撤換自己推舉的委員。

一天下午，我到康平路王少庸辦公室談工作，看到兩個聯絡站工作人員，當面要求我和王少庸、王承龍三人到聯絡站參加整風會議。他們對王少庸說：“我們除了對王承龍提意見外，也要對你提意見。你參加市裏領導工作以後，我們感到你身上有些舊的東西復發了，希望你也要到會聽取意見。今天請你定個開會的日期，你們能來，我們就開會。”王少庸嗯嗯地不肯答應開會的具體日期。

我心裏很明白，這個會議主要針對王少庸和王承龍的，我說：“我可以參加的，日期請少庸同志定就是了。”這兩個工作人員在王少庸辦公室蘑菇了一個鐘頭，不答應就不離開。最後王少庸答應下來：“這樣吧，十一月十日下午，到市委黨校聯絡站所在地參加整風會議。”兩人得到確切答覆，告辭走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凌晨，我突然感冒發燒。當時我因工作太忙，平時不回家，住在榮昌路六十號三樓的閣樓上，為了表示自己不搞特權，我找了一處專題寫作班最整腳的房間過夜，到中午還爬不起來。專題寫作組有人通知我：“下午王少庸和王承龍在上海展覽館咖啡廳召開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會議，請財貿系統的人來討論財貿系統是否要成立工會的問題”

題。”當時有種說法，“工總司”屬於產業工人，財貿系統不屬於產業工人，這當然是大問題。“請王洪文和你一定要參加。”我一聽，感到很奇怪，王少庸不是明確答應今天下午去參加聯絡站整風會議嗎，怎麼另外安排會議呢？這兩個會不是衝突了嗎？

我就找人說：分別給兩個會議打電話，替我請假，說我確實是生病不能參加。但是問一問，這兩個會怎麼會同時開？過了一會兒，回答是：市委機關聯絡站他們沒有接到王少庸和王承龍的改期通知，所以下午的整風會議照常開。這樣就出現了僵持局面。我覺得“二王”是故意違背自己的諾言，避開整風會議，另外設計了一個會議。凌岩他們在黨校市委聯絡站開會，原來就比較激動，一直催王少庸和王承龍去，而他們則堅持在上海展覽館開另一個會。我怕事態擴大，勸凌岩他們另行改期。但聯絡站方面答覆說：“群眾對王少庸他們的失信非常氣憤，我們自己也想不通，不願意改期。”又過了半個鐘點，忽然來電話說市委機關聯絡站那批人直接去上海展覽館找王少庸和王承龍，當面質問他們去了。

我想，這下糟糕了，兩方面一定要衝突起來。當時張春橋、姚文元不在上海，假如機關內部陣線亂了，發生兩派分裂，就難以收場。我想趕去阻止他們，誰知遲了。凌岩帶着人衝進上海展覽館，因為人數很多，雙方就在會場上唇槍舌戰起來。王少庸覺得大丟面子，大喊：“我準備第二次打倒！”拒絕聽取意見，拂袖而去。

事情發生後，王承龍說這是衝擊市革命委員會會場的事件，定名為“十一·十”事件。並且把賬全都算到了程綺華的頭上。為此，王少庸召集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會議，說：“簡直不像話。一個群眾組織竟然可以這樣對待市革命委員會，一

定有幕後策動人。”懷疑我在後面鼓動。我明確告訴他們那天我是如何處理的，但他們根本聽不進，說什麼一定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張春橋從北京回來後，我專門去找他，把前因後果、事情的全過程和我的看法向他彙報了。彙報中我發現，張春橋對事情很瞭解，他告訴我：“軍報記者已向我彙報過了。王少庸那天態度是有問題的。”“十一.十”事件就此平息下去，我也比較放心了。誰知道，這後面醞釀着更大的風暴。

### 市委機關聯絡站“心臟爆炸”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正在文化廣場開大會。那天張春橋、王承龍都在。忽然，康平路送來一份電話紀錄：一群“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學生和機關內部造反派，衝進市委機關聯絡站辦公地點，封掉了聯絡站。”我趕快把電話紀錄給王承龍，問他知不知道，他笑而不答。我又把電話紀錄拿給張春橋看，希望張春橋有個態度。張春橋平時看到緊急情況會在紀錄上做批示，那天也沒有批示。

到了晚上，情況進一步發展了。王承龍告訴我：“聯絡站已搜出東西了，原來的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楊士法是假黨員，那材料窩藏在市委聯絡站裏。聯絡站頭頭程綺華的丈夫，黃浦區副區長張六吉政治歷史上有嚴重問題。張六吉已被抄家，抄出程綺華和張六吉解放前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團契時與國民黨特務、工福會頭子陸京士合拍的照片。”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沒有讓我看，說是送張春橋看了。讓我納悶的是，衝擊機關聯絡站的帶頭人之一，是由張春橋的妻子文靜直接領導、王承龍具體負責的康平路辦公室聯絡組的成員，叫陳佩璋。假如沒有王承龍的指揮，沒有文靜的支持，他是不敢這樣做的。他們調動的

隊伍又是與文靜關係非常密切的交大“反到底”兵團的一些人。他們不是孤立地去衝擊，背後有人直接操縱着他們的行動，這是有領導、有預謀的行動，只不過背着我而已。這次搞法，真像我造市委的反一樣，“心臟爆炸，後院起火”。我乘車到華山路三百七十號海格大樓聯絡站辦公地點去一看，只見馬路邊的圍牆上貼着標語：“揪出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一小撮壞頭頭”，署名是“心臟爆炸戰鬥組”。我感到，矛頭是衝着我來的。

在聯絡站“爆炸”事件之前，有兩個外地幹部，拿着介紹信到聯絡站外調，說是華北地區有一個女幹部曾經跟文靜一起被日本軍隊抓獲後自首，為日本人作過反共宣傳，她交待了一些材料，這兩個外地人要到文靜那裏核實。程綺華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把事情單獨地向張春橋作了彙報，張春橋當時很尷尬，說：“不見了吧。”我就通知了程綺華回絕了那兩個外地人。現在，衝聯絡站的幕後又有文靜的影子，我就很敏感地把這件事和整程綺華的行動聯繫了起來。所以，我要找王少庸進一步瞭解情況。

有一天，我直接來到王少庸辦公室，正巧王少庸在上廁所，我就坐在他辦公桌前的轉椅上等他。他的資料夾打開着，我一看，有份材料上寫着我妻子葛蘊芳的名字，我吃了一驚，材料是一份名單，上面有：“葛蘊芳，上海市立師範學校學生，解放前加入‘清道夫’組織，後來加入地下黨。”後面還有一批名單待查。我知道她們學校裏有一個女教員被國民黨逮捕過。現在，王少庸他們要以清查地下黨專案為名，從這裏打開缺口，直接查到我妻子葛蘊芳的頭上了。當時我很不愉快，但不露聲色。

王少庸從廁所出來，看我情緒不好，就說：“走吧，今天

到我家吃餛飩。”他住在康平路大院裏。進了他家，保姆便把餛飩拿出來，我們邊吃邊談。我說：“我真不明白在市委機關聯絡站發生了什麼事？”他一面用調羹舀着餛飩，一面說：“程綺華的丈夫叫張六吉，原來是黃浦區的副區長，區裏反映他政治上有問題。有一個叫陳志存的交代，他們解放前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時候，張六吉是地下黨支部書記，但他們這個支部與特務組織有聯繫，我已看過了書面交待材料。”

我說：“我不認識張六吉，我至今沒有看到過什麼材料。”當時中央有文件，各群眾組織的壞頭頭要由各群眾組織自己端出來。我是市委機關聯絡站一把手，我應當知道組織中出現了什麼情況，但他們卻對我封鎖。王少庸又說：“那個陳志存還交待，‘炮轟南京路’的大字報也是他們策劃的。不過，我看這個材料靠不住。”當時南京路上貼出過一張大字報，說南京路上商業網點那麼集中，完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應該“炮轟南京路”，把南京路上的商業門店分散到全市各地，更好地為全市人民服務。這是極左的思潮，張春橋與我們對這張大字報都持否定態度。王少庸接着說：“張六吉已經被隔離，要立專案審查。程綺華那時也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她跟張六吉一個支部，看來也要審查。”我想：你們背着我自己已經向程綺華下手了。

我從王少庸家出來，又跑到張春橋那裏。我愁眉苦臉地向張春橋告狀說：“他們那樣搞，叫我今後怎麼工作？我是這個群眾組織的頭頭，程綺華究竟有什麼問題，我不能不知道。”張春橋見我急了，安慰道：“這事也是事出有因，不是有一張張六吉和陸京士一起拍的照片嗎？你呢，就不必介入了，由他們去查。你去搭一個班子，着重抓黨章修改工作，你還可以組織原寫作班子的人，重點寫幾篇批判文章。”過了一天，張春

橋下了一個批件，要交大“反到底”紅衛兵全部撤出市委機關聯絡站，批件說，機關的運動由機關幹部自己來搞。他批了，交大紅衛兵就退出去。這更說明：衝聯絡站、封聯絡站的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後指使和支持的。

緊接着，張春橋在上海展覽館召開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和各區、縣級領導會議，各群眾組織負責人也都參加，不過，程綺華沒有資格參加了。張春橋在會上宣佈，經中央同意，上海開始整黨、建黨試點工作，中央還把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這個光榮任務交給了上海。他說，經毛主席批准，上海黨章修改小組成員為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台下掌聲響起，我的地位鞏固了。王承龍在背後發牢騷：“徐景賢是搞不倒的，他後台硬。”我的日子是好過了，但張六吉他們卻大禍臨頭。

### 借張六吉專案挾私報復

王少庸、王承龍秘密地把張六吉、陳志存關到中華造船廠地下防空洞。文革結束後，我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裏的時候，正好碰到當時張六吉專案組組長，他也在服刑。他說與王少庸在“四清”時就認識，他是中華造船廠政治部的，王少庸當時在廠裏蹲點。設立張六吉專案以後，王少庸指定他為專案組負責人。那人告訴我，他們專案組的代號是“十一.十專案組”，十一月十日就是凌岩帶市委聯絡站人員衝擊市革命委員會王少庸、王承龍開會會場的那一天，把“十一.十”定為張六吉專案的代號，意圖太明顯了。

“十一.十專案組”有事可以直接向王少庸、王承龍請示彙報，後來這個專案組索性搬到高安路專案辦辦公。形式上是群眾專案，由中華造船廠立案，實際上跟中華造船廠毫無關係。他們將審查對象關在防空洞裏，嚴刑拷打，刑訊逼供。王洪文

也曾到那裏審過人，因為張六吉當過國棉十七廠工作隊的隊長。後來王洪文告訴我：“張六吉他們被打得非常厲害，屁股都打爛了。專案組的人把幾張桌子疊起來，疊到屋頂下，強迫對象爬上去跪在三角鐵上，頭頂着屋頂，時間一長，兩個膝蓋都紅腫潰爛。我覺得太過分了！”連殺勁很足的王洪文都不忍看這樣的慘狀。先招供的陳志存見到王洪文，叫着喊着：“冤枉啊！冤枉啊！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是他們硬逼的。”當時王少庸抓專案，王洪文即使有意見也不可能把這個案子翻過來。

在殘酷折磨下，張六吉實在吃不消，乘有一天看押人的疏忽時逃走了。當時王少庸和王承龍下令在全市搜捕。張六吉曾給自己家裏打過電話，也曾到南市區一家綢布店找過他的哥哥，但都無處藏身。在絕望中，他給張春橋寫了一封信，希望張春橋向他伸出援救之手，但沒有任何回音。當時程綺華被留在華山路三百七十號受審查，她沒有辦法跟自己的丈夫聯繫。

張六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時天氣很冷，在漕河涇附近的一條小河邊，有個農民看到一個年近半百、滿頭白髮的幹部模樣的人，穿着棉襖，愁苦地坐在小河邊，把臉深深地埋在膝蓋中間，從早晨起就看到他坐在那，到中午，人們發現他已經撲倒在小河裏，死了。

張六吉生前我和他沒有見過面，死了以後，我看過他的照片：臉瘦削，眼緊閉，滿頭散亂的白髮，太陽穴旁有個傷口，全身棉襖浸滿了水。結論是：“畏罪自殺”。程綺華被審查了很久，也查不出什麼名堂，最後宣佈取消審查。丈夫死了，自己的市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的職務也被撤銷了，她遭受重大的打擊。市委機關聯絡站改組以後，她被下放到幹校。

三年以後的一天，我約程綺華見面，那時我已是中央委



員、市委書記，地位穩固。王少庸是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委常委。我一直覺得對不起程綺華，我問她：“那次被人家抄出你們和陸京士合拍的照片究竟是怎麼回事？春橋同志都說事出有因。”程綺華聽了大吃一驚，跳起來說：“哪裏是什麼國民黨特務陸京士？這是解放以前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長叫陸幹臣，是他訪問美國以前與我們一起合影留念。說什麼陸京士，這完全是硬裝樺頭嘛！照片上明明寫着他的名字嘛！”說到這裏，她眼圈紅了：她的丈夫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

### 關於“王少庸現象”的思考

一九七五年，毛澤東指示說要為一批被審查的老幹部作結論予以解放，黃浦區給市委送來一份報告，要求給原副區長張六吉做一個結論。市委常委會上討論的時候，我明確地說：“這是一起冤案。”當時王承龍已經由張春橋決定下放勞動了，王少庸還是市委常委，我也沒有在會上點穿是以他為主幹的事。王少庸面對着關於張六吉的材料總算說了一句實話，他習慣地抖着自己的一雙手說：“在張六吉的問題上，我的手上沾着鮮血啊。”

像王少庸這樣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歷經長期的黨內鬥爭，挨過自己人的整，解放後在山東省“向明反黨集團”的冤案中被關押多年，文革前被柯慶施調到上海後擔任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革中被作為黨內“走資派”打倒。上海“一月奪權”以後，因為揭發陳丕顯、曹荻秋有功，被作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解放出來，結合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分工負責抓專案工作和政法工作。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大權，很快故態復萌，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搞黨內鬥爭，毫不留情地打擊曾經反對過他的革命幹部和造反派，對一批被誣

陷的原華東局和上海市的領導幹部設立專案，長期關押，下手又狠又辣。

除了專案以外，王少庸還分管政法系統，文革期間上海的“反革命”犯、刑事犯要判處死刑的，先由市人民法院寫出書面報告，報給王少庸審批，王少庸再批轉市委常委會集體討論通過。其中，按當時的“公安六條”，有所謂直接“反對毛主席”的，要判死刑，肯定錯殺了一些人。

我反復思索，覺得這種“王少庸現象”不是個別的，而是階級鬥爭學說從思想上長期統治共產黨造成的一種特殊現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周而復始，循環往復。文革結束以後，王少庸沒有被捕，因為他是老幹部，予以寬大，只作了開除黨籍處分和降級處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王少庸在上海病死。

王少庸是從這個國家裏消失了，但是“王少庸現象”和專案遺風是否從此絕跡了呢？

## 第十二章

# 王洪文的班底

王洪文領導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安亭事件”中得到了張春橋的支持，接着又獲得了毛澤東的首肯，在組織上得到迅速發展。一九六六年底，在康平路大武鬥中，對立派工人赤衛隊被擊潰，“工總司”作為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的主力，又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四個單位聯合署名發來“賀電”的肯定，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工人造反組織。

“工總司”對“赤衛隊”採取了吸收入隊的政策，而不是排斥在外的政策：只要赤衛隊員承認“工總司”造反的大方向、轉變自己的立場，就可以加入造反隊成為隊員。這樣就從根本上瓦解了“赤衛隊”這一組織。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末、二月初，隨着原上海市委的倒台，“赤衛隊”也隨之土崩瓦解。

“工總司”造反隊員的人數發展到一百多萬人，佔了上海產業工人的絕大多數，因此上海在奪權之後，始終沒有形成對立的兩大派，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局面。在文革十年期間，張春橋、姚文元就是依靠這支隊伍穩住了上海的大局。

### 王洪文的“班底”掌控上海的黨政大權

工人造反派作為主力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就有參與掌權的政治要求。張春橋、姚文元順應這樣的要求，一九六七年二月，就安排“工總司”的司令王洪文、潘國平擔任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員，接着又讓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工人造反

派中的共產黨員，進入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班子，當上了市革會副主任，然後進入中共上海市委擔任常委；王洪文、王秀珍都當上了市委書記。

早在奪權初期，王洪文就嘟囔：“市級機關裏掌權的都是機關造反派，沒有我們的人！”張春橋知道以後，就批准由組織部門選拔一百二十八名基層工廠裏的工人造反派中的黨員，調到市革命委員會的各個部門工作，這是全國最早採取的選拔工人造反派向黨政機關“摻沙子”的措施。

可是，和王洪文一起參加“安亭事件”的老造反如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等人當時都不是共產黨員，沒有在職務上得到安排，王洪文覺得對不起這些“小兄弟”。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決定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一起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並且發出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召。與此同時，上海也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派遣“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王洪文和張春橋商定，把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同時命名為“工宣隊”辦公室，分別管理向各系統派駐“工宣隊”的事宜。如市革會文教組又稱“工宣隊”一辦，負責向大專院校、文化衛生系統派駐“工宣隊”，市革會地區組又稱“工宣隊”二辦，科技組又稱“工宣隊”三辦等。趁此機會，王洪文就把自己的“小兄弟”們安插進了各個“工宣隊”辦公室當負責人，例如讓上棉三十一廠工人、幫助王洪文抓捕政治對手耿金章的黃金海，當上了“工宣隊六辦”(市革會財貿組)的頭頭，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工人戴立清當上了“三辦”(科技組)的頭頭，上海重型機器廠王明龍當上了“五辦”(郊區組)的頭頭，又派建築工程基礎公司張寶林、江南造船廠的施尚英當上了市“文攻武衛(民兵)指揮部”

的頭頭，上海柴油機廠工人徐成虎當上了市公安局的頭頭，而王洪文的貼心“小兄弟”、上海良工閥門廠參加過“安亭事件”的老造反陳阿大，則當上了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上棉三十廠技術員王秀珍當上了市革會文教組負責人，上海電機廠工段長金祖敏當上了市革會組織組負責人，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化驗工葉昌明主持“工總司”的日常工作，以後又成為上海市總工會的負責人。其中的非黨人員陸續地加入了共產黨，有些人又經張春橋、姚文元批准列席市委常委會。至此，王洪文的班底可以說是全面掌控了上海市黨政機關的各個重要部門(除了我所直接領導的文教衛生系統及市委寫作組以外)，真正從政治上到組織上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戰略部署。

王洪文的班底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王秀珍、金祖敏、唐文蘭等人為代表的黨員工人造反派，還有一類是以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等人為代表的非黨工人“老造反”。雖然兩類人都受到王洪文的重用，但比較起來王洪文更重用和信任第一類人。這是因為王洪文自己在文革前就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在一九五零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五一年當上中國人民志願軍，一九五六年進入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同年入黨。一九五六年九月，王洪文復員安排進上海國棉十七廠，先後做過措車工、保全工和車間治保主任，一九六零年正式調到廠保衛科當保衛員，從工人編制正式轉為幹部編制。由此可見，王洪文長期以來受着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教育，思想上“聽毛主席和黨的話”的觀念較深，組織性、紀律性較強，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組的壓制、給領導貼大字報的時候，他仍想方設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彙報，尋求黨的高層領導的支持。一九六六年底的“昆山事件”中和一九六七年初上

海奪權前夕，他都趕往北京，面見張春橋、姚文元等，目的也是爭取中央能夠承認自己的行動。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過程中，多次聽他說過：他在造反的過程中，反反復復認真閱讀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指示和《紅旗》雜誌的社論，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

王洪文給我的總的感覺是：他受着黨的長期教育和培養，身上總有一點共產黨員的黨性，有翻身感，有一定的組織、紀律觀念，因而他對造反同夥中的黨員特別信任。至於受他重用的王秀珍、金祖敏、唐文蘭等人，也都往往自認為是共產黨員，內心深處對“工總司”的那一批非黨“老造反”是看不起的。

在這裏，我分別從王洪文的班底中選取兩個典型：王秀珍和陳阿大，作一些詳細的剖析，以便人們對這個班底的組成有更加感性的瞭解。

### 黨員工人造反派的代表——王秀珍

在工人造反派中，最受王洪文重用的是王秀珍。在王洪文一九七二年調往中央以後，王秀珍成了上海“工總司”的總管家。但是，王洪文最初想重用的還不是王秀珍，而是唐文蘭。唐文蘭是王洪文的同事。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在上棉十七廠造反的時候，建立了一個名稱很長的組織：“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鬥隊”，簡稱“誓死隊”。“誓死隊”隊長是王洪文，副隊長是唐文蘭。現在外面總是認為王洪文的心腹中有王秀珍，不大提到唐文蘭，我覺得講王洪文的班底，最早的、最堅定的班底成員應該是唐文蘭。

唐文蘭是上棉十七廠黨委組織科的檔案管理員，共產黨員。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六月在上棉十七廠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時候，模仿聶元梓在北大貼的那張大字報，署名的也是七個

人，唐文蘭就是緊隨其後的，所以王洪文對唐文蘭非常信任，奪權以後曾經想把唐文蘭提到市裏來。還是張春橋打消了王洪文的這個打算。

唐文蘭在上棉十七廠一直堅定地支持王洪文，穩住他的基礎，所以我覺得唐文蘭對王洪文來說是很重要的。中共“九大”的時候，王洪文又提名唐文蘭當“九大”的代表，後來我們在北京“九大”上海組會議上批判陳毅，唐文蘭也作了重點發言。王洪文對唐文蘭很器重，在提拔她當市裏領導的打算沒有實現以後，就把她提為上海市紡織局的一把手——紡織局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紡織系統是王洪文起家的地方，當時有幾十萬產業工人，是很重要的一個產業，唐文蘭是鐵杆保王洪文的。

### 王洪文向張春橋推薦王秀珍

後來王秀珍取代了唐文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六七年三月間的一個晚上，張春橋把王洪文和我找到他住的興國路招待所去商量工作。張春橋說：“上海有將近二百萬工人，其中婦女是半壁江山，在這場大革命中應該產生工人階級自己的婦女領袖，你們現在‘工總司’的常委都是男的，我們想選拔一兩個女工來參加市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再說，現在外賓來得多了，有一些國賓，像某些國家的總統、總理還帶着夫人。當然，我們不必學他們那一套，我們不用夫人作陪，要打破這些框框，我們就用女工來作陪，可不可以啊？”後來，我體會到，張春橋因為自己的妻子文靜歷史上有問題，不宜出面陪同，人家總統夫人來了，就提出一個設想：讓女工來陪。這一天，張春橋談了他的想法，問王洪文：“你有什麼人可以推薦嗎？”

王洪文說：“我們老造反中有幾個女的呀，她們很有殺勁

的，比如唐文蘭，她和我一起在上棉十七廠最早貼出大字報，我們還一起到北京去上訪。”

張春橋說：“你們兩個都是國棉十七廠的，一個廠出兩個人，都到市裏來工作，這總不太合適吧。”這樣就把唐文蘭否決掉了。

王洪文又說：“還有一個徐美英，縫紉社的縫紉女工，是‘工總司’的老造反。”我曾經聽徐美英說過，她到文化廣場去參加“工總司”成立大會時，根本沒有準備外出，更沒有想到會去安亭、上北京，她只穿了一雙布鞋，一路上踢踢踏踏地就跟着隊伍走了。這個女性非常能說會道，講話很厲害，在“工總司”裏她敢於給所有的頭頭提意見。王洪文問張春橋：“徐美英怎麼樣？”

張春橋說：“她是手工業局系統的吧？”張春橋都看過這些人的檔案，“她那個縫紉社是合作社性質的，集體所有制，不能算產業工人。”張春橋很強調這一點，他要提拔的工人一定要是產業工人，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職工、財貿系統的店員，在他看來，都不能算產業工人，縫紉社的也不能算。“我們要的是產業工人。”這樣，張春橋又否定了一個人。

這時候，王洪文才提出一個新名字：“有個人不錯的，就在我們楊浦區，叫王秀珍，是國棉三十廠的工人，共產黨員。她們廠就在我們廠的隔壁，我很早就認識她，到市委去串聯、上訪的時候就和她聯繫上了，後來我在廠裏貼了工作隊大字報，工作隊要整我，王秀珍還帶了國棉三十廠的隊伍來支持我。這個女同志非常潑辣，最近我已經把她調到‘工總司’總部工作。我看，是不是可以把她調到市革命委員會來？”三月間的這一天，王洪文第一次給張春橋和我介紹了王秀珍，以前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名字。



張春橋說：“等我看看材料以後再定吧。”

過了幾天，張春橋看過王秀珍的材料，叫我們通知王秀珍來參加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有關會議，當面瞭解她這個人究竟怎麼樣。在會議上還讓王秀珍發言，王秀珍呱呱啦啦很會講，張春橋感到這個女工造反精神很足，問下來，她也是參加“工總司”成立大會的，但她沒有到安亭，那天她乘另一輛火車到南京去了，跑得遠了，後來跟着“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一兵團從南京返回安亭，也算老造反了。這樣，張春橋說這個人可以培養。

### 我要寫作組代王秀珍寫文章

張春橋和姚文元商量，讓我把王秀珍這個人在群眾中宣傳宣傳。當時樹立一個標兵的最佳途徑就是替他(或她)寫文章，在全國性或上海的重要報刊上發表，影響就大了。我領受指示以後，就要寫作班的人捉刀代筆，幫她寫出一篇文章來。當時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王知常，讓他去採訪王秀珍。

根據王知常對她的瞭解，我才知道，王秀珍一九三四年出生，比我小一歲，遼寧遼陽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老家是從山東逃荒出關到東北的，在遼陽的生活很苦，家裏丫頭很多，有六個姐妹，小時候她背着妹妹在人家倒出來的煤灰裏撿剩下的煤核，賣幾個零錢供家裏用。王秀珍後來告訴我：她的父親做過小攤販，她自己也做過提籃的小販。她小時候斷斷續續上過三年學，後來進紡織廠當女工，在遼陽市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還當過勞動模範，被選為市一級和省一級的人民代表。她入黨較早，一九五三年就入黨了。張春橋考慮到“工總司”中的黨員非常少，能夠找到一個黨員，而且黨齡比較長，又做過勞動模範、人民代表，還是老造反，真是很難得。在文化大

革命初期，勞動模範往往都是站在“保守派”一邊的。

王秀珍怎麼會到上海來的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國家要培養工農幹部，上海紡織機械工業專科學校到全國各地去招生，這是一所中專學校，當時高小文化程度的王秀珍在一九五六年被保送到上海進這所學校讀書，念了四年，一九六零年畢業後，分配到上棉三十廠當織布車間技術員。王秀珍在上海結了婚，丈夫是她在紡織機械工業專科學校的同學。王秀珍的工資是七十九元二角，在當時也算比較高的。論出身，論成分，論個人歷史、家庭情況和造反表現，張春橋和我們對她都比較滿意。

王秀珍又怎麼會造反並和王洪文建立聯繫的呢？

文革初期，王秀珍認為廠黨委佈置寫大字報只批判廠裏留用的資本家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不聯繫自身的問題，就和另外幾個人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廠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冷冷清清》。工作隊進廠後，開始時支持了王秀珍，還按《十六條》規定，選她為廠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主任。但隨着運動的深入，全國各地普遍認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王秀珍也認為工作隊包庇黨委，和工作隊產生了矛盾，工作隊甚至考慮要解除王秀珍的廠文革主任的職務。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王秀珍從楊樹浦趕到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告廠工作隊的狀，遇到了中專時的同學王春曉，王春曉分配在上棉十七廠工作，就向她介紹了正在近旁上訪的同事王洪文。王洪文告訴王秀珍，自己剛從北京回來，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告了上棉十七廠工作隊的狀，並說中央文革支持他們和工作隊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王秀珍一聽就合拍了，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都對工作隊有意見，又都是東北大同鄉，兩個廠又是楊浦區的貼鄰，所以談得十分投機。王秀珍邀請王洪文到自己廠裏

傳經送寶，王洪文第二天就去了，他還指點王秀珍要利用廠文革主任的身份，和工作隊進行合法鬥爭。接着，王秀珍又帶着廠裏的同夥到王洪文廠裏取經。就這樣，彼此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至於張春橋為什麼要選中王秀珍呢？因為原來市委陳丕顯、曹荻秋掌權的時候講過，“工總司”內部很多人是“社會渣滓”，主要是指他們有些人在歷史上、生活上有點問題。至今，在有些關於上海文革的著作中仍有這樣的提法。我覺得籠統地講工人造反派是“社會渣滓”是不妥當的，這也是當時黨的領導對於敢於提意見的群眾的一種偏見。但是當時的確有少數人在經濟上、生活上有些污點，在家庭歷史上也不太清白。張春橋選人的時候就努力想避開這些問題，一定要選政治歷史上、生活上清白的人上來，使人家抓不到把柄。包括張春橋為什麼選王洪文進市革會，不選潘國平，兩個人比較以後，是共產黨員的王洪文優先入選，也是出於這種考慮。正因為這個原因，王秀珍的共產黨員、勞動模範的身份就被張春橋看中，提拔她一步一步地到市裏來參加領導工作。

### 王秀珍到北京立了一功

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即將成立。張春橋跟我商量，要派一個上海代表團到北京去表示祝賀。我說：“假如要從工人當中選拔代表，是不是可以讓王秀珍去？”這是我提名的。上海代表團去祝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團長考慮由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教衛組負責人陳琳瑚擔任，他是革命幹部，也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批與馬天水、王少庸一起被解放出來的老幹部，王秀珍是工人，可以當代表團成員。我說：“到北京去過‘五一’國際勞動節，又是祝賀北京市革命委員

會成立，很有可能上天安門，一上天安門，肯定可以見到毛主席，假如讓王秀珍回來再向大家做一個傳達，這樣可以樹立她的威信。”張春橋採納了我的意見，讓她去了。

巧的是，那次上海代表團確實被請上了天安門城樓，團長陳琳瑚當天中午跟北京的老戰友見面，吃飯喝酒耽誤了上天安門的時間。王秀珍在天安門上面，又是跟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握手，又是和聶元梓一起站在毛主席身邊，她手裏還抓了一把上海“工總司”的紀念章送給毛主席，這次活動給她提供了很好的亮相機會。回來以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文化廣場召開傳達大會，這次就輪不到陳琳瑚傳達了，由王秀珍傳達在北京祝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詳細經過，特別是講述毛主席怎麼接見他們，他們怎麼親手向毛主席獻上“工總司”紀念章，她怎麼和聶元梓兩人跟在毛主席後面從城樓的東頭走到西頭，一直追隨着毛主席，天安門下面的人對着毛主席歡呼，她們怎麼激動掉眼淚。這樣一講，上海的幹部和造反派都聽到了傳達，王秀珍一下子變成大有影響的人物。與會者在文化廣場振臂高呼：“感謝毛主席對造反派戰士的無限關懷！”“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王秀珍也因此而沾了光。

這一次去北京，王秀珍還立了一功。她回上海以後，向張春橋、姚文元和我彙報：在北京紅衛兵參加的座談會上，有的北京紅衛兵發表了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不滿言論，陳琳瑚非但不公開批判他們的言論，反而附和。又彙報說：陳琳瑚到北京後到處拜訪老戰友，發發對文化大革命的牢騷，還因為喝酒耽誤了見毛主席的重大活動。張春橋聽了以後，勃然大怒，當着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成員的面，狠批了陳琳瑚。陳琳瑚也為這件事對張春橋很有意見，背後講了一些對張春橋不滿的話，後來張春橋就把他作為“不見得派”的代表給整了下去，還將他

關起來隔離審查。當時把一些認為“文化大革命不見得好”、“奪權不見得好”的人，稱為“不見得派”，陳琳瑚就算一個。王秀珍彙報陳琳瑚的情況有功，深得我們的信任。

### 王秀珍成了王洪文的“總管家”

王秀珍有這樣一個特點，每天要把大大小小的情況向王洪文匯報。王洪文的耳朵根子比較軟，喜歡聽各種各樣的情況，王秀珍就把“工總司”內部的各種議論，包括有些人對王洪文的態度，都向王洪文一一彙報。甚至把當時陳阿大如何追求“工總司”文藝小分隊姓季的演員，追求成功結婚後，兩人又鬧矛盾，陳阿大外出，小季怎樣在外面盯梢，兩人在家裏怎麼吵架等等，都向王洪文詳細彙報。王洪文覺得，王秀珍不斷有信息可以告訴他，所以一再地重用她，很多人都不敢得罪她。

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意見，王秀珍從北京回來，我佈置寫作組給王秀珍撰寫的一篇很長的文章也完成了，署上王秀珍自己的名字。當時姚文元開始主管《紅旗》，我們告訴《紅旗》雜誌，上海有一篇約王秀珍寫的文章，介紹她自己怎樣從一個提籃叫賣的窮丫頭變成紡織工人、勞動模範，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樣起來造反，以後又見到了毛主席，決心成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戰士。文章定稿後，我們用電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傳給《紅旗》雜誌，由編輯部直送姚文元。姚文元很快就審看、修改了，並決定在《紅旗》雜誌上用顯著地位發表。文章寫得很有氣勢，王秀珍因此成了上海四十萬紡織工人的代表，工人造反派的優秀人物，名揚全國。

此後，王洪文對王秀珍非常重用，一再提拔，一九七二年，王洪文要上調北京了，王秀珍本來是“工宣隊”一辦的負責人，代表工人階級參與領導的。王洪文臨走以前，把上海市

委的組織部門、政法部門(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民兵指揮部(文攻武衛)以及上海市總工會、共青團市委、市婦聯等這些大權全部交給王秀珍掌管，他還把“工總司”的一批老頭頭都召來，當面託付給王秀珍領導、管教。這樣，王秀珍名副其實地變成王洪文在上海的總管家。

王洪文調到北京以後，王秀珍可以直接和他通話，一方面彙報上海的情況，一方面聽取王洪文有什麼指示或者打聽中央有什麼精神。我們在上海的幾個負責人平時和在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聯絡比較少，因為張、姚不贊成我們經常給他們打電話，有什麼事往往都是書面請示彙報。王洪文走後，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要瞭解中央的精神，又不便經常給張、姚打電話，往往去找王秀珍，讓她講講王洪文那裏有什麼精神。於是，幾乎天天和王洪文通電話的王秀珍，倒過來向馬天水轉達中央的精神，這種領導關係很不正常。

王洪文離開上海以後，他的小兄弟們對王秀珍顧忌很大，因為王秀珍經常要向王洪文匯報他們每個人在上海的各種表現。王洪文要批評什麼人，也通過王秀珍來傳達，所以他們都不敢得罪王秀珍。結果在王洪文的圈子裏對王秀珍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稱呼——“大姐”。“大姐”，原來是黨內對中央幾位資歷很老的女領導的稱呼，比如說對鄧穎超，叫鄧大姐；蔡暢，蔡大姐；康克清，康大姐。只有這一輩的人在黨內才配稱“大姐”。王洪文和我平時叫王秀珍就叫“秀珍”，但“工總司”的小兄弟們卻都叫王秀珍“大姐”。其實按照年齡來講，王秀珍並不比他們都大；按照造反的資格來講，王秀珍也並不比他們老，有的人說過在“安亭事件”時他們還不知道誰是王秀珍。由於王秀珍得到了張春橋的提拔，王洪文的重用，並被江青提名當上了市委書記，位置越來越重要，這批人就圍着她

叫“大姐”。最奇怪的是：有一個上海的老幹部張敬標，原來在楊浦區委做過書記，因為解放得早，王洪文極力推薦他作為老幹部的代表到市裏來工作，張春橋、姚文元採納了這個意見，張敬標先到市革命委員會當辦公室負責人，後來又當上市委常委。當時五十多歲的老幹部張敬標見了只有三十多歲的王秀珍，也跟着別人叫“大姐、大姐”，聽了實在使人渾身發麻。

### 非黨工人造反派的代表——陳阿大

介紹過了黨員工人造反派的代表王秀珍，再來談談非黨工人造反派的代表陳阿大。他也是王洪文班底中的重要成員。

陳阿大在“工總司”頭頭中的名氣很大，據我瞭解，王洪文對陳阿大的評價並不高，有時也要嘲笑他，但是，卻始終非常重用他，這是為什麼呢？在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才知道，陳阿大對於王洪文，可以說是死心塌地跟定了，甚至可以舍掉自己的命來保他、救他。王洪文在文革初期遇到危難的候，往往是陳阿大挺身而出，拉了隊伍來保衛王洪文，給王洪文解圍，所以王洪文把陳阿大當成鐵杆兄弟，非常信任他。

張春橋也曾仔細看過陳阿大的材料，認為從他的歷史以及現實表現來講，總的方面是可以的。陳阿大，浙江紹興人，一九四二年阿大、阿二這一對雙胞胎兄弟出生在貧農家庭裏。後來父親到上海做霉乾菜小生意，母親到上海幫傭。解放後，父親進了造船廠做搬運工，一九五二年，把陳阿大等接到上海。陳阿大進了小學，讀到初一，十五歲的時候在南碼頭做臨時工，一九五八年進中華造船廠做鉗工。一九六一年從工廠參軍，在福建部隊當炮兵，一九六五年復員，到上海良工閘門廠做機修工、也當過鉗工，做過基幹民兵排長和車間保衛幹事，在“四清”運動中加入共青團。張春橋對他的經歷比較滿意，

認為這個人屬於產業工人，雖然有人反映陳阿大住在棚戶區時交過一些流裏流氣的朋友，在部隊時鬧過情緒想要提早復員，他自己也穿過小褲腿和尖頭鞋，但張春橋認為這些都屬於小節，無礙於陳阿大成為工人造反派的頭頭。因為良工閥門廠是“工總司”的發起單位，陳阿大在籌備會上自報家門的時候，憑他是工人出身、當過炮兵、又加入過共青團這幾條，被推選上了“工總司”常委的位置。

### 陳阿大死保王洪文得到了重用

王洪文幾次跟我提起，在他危難的時候，總是陳阿大調隊伍來救他。有幾次，反對派把王洪文抓去，陳阿大把王洪文從人家手裏搶下來。所以王洪文很看重陳阿大死保他這一點，認為陳阿大講義氣，所以雖然陳阿大缺點很多，人緣很差，在“工總司”裏威信很低，但王洪文卻始終袒護他，重用他。

我也親身經歷過一次陳阿大死保王洪文的事件。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郊區青浦兩派大都是農民，搞起了大武鬥，非常激烈，王洪文趕到那裏去調解。過了不久，傳來消息說王洪文被其中的一派抓去了，還挨了打。當時市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發生這樣的事情，當然非同小可，我馬上在康平路小禮堂二樓二零三會議室召集“工總司”的人開緊急會議，商量怎麼辦。當時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張宜愛，是個老紅軍，負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郊區組的工作，我也把他請來一起商量。當天，矮端端、胖墩墩的陳阿大也趕來了，他火氣非常大，用手摩着平頂頭着急地說：“我們幾個人已經商量好了，調了一百多輛大卡車，車上都是‘工總司’的造反隊員，手裏拿着鐵棍和長矛。大卡車的佇列已經排在西郊公園門口的馬路上，只消一聲號令，我們就出發去救王洪文！”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都不在



上海，我一想，這一百多輛大卡車上的工人造反隊員拿了鐵棍、長矛去跟青浦農民幹起來，就是一場流血大武鬥。如果造成重大的傷亡，我們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我說：“無論如何先穩住，瞭解一下情況再說。”

陳阿大堅決不聽，他馬上要在康平路小禮堂打電話通知隊伍出發。

我打電話問青浦方面的情況，答覆是情況不明。王洪文的車到了衝突現場附近，給兩派中的多數派圍住了，當時又沒有手機什麼的，他與外面的聯繫中斷了，不曉得他的去向如何。傳來的消息說是他被打、被抓了。當時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我自己去青浦直接處理，一個是允許陳阿大帶一百多輛卡車開往青浦營救。

情急之中，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說：“這樣吧，我去。我是穿軍裝的，估計人家不會打我，你徐景賢去，人家也不一定賣賬。我用我自己的生命擔保王洪文的安全。”

這樣，陳阿大總算答應暫緩動用他的武鬥大部隊：“等你張宜愛副司令去了，看看結果怎麼樣再說。”

我們就在康平路辦公室等候。陳阿大又連連催問。兩個多鐘點以後，張副司令的消息終於來了：“我親眼見到王洪文了，他正在找兩派開會，根本沒有挨打，只是他坐的小轎車被幾個不明真相的人敲了幾棍子，有點癟凹。”

這時已近傍晚了，聽到這個消息，陳阿大才同意把西郊公園大門口那一百多輛武裝大卡車撤走，避免了一場嚴重的流血衝突。我終於鬆了一口氣。當時上海市的權力機構已經成立，經我們勸說，他都可以不顧一切地死保王洪文，可見他從前搶救王洪文是如何賣力，怪不得王洪文要特別寵他了。

## 陳阿大是市革會裏的“阿混”

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王洪文推薦陳阿大負責上海的工交戰線。實際上，上海工業交通系統的大量工作是馬天水抓的，後來，把原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領導幹部黃濤解放出來，擔任工交組一把手。黃濤做過江南造船廠的黨委書記，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經驗比較豐富，他與馬天水是長期的上下級關係。黃濤上任後，陳阿大變成了二把手。工交組召集工交系統負責人開會的時候，黃濤講話佈置工作，大家都拿出筆記本來認真記錄，等到陳阿大講話的時候，大家都停下了筆。

陳阿大喜歡踢足球，打羽毛球、乒乓球，下軍棋、舉啞鈴，他把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工交組辦公室作為鍛煉身體的場所。休息的時候，他還到市革命委員會的大廳裏去打羽毛球，打球總有輸贏，但他一定要贏，輸了就發脾氣，甚至把鋼管做的羽毛球拍往地板上摔，有時都摔斷了。他還在幾十平方米的辦公室房間裏對着牆壁踢足球，嘭、嘭，白牆上都是球印子，有一次把玻璃門都踢破了。他在辦公室裏放了一副鐵啞鈴和一副三根彈簧的擴胸器，專門練胸肌。外邊的體育場如果有足球比賽，他就叫幾個人和他一起去看足球。市革會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很看不起他。他基本上不鑽研工業生產的業務，也不認真研究當時工業、交通方面的政策、法令、法規，常常信口開河，不懂裝懂。我們失去自由以後，關在提籃橋監獄裏，我和他曾在一個小組，他總是把一本書放在面前裝樣子，然後拿了一支筆，在白紙上面七劃八劃，可以熬過兩個鐘點，無所事事。從這點可以想見，他過去鬧的笑話是真的。

上海奪權以後，我和王洪文聽秘書廖祖康講起，陳阿大這個人不懂裝懂，經常在電話裏給人家吹牛，說他晚上在學習馬列。有一天晚上，我們在一起給陳阿大打電話，王洪文撥通了

電話，我也湊上去聽。

王洪文會講一點上海話，“阿大，儂勒做啥？”

實際上陳阿大正在瞌夢頭裏沒有完全醒過來，一聽是王洪文來電話，就說：“我勒拉學習。”他是紹興人，一口紹興話。

王洪文說：“這麼晚了，你在學什麼？”

阿大說：“我在學《列寧全集》。”

王洪文也蠻鬼的，說：“你在看《列寧全集》裏哪篇文章？”

阿大說：“我讀到二百多少多少頁。”他說不出文章名字，只說多少頁。

王洪文一聽，哈哈大笑，說：“你別騙我們了！”

陳阿大耍賴皮：“不相信你們來看好了！”

好幾次廖祖康給他打電話也都是這樣，現在終於由我們來證實。

過兩天，王洪文晚上又給他打電話，他還是說在看《列寧全集》，王洪文問：“這次你學習哪篇文章？”他又說多少多少頁。

王洪文說：“你上次在學二百多頁，今天只學一百多頁，倒過來學習了？”

陳阿大就是這麼胡來，裝得好像很認真似的。王洪文給他打了電話以後，有一次碰到他說：“阿大，你的臉皮比鄧錄普還要厚。”鄧錄普是一種名牌的橡膠車胎。

陳阿大從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大門進出的時候，耀武揚威，有的警衛戰士不認識他，要他出示工作證，“我是陳阿大你都不認識？”他動手就推人家。他坐轎車的時候叫司機闖紅燈，還與交通警發生過糾紛。他坐在轎車後排，有時把兩個腳擱在

駕駛員的肩膀上，雖然是開玩笑，但他這副樣子，實在不像一個市裏的負責工作人員。所以人家背後就叫他“阿混”，還到我這裏告狀。張春橋卻對我說，他們的事情你不要插手管，讓王洪文管他們。所以我又把情況跟王洪文講，王洪文倒是當着我的面批評了他，我也跟着說兩句，“阿大，你怎麼可以這樣呢？辦公室變成足球場，把玻璃門都踢破了，你在大廳裏打羽毛球，大廳裏那麼多人看到你摔拍子，意見大了！你還對警衛戰士耍態度，你要注意呢。”後來，他見了我，有點怕，也有點恨。

### 張春橋、姚文元讓陳阿大“突擊入黨”

中共“九大”召開以前，張春橋說要把陳阿大發展成為黨員。張春橋說：“我們現在造反派隊伍中黨員太少，假如不在‘老造反’中發展黨員，以後要長期掌權是掌不牢的。”一九六八年，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我一起到良工閥門廠去，召開了一個整黨建黨座談會，在這個座談會上張、姚專門強調要從革命造反派隊伍中發展新黨員。當時中央決定在文革中暫停黨的組織生活，不能發展黨員，張春橋、姚文元就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吸收新鮮力量入黨》的請示報告，經過毛澤東批准，然後對良工閥門廠的黨員幹部說，你們這裏可以成立一個黨的核心小組，有權發展黨員。原來廠裏的支部發展黨員要經過廠黨委正式批准，因為廠黨委暫時停止行使職權，就採用先成立黨的核心小組的辦法，由原黨委書記老程擔任核心小組組長，授權他可以發展黨員。

王洪文還特意在良工閥門廠的會上挑明：“像你們這裏陳阿大那樣的，他在‘一月革命’奪權當中功勞很大，完全可以入黨。”

就這樣，市裏內定要發展陳阿大入黨後，馬上由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找陳阿大談話，“啟發”他的入黨要求。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陳阿大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十月十九日，王秀珍和黃濤又趕到良工閥門廠，指示陳阿大原來的所在單位金工車間召開黨支部大會，表決通過陳阿大入黨：廠裏的黨的核心小組很快就正式批准了陳阿大入黨。不久，經張春橋、姚文元授意，陳阿大又成為中共“九大”的代表。從陳阿大遞交入黨申請書到成為“九大”代表，前後只有兩個月時間，這完全是典型的“突擊入黨”，也是張春橋、姚文元一手促成的。後來才知道，為陳阿大入黨，支部大會也開了，廠裏黨的核心小組也批准了，但他只交過入黨申請書，沒有交過入黨志願書。組織部門讓他填的一式兩份入黨志願書，他一直放在自己的抽屜裏，沒有上交，等到文革結束以後，才從他的抽屜裏查出來。事後有人到我這裏調查陳阿大入黨的經過，告訴我關於志願書的事，我很吃驚，怎麼會這樣？入黨手續不全，他竟然當上了“九大”代表和市委列席常委，這完全是文革中黨的體制混亂的突出事例。

陳阿大在學習上差勁，在工作上無能，但在追求個人生活享受方面卻削尖腦袋，很會鑽營。他原來家裏的住房條件很差，到了市裏工交組工作，分管房地局，先為自己改善住房，開始時搬到常熟路瑞華公寓的市委機關宿舍，一去就佔了一整套四室戶。我文革前在市委當幹部的時候也住在那裏，只住一室半，有的人家只住一間，我們一套裏共住了三戶人家。可他住進去後，一套四間都是他的。接着他又佔了另外一套。還嫌不夠，住了不久，他聽說上海高幹和高級知識分子住的最好的房子是淮海中路新康花園，他又搬到那裏去了。別看他這個人似乎是大大咧咧的，在追求享受方面門檻卻賊精。難怪後來姚

文元在聽說陳阿大等人熱衷於追求享樂以後，對我感歎道：  
“他們這些人表面上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實際上追求的正是資產階級法權，好比吃臭豆腐乾，聞聞是臭的，吃吃是香的！”

### 上海人給陳阿大編的笑話

對陳阿大這樣一個“阿混”式的人物，上海人是早有口碑的，而且給他編了幾則精采的民間故事，揶揄他，嘲笑他。現選擇其中的兩則，為保持原貌，記錄如下：

陳阿大說話粗俗，切口很多，差不多一開口就帶“標點符號”，張口閉口“觸那！”（北方話‘操你媽’的同義語）

有一天，陳阿大接待外賓，說話間時不時地冒出一個個“觸那”。外賓奇怪，問翻譯：“‘觸那’是什麼意思？”翻譯為維護主人的顏面，只好說：“是‘你好’的意思。”臨別的時候，外賓握着陳阿大的手，熱情地說：“觸那！”

這則笑話，流傳很廣，不過要如實地說，我和陳阿大接觸很多，倒沒有聽到他說話帶“標點符號”。

還有一則笑話，陳阿大自己對此也津津樂道：

有一天，上海民兵指揮部召開民兵大會，陳阿大上台講話。

陳阿大說：“今天，我們給上海民兵舉行發槍儀式。我要告訴大家：一個人發一支……”

下面熱烈鼓掌。

陳阿大接着說：“這是不可能的。”

下面默然。

陳阿大又說：“兩個人發一支……”

下面再次熱烈鼓掌。

陳阿大接着說：“這是辦不到的。”

下面又默然。

陳阿大最後說：“決定三個人發一支，”下面繼續鼓掌，陳阿大緊接着說：“木頭的！”

關於這個故事，陳阿大自己也聽說了，他有一天還講給王洪文和我聽，我說：“你又不分管民兵，還輪得到你發槍嗎？”陳阿大聽不懂故事裏對他的諷刺，反而洋洋得意。

### 張春橋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老頭子”

王洪文委派“工總司”中的黨員工人造反派和非黨工人造反派(後者在文革後期全都發展入黨)，擔任了市革會各辦的領導職務，又通過“工宣隊”和派出工人幹部的形式，掌握了上海各系統的黨政權力。從工業、交通、財貿、科技、農業、地區到公安、檢察、法院、民兵以至工會、青年團、婦女及各區、各縣，他們都掌握了實際的權力。據統計，當時共派出“工宣隊”一萬零七百一十三人，其中擔任各單位書記、主任、委員的共四千一百四十二人，有些人雖然擔任副職，但實權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市委組織部門的大權由王洪文的心腹、上海電機廠的工段長金祖敏掌管，市總工會的日常工作由和王洪文一起籌建“工總司”的葉昌明主持，他們都可以向各級黨委和革委會派遣和“推薦”工人幹部。

除了掌握上述各個系統的權力以外，王洪文等人還不滿足，一直想把手伸到意識形態的領域裏來，他們想要辦報紙，出刊物，抓文藝。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就辦起了自己的機關報《工人造反報》，發行量一度多達六十多萬份。但是這份報紙不像《文匯報》、《解放日報》那樣，不歸市革命委員會領導，而是由他們獨立編報。“工總司”的一批人希望不但有行政權、組織權，而且有自己

的話語權。他們不知道這個領域是不容他們染指的，他們不斷向這個領域伸手，就觸犯了張春橋、姚文元的禁忌。張、姚認為文革的最高話語權在毛澤東，而對毛澤東話語的詮釋權則在中央文革和張春橋、姚文元手中，此外誰也不能插手此事。張春橋曾在會上多次開導王洪文等人，張春橋說：“聯共布黨史中談到當時俄國有一個馬爾托夫派，列寧就針對馬爾托夫派指出：自發的工人運動是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的。”張春橋多次提醒王洪文，希望“工總司”停辦《工人造反報》。王洪文不捨得，希望保留這個話語權，一直拖着沒有執行。直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張春橋把話說得很重了，他說：“全國各地群眾組織的小報小刊都停辦了，唯獨上海《工人造反報》還在出版，人家很有意見，影響不好，還是停辦吧！”這樣，王洪文才不得不下令停刊。

過了一段時間，“工總司”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批復辟回潮，神氣起來，他們又想掌握話語權了。他們不甘心張春橋、姚文元把上海的意識形態詮釋權交給我和朱永嘉等知識分子掌管，他們找藉口要批判市委寫作組辦的文藝雜誌《朝霞》，迫使《朝霞》停刊檢查，他們自己想辦刊物《工人創作》。我頂不住來自王洪文的壓力，但寫作組的成員、《朝霞》主編陳冀德向張春橋寫信彙報了此事，張春橋雖然生氣，但不動聲色，通過給上海市委寫信、自己出面承擔責任等措施，斷然制止了“工總司”的進一步行動。到了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從北京回上海，又指示葉昌明要出版工人自己的刊物。葉昌明經過籌劃，打算由總工會宣教組編兩種刊物：《工人理論》和《上海工人工藝作品彙編》。後面這本《彙編》第一期剛剛出版，就被我看到了，我深諳張春橋的意圖，立即把這本刊物通過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直送北京。張春橋迅即作出批示：“我



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隨便出刊物。”兩本刊物就全被封殺了。

張春橋可以把別的權力交給王洪文的班底，可是，話語權和詮釋權卻萬萬不能鬆手。

其實，王洪文的班底所掌握的上海各個系統的權力也好，我所控制的上海意識形態各個文化領域也好，最後仍需向張春橋和姚文元作請示彙報，最後的決定權仍在張、姚。因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仍然要通過黨，而作為上海黨的最高領導的化身，就是張、姚。即使王洪文後來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職務比張、姚都高，但是他對張春橋、姚文元還是唯命是從的。特別是對張春橋，用上海話來形容，王洪文可以說是“一帖藥”，嘸沒還價。這是因為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他們之間存在着長遠的歷史淵源和恩怨關係。

張春橋從“安亭事件”開始，支持了“工總司”的成立，承認了他們的組織，肯定了他們的行動。張春橋知道中央在對處理“安亭事件”上存在着不同意見，而他自己敢於豁出去簽字同意，是期望和相信會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事後他曾對王洪文說過：“我是提着骷髏(體)頭簽字的。”因此，王洪文多次對他的小兄弟們講：沒有春橋，就沒有我們這些人；沒有春橋，就沒有我們“工總司”！他對張春橋是非常恭敬的。張春橋也十分重視這支隊伍，他通過“工總司”的頭頭，把上海一百二十萬產業工人的隊伍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對這些頭頭採取一種恩威並施的做法：一方面對他們施恩，提拔他們，扶植他們，另外一方面對他們的缺點錯誤，也會進行批評，甚至批評得很嚴厲，使他們很服貼。

可以講一個故事，說明張春橋和王洪文的班底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工總司”是上海最大的群眾造反組織，對其他的組織經常流露出一種大國沙文主義的情緒，他們的小團體主義發作起來有時非常厲害。正好“一月奪權”最緊張的時候，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要訪問上海，這一批國賓由總理謝胡帶隊，他是該國的第二把手。上海由張春橋出面接待，陪同的人員也由張春橋指定。外賓到達時飛機場要有群眾隊伍，當時重要的外賓來訪，一下飛機，要有幾千人的隊伍夾道歡迎，表示友好。飛機場的歡迎隊伍，市裏規定由各個群眾組織輪流去，譬如說這一次是“工總司”調隊伍去飛機場，下一次是大學紅衛兵組織去，再下一次是中學紅衛兵組織去。那天輪到的是財貿系統的隊伍去歡迎。財貿系統的造反組織當時叫“財革會”，頭頭姓宋，我們都叫他“宋老闆”，他原是財貿系統一個竹木器店的店員。當時外事組就通知“財革會”老宋：“今天你帶財貿系統隊伍到飛機場去歡迎外賓。”他就組織隊伍去了。誰知道，“工總司”的頭頭們聽說今天有重要外賓來了，不滿意外事部門安排“財革會”歡迎，仍想自己出風頭。於是他們不顧外事紀律，打聽到了外賓專機抵達上海的時間，自己調了一輛大卡車，“工總司”的常委們以及在總部工作的頭頭們，一擁而上，直開虹橋機場。這時，財貿系統已經在停機坪上排好了隊伍，敲起鑼鼓，揮動花束，單等外賓降落了。那天張春橋作為上海的主要負責人，也去了機場，他在貴賓休息室裏等候外賓到來。

正等候間，外事組人員忽然發現有一輛大卡車直朝機場開來，在指揮塔旁邊停下。車上的人們扛着一面很大的旗子跳下車子，旗子一展開，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面特製的大旗，平時不輕易拿出來，有重大活動的時候才抬出來揚威。大旗展開以後，潘國平穿着草綠色的軍便服走在隊伍的前

頭，兩手高舉着大旗，後面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葉昌明等，十幾個頭頭排成一字長蛇陣，跟在大旗的後面，威風凜凜地朝停機坪走去。外事組人員一看，怎麼回事？今天明明輪到財貿系統的頭頭帶着隊伍來歡迎，怎麼突然間又來了“工總司”頭頭的隊伍，恐怕要鬧矛盾、出問題。“工總司”這一路縱隊從指揮塔下車，朝停機坪走去的時候，必定要經過貴賓室，外事組的工作人員馬上跑進貴賓室，向正在休息的張春橋緊急彙報：“今天原來安排財貿系統群眾來歡迎的，結果‘工總司’頭頭的隊伍來了，還拿着大旗，正朝這邊走來。”

張春橋一聽，便從貴賓休息室裏走出來，他的習慣是這樣的：平時遇事不露聲色，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煙。貴賓休息室門口有幾級台階，他走下台階，正好看到“工總司”大旗下面的隊伍從指揮塔那兒列隊而來，他也不走上前去，只在貴賓室前站定了，然後側過頭，抽着煙，一雙眼睛從眼鏡片後面看着他們。

那些傢伙真是無法無天，他們開始並沒有注意貴賓室門口站着的是什麼人，腦子裏只想着“工總司”到什麼地方還有誰敢阻擋？在這支隊伍裏，潘國平本來兩手直挺挺地舉着大旗，雙腳故意走正步，後面的人有的嘻嘻哈哈，有的學潘國平的樣子正步走，可是走近貴賓休息室門前，他們一下子發現十幾步開外站着的正是張春橋，而且張春橋正抽着煙盯着他們看，冷冷地板起臉，這下子把他們嚇得非同小可。他們趕快把旗子縮下來，後面的人個個想躲起來，但還能往哪裏躲，整個隊伍暴露在這塊空地上，十幾個人非常尷尬。張春橋還是不響，冷冷地看着他們。當時沒有任何人喊口令，也沒有任何人說向後轉，只見潘國平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朝後就走。大旗本來是舉在前面的，現在卷起來扛在肩上，偃旗息鼓了。他

掉頭一走，其他人也都灰溜溜地、垂頭喪氣地往回走。陳阿大原來排在第二，潘國平一轉彎，他也緊跟着回頭，其他的人索性跑將起來，大家爭先恐後地爬上卡車去。來的時候雄赳赳，像大公雞一樣，走的時候成了殘兵敗將。大卡車一溜煙開走了，正在這時，外賓的飛機正好在機場上空盤旋而下。

後來我聽他們自己講，那輛卡車開在回去的路上，十幾個人坐在車上相互埋怨：是誰想起要到機場來的？陳阿大為了發洩不滿，還在卡車上翻了兩個跟斗。這正是：“張春橋路邊一站，工總司嚇破了膽！”

過兩天，我到張春橋辦公室去，跟他說：“外事組已經告訴我了，‘工總司’頭頭怎麼搞的？外事紀律是最起碼的，誰去迎送都有規定，他們怎麼自作主張去了，還弄成這副模樣？當時虧得你在場，他們見了你還是怕的……”

張春橋一面聽我講，一面嘎嘎地笑，邊笑邊說：“嘿嘿！他們啊，把我當成‘老頭子’了！”

張春橋也算是三十年代的“老上海”了，我覺得他這句話，半是調侃半是得意。因為上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青洪幫的“老頭子”（首領），如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這些人，下面都有好多徒子徒孫，確實能做到“老頭子”一句話就可以把他們擺平的。我也有這種感覺，“工總司”這些人看到張春橋真是服服貼貼，像是見了“祖師爺”。

儘管王洪文的班底掌握了上海很多部門的權力，儘管後來王洪文在中央的職務比張春橋還高，但是我覺得，王洪文始終是聽命於張春橋的，這個格局從來沒有改變過。因為張春橋一開始就對上海工人造反派有恩，然後恩威並施，終於成為整個王洪文班底的“老頭子”。

## 第十三章

# 毛澤東說：武裝上海十萬工人

## 砸上柴“聯司”的前後經過

我接觸上柴“聯司”（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簡稱）的問題，最早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那時上海的形勢相當亂，張春橋、姚文元剛從北京到上海不久，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張春橋讓他的秘書何秀文打緊急電話到武康路二號，說有兩個人闖入他們住的興國路招待所（現今的興國賓館），叫我去處理一下。

### “聯司”人員夜闖興國路招待所

那天已快到半夜了，我急忙騎上自行車，趕到那裏。進了興國路招待所的邊門，只見門裏面吵吵嚷嚷，張春橋的秘書和部隊的軍官、值勤的解放軍戰士，圍着兩個人，正在跟他們爭論。何秀文打電話通知時要我以一個群眾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出面，所以我就走上前去對那兩個人說：“我是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其中有個人認識我，很快就叫出我的名字：“你是徐景賢。”他介紹自己說是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的。

我說：“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他說：“我們要見中央首長。”

我問：“你們怎麼會找到這地方來的？”當時張春橋、姚文元住的地方是非常秘密的。

那兩個人不肯講，他們堅持說：“我們到這裏要向中央首

長彙報情況。”

正在我們對話的時候，“工總司”二兵團的頭頭耿金章來了，他也是張春橋的秘書打電話叫來的，張春橋要我們兩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出面勸阻那兩個人。

耿金章對他們態度很兇，說：“這地方是禁區，你們怎麼可以闖進來？”

通過問答，才知道他們是翻牆進來的，當時牆上築有鐵絲網。他們翻進大院後，見院裏是一個大花園，分佈着好多幢樓，不知中央領導人住在哪裏，就挨家挨戶地找。文革以前，興國路招待所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來上海時住的地方，守衛得很嚴密。本地的來訪者要見中央首長，都要從大門口先打電話進去，然後由裏面派人出來接。那兩個人在裏面闖了半天，沒有結果，最後被解放軍戰士帶到門口傳達室。

耿金章和我兩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耿金章很兇，我比較溫和，一起勸他們回去。他們堅持了很久，看來見不到中央首長了，便留下單位、姓名走了。他們此行的目的，說是要向中央首長反映上海柴油機廠兩派的問題。

我等那兩人和耿金章走了以後，就跟何秀文一起到裏面看望張春橋。張春橋住在五號樓，見了我們的面，他餘氣未消，惱怒地說：“解放軍根本沒用處，那兩個人居然可以翻牆頭跨越鐵絲網到院子裏面來，解放軍根本不敢碰他們。他們一幢樓一幢樓尋找，到了五號樓，我正在看文件，聽到外面要找人，就把燈關掉了。只聽見他們走近來，說要找中央領導，解放軍跟他們對話，就在我窗下糾纏了好久，才把那兩人勸到外面去。解放軍說要保衛我們，到關鍵的時候，連槍也不敢開。”我當時想，這兩個人並沒有謀害領導的意圖，開槍總是不行的。

張春橋又說：“我已經問過了，這兩個人是怎麼會來這裏的？”原來上海警備區政委李世焱和副政委李彬山，知道中央首長張、姚住在這裏，代表警備區來看望。他們出門的時候，正好碰見那兩個人，兩人看到年紀很大的解放軍首長從裏面出來，就把他們堵住問：“這裏是什麼地方？”兩位政委告訴道：“這裏是中央首長住的地方，你們不要隨便闖。”他們一聽便來勁了，興國路大院門口警衛森嚴，無法進去，他們就繞道到後面，翻過圍牆跨過鐵絲網，闖入院裏。當天只知道他們是上柴“聯司”這一派的，因為沒有造成什麼後果，也就算了。

但到後來，當上柴“聯司”和上柴“東方紅”（“東方紅兵團”）兩支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銳的時候，聽說這件事也變成“聯司”的一條罪行，有人宣稱上柴“聯司”的兩個人，在張、姚到達上海沒幾天，就半夜翻牆直闖張春橋、姚文元的家裏。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在康平路大院裏，那兩個人到興國路只是為反映情況而已，根本稱不上什麼“罪狀”。

### “聯司”提出“改組”上海市革會

此後，我們就開始注意上柴“聯司”和上柴“東方紅”的矛盾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正好在張春橋、姚文元住處彙報工作，王洪文打電話來報告，說他已帶了好多人衝到上柴廠去。據說那天廠裏發生了一場很大的武鬥，還抓了人。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清楚上柴兩派究竟是什麼關係，只是對王洪文講：“不要造成重大的傷亡。”其實這時王洪文和“工總司”已經介入到上柴兩派的矛盾中去了。

後來，我們問王洪文是怎麼回事，他說：“‘聯司’和‘東方紅’兩派都宣稱自己是造反派，主要是上柴廠裏的兩派在打倒誰、解放誰和結合誰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在誰執行修正

主義路線的問題上有爭論。”據說這種爭論一直牽涉到八機部。對這些是非我沒有時間去弄清楚，也沒有認真去研究過，因為當時正值上海奪權初期，我實在太忙，顧不上去詳細瞭解。

之後，上柴“聯司”一派來找我們，上柴“東方紅”一派也來找我們，他們都認為市委機關聯絡站是張、姚的辦事機構，都想爭取我們的支持。果然，市委聯絡站的工作人員中有同情“東方紅”的，也有像郭仁杰那樣同情“聯司”的。我的態度是：哪個地方發生兩派矛盾的時候，不要去支持其中一派。所以，開始的時候，我在上柴“聯司”和“東方紅”的問題上一直是比較超脫的，沒有發表過意見。

等到交通大學“全向東”（一個年輕教師湯福坤的化名）與上柴“聯司”結合後，不斷在社會上發表言論，才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上柴這麼一個大廠，又有軍工生產，兩派對立很激烈，影響了生產，特別是軍工任務。我們派部隊的軍宣隊進去，不久軍宣隊很快地宣佈“東方紅”是左派，“聯司”當然不滿意，他們就把軍宣隊辦公室砸掉了。部隊報告公安局，公安局抓了兩個砸辦公室的人。這樣一來，“聯司”更不滿意，組織人到市公安局靜坐，從此就把上柴“聯司”的問題鬧到社會上去了。

上海“一月奪權”以後，很多基層單位都存在着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不同的群眾組織都打着“造反”的旗號，宣稱自己是“左派”，壓制對立派，大搞派性，唯我獨“革”，大權獨攬，不想和對方聯合而只想把對方打下去。而王洪文等指揮的“工總司”又往往支一派、打一派，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受壓的、丟權的或是失意的組織，對市革命委員會、“工總司”和“支左”部隊有意見，或是心裏有氣，現在正好趁着上柴



“聯司”敢於向市裏挑戰，就紛紛表示支持“聯司”，還成立了一個全市性的組織：“支持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司令部聯絡總站”（簡稱“支聯站”），把各種對立力量都糾合起來了。

“聯司”把矛盾鬧到社會上來，使我們很傷腦筋，這影響到我們奪權以後的秩序問題。“聯司”派人到市公安局靜坐以後，我們不斷地要市政法指揮部出面解決。市政法指揮部發了好幾個通告，但都不能平息矛盾。因為市政法指揮部是市革命委員會的所屬機構，“全向東”他們認為政法指揮部偏袒上柴“東方紅”，開始把不滿言論指向市革命委員會。從五月份開始，我們收集了好多有關“全向東”的言論，他的中心意思是：，上海市的政法機關對上柴“聯司”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必須改組負有領導責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批評“聯司”的做法。“全向東”又批評《解放日報》、《文匯報》是資產階級喉舌，是資產階級代理人，而且說上海政宣部門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裏，因為對宣傳工作不滿意就把矛盾扯到我頭上來了，當時我在市裏的排名在王洪文的前面，所以“全向東”在七月份提出一個說法：“徐景賢、王洪文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且鼓動一批群眾衝擊學生組織“紅三司”。比較嚴重的事件是有人放火焚燒西藏路的光明中學。雙方大辯論的時候，還有人把南京路上一輛同情上柴“東方紅”觀點的人駕駛的摩托車推翻，點火燒毀，不料被住在和平飯店樓上的外國人拍了照片，在國外報刊上登了出來。我看到了國外的報導和照片，很生氣，認為這樣做就是要搞亂上海。所以我當即下達指示，要《文匯報》、《解放日報》收集“全向東”和上柴“聯司”的言論，編成幾版報紙版面，加上批註，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裏發行，對“聯司”發起凌厲的宣傳攻勢。

## “聯司”和“阿東”形成兩大派

“聯司”受壓以後，提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口號。當時正值夏季，天氣炎熱，雙方就利用晚上乘涼的機會，在人民廣場設台辯論，支持“聯司”的和支持上柴“東方紅”（簡稱“阿東”）的辯手都很活躍。群眾去那裏觀看熱鬧，進場時有人首先要問你是支持“阿東”的還是支持“聯司”的？人民廣場上就像過去上海說唱“小熱昏”的架勢，搭起了舞台，每天晚上雙方對着幹，展開大辯論，熱鬧非凡。

當時上海勢力較大的是一批在市裏掌權的造反派，以“工總司”領銜，另一批是在野的造反派，“聯司”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還有“工總司”一兵團、二兵團、三兵團的一些下台的頭頭，曾經挨過整，還有學生組織“炮司”的一些人，“紅革會”的一些人，都受過打壓。於是各種各樣沒有掌握權力的造反派，在社會上借“聯司”的問題形成了一股力量。事實上，當時被打倒的“走資派”和“牛鬼蛇神”都不敢擠進這個隊伍去，“挺身而出”參加大辯論的人都打着造反的旗號，包括“聯司”也宣佈自己是造舊市委的反、造陳丕顯、曹荻秋的反的，他們的口號是：“市革命委員會必須改組！徐景賢、王洪文必須從市革命委員會滾出去！”，他們又從南京路市百一店高樓上掛下來幾條大標語，上面寫着：“打倒陳、曹黑秀才！”群眾一看，就知道是要打倒徐景賢的，因為我造反以前還在給原市委起草文件、代曹荻秋寫檢討報告。現在“聯司”就製造輿論，把我劃到陳、曹一邊去。

在六月份的時候，“聯司”在廠裏又搞過一次武鬥，還衝擊了上海市青年宮。市革命委員會為此發了一個《六·二九通告》，明確提出要制止上柴廠的武鬥，把“聯司”放在被告的地位上。“聯司”當然很不服氣。



1967年6月，上柴“聯司”在上海中百一店懸掛出大幅標語。

七月一日，王洪文決定由“工總司”出面聯合各個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開了一次大會，聲討“聯司”和支聯站。我與王少庸、馬天水、王承龍、王洪文商量，覺得“聯司”這樣搞下去，會把上海搞亂。因為各區、各系統的“支聯站”都紛紛成立，上海從此有可能分裂成為對立的兩大派，這是我們最擔憂的事情。所以我們贊成王洪文聲討“聯司”的行動。

《六·二九通告》以後，我們邀集上柴“聯司”和“東方紅”兩派的頭頭到衡山飯店談判，市革命委員會領導全去了。我記得，“聯司”的負責人楊仲池來了，他是一九六二年的清華大學機械系畢業生，分配到上柴廠後成為技術骨幹，現在是“聯司”的頭頭，“東方紅”的負責人也來了，但是“聯司”的代言人“全向東”沒有來。我們在會上提出的方針是：兩派在本單位辯論是可以的，但是雙方應該求大同、存小異，爭取聯合起來，而且不能發生武鬥，不能把另一派的人趕到廠外面去。那天雙方爭論不休，談判沒有結果。

那時，“東方紅”這一派在廠裏留不住了，住到外面。廠裏變成“聯司”一派了。局勢有一觸即發的危險，還可能發生

大規模的武鬥。市革命委員會的幾個領導商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決定再放下一次架子，登門去跟楊仲池談判，希望他們先讓“東方紅”的人回到廠裏，然後在廠裏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雙方要繼續抓生產，不能把生產停下來。

那天我們認為直接去上柴廠是相當冒險的，王洪文沒去，因為“聯司”對他意見很大，怕他去了會出事情。去的是我、馬天水、王少庸、王承龍四人，每人後面只跟一個警衛員。我們闖到“聯司”總部，楊仲池在那裏接待我們。當時楊仲池非常傲氣，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裏，一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居然敢於對市革命委員會持這種態度，從沒見到過。我們心裏很生氣，但都忍住了。楊仲池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錯在“東方紅”這邊，他們是正確的，指責市革命委員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一派，反對一派。但是最後他終於同意讓“東方紅”那一派回廠。

“東方紅兵團”的成員回廠不久，又出了一個七月十八日事件。因為雙方把大字報貼來貼去，發生了衝突，釀成武鬥。觀點傾向“東方紅”的工具車間工段支部書記解福喜在武鬥中被打死，矛盾馬上激化。王洪文抓住這個機會，七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廣場開了一個大型追悼會，追悼大會結束後，又舉行全市卡車大遊行，在第一輛大卡車的前面掛了一幅解福喜的大照相，企圖在全市造聲勢。

這時，“聯司”也發了一份備忘錄，為打死人辯解。我們請法醫做屍體解剖，屍體上傷痕纍纍，我詳細地看過屍體解剖的照片，我認為這個解剖是可信的，結論是武鬥重傷致死。但是在“聯司”的備忘錄裏，說解福喜是因疾病或者中暑而死。我當時覺得“聯司”的態度很不對，文過飾非，這個組織在武鬥致人死亡後還要抵賴，是完全錯誤的。

## 毛澤東從武漢來到上海

“七·一八”事件發生後，形勢急轉直下，導致八月四日上柴“聯司”的被砸掉。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砸“聯司”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應該和全國形勢的大背景聯繫起來加以考察。當時全國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即“七·二〇”武漢事件。毛主席當時在武漢，武漢的兩派矛盾激化。“百萬雄師”這一派得到了武漢軍區和司令員陳再道的支持，包圍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的住處。毛主席的住處正好在王力的隔壁。王力出去跟激動的群眾說話，群眾認為他支持另一派，把他打傷了。當時的中央擔心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很緊張，認為陳再道可能搞兵變，所以他和江青一起建議毛主席轉移到上海來。說來也巧，正當毛主席到上海的時候，上柴廠出了解福喜被打死的事情。中央認為毛主席在武漢的安全受到威脅，由周恩來總理到武漢緊急安排毛主席撤出。中央原來已經有過決定：為了保證安全，今後毛澤東外出不能乘飛機，所以他從北京到武漢時乘的是專列。但是這次緊急撤出時又乘了一次飛機，這是毛在一生中最後一次乘飛機，從武漢直接飛到上海。毛主席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兩點抵達上海的。這一天，人民廣場正好召開上柴廠被打死的解福喜的追悼大會。毛主席來後住在上海西郊虹橋路的“四一四招待所”（今西郊迎賓館），上海當時的重大任務，就是要確保毛主席的安全。

七月二十二日，河南發生大武鬥，江青在北京接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時，明確肯定了“文攻武衛”這個口號。當時林彪、江青都主張造反派要掌握武力，不僅要文攻，而且要武衛。林彪、江青後來把陳再道召到北京，進行批鬥，並在武漢把“百萬雄師”這一派壓下去了。

張春橋是陪同毛主席從武漢飛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

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的詳細談話記錄用文件的形式批轉給我，同時告訴我，這個記錄可以散發。我就把江青的談話印成傳單，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裏發行。我覺得當時中央的方針非常強調“文攻武衛”，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武。

毛主席到上海以後，七月二十三日，我們在人民廣場開了一個“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的大會，完全是針對武漢事件、河南大武鬥，包括針對上海上柴“聯司”和“支聯站”的。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通過他掌握的公安局楊浦分局，搞了一次秘密的突擊搜捕，把正在泰安路“支聯站”總部開會的“支聯站”頭頭二十五人全部抓獲，把其中的十四人送交市公安局關押，但“全向東”沒有到會，未能抓到。當時，游雪濤領導的秘密組織“掃雷縱隊”派人打進了“支聯總部”，掌握了他們的動向。所以，“支聯總部”是首先被解決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柴“東方紅”的隊伍全部撤出了工廠，為以後的“踏平聯司”創造了條件。八月三日，由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起草，經過我改定，經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發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致上柴‘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信》。市革命委員會是當時上海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權力機構給一個工廠的群眾組織的成員寫一封公開信，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我們當時認為對“聯司”已經仁至義盡了，找它出廠談判不行，上門去談判也不行，市政法指揮部又控制不住他們的行動，最後一招只有向他們的群眾寫信了。市革常委擴大會在討論這封信的草稿時候，也頗有爭論，比如“工總司”陳阿大堅決不同意在信中提“聯司”是群眾組織，主張一定要宣佈“聯司”是反革命組織。我說服他：“聯司”還是群眾組織，“聯司”的群眾我們還應該稱他們是“革命群眾”，

希望他們能夠起來與“聯司”的頭頭決裂。

《公開信》印成大佈告的形式，派專人直接送去上柴廠。當時的做法也很特別，由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派幹部乘着三輛大卡車，拿着公開信，還通知新聞記者、電影廠的攝影師一起去，看“聯司”怎麼應對。到了廠門口，“聯司”完全把市革命委員會作為對立面，不讓進廠，送信人就在車上用高音喇叭廣播《公開信》，結果“聯司”派人把高音喇叭砸了，把電影攝影機奪走了，打了攝影師，還把幾個送信的帶進去教訓一頓。三輛大卡車被砸，實際上是“聯司”中了我們設下的一個圈套：市革命委員會給你寫信，你居然敢於對市革會派出的代表動手，這說明“聯司”的問題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市裏對它採取進一步行動就有充分的理由了。

### 王洪文決定動手砸“聯司”

八月四日凌晨三點，王洪文在華山路八百八十八號召開“工總司”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對上柴“聯司”動手。我覺得要動手的話，一定要經過張、姚批准。我當時多次打紅色保密電話找張春橋，但他陪毛主席去了，不接我的電話。我把緊急請示告知他的秘書，秘書答應轉達，但張春橋始終沒有回覆。沒有他的批准，我是不敢下最後動手的決心的。估計是他有意不表態，讓王洪文出面放手去幹。

王洪文把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等找到華山路888號參加作戰會議，他們把楊浦區的地圖攤開，在上柴廠的周圍標出了很多作戰點，對廠房、倉庫、水塔、食堂，甚至上柴廠沿黃浦江周邊的區域，都作了詳細的作戰部署。因為怕“聯司”成員從黃浦江上轉移出去，特地從港務局調了幾艘巡邏艇，把江面封鎖起來。

部署完畢，王洪文已經等不及張春橋的批准令了。

王承龍作為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參加了華山路八百八十八號的作戰會議，他根據我們商定的意見對王洪文說：“這麼重大的行動要春橋、文元同志批准，我們還是等一等好。”

“不管了，動吧！”王洪文自己拍板了。凌晨，上海的各個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舉行誓師大會。會後，浩浩蕩蕩的隊伍乘着一千多輛卡車向上柴廠進發。

我記得，八月四日那天天還沒有亮，王承龍氣急敗壞地衝到榮昌路六十號市革會專題寫作組，緊急敲我臥室的門：“快起來！老徐，快起來！王洪文他們已經調隊伍打‘聯司’去了！”

我很着急，張、姚都沒有表態，怎麼辦呢？我趕到康平路辦公室，王少庸也被從睡夢中叫醒，我們只能面對現實。當時王洪文又下令從楊浦區大廠調隊伍，最初調四萬人，後來有些單位聽到消息就自己跑去了，加起來有十幾萬人。軍工路上塞滿了人和車，各種各樣的車輛載着工人，他們拿着鋼釘、鐵棍，戴着柳條帽，穿着帆布工作服。鋼鐵系統的造反派最先趕到上柴廠，充當了打頭陣的隊伍。在現場指揮的是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和王腓利。我讓王承龍一定要跟他們在一起，並下了一個命令：決不能打死人！我最擔心的就是武鬥死人。上柴廠解福喜一死，對“聯司”很不利；假如這次在打“聯司”的過程中，“工總司”這邊也打死人，事情就會更複雜化。我處理過一九六六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工總司”與赤衛隊大武鬥，只是傷人，沒有死人，後遺症就少些。所以我要王承龍帶去一條死命令：打“聯司”不能打死人！我和王少庸、馬天水沒有去上柴廠現場，我們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禮堂聽取消息。



王洪文他們在上柴廠週邊的工農新村，找了間有電話的房子作為指揮所。除了陸上包圍以外，還調來艦艇，從黃浦江上斷了“聯司”的後路。開始的時候，雙方都採取宣傳攻勢，打“心理戰”，高音喇叭對高音喇叭。最前沿的是幾十名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文攻”。外面對裏面廣播：“‘聯司’必敗！‘東方紅’必勝！”還策動“聯司”廣大戰士起來造“壞頭頭”的反；裏面對外面廣播：“‘工總司’鎮壓‘聯司’絕沒有好下場！”而且口號提得很策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階級不打工人階級！”王洪文聽了大為生氣，下令：“把裏面廣播喇叭的電源切斷！”有人立即通知供電局切斷廠區電源，結果裏面的喇叭不響了，外面照樣廣播。

“聯司”製造的彈弓威力很大，他們在廠部辦公樓屋頂平台上樹起一根根水泥柱子，繫上很粗的橡皮筋，用洋元（鐵棒）鋸成一段段鐵塊當子彈，像一段段胡蘿蔔塊，通過橡皮筋向廠外陣地彈射出去，射程很遠。這些彈弓像一挺挺機關槍，很具殺傷力。“工總司”戴立清在前沿指揮的時候，一塊洋元打到他胸前，把衣服口袋裏的鋼筆都打斷了。他後來告訴我這件事，我說：“幸虧鋼筆保護了你，不然，胸口肯定要受傷。”裏面發射的“子彈”把外面的高音喇叭也打壞了。外面有些人想衝進廠門口去動手，但裏面樓頂上守着很多人，不斷朝外扔石頭、鐵塊和自製燃燒瓶，甚至噴射鎂水和硫酸，使進攻者無法逼近。上柴廠的圍牆也很厚，一時難以突破，後來從外廠調來四輛二十五噸的大型吊車和鏟車，從側面撞牆，牆倒下以後，外面的隊伍衝了進去，開始了逐屋爭奪戰。“聯司”人員死守，進攻隊伍攻下了食堂、酸洗車間、鑄工車間、冷鍛車間，衝進了三十米高的金工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戰鬥十分激烈。

## 電影攝影師拍下砸“聯司”的全過程

上海電影製片廠一位姓殷的攝影師和我比較熟悉，他在隨市革命委員會代表給“聯司”送《公開信》時已經挨過打，對“聯司”有一肚子氣，這次他帶着電影廠“敢死隊”跟着最前面的隊伍一起衝進去，爬到廠內的制高點，用好幾部攝影機居高臨下地同步拍攝，把砸“聯司”的過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來。這就是後來製作完成後放給毛主席看的一部長紀錄片。

隊伍衝進去後，辦公區的一號樓、二號樓、三號樓很快就被佔領了，只剩下四號樓，是一幢多層大樓，也是“聯司”總部。他們在樓上搞了一套裝置，配備有鋼瓶，帶着噴霧器一樣的噴嘴，噴射強酸。他們為堅守準備的磚頭、石塊、鐵塊也很多。隊伍攻到四號樓，久攻不下。正在這時，旁邊的木模車間又失火了，大家一邊忙着救火，一邊繼續強攻。當時進攻者的武器只有鐵棍、長矛，槍倒是沒有發。攻勢很猛，四號樓裏的人終於抵擋不住，一層一層地由下往上撤退，最後退守到屋頂平台上，把上平台的樓梯封死。於是，進攻的人只能從牆外的落水管爬上去，爬到平台邊緣，守衛的人又將他們推下來。當時消息報來，我認為肯定已經跌死了好幾個人。每掉下一個人，王承龍就在現場給我打電話，我說：“完了，又死了一個！”

四號樓久攻不下，但旁邊木模車間的失火、救火，啟發了進攻者的靈感。正在現場的“消革會”（“消防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的司令吳大炮很起勁，很想在這場戰鬥中立功，他下面還有一個“義革會”（“義務消防隊員革命造反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在當時都是很有實力的。一聲號令，他們調來十七輛消防車，把四號樓團團圍住，長長的雲梯架上去，把四號樓屋頂平台包圍起來，準備用高壓水槍攻擊。誰知下邊把消防帶

接上後，高壓水槍裏的水卻放不出來，原來進攻前給高音喇叭停電以後，廠裏的水源也中斷了。消防隊趕緊從一千多米遠的一條河浜裏接水，雲梯上的多支高壓水槍(又名“大炮水槍”)就對着四號樓屋頂平台上的守衛者猛烈噴射，守衛者被一百多磅的水柱衝得稀利嘩拉，無法招架，消防隊員就乘機從雲梯上跳下去，在屋頂平台上舉起消防斧頭劈打。趁着守衛者混亂之際，進攻者們大批蜂擁而上，解決了最後一個據點。

工廠裏最高的煙囪上還飄揚着一面“聯司”的旗幟，進攻隊員又爬到煙囪上把它拿下來，這就象徵着攻堅戰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參加打“聯司”最賣力的是兩個廠的工人造反隊員：上海矽鋼片廠和上海鐵合金廠，後來這兩個廠成為上海“文攻武衛”民兵組織的基幹廠。當時，我關照在現場指揮的“工總司”戴立清，不能打死人，他在那裏指揮時一再提醒進攻者，不要打俘虜，但是實際上動手打的人很多。被俘的“聯司”成員，男的上身衣服被抓掉，赤身露體挨打。“聯司”的頭頭楊仲池也被抓到了，聽說是在地下室裏揪出來的。從電影鏡頭裏看，楊仲池被打得很厲害，雙手抱頭，口吐白沫，押送時一路上有人揪他的頭髮，拳擊他的兩肋，連在兩旁保護他的人也挨了打。整個戰鬥從上午十時左右發起總攻，到最後清掃戰場、押送俘虜，已是傍晚六點鐘了。

我最關心兩件事：第一，到底傷亡如何？死了幾個人？戴立清按我的要求一個人一個人清點，包括從屋頂平台上跌下來的，受傷送到醫院去的，清點下來他給我打電話說沒死人。我不相信，他說：“我已經點了兩遍了。我現在吃力得連路也走不動了，就是一個也沒有死。受傷是有的，還不少。”我想，如果沒有死人的話，對外、對上都好交待。“聯司”的“俘虜”當夜都被轉移到交通大學，我還是不放心，特地趕到那裏

去看過，多方打聽下來證實了確實沒有死人，終於舒了一口氣。第二件事情，我關心全部武鬥的過程拍下來沒有？我叫上海電影製片廠趕快把片子洗印、剪輯、整理出來，隨時準備調用。

### 毛澤東巡視上海並觀看砸“聯司”的紀錄片

當天深夜，毛主席在上海知悉了剛發生的這場大規模的武鬥事件，他便說要到外面看看。毛主席從虹橋路的“四一四”招待所，坐上一輛蘇聯造的鋼甲防彈轎車出發。這車原是斯大林送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吉斯牌，混身黑色，車身厚重，北京有好幾輛，上海只有一輛。毛主席到上海總是由固定司機開車，司機就是市委車隊隊長老劉。車窗上裝着厚厚的保險玻璃，車身用兩寸左右的厚鋼板做成，不要說手槍射擊，連機槍、手榴彈都打不進去。當時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對群眾是絕對保密的，轎車從“四一四”招待所開出，向鬧市區駛去，毛主席坐在後座，窗上有薄紗擋住，他可以透過車窗向外張望。

張春橋事後告訴我：毛主席的車子開到外灘時，曾被人家發現過。當時在毛的轎車前、後各有幾輛北京吉普負責保衛和開道，車隊開到一個路口，不知怎麼搞的，旁邊路上有一輛卡車突然插進北京吉普和毛的轎車之間。毛坐在轎車後座，可以看到前邊插進來的一輛卡車的後部，坐着幾個裝卸工人，他們居高臨下朝後張望，有一個工人發現後邊一輛轎車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趕緊同旁邊的人說了，還向轎車裏指指點點。同車的中央警衛局警衛人員緊張起來，馬上遞給毛主席一張報紙，假意讀報把面部遮起來。那幾個人萬萬沒有想到車上真會是毛主席，隔着保險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點吃不准，事後才沒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傳開去。張春橋後來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連連說：“好險，好險。”

毛主席的車在外灘黃浦江邊緩緩行進，當天參加武鬥的人還沒完全散盡，馬路上的車輛和行人很多。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大門口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鋼釘、頭戴柳條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原來在市革會大門口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反而並不顯眼了。毛主席的車慢慢繞過市革命委員會大門口，他這邊看看，那邊瞧瞧，目睹了這個經歷了一場大武鬥以後的城市夜晚的緊張情景。

第二天，張春橋通知我：“你趕快在電視台裏面播放昨天拍的片子。”電影紀錄片拍出來以後，電影廠已經連夜洗印、剪輯好了，我趕到電影廠去先審查一遍。影片長度為五十分鐘左右，完全是現場實錄：武鬥雙方門口對峙、彈弓射擊、鏟車撞牆、逐屋爭奪、噴射硫酸、失火救火、雲梯進攻、半空開戰、屋頂互毆……直至楊仲池被抓、毆打俘虜等等，全部過程歷歷在目，看得人驚心動魄。我佈置上海電視台當天晚上播出這部片子，把播出的時間告訴了張春橋，由張去轉告毛主席的隨從。後來，張春橋又通知我讓電視台播放過兩次，一共放了三次。張春橋對我說，毛主席通過電視觀看了這部影片，還稱讚雲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張春橋說，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興趣。

後來有的文章裏說，毛主席是不贊成上海砸“聯司”的，理由是毛主席回北京後，發表了在上海作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但根據我的瞭解，事實真相卻不是這樣的。毛主席看了砸“聯司”的紀錄片以後，我們都很興奮，王洪文因為指揮這次武鬥嘗到了甜頭，認為上海工人造反派很有戰鬥力，建議以上海矽鋼片廠和鐵合金廠民兵團為基礎，重建上海民兵組織，改名叫“文攻武衛”。當時我們認為文革以前上海的民兵路線是不對

頭的，不僅上海，全國也是這個情況，民兵沒有戰鬥力，用兩句話可以概括：“牆頭上的官，抽屜裏的兵。”所謂“牆頭上的官”，就是民兵幹部的名單都貼在牆上；“抽屜裏的兵”，就是民兵的花名冊都鎖在人民武裝部的抽屜裏，民兵難得訓練，打實彈的機會更少。張春橋則認為民兵都是“花架子”，沒有實戰能力。於是，他趁打完“聯司”這個機會，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主席回答：“武裝上海十萬工人。”

張春橋問：“可不可以發槍？”

毛主席說：“每人先發一根棍子。”

這是當時兩人的對答，張春橋向我們傳達的原話。有人刨根問底，對當時有沒有發棍子特別感興趣，實際上，建立“文攻武衛”組織的工廠裏都有鋼釘、鐵棍，磨尖了就變成人手一根的梭鏢，根本用不着逐級發棍子。棍子是沒有發，但是過了幾年還是給上海“文攻武衛”隊伍發槍了。

根據毛主席的表態，張春橋當時正式寫了一份重建上海民兵的請示報告，毛主席圈閱後，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都跟着圈閱，表示同意。上海民兵就改成了“文攻武衛”，人民武裝部也改成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王洪文就這樣當上了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的總指揮。毛主席視察了“八四”大武鬥以後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總司”調動三十萬工人武裝砸掉“聯司”全過程的紀錄片，他覺得上海的形勢和他剛離開的武漢的形勢大相徑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裝完全能夠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決心武裝十萬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這正好說明：毛澤東是完全同意和堅決支持上海打“聯司”的行動的。

## 砸“聯司”的實質是兩派權力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武漢的大局已經穩定。毛主席走的時候，不再乘飛機，而是從上海乘專列回去的。虹橋機場邊有一條專線，專列就停在這條線上，這條專線的外面是大圍牆，有鐵門可以把專線的入口封鎖起來。專線的月台和車門的踏步是平齊的，用不到跨步上車，適宜於老人登車。那天臨走的時候，毛主席很高興，讓所有的隨行人員，警衛、護士、醫生以及汪東興、楊成武、余立金、張春橋等，都圍在他旁邊，在車站上拍照留念。張春橋後來把這張照片拿給我看過，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所見到的張春橋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砸掉“聯司”後，北京和外地的紅衛兵對上海的反應很大，有些人公開支持“聯司”，指責上海“工總司”調動武裝血腥鎮壓“聯司”。八月二十日，張春橋到北京，在會上表態說：“‘聯司’要上海大亂，這樣的局面怎麼能夠維持下去呢？上海出動工人武裝砸掉‘聯司’是完全正確的。”張春橋敢於在北京的會上公開支持砸“聯司”的行動，說明他是摸到了毛澤東的底，他知道毛是支持這次行動的，所以才敢於出來說話。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已處於失意的在野狀態，所以他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同情“聯司”，這是從全國範圍的角度來觀察的。至於在上海，“聯司”和“工總司”的矛盾，更是在野的造反派和掌權的造反派的矛盾激化的表現，在支持“聯司”的隊伍裏，我曾經發現過戴祖強的弟弟，是“支聯站”的頭頭，而戴祖強是“工總司”一兵團的負責人，在上海“一月奪權”的時候，他曾要成立一個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和二兵團的耿金章相結合，另外成立一個政權，後來被王洪文砸掉了。戴祖強的弟弟就說他的哥哥是被壓

制的，所以他要支持“聯司”。其他像“紅革會”的某些人、“炮司”的某些人也支持“聯司”，因為他們在“一月奪權”中都是受壓制的，這正反映了當時的權力爭奪。

但我並不認為當時代表“聯司”觀點的人都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他們同樣擁護文化大革命，他們也打着“批判修正主義”、“打倒走資派”的旗號，也主張推翻上海市委，也高呼“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口號，只是因為他們在本單位、本地區的掌權問題上受到壓制，所以才四出串聯，和社會上各種各樣被打下去的力量結合起來，想用各種方法掌權，於是就出現了大動盪和大武鬥。奪權和反奪權，奪取權力後如何瓜分權力，這是上柴“聯司”問題所以爆發的深層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講過文革一年發動，兩年搞徹底，三年收尾。但搞到那時，反而天下大亂，違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他想要穩住大局，決不允許再天下大亂。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在視察全國時，也說過七、八、九月以後，全國的形勢要穩定的話。上柴“聯司”和各地一些在野的、沒有得到權力的組織提出“上海要第二次大亂”、“全國要第二次大亂”，肯定不符合毛當時的戰略部署。所以我覺得，如果把砸“聯司”與武漢事件、與毛澤東視察全國、希望穩定的設想聯繫起來，就比較容易理解這些事件的發生背景和發展脈絡了。



## 第十四章

# 我擅自發表毛主席最新指示

文革期間，我在上海分管報刊宣傳工作，闖過一個“大禍”：擅自決定發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凡是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經常通過發表最新指示，來直接指導全國的群眾運動。那個“最新指示”的發表，比之封建帝王頒佈聖旨，規模和聲勢可要大得多了：“最新指示”的發佈，往往利用現代化的通訊宣傳工具，先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全國聯播節目向全國廣播，然後由新華社向全國統發消息，第二天由各地報刊用大字全文登載，再由各單位組織全民學習。

“最新指示”的發表時間，往往選擇在夜間七點整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有的時候還事先發佈預告，讓基層單位組織群眾收聽、學習，有的地方還敲鑼打鼓地組織慶祝遊行。往往是播音員的聲音還沒有告一段落，喧鬧的遊行隊伍就上街了。還有些單位的兩派造反組織，為了表示自己這一派最忠於毛主席，在得悉晚上要發佈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消息以後，早早派人上街，在重要路段的醒目牆壁或標語牌上，糊上空白的準備寫大字標語的彩紙，書寫的人提了墨汁桶守候在旁邊。等到“最新指示”一廣播，馬上刷刷地用大字書寫出來，還張貼出“堅決落實毛主席指示不過夜！”“XX廠(學校)革命造反派最忠於毛主席！”等大標語，下面署上自己這一派組織的名稱。這也構成了當時一條獨特的風景線。

## 毛澤東在上海做出“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澤東在武漢小住，親眼目睹了“武漢事件”中的兩派衝突。當周恩來將他安全轉移到上海以後，他又看到了“八四事件”中上海“工總司”踏平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組織的全過程。毛澤東對各地分裂為兩大派的局面，感到憂心忡忡，於是他想發佈“最新指示”來推動大聯合了。

毛澤東在上海期間，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找張春橋、楊成武、余立金談過一次話，毛澤東特別擔心工人中分裂為兩大派的問題，他說：“一個工廠都是工人，為什麼分兩派，我想不通。”他對兩派工人大聯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這也是他目擊了“武漢事件”和砸“上柴聯司”事件後作出的思考。在接見時，張春橋向毛澤東彙報：上海交通大學有一個造反組織叫“反到底”，提出學校中兩派大聯合要以它為核心。毛澤東聽了說：“什麼核心？核心是實踐中群眾承認的，不是自封的。”說到這裏，毛澤東明確指出：“兩派群眾組織要無條件地實行大聯合。”

九月下旬，毛澤東要回北京去過國慶節。上海方面的領導人希望毛澤東能夠留在上海過國慶。毛澤東考慮：每年國慶都要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遊行隊伍，不便留在上海，決定打道回府。

毛澤東一走，他前一階段住在上海的消息就不用保密了。張春橋召開了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把毛澤東接見並和他們幾個人談話的情況作了傳達，重點傳達了毛對兩派工人大聯合和兩派學生大聯合的指示，想要進一步推動上海的某些基層單位兩派嚴重分裂的局面。

## 我同意文匯報刊登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九月二十四日晚間，新華總社發來了毛澤東在上海期間所

作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我想：這條最新指示第二天肯定要上報紙的頭條的，但為什麼只發了關於兩派工人大聯合的指示，沒有發關於兩派學生大聯合的指示？而當時正是北京、上海等地高等學校兩派關係緊張的時刻。這時，已經是深夜了，文匯報奪權後的負責人朱錫琪打電話向我請示：可不可以在明天的報紙上同時刊登毛主席關於學生組織大聯合的指示？他們的設想正合我意，我要文匯報排出兩個指示的清樣，由我審改並請示張春橋後再發表。時過半夜，我審定了文匯報送來的版面清樣，然後打電話向張春橋請示。但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張春橋，原來他也到北京去了，姚文元又不在上海，文匯報更是急等着開印。我頭腦發熱，心想：反正這兩條確實是毛主席在上海做出的指示，發表出來只會有利於促進大聯合，我就決定由我拍板，在清樣上簽字付印了。

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國的報紙都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關於兩派工人大聯合的那條指示，唯獨上海的文匯報刊登了兩條“最新指示”。在第一條指示下方，用特大字體印着：

毛主席又指示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是革命群眾組織，要無條件實現革命大聯合。

這真是文革期間上海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方面的“獨特創造”！

### 張春橋的批評和補救

過了幾天，張春橋回到上海，馬上找我：“你怎麼搞的？報紙刊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經過中央的鄭重討論，並且報給

毛主席審定，經毛主席同意後才能夠發表的。你怎麼隨便就把毛主席的話發佈呢？”我說：“毛主席的指示，是要促進大聯合嘛，我一時找不到你，就登報了，而且，‘無條件大聯合’是毛主席的原話呀！”他說：“你膽子倒很大。無條件大聯合，在談話中這樣說是可以的，但要形成文字，就應該更嚴謹：凡是聯合總是有條件、有原則的。”

張春橋雖然批評了我，但是口氣很婉轉，而且並沒有就這件事進一步處理我，反而保護了我。我想：因為這條指示就是他向我們傳達的，他也有責任。假如當時有人要整我的話，擅自發表毛主席指示的罪名可就大了！張春橋考慮了一下說：“現在沒有其他辦法，只好過幾天，重新請毛主席審定。”果然，到了十月九日，這條毛主席最新指示，經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整理，經毛主席審定，修改成為：

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原來指示中的“無條件大聯合”被改成“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然後把這條“最新指示”寫入北京日報社論，由新華總社再一次向全國發佈，悄悄地糾正了文匯報的提法。

闖了這個禍，我終於懂得：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從開始講話到發表，有一個不斷修改、不斷推敲、不斷完善的過程。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自己亂作決定，在報紙上隨便刊登聽來的“最高指示”了！

## 第十五章

# 毛澤東下達逮捕令

林彪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沙漠機毀人亡以後，毛澤東親自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的親信——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以及在浙江的親信——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這次抓捕行動是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去北京接受命令，並由王洪文、肖永銀副司令和我在上海具體執行的。所以我來介紹一下抓捕的詳細情況。

###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的一些政治動向

先說一下我們是怎麼知道林彪出逃的。一九七〇年八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們已經對林彪的所作所為打了問號了，但是既然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認為……”，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要領會毛澤東的意圖，要繼續根據黨章的規定，維護林彪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和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工作會議。會上，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對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五員大將的書面檢查所作的批示，非常震驚，感到毛的鋒芒是隱隱對着林彪的。雖然林彪沒有參加“批陳整風”會議，但是緊接着的一九七一年“五一”節毛澤東登上天安門的時候，林彪也隨着上了城樓。看來，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並沒有變化。所以，我們只能在暗地裏對林彪有所懷疑。

一九七一年初，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在從機場到招待

所的路上，張春橋仔細地觀察了上海的街頭情況。到了興國路招待所，他就把我找去，對我說：“我出了機場，車子開到新華路轉盤大草坪的地方，看到轉盤周圍還樹着一幅大標語牌，上面寫着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裏面還有‘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些提法，你想辦法叫人換掉。”他雖然沒有明指林彪，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上海不要再宣傳林彪了，特別是再版前言的這種提法不能再公開用了。因為毛澤東一九七零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就反對稱“天才”了。我當時不動聲色地通知長寧區委，把從機場到市區道路上的標語牌更新，不露痕跡地把四塊標語牌一起換掉，換成新的毛主席語錄。

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警衛員、空四軍派來的排長小邊，在看一本書，我順便問他：“你看的是什麼書啊？”

他說：“是空四軍軍部發的，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的講話。”

我說：“這我倒沒看到過，你給我看看。”我拿來一看，是林立果在空軍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用報告。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已經得知林立果是林彪的兒子，在空軍中是很有地位、很有影響的人物，既然有那麼一本書，我又敏感地聯想到廬山會議上某些人的活動，所以我就向警衛員小邊借這本書。

他有點為難，說：“這書是我們的軍內讀物。”

我說：“我看看，我也會保密的，不會外傳，三天後就還給你。”這書是白色封面，標題印紅字，標明是內部文件。我急忙看了一遍，覺得很重要，就給張春橋掛了一個電話，說是有急事要找他。我搞得很秘密，這件事連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

也不讓知道。到了興國路招待所，等何秀文把我引進張春橋辦公室，自己退出去以後，我才從包裹拿出這本書。張春橋一看，很有興趣，問我從哪裏來的？我說是空軍發的，人手一冊，他就把書留下了。過了一天，他很快就把書還給我，當時不加評論，沒有說一句話，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我們對林彪寵愛的兒子已作了一番研究。

當時江青等人表面上對林彪仍做出“和為貴”的姿態。一九七一年“八·一”建軍節前，江青特意給林彪拍了好幾張藝術照和生活照。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曾經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釣魚台看望江青。在她的大辦公桌上，看到江青拍的一些林彪的半身照。江青的辦公桌像打桌球的桌子那樣長，桌上放着一些照相冊，從這些照片中江青選了一張照片：林彪手捧毛澤東選集，翻開在看，江青給照片取名為“孜孜不倦”，用“峻嶺”的筆名將它發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期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上。試想，林彪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逃的，八月份全國性的畫報還在刊登江青給林彪拍的脫帽照片，林彪是禿頂，脫帽照片相當罕見，所以很引人注意。可見，當時江青等人還想和林彪搞好關係。

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我作為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參加討論修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八月，周恩來總理和張春橋兩人一起到林彪的住地——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向林彪彙報工作，而且還帶去了經毛澤東批准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請林彪閱閱以後，作為中央文件向全國下發。這一切舉動，在我看來，都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些人主動向林彪表示團結的象徵。當然，我完全沒有想到林彪等人已經在暗中策劃陰謀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澤東乘專列到湖北、湖南、江

西、浙江、上海等地南巡，找當地黨政軍領導談話、吹風，談到廬山會議有人搞突然襲擊，但仍然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毛澤東聲稱自己回到北京，還要找林彪談談，然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這些動作說明毛澤東對林彪的問題採取的是“冷處理”的方針。

### 周恩來通過許世友告訴我們林彪出逃的消息

毛澤東是九月十一日下午離開上海的，臨走前，找王洪文和許世友談話。走的時候，他誰也沒通知。有的文章中說，我們已經察覺了有人要謀害毛主席，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要強調的是，王洪文、我，還有馬天水，在毛澤東走了以後，特意到龍華飛機場送許世友回南京，當時王洪文好像鬆了一口氣，他已經幾天幾夜沒有合眼了。毛澤東和許世友一走，我們感覺到肩上的擔子輕鬆了，根本不知道有什麼陰謀正在策劃、醞釀之中。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關於毛澤東攝影畫冊正式出版的報導。這本畫冊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周年而編輯出版的，報導說：“這套照片中，有幾幅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親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貫徹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的光輝榜樣。”我看到這篇報導前，收到過新華總社攝影部發來的通知，附有這本攝影畫冊照片的詳細目錄和文字說明。我知道，這些照片的發表都是經過中央審定的，這是當時中央對外的公開口徑。

接着就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馬上發佈禁飛令，所有的飛機停航，包括民航客機在內，還通知陸軍部隊進駐機



場。當時中央沒有說什麼事情，只是命令進入一級戰備。王洪文和我也很奇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都聯繫不上，這樣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發生過。

過了幾個鐘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從南京打保密電話給王洪文：“剛才，總理給我打電話，要我通知你，你們那個姓王的上級的上級跑了！懂了嗎？”

王洪文拿着電話一聽，愣住了，沒有反應過來：“你再說一遍。”

許世友大聲地說：“你們那裏到廬山去開會的姓王的，知道嗎？”這樣說，王洪文明確意識到這是指王維國。

王洪文說：“知道，知道。”

許世友又說：“他的上級的上級跑了，現在聽懂了嗎？”

王洪文想：王維國是駐上海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的上級是南京軍區空軍，南空的上級是在北京的空軍總部，空軍司令是吳法憲，吳法憲在廬山犯過錯誤，給毛主席寫過檢討，開“批陳整風”會時，毛還嚴厲地批評過他，王洪文的領會是吳法憲跑了。

許世友很急，電話裏又不好說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問：“你聽懂了嗎？你聽懂了嗎？”

王洪文回答：“懂了，聽懂了。”

許世友掛了電話，任務完成。許世友是在南京軍區打的電話，沒想到我們會把南京軍區空軍作為空四軍的上級，這樣就差了一級。王洪文按照空軍的機制去想，只想到吳法憲為止。我們隨便怎樣都不可能想到林彪會跑了，聽了半天電話說“懂了，懂了”，結果還是沒有聽懂。

王洪文擱下電話，趕快跑到康平路我的辦公室找我。九屆

二中全會以後，張春橋、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詳細地敘述了許世友的電話內容，我們兩人又仔細地分析，結論還是：“吳法憲跑了！”

我說：“空軍司令調一架飛機很容易的，可能他飛走了。不過，他究竟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國內不象，總是朝國外跑。”

正當王洪文與我密談的時候，市委機要室送來一份絕密電報：《毛澤東攝影畫冊》暫不發行，特別提到第幾號、第幾號照片要刪掉。這本畫冊不僅在北京發行，還在上海製版印刷。我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畫冊目錄，一幅幅對照，一看，這些指令刪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說凡是有林彪出現的照片都要刪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驚：怎麼會是林彪呢？難道他跑了嗎？但是在沒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們都不敢指名道姓。

飛機停航以後，中央通知軍隊系統進入一級戰備。正好有一個朝鮮高級新聞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搭了一架安東諾夫24型專機飛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訪問毛澤東的故鄉韶山。禁飛令一來，朝鮮代表團走不掉了，怎麼對外解釋呢？外交部也說不出理由，就說改道走吧。我沒有辦法，只好讓市革命委員會外事組安排他們改乘火車到韶山去。

### 中央通知王洪文緊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要他馬上乘火車去北京。我們分析：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關係，可能涉及到廬山會議，最好不要讓王維國知道。同時，王洪文到北京去這件事要保密，儘量不告訴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們兩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當時康

平路大院的警衛由空四軍派來的處長李松亭負責，警衛員也都穿空軍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衛員們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會向王維國報告的。王洪文就叫秘書小廖把警衛員支開，然後叫從工廠調來的司機小常開一輛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門口，我和王洪文兩人悄悄地坐上車，到當時的北站。誰知道，我們剛剛進北站，還沒登上火車，就碰到市委警衛處的空軍幹部，他的家屬到上海探親，他到火車站去送行的，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蹤。

王洪文對我說：“這樣吧，你回去後索性開一個市委常委會議，名義是討論別的工作，會上你宣佈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線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佈置一級戰備，王洪文到小三線檢查戰備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開市委常委會，宣佈王洪文的去向。王維國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請假不來，說是病了。我估計他肯定從北京空軍那裏打聽到什麼消息了，他一個人究竟在幹什麼？打的什麼主意？上海的空軍部隊掌握在他手裏，我怕有什麼變故，就說：“我去看他一次。”我給王維國打電話，他說：“我身體不大好，正在家裏休息。”我說：“你生病了，我來看看你。”他推辭說你很忙不要來了。我說：“我很快就過來。”

我這是第一次到王維國家裏，他住在江灣軍部大院對面的家屬宿舍。王維國的妻子杜貴珍，原來在同濟大學工作，後來調到空四軍後勤部當副部長。一聽我要去，杜貴珍就在家門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樓的寢室，王維國躺在床上，見了我，欠着身子，很熱情地握手。王維國四方臉孔、中等身材，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那天他的方臉盤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時皺得更緊，顯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當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

問他：“維國同志，你的病情怎麼樣？”

他說：“肝臟不好，正在請中醫治療。吃了幾帖中藥，還不見好轉。醫生說我的肝臟裏面有毒素，規定我吃中藥時要忌口，什麼葷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點白粥，解除肝裏的毒性。”為了證實他的病，說到這裏，杜貴珍就端來一碗白粥給他喝。

說了一陣病情後，就把話題轉到形勢方面。

我說：“九月十三日，中央下達禁飛令，現在中央軍委部署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戰備，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情？現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級戰備命令後，到小三線檢查去了。你那裏情況怎麼樣？聽到些什麼消息？”

王維國是河北人，普通話說得很標準，他說：“沒有啊。我們的機場現在給陸軍接管了，飛機也停飛了，我打電話問北京空軍司令部，根本打聽不到任何消息，我們很納悶，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當然，我不能告訴他許世友給我們打電話的情況，我想摸他的底，他當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後才知道他早已經把兒子派到北京去通風報信去了。我們談了一陣子，我沒有把底交給他，他也沒有任何消息告訴我，我說：“你好好養病吧。”看起來，他現在還沒有什麼動作，我就告辭了。

###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國四方”

告別王維國，回到市委後，我等着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裏演了兩天獨腳戲，真是度日如年。九月二十日上午，我辦公室裏的紅機子電話響了，是王洪文的聲音，他說：“老徐，你趕快到常德路警備司令部來一下。”

我很奇怪：“啊？你怎麼已經回上海了？”

他說：“快來，來了再說。”我也感到很吃驚，王洪文回上海，連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進，直奔上海警備區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

我趕到常德路警備司令部，大院深處有一幢小樓，過去是陳毅的辦公室，現已變成警備區司令部辦公樓。我踏進二樓的司令辦公室，看見王洪文神色興奮，露出很得意的樣子，跟我握手的時候，說：“我這次到北京去，許司令也一起去的，這裏還有一位肖副司令。”馬上向我介紹南京軍區副司令肖永銀。“我和肖副司令一起從南京趕回上海。”我們坐下後，他從資料夾裏拿出一份文件，說：“你先看看”。

我一看，這是毛澤東批准下發的中央紅頭文件，文件的上方印着：

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逃出國的通知  
1971.09.18；中發〔1971〕57號  
毛主席批示：照發。

我趕緊認真地閱讀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現已查明：林彪背着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飛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同上飛機的，有他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及駕駛員潘景寅、死黨劉沛豐等。在三叉戟飛機越出國境以後，未見敵機阻擊，中央政

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隊立即對直升飛機迫降。從直升飛機上查獲林彪投敵時盜竊的我黨我軍大批絕密文件、膠捲、錄音帶，並有大量外幣。在直升飛機迫降後，林彪死黨周宇馳、于新野打死駕駛員，兩人開槍自殺，其餘被我活捉。

對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我讀完文件，很震驚，但也很興奮，連聲說：“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王洪文說：“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國四方’抓起來。許司令與我商量，請肖副司令到上海與我們一起執行這個任務。”“三國四方”是借用“抗美援朝”時期常用的稱呼。“三國”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撾，“四方”是因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兩方。一九七零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立果召開秘密會議，借用“三國四方”的說法，“三國”是指南京軍區空軍、上海空四軍、浙江空五軍。“四方”是指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騰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他們於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陽路少年科技站開過號稱“三國四方”的秘密會議，會後根據林立果的旨意，寫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紀要》中寫道：

“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

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導彈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 王維國、陳勵耘兩個人的經歷

毛澤東為什麼下令要把王維國、陳勵耘抓起來？這裏要單獨介紹一下這兩個人的情況。

王維國：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參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元氏縣獨立營指導員，遊擊大隊主任。一九四零年參加八路軍，歷任：一二九師政工隊學員，一二九師十一旅教導大隊指導員、營教導員，山西晉東獨立營副政委、五十四團副政委、團長，太行軍分區三十四團政委，中原野戰軍九縱七十三團團長、政委，豫西軍區警衛一團、警衛二旅四團、河南軍區警衛一團政委，河南軍區政治部青年部部長。解放後任空軍師副政委、政委，空軍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軍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間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晉升為大校、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委。

陳勵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歲在成都就讀於天府中學，就在中共領導下參加學生運動，一九三八年三月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三團排長、抗大總校文工團團長。蘇中軍區抗大九分校政治處組織股股長、政工隊政治指導員。新

四軍一師山炮團連指導員、營政委，新四軍一師政治部秘書。蘇浙軍區一縱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華東野戰軍六縱後方留守政治處主任、六縱十六師四十六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華東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長。華東軍區教導三總隊十四團政委，華東軍政大學五總隊政委，華東軍區教導總隊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軍航空兵航空師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軍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晉升空軍大校。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委。陳能說會道，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軍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分管公安系統。汪東興回憶說，陳勵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負責毛澤東在杭州住所的警衛工作。

王維國和陳勵耘都是跟着毛澤東轉戰南北的年輕將領，一九六九年當上九屆候補中央委員時都只有五十歲，可是因為他們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過林彪的單獨接見，又參加過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國四方”會議，會議確定王維國是上海地區的頭，陳勵耘是浙江地區的頭，把他們作為“骨幹力量”寫進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因此，毛澤東懷疑他們謀反，並且捲入“謀害”的陰謀，就下令立即把他們兩人抓起來，並命令這個任務由許世友和王洪文執行。抓捕措施由許世友叫南京軍區副司令肖永銀隨王洪文到上海後具體落實，確定抓捕方案。

我們在上海常德路警備司令部辦公室作了縝密的研究。肖副司令年近六十，精瘦能幹，頭髮有點白，一看就知是位身經百戰的將軍。王洪文介紹說他是管作戰的，肖副司令首先提議說：“先抓王維國，再抓陳勵耘，怎麼樣？江騰蛟在北京，由北京解決；周建平在南京，由南京解決。至於王維國、陳勵耘



怎麼抓法？我們商量一下。”

王洪文說：“怎麼抓，一定要穩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維國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剛剛去看過他，他說有病，正躺在家裏休息。但是我看他沒有什麼大病。我告訴他，你到小三線抓戰備去了。”

肖副司令說：“我從南京軍區保衛部只帶了六個人來，這次行動主要靠上海警備區的力量。但是我們不宜到空四軍軍部直接抓王維國，他在那裏有大量的兵力，很難動。”

王洪文說：“這樣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後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線去了，老徐，還是你打電話給他，比較自然。”我在市委分管意識形態和文教，與軍事不搭界，王維國不會懷疑我有什麼舉動。

我問：“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呢，還是哪裏呢？”

王洪文說：“還是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吧。那個地方環境比較隱蔽，便於埋伏力量。肖副司令，你看怎麼樣？”

肖副司令說：“好，我叫警備區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備區派一個連，佔領延安飯店(南京軍區的指揮所)的制高點，同時要動用兩個師，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灘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維國調動空四軍進攻。至於錦江飯店那邊，我會作全面部署的。”

我說：“那我打電話了，讓他下午兩點到錦江飯店小禮堂看文件，時間安排來得及嗎？”我們大家看看手錶，那時是上午十一點，蠻緊張的。

肖副司令說：“抓緊佈置，來得及的。”

接着，我們討論了具體的抓捕方案。錦江飯店是市委召開

重要會議的場所，小禮堂有兩個門，靠近小花園的前門是平時我們下車進會場的地方。我們讓王洪文的秘書小廖和我的秘書小張兩人守在小禮堂前門，王維國的車來了，就讓王維國進小禮堂，但是他的司機、警衛員不讓下車。小禮堂有個後門，靠東邊的馬路有個通道口，後門邊上悄悄地停兩輛軍用吉普，抓捕到王維國後，就把他架到軍用吉普上開走。小禮堂外面和錦江飯店大門口不設任何武裝人員，免得引起王維國的隨從和警衛員的懷疑。小禮堂裏服務員的房間裏，埋伏下南京軍區的保衛科長等人，等候王洪文向王維國等人宣佈了毛主席的命令，可以動手抓捕的時候，埋伏的人就衝出來。董副司令率領一個營的戰士埋伏在錦江飯店週邊和飯店大門邊上的小樓裏，嚴密警戒，以防不測。

部署部隊抓人的命令發出後，我當着王洪文和肖永銀副司令的面，拿起電話打給江灣空四軍軍部，直接找王維國。當時我心裏不免有些緊張，但說話的聲音儘量顯得平靜，我說：

“維國同志嗎？這幾天身體好點了嗎？今天中央來了一份絕密文件，規定由市委常委閱讀，下午我把文件帶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去，下午兩點請你來看文件，可以嗎？”

王維國也急於想瞭解中央的精神，趕忙回答：“可以，可以。”

我說：“那好吧，下午兩點，錦江小禮堂見。”就把電話掛上了。我是市委分管宣傳文教的書記，王維國根本沒有往武裝這方面想，對我很放心，他爽快地答應前來。

接下來，我們商量抓捕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的辦法。如果單獨通知陳勵耘到上海來，肯定會引起懷疑，最後決定，還是由我打電話給浙江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軍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省委書記陳勵耘一起來上海看中央重要

文件，而且說整個華東地區只有一份文件，規定由省委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親自閱讀，要他們立即趕到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來。

我和南萍比較熟，他回答我說：“接了電話，叫上陳勵耘，儘快出發。”他還告訴我，走海邊的一條公路比較近，大概五個小時後到上海。

這樣，抓王維國和抓陳勵耘在時間上正好錯開。兩個電話打完後，王洪文和肖副司令認為通知抓捕對象這一方面已經落實，決定兵分兩路：肖副司令留在警備區司令部指揮部隊，王洪文和我兩人趕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和抓捕對象直接見面，實施抓捕。

時近中午，我們匆匆吃了點飯，就趕到錦江飯店。這時下午一點還不到，飯店大院裏特別沉靜。北樓附近馬路上有些人在走動，南樓和小禮堂前面的花園裏根本沒有人影。但是我們知道，周邊的小樓上已經隱藏着許多雙眼睛，正在注視着小禮堂附近的一舉一動。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我們的秘書小張、小廖等候在小禮堂前門，專門迎接王維國，同時安排駕駛員和警衛員留在車上。一切佈置就緒。

我和王洪文進入錦江小禮堂。小禮堂有七、八百平米，鋪着紅地毯，兩面都是落地長窗，垂着半透明的絹絲窗簾，禮堂深處有一個供作報告和小型演出的舞台，小禮堂內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據需要任意移動，毛澤東曾在這裏多次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有時候晚上在小禮堂看文藝演出。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曾在這裏簽訂過《中美上海公報》。

今天，我們在動手之前，把小禮堂的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張沙發，三張沙發向外朝着門口，三張沙發向裏朝着舞台，中間的一張是雙人沙發，兩邊各放一張單人沙發，

沙發前各放一隻茶几，茶几上放了幾個玻璃煙缸。兩組沙發之間的距離只有兩三公尺。王洪文和我坐在面朝門口的雙人沙發上，整個小禮堂裏就我們兩人，靜靜地等候王維國的到來。

王洪文把資料夾放在茶几上，夾子裏放着毛澤東批准下發的一九七一年第五十七號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王洪文點了一支煙，對我說：“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對王維國、陳勵耘進行隔離審查外，還談了今後要抓緊抓好華東地區林彪事件的專案工作。周總理在確切知道林彪機毀人亡以後，在人民大會堂大叫拿酒來，跟中央的其他領導幹了好幾杯茅台酒。”

因為等人，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臨近兩點，我們便不再說話，空氣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煙缸說道：“等一下王維國要是拔槍的話，我們就用這東西砸他。”聽他這麼一說，我的心情格外緊張起來。

### 王維國首先束手就擒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二點，王維國的車準時到達錦江小禮堂，我們的秘書把他引進小禮堂的頭道門，王洪文和我坐在小禮堂裏，面朝着二道門，這是兩扇拉門，門上掛着絲絨的門簾。絲絨門簾撩開了，我們看見身穿空軍軍裝的王維國走進來了。他一見王洪文，顯得很意外，走上前來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說：“洪文同志，回來啦。”

王洪文說：“是啊，是啊。”順勢請他在我們對面的沙發上坐下，“這次我不是到小三線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因為要保密，所以對外說我到小三線去了。現在我帶回來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說完，王洪文就把文件遞給他。

此時，王維國把手伸進上衣的口袋裏，我以為他要拿什麼

東西，心裏格登了一下，他摸出一個眼鏡盒，戴上老花眼鏡看文件。禮堂裏的空氣顯得異常緊張，我們兩人盯着王維國，看他有什麼反映。王維國拿起文件，第一頁就看到了林彪在九月十三日乘飛機出逃，叛國投敵、機毀人亡的消息。王維國的臉色由黃變灰，兩條眉毛緊緊地蹙起來，神色緊張，手拿着這幾頁薄薄的文件，微微顫抖，看完一遍，還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又回過來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計時間差不多了，問他：“看好了吧？”王維國說：“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這時候，王洪文很嚴肅地說：“王維國，現在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對你實行隔離審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問題。”

王洪文的話音剛落，王維國身後的絲絨門簾又撩開了，悄悄走進三個人，他們是南京軍區保衛部李部長等人，他們走到王維國的身後。王洪文宣佈完畢，王維國沒有顯出特別驚慌的神情，好像逮捕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來，南京軍區的兩個幹部一邊一個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個搜他的身，看看有沒有武器。他們沒有用槍對着他，也沒有上手銬，王維國一言不發，任憑他們檢查。檢查完畢，幾個軍人用手一夾，推着他朝舞台旁的後門走去。在後門外面的過道馬路上，停着軍用吉普，他們把王維國往車上一送，軍用吉普飛快地把王維國轉移到一所事先準備好的地下室，根本沒有驚動小禮堂前面的人。王維國的司機和警衛員還在那裏說說笑笑，等了很久，才被安排走。

王維國的問題解決了，王洪文和我兩人都鬆了口氣，這時候，掉過頭來再給浙江省委打電話，問他們出來沒有。省委辦公廳說，南萍、陳勵耘早在中午十二點多就乘小轎車從浙江杭州出發，估計五點多鐘可以到上海。

在等候的過程中，下午三、四點鐘，王秀珍來了，原來她

是到錦江飯店北樓接待外賓的，一看王洪文和我的車都在，就找到小禮堂。因為她也是市委書記之一，王洪文就告訴她到北京去的情況，同時給她看了中央文件，王洪文還對她說：“我們已經把王維國抓起來了。等一下還要抓陳勵耘。”

她一聽，非常好奇，又很緊張，說：“我留下來看看，好嗎？”王洪文跟她關係比較近，說：“好吧，好吧，你就留着吧。”這樣，在小禮堂裏等候陳勵耘的就變成三個人了。

### 陳勵耘的車掉到海裏去了

我們在小禮堂裏一面聊天一面等人，等到傍晚六點鐘，還不見杭州的車來。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或是抓王維國的消息捅到杭州去了？我們要秘書一再打電話給浙江省委，那邊回話說也沒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擔心出事情，就叫市委警衛處派人開車沿着滬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等到晚上七點鐘，只聽外面嚷起來，“來啦！來啦！”

門簾撩開，走在前面的是瘦瘦的穿陸軍服裝的南萍，後面則是高頭大馬的穿空軍服裝的陳勵耘。陳勵耘走進來，一面跟我們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車掉到海裏了！”只見他提着藍色的褲管，褲腿上沾着泥漿水，還水淋淋地往下滴着。

南萍是二十軍政委，又是浙江省的一把手，說話文縷縷的，忙着給我們解釋：“我們想趕路，車開得太快，從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處地方是急轉彎，路旁有標誌，但司機沒有看清楚，沒打急轉彎，車子就開到海邊的泥塘裏去了。”

陳勵耘說：“今天真是不順利，欲速則不達！後來我們沒有辦法，從泥漿裏爬出來，讓農民來拖車。拖了半天也拖不上來。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幾輛拖拉機才把汽車拖上來。”

王洪文說：“怪不得，多等了你們兩個鐘點。請坐，請

坐。”兩人就在對面的大沙發上坐下。

陳勵耘不但長得高，皮膚也黑，我們平時開玩笑地說，他就像京劇《沙家浜》的唱詞裏所唱的那樣：“像座黑鐵塔”。他走起路來兩條腿叉開，一搖一擺，頗像一頭企鵝。他是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文化水準比較高，在中央開會時做紀錄很詳細。每次中央開會，上海由我作記錄，浙江由他作記錄，南萍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他們兩人的紀錄在南京軍區算是比較好的。當時，中央開會，要詳細記下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有三份紀錄是比較好的，一份是南京軍區政委杜平記的，一份是浙江省他們兩人的記錄，一份是上海我的記錄。凡是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大家紀錄完後總是互相核對，核對出一份標準紀錄，再帶回去傳達。

當時在陳勵耘任政委的空五軍有幾個笑話流傳，而且流傳很廣。有一次，林彪給浙江空五軍送了一筐桔子，林彪經常會給比較親近的部隊送禮物。軍部機關領導特地召開誓師大會，慶祝林副主席送來了“幸福果”，然後把這一筐桔子一層一層地分送下去，軍到師，師到團、營、連，層層開會表忠心。有一個師的政治部，分到一個桔子後，由政治部主任召開誓師大會，正好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去了，沒有參加大會。大會結束後，政治部主任把分到的那個桔子恭恭敬敬地捧回來放在桌子上，他還要考慮這麼大的機構，下面人那麼多，這個“幸福果”怎麼吃法？還沒有考慮出一個辦法，他臨時有事離開了辦公室。

正好這個時候，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回來了，他又累又渴，看到政治部主任桌上的桔子很大很解渴，拿來剝開三口兩口就吃光了，把桔皮扔在桌子上。過了一會兒，政治部主任回來，一看“幸福果”沒有了，大吃一驚：原來進了副主任的肚子！這下主任叫苦不迭：“剛剛開過誓師大會，你吃掉的是接班人

林副主席送來的重要禮物，闖大禍了！”難道再開一個大會作吃掉了桔子的檢討嗎？副主任也緊張了，這下真倒楣了，可能還要撤職呢。正發愁時，主任一看桔皮還在，靈機一動想出一個辦法，趕緊叫伙房把桔皮泡在大缸裏，燒了一大缸桔皮茶，裏面多放幾斤白糖，讓全體幹部戰士都來喝上一杯“幸福果”茶，這樣，總算讓大家嘗到了副統帥送的禮物的滋味，也給副主任解了圍。不過，最後副主任還是認真地寫了檢討。

為這件事，有人專門寫了一副對聯，活龍活現地作了描寫和諷嘲：“副主任獨吞幸福果，政治部分享桔子皮。”橫批是“嘴饞遭禍殃”。這個和陳勵耘有關的空五軍的笑話流傳很廣。

還有一個笑話，也是關於送禮的。林彪給浙江部隊送了一盒他湖北家鄉的土特產——麻片糕。也是同樣的問題，僧多粥少。分到麻片糕的軍事單位，就把大家集合起來，圍桌而坐，把麻片糕掰成一小塊一小塊，保證每人有一小片。記得當時有一部蘇聯影片《一個人的遭遇》裏，著名演員邦達爾丘克演的蘇軍俘虜，到德軍司令部去得到一個白脫麵包，回到俘虜營後幾百個俘虜看到一個麵包，嘴饞得不得了，也是大家圍坐着，把麵包分成很小很小的一塊塊，分而食之。但現在部隊面對林彪的禮物時不是為了嘴饞，而是為了表忠心。所以大家在吃麻片糕時，還有一套很繁複的程序，一面吃糕，一面發言，輪流表態：“感謝林副主席對我們廣大指戰員的最大關懷、最大鼓勵、最大鞭策！”等等等等。

此刻，在錦江飯店小禮堂裏，陳勵耘和南萍坐在沙發上，顯得很累。陳勵耘點了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王洪文對他們講了最近到北京去開會的事，特別提到有份中央文件帶了回來，說着他把中央文件遞給南萍，南萍在看的時候，陳勵耘把頭也湊過去，兩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陳勵



耘拿煙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夾着香煙的煙灰燒得很長都不察覺。文件的內容，對他來說確實是驚人的消息。等他們看完文件，還未吭聲，王洪文就宣佈：“陳勵耘，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現在對你實行隔離審查！”與此同時，南京軍區的幾個幹部也走到他身後。陳勵耘有個特別的動作，當他聽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兩隻手舉起來，做了一個投降的姿勢，神態非常沮喪，站起來就隨着南京軍區的幹部從小禮堂後門走了。

整個過程還算順利，抓捕陳勵耘後，已是晚上八點多了。王洪文請南萍到錦江飯店北樓吃飯，我和王秀珍兩人作陪。王洪文告訴南萍：“這次我們接到命令抓王維國和陳勵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穩定下來，至於空五軍的工作，叫白軍長主持。”正在說話的時候，警備區董副司令來報告說：“王維國和陳勵耘兩人已被安全押離上海，送到南京軍區在一座山裏開挖的坑道裏的地下室，看押起來。為了安全起見，一路上給他們頭上蓋了一條軍毯。到了目的地，給他們吃了晚飯，王維國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肉絲菜湯麵。”

### 王維國、陳勵耘的最後命運

在王維國、陳勵耘被抓捕的同時，“三國四方”的其它幾個人，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周建平在南京被抓捕，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原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在北京被抓捕。這樣，參加過上海“三國四方”會議的幾個人全部落網。九月二十四日，根據毛澤東的命令，由周恩來親自出面，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四人實行抓捕，把他們關押於北京衛戍區駐順義的部隊裏。毛澤東接着又下達了一道命令：全國的林彪專案由周恩來總負責，華東地區的林彪專案由許世友、王洪文負責。這以

後，一場全國範圍的批林整風運動以及清查林彪餘黨的工作就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

至於王維國和陳勵耘兩個人的最後命運，取決於一九八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的判決。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王維國在被關押了十多年以後，軍事法庭認為：王維國積極參與林彪集團策動武裝叛亂的犯罪活動，參與林立果指揮的“上海小組”，並根據林立果的旨意組建“教導隊”等武裝和試製七.六二毫米輕型衝鋒槍，積極為林彪策動武裝政變服務，參加《“五七一工程”紀要》在上海召開的建立武裝政變指揮班子的秘密會議，並被林立果指定為上海的“頭”。在林彪下違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後，積極參與策劃在上海謀殺毛澤東的活動；謀殺計劃失敗後，又將毛澤東在上海的談話內容和離開上海的情況密報周宇馳，促使林彪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據此，王維國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被開除黨籍，一九八二年二月被開除軍籍，一九八二年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策動武裝叛亂罪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刑滿釋放，讓他回到他妻子杜貴珍的原籍河南省安置，一九九三年病故。

陳勵耘的處理比王維國稍輕一些，先後被關押在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進過秦城監獄，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決定免於起訴，一九八二年五月按一般幹部退出現役。給陳勵耘的免於起訴書內容如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免予起訴決定書

〔82〕軍檢免字第10號

被告人陳勵耘，男，現年63歲，四川省成都市人，漢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

產黨，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五軍政委。因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於1971年9月20日隔離審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陳勵耘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偵查終結，於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請起訴。經本院審查，確認被告陳勵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林立果根據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在“準備階段”建立“指揮班子”的“實施要點”，召集《紀要》中確定的指揮班子成員陳勵耘、南京軍區空軍原政委江騰蛟、空軍第四軍政委王維國以及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在上海岳陽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開會。會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于新野專程去杭州接陳勵耘。陳在于新野陪同下，於3月31日晚趕到上海參加了會議。會上，林立果指定陳勵耘為杭州的“頭”，陳勵耘接受了委派。以上罪行，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告供認不諱。

被告人陳勵耘積極追隨林彪，參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已構成參加反革命罪。鑒於未發現被告人陳勵耘參加“上海會議”後有新的犯罪活動，罪行較輕。根據《刑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決定免於起訴。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七日內向本院申訴。

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免予起訴”的陳勵耘已被關押了十年有餘，獲釋以後，他被安置在浙江嘉善，與他的老伴共度晚年。

## 第十六章

# 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奉調從上海去了北京，毛澤東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毛的本意是想讓王洪文讀後有自知之明：以一個普通工人造反起家，當上了中共中央的重要領導，不要學漢朝農民起義軍中的放牛娃劉盆子，即使僥倖被選中當了皇帝，仍然不務正業，終日嬉戲，最後以失敗下台而告終。

無獨有偶，毛澤東又曾要姚文元讀《舊五代史》中的《唐書》列傳《李襲吉傳》，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 姚文元佈置朱永嘉標點《李襲吉傳》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後，特別是一九七零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後，陳伯達下台，姚文元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內負責分管宣傳工作。他經常給上海市委寫作組下達重要任務：為毛澤東選看的古文做好標點和注釋工作。一九七三年七月間的一天，姚文元要求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單獨為他標點一份古文，那就是毛澤東要姚文元讀的《唐書》中的《李襲吉傳》。朱永嘉找了一下《二十四史》，在《舊五代史》卷六十的《唐書·列傳第十二》，是為士人李襲吉立傳的。當時《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尚未完成，這一篇還未及標點。朱永嘉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專門研究古代史中的明史的，一九六四年就調到市委寫作班來，參與過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深得姚文元的信任。所以姚單獨向他佈置任務，要他把這篇《李襲吉傳》做好標點，交保密印刷廠排印出來，只送姚文元

兩份，不得給其它人。

李襲吉何許人也？為什麼毛澤東特別要姚文元專讀他的傳記呢？

李襲吉，唐朝末年黃巢起義時的讀書人，自稱是宰相李林甫的後代，父親李圖曾任河南洛陽縣令。動亂起後，李襲吉等一批士人逃難到了山西，投靠了後唐的國君武皇李克用。李襲吉被任命為李克用的秘書班子的負責人。

《唐書》本傳對李襲吉的才識和文章多所稱頌：“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為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

當時，武皇李克用和實力更大的朱溫有矛盾，武皇命大秘書李襲吉修書給朱溫。李襲吉寫了長長一篇宏文，和朱溫辯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朱溫看了不但沒有生氣，反而欣然而起，贊曰：“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連武皇的對手朱溫，讀了李襲吉的文章，也大加讚賞，認為自己如能得到這樣的“大秀才”輔佐，真是“如虎添翼”了！

這些情節，在《唐書·李襲吉傳》中有着詳細的描寫。

當年因為姚文元作過關照，朱永嘉一直不敢把這件事告訴我。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朱永嘉才找出《李襲吉傳》給我看，並介紹了姚文元佈置標點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我和朱永嘉一道讀了《李襲吉傳》，又和他作了幾次議論。我們兩人一致認為：毛澤東要姚文元讀這篇文章，寓意是對姚文元的肯定和褒揚，不同於毛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寓意是提醒和告誡。

### “反右英雄”姚文元自覺地做毛澤東代言人

回顧毛澤東和姚文元的關係，可以看出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並非偶然。

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讀了姚文元評論作家姚雪垠的文章，就打聽姚文元是什麼人，並稱讚他的文章“我看是不錯的”。

之後，姚文元獲得了進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殊榮，聆聽了毛澤東在大會上所作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文章《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批評《文匯報》刊登毛澤東在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時對版面編排處理不當，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後立刻以此為契機，下令《人民日報》加以轉載，並要《人民日報》以“本報編輯部”的名義在頭版刊登《〈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公開點名批判《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擂響了反右派鬥爭的戰鼓。

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以後，姚文元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連續寫了五十多篇“反右”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報刊，他用“鐵筆”橫掃了施蛰存、許杰、徐中玉、流沙河、王蒙、鄧友梅、劉紹棠以及馮雪峰、丁玲、艾青等一大批作家，成為全國聞名的“反右英雄”。

由於姚文元在文壇上賣力地推行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終於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一九六五年，江青受毛澤東的委託，在上海物色了姚文元撰寫文章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奏響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這篇批判文章經毛澤東親自審定後在全國發表，為摧垮北京市委立了頭功。其後，姚文元又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寫出了批判北京市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文章的題目原名為《評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毛澤東在審定時把三個

形容詞圈去，定名為《評“三家村”》，射出一發打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重磅炮彈。

由於姚文元一貫搞極左，在評論文章中揮舞棍棒整人，上海文藝界的一些人士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棍子”。可是江青知道後卻反其道而用之，讚揚姚文元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姚文元為此洋洋自得，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姚文元在自己的日記裏記下了江青的一句活，說要用他這條“棍子”“參戰十年”。

姚文元由此青雲直上，就像《唐書》所述文士李襲吉在武皇李克用身邊做秘書一樣，姚文元被調到北京，提拔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幫助毛澤東執掌輿論大權。姚文元從此更為自覺地成為毛的代言人。凡毛澤東有重要指示，姚文元就親自撰文或組織媒體全力宣傳。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對抓“五一六”分子作出了指示，姚文元就撰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向全國傳達毛的旨意。一九六八年，毛為了要穩住全國的動亂局勢，決定向上層建築各個領域派出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姚文元又親自撰寫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闡述毛澤東此項決定的重大意義。這些文章都深為毛澤東所欣賞，姚文元在中央主管新聞宣傳的地位也就愈來愈鞏固。

**毛澤東說：“為什麼不到《紅旗》去奪陳伯達的權？”**

據姚文元告訴我，毛澤東對原來主管宣傳工作的陳伯達日益不滿，特別是中共“九大”以後，毛澤東認為陳伯達不能領會他的思想，決定走馬換將。毛澤東對姚文元說：“你為什麼不到《紅旗》去奪陳伯達的權？”這樣，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姚文元取代了陳伯達，執掌了《紅旗》雜誌的編輯大權。當時，《紅旗》是黨中央的機關刊物，也就是毛的喉舌，誰主

管了《紅旗》，誰就可以左右全國的輿論。一九六八年，姚文元掌管了《紅旗》雜誌以後，特意請示了毛，指定由我和朱永嘉、王知常、蕭木四人為《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的成員，幫助他出主意，擬選題，辦好刊物。

姚文元在主管《紅旗》的過程中，對毛的指示言聽計從，令出必行，跟得十分緊密。每期《紅旗》的選題計劃，都要送給毛審查圈閱。毛要看什麼古文，均由姚文元直接下達給上海市委寫作組標點、注釋，並在上海中華印刷廠設立了一個特殊的排字車間，專門替目力不濟的毛澤東排印出大字本，然後通過姚文元轉呈上去。張春橋和姚文元還曾多次按毛的要求編出馬、恩、列和毛的專題語錄，經過毛批准後下發，宣傳“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宣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對會寫文章的張春橋、姚文元兩個人是很看重的。張春橋對我說過：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主席就講自己要讓中將不再受壓，讓小將不再受苦。張春橋解釋說：“中將”是指他張春橋這樣年紀的人，“小將”是指姚文元這樣更年輕的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澤東又一次提出要限制商品制度和工資制度，他說“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他指示要春橋、文元寫文章，“使全國都知道”。張春橋遵命寫了一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姚文元寫了一篇《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送給毛澤東審查後發表。毛在審閱他們的文章時，像一個老塾師替學生批改、評點作文那樣，在兩篇文章的題目上方一連畫了幾個圈，以示欣賞。姚文元個別對我說：“主席在我的文章上畫的圈比春橋還多一個。”說時流露出暗自得意的神情。

## 姚文元成為文革時代“李襲吉”



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口述回憶：“毛主席對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當時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記得十大後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曾經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們，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裏的一些碧綠的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他們的生長一樣。”（見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一書）

由此可見，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正是對他寄託着一種信任和鼓勵。武皇李克用稱讚“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為文精業練實，動據典故……辭理宏健”，何嘗不是毛澤東對姚文元作出的評價呢？

毛澤東還借《李襲吉傳》對姚文元提出了希望，正如他希望姚文元等人像菜地裏碧綠的蔬菜那樣成長：“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惟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於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

姚文元當然是讀懂了毛澤東的心意的，他在毛澤東身邊搖筆桿子搖了整整十年，正應驗了他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日記裏記下的江青的話：用這條“金棍子”“參戰十年”。十年中，他兢兢業業，事事請示，掌控媒體，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要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專政”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他自己也終於從“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成為毛澤東對中國人民實行思想統治的“輿論總管”。毛澤東的其它幾位大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最後都離開了毛，獨有姚文元堅守在毛的身邊。

姚文元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希望，所以能始終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成為文革時代的“李襲吉”。

## 第十七章

# 近距離接觸姚文元

我和姚文元的關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輿論準備階段，通過上海市委寫作班的“共同戰鬥”，變得密切起來的。

### 毛澤東肯定了姚文元和他的寫作班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中介紹說：“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子）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江青的講話中，原來沒有“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子”這句話，講稿在送給毛澤東審閱的時候，是毛特意加上去的。這件事，姚文元對我說過不止一次，意思是讓我記住：毛主席很關心上海市委寫作班，知道這個班子和姚文元的密切關係，並且肯定市委寫作班在文革輿論準備階段所起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我當上了中國共產黨“九大”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我主動去和坐在前排正中座位上的毛澤東握手。毛澤東不認識我，問道：“你是哪裏的呀？”張春橋趕緊從自己的主席團座位上趕過來，向毛澤東介紹說：“他叫徐景賢，上海來的，就是姚文元那個寫作班子的支部書記。”毛澤東“哦”了一聲，顯得很高興，親切地握住我的手；我趕快代表上海的同志們向毛澤東致意。

毛澤東提到的寫作班子，當時實際上是上海市委的喉舌，也是為毛發動文革製造輿論的工具。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接受了撰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秘密任務，來到我們市委寫作班。寫作班的地點先是在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和華東局《內部文稿》（我們稱為“內刊”）編輯部合署辦公。姚文元兼着“內刊”文學組的組長，有他自己的辦公室，不要求另外安排，只要求寫作班歷史組為他收集《明史》及其他古籍中有關海瑞的資料。

後來，“內刊”搬到宛平路後，寫作班搬到武康路二號，那是一幢前面有着一片小花園的三層樓洋房。我就為姚文元在武康路二號小樓的二樓北部，安排了一處隱秘的房間。房間約十五平方米，裏面安置了一床、一桌、一椅，平日鎖着門，寫作資料都堆在辦公桌上，他有一把鑰匙，我有一把鑰匙，別人都進不去。房間的斜對面，就是為他準備明史資料的寫作班歷史組（“羅思鼎”小組）的辦公室，他可以隨時過去和歷史組成員朱永嘉、吳瑞武、王知常和朱維鏗（調來寫作班前均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交流討論。

說來真巧，歷史組的組長、胖胖的朱永嘉，正是研究明史的。一九六四年冬，《海瑞罷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來上海，通過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的介紹，在錦江飯店會見了朱永嘉，對朱研究明王朝覆亡這一段歷史時的若干觀點，很是欣賞，表示願意收朱永嘉為學生，做他的“關門弟子”。

姚文元對我在市委寫作班為他安排的寫作環境很滿意，他有時躲在宛平路十一號的華東局“內刊”辦公室寫文章，有時就到武康路二號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和討論問題。

## 我與姚文元的交往

說到我和姚文元的關係，還得追溯到一九五四年，當時我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處長丁景唐要我關注工人文學創作活動。我們在江西中路建設大廈市委三樓會議室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找一些平時寫評論文章的人，一起來討論工人文學創作中的一些問題。姚文元當時在中共盧灣區委宣傳部工作，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評論文章，我們就把他請來了。他頭戴一頂藍布鴨舌帽，身穿一套藍卡其中山裝，腳上穿着一雙黑色的圓口布鞋，肩上掛着一隻草綠色的軍用背包，張嘴一笑就露出半顆殘缺的門牙。從此我們就相識了。他曾告訴我：他的門牙是小時候和同學一起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在奔跑時不慎撞斷的。文革期間他去了北京，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才把門牙修補好了。至於他的一身穿着，則是數十年一貫制，一直到文革發生進了北京後才換上了軍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姚文元因為寫評論文章引起了市委領導柯慶施、張春橋的重視，先把從盧灣區委調到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擔任《萌芽》雜誌編輯部詩歌組和評論組的組長，以後又提為作協黨組成員。我因為在市委宣傳部分工聯繫作家協會，經常在黨組會上遇到姚文元，兩個人越來越熟悉了，有時一道開會，散了會就在外面飯店裏一起吃客飯，邊吃邊談寫作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問題。

姚文元在生活上十分隨意，不修邊幅，他和在盧灣區委組織部擔任副部長的金英戀愛、結婚以後，極少過問家務。姚文元一九三一年出生，比我大兩歲，但我比姚文元早結婚、早生女兒，聽他說起妻子金英懷孕了，就用我自己的經驗告訴他：要多關心懷着孩子的金英，免得她在坐月子的時候，吹風受寒會得終身毛病，而這些知識正是我的岳母教給我的。可是，姚

文元沒有聽進去，他對產期中的金英很少關心，以致金英在生第一個女兒時就受了風寒，得了風濕性關節炎，以後又轉為風濕性心臟病，落下了終身毛病。我為此一直感到遺憾，還埋怨過姚文元。

正因為這個原因，致使文革結束姚文元被捕以後，金英頻頻發病，多次住院，我出獄後還到她家裏和上海盧灣區中心醫院去看望過她。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金英在上海等待了姚文元十九年又十個半月。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九日，金英終因風濕性心臟病突發，搶救不及，就猝然去世了，沒有能等到姚文元出獄回家。在北京的姚文元得到女兒的報喪訊息，悲從中來，說了一句話：“終身之恨！”又給妻子寫回來一封告別信：“遠方的老伴為你送行……”後來海內外的有些報導中說姚文元刑滿釋放回上海時，是他妻子金英去車站接他的，以後又在一起共同生活等等，那都是誤傳。事實上，姚文元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從北京出獄以後，孤身一人在浙江某地住了好多年，身邊無親人陪伴；到後期身體有病，才獲准進上海市區但仍不許與女兒同住，直至送進醫院不治身死，終年七十四歲。不過這已經都是後話了。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委創辦理論半月刊《解放》，柯慶施、張春橋把姚文元調去擔任編輯部文教組組長，這時他反過來向我約稿了，我有時也到榮昌路六十號二樓他的辦公室去，交談稿件方面的情況。接觸多了，彼此也就更瞭解了：姚文元解放前在盧灣區的滬新中學參加過學生運動，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以後高中畢業，沒有讀大學，直接進了青年團盧灣區委工作。這段經歷和我相仿，我也是解放以前在南洋模範中學讀書時接觸了學生運動，解放後放棄了考大學的

機會，直接被調到市委宣傳部工作的，因此彼此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我和他一起到作家協會開會時，有時會遇到他的父親姚蓬子，也是作協會員，胖胖的光頭老者，耳朵有點背，在討論會上發言的時候喉嚨很響。姚文元的長相酷似乃父，但他從不在公眾場合與他的父親搭腔。我知道姚蓬子曾是左翼作家，但歷史上有些問題，所以也沒有和姚蓬子對過話。

一九六二年，在《解放》半月刊停刊以後，姚文元被調往上海解放日報任編委和文藝部主任。有一次，我給報紙的副刊“朝花”寫了一篇雜文《不做“冷酷的觀眾”》，受到文藝界某些人的非議，並傳說我“挨批”了。姚文元知道後隨即用“尖兵”的筆名寫了一篇雜文《並非“挨批”》，為我作了辯護，使我覺得他很仗義。過了一段時間，姚文元患了傳染性肝炎，需要療養，但是按照他的級別(他當時是行政十六級)和職務，不能進高幹住的無錫太湖華東療養院。我為他的病情擔心，就向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寫了一份報告，彙報了姚文元的病況。經過石西民的批准，由市衛生局安排姚文元到青島的一個療養院去療養了幾個月，使他恢復了健康。為此姚對我心存感激。他出了文藝評論集子和雜文集，還題詩和簽上名字贈送給我。所以，當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接受江青佈置的秘密任務，要到市委寫作班來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的時候，我作為寫作班的支部書記，對他當然是十分歡迎並熱情相待的。

我告訴寫作班的成員：姚文元來寫作班寫文章，什麼內容大家不必多問。只有歷史組的幾個人大體知道是市委交下的任務，但姚文元的口風很緊，“羅思鼎”小組的成員也不知其詳。他來到武康路二號，基本上就躲進二樓北間，有時也到對門歷史組坐坐，或是到樓下東部我的辦公室聊上一會兒，我有時也上樓看看他。

姚文元從不抽煙，也不喝酒，就喜歡吃糖，生了肝炎以後寫作時特愛吃硬水果糖。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因患糖尿病歿於上海第一人民醫院，恐怕和這長期愛吃糖的習慣有關。他還有一個習慣，寫作時喜歡咬筆桿子，一邊思考，一邊咬齧，把鋼筆的尾端咬得留下斑斑駁駁的齒痕。有時他早上來到武康路二號，中午在寫作班自掏飯票買一客從延安西路市委機關食堂送來的普通飯菜，傍晚就和我一路回家。

我住在常熟路瑞華公寓市委機關宿舍，他住在香山路解放日報宿舍。他不會騎自行車，我們就一起步行。當我們從武康路沿着五原路走向淮海中路的時候，有好幾次我主動走在他的右邊，結果發現他也總是想繞到我的右邊，原來兩個人都患過中耳炎，右耳聽力嚴重下降，所以都想走在別人的右邊用左耳聽他人說話，說破了兩個人哈哈大笑。

在我們的交談中有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原來我們兩人都很敬佩周揚，把他看作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化身，覺得他是最忠實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的代表，而且是周揚具體指揮了文藝戰線上的歷次鬥爭，從反胡風、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到反右派、反現代修正主義，他都是領軍人物，但是現在周揚卻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批判，姚文元在議論時惋惜地對我說：“想不到……真想不到……”而當我們得知是毛主席決定批判周揚的時候，我們當即寫文章對周揚下手毫不留情，姚文元還寫了一篇痛批周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經毛澤東審定後發表。現在回顧起來，姚文元在文革前對周揚是亦步亦趨的，虔誠地信奉毛澤東的文藝路線和文藝政策，而且用自己的理論思維和寫作實踐來千方百計地體現毛澤東的意圖，在這個體現的過程中還加入了自己的創造，因此深得毛澤東的欣賞。

後來，姚文元調到北京，接觸到了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環境，變得格外謹慎小心，可以說是步步緊跟毛澤東。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給毛澤東寫請示報告，得到毛的批准後才去實行。毛澤東要他接管《紅旗》雜誌，說：“你為什麼不去奪陳伯達的權？”姚文元這才直接抓《紅旗》雜誌，建立了《紅旗》上海組稿小組，指定我和朱永嘉、王知常、蕭木為上海組稿小組的成員。每一期開列的《紅旗》組稿目錄，姚文元都要送給毛澤東審定、畫圈。有一次他要到上海住幾天，到了興國賓館叫我去談話，剛坐下，他就拿出一個透明的塑料資料夾給我看，裏面是他寫給毛澤東的一份請示報告，說是要請假一星期到上海去談談寫文章的事，順便探親(當時姚的妻子和女兒都住在上海)。毛在這份文件上畫了圈，批示“同意”。姚文元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我這次到上海來是經過主席批准的。”姚文元在中央如此謹小慎微，真正做到了如周恩來所說的：“授權有限，事事請示”。所以，後來華國鋒等人把姚文元抓起來進行審判時，特別法庭想把姚的所作所為和毛澤東分開，感到特別困難。因為姚文元幾乎每件事都留有書面文件，都向毛澤東作過請示，都有毛澤東的親筆批示，這兩個人又如何能夠分開？

### 姚文元的寫作道路

姚文元走的是一條具有當時時代特色的寫作道路。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當姚文元還是上海市盧灣區團委的一名普通幹事時，他就向北京的《文藝報》投稿，批評在上海演得十分紅火的以反特鬥爭為題材的滑稽戲《活菩薩》，給它扣上低級庸俗的帽子。文章以《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數字》為題，發表在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二期《文藝報》上。當時的風氣是：凡是被權威報刊批評過的文藝作品，就會受到巨大的政治



壓力。上海市的戲曲改進協會面對姚文元的指責，不得不在新聞日報上為《活菩薩》的上演一事撰文加以說明。姚文元第一次嘗到了文藝批評具有崇高威信的甜頭。

接着，他積極地投身於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撰寫了大量言辭嚴厲的批判文章，成為上海文壇上寫批判文章的積極分子。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寫了一篇關於姚雪垠的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注意，還打聽姚文元是什麼人。當毛澤東聽說他是三十年代老作家姚蓬子的兒子以後，倒也並不在意，還表揚姚文元的文章說：“我看是不錯的。”姚文元因此被提名作為上海市的代表，參加了黨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上海代表團的成員還有陳望道、金仲華、傅雷、周信芳、舒新城、趙超構、徐鑄成等人。當我和市委宣傳部的領導去北火車站歡送上海代表晉京時，姚文元雜在這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中，顯得異常興奮。

就在這次會議上，姚文元第一次當面見到了毛澤東，並聆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回到上海以後，姚文元格外注意毛澤東的動向。反右派開始前，姚文元憑他的政治嗅覺，寫出了短文《錄以備考——讀報偶感》，發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的文匯報上，強調毛澤東關於捍衛社會主義的講話的重要意義，揭露批評文匯報的版面編排。這篇短文立刻被毛澤東發現並以此作為突破口，在人民日報親自撰寫社論《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打響了反右派鬥爭的重大戰役。

從此姚文元越來越自覺地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思想文化領域裏，主動地去尋找和發現他認為違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觀點的種種傾向，撰文加以抨擊。他寫的批判文章，往往是主觀武斷、無限上綱的，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給別人扣大帽子，壓服而不是說服。因此，在藝術界和文學

界，有人便罵姚文元為專門打人的“棍子”，後來江青卻不但不諱言，反而讚揚姚文元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毛澤東正需要這樣的“金棍子”，拿在手裏得心應手，“橫掃千軍如卷席”。當姚文元被物色為批判《海瑞罷官》的攻堅手時，這根“棍子”才真正打到“要害”上。

不過，姚文元在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期間，由於他只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編委，政治地位較低，還不能直接面見毛澤東，也難得見到江青。“上面”的精神都是通過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轉達的。每一次的修改文章都交給市委印刷廠排出大字本清樣，以改清樣的次數計算，前後大改十稿，小改就難以計數了。每改一稿，姚文元就急切地想聽到“上面”的意見，有時他和我一起到康平路市委書記處去，走進小禮堂二樓對着樓梯的二零一室張春橋辦公室時，姚文元往往對坐在辦公桌前的張春橋大叫一聲：“春橋！怎麼樣？”張春橋也總是笑盈盈地接待他，但並不每次都有“上面”的新的精神。等到“上面”對某一次修改稿有新的指示下來，姚文元就兢兢業業地修改，力求改得符合領導的要求，然後再交給印刷廠，排成四號宋體字的大字本，通過張春橋直報江青並呈送毛澤東。

### 上海市委書記處為姚文元的文章集體討論定稿

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對外是保密的，但整個文章的寫作與定稿過程，上海市委卻是始終參與並積極領導的。我參加過討論這篇文章最後兩稿的市委書記處會議，時間在一九六五年九月間，當時原市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柯慶施已經去世了，出席文章討論會的人員有主持全面工作的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到當年的十一月份被正式任命為第一書記），市委書記處書記

曹荻秋、馬天水、張春橋，候補書記王少庸、楊西光、梁國斌等，地點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208會議室。姚文元、我和寫作班歷史組的朱永嘉都參加討論，參加者還有文匯報的總編輯陳虞蓀。會議由陳丕顯主持，開始時他還要姚文元念一遍批判文章全文。當時陳丕顯正在戒煙，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醬油瓜子，他先給與會的人打招呼說：自己煙癮上來時，要一面吃瓜子，一面參加討論。會上都是由張春橋首先發言，對本次稿子的修改作出說明；比較活躍的是楊西光，他琢磨着文章裏要不要對吳晗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據陳丕顯後來說，姚文元的文章定稿後，還是由他充當“信使”，從上海秘密帶往北京，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交給江青轉送毛澤東審閱的。

我參加姚文元的文章討論會以後的感覺是：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經整個上海市委書記處集體討論後定稿的，由上海市委向毛主席集體負責。當時只看到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背後，是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連張春橋也不知道毛澤東的最後目標是針對劉少奇的。文革中我當面問過張春橋，他說：“當時確實沒有想到過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但是，整個上海市委書記處，包括主持工作的陳丕顯在內，都會明確意識到毛澤東要通過這篇文章，採取“甩石頭”的做法，用上海市委整北京市委。對此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發表以後，張春橋馬上要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收集反應，結果聽說吳晗看了文章，感到很委屈，特別對姚文元批判他宣傳“地主資產階級國家觀”，宣揚“階級調和論”，表示不能接受。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麼”中，姚文元說吳晗寫“退田”，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回土地，就是搞“復辟”，刮“單幹風”；寫“平冤獄”，就是為地主、資產階級翻案，刮“翻案風”，配合地、

富、反、壞、右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吳晗更是不能接受。因為所謂“颶風”是一九六一年的事，而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是一九六零年應馬連良之約寫的，年底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正式公演；所以吳晗說：“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預見到一九六一年要‘颶風’。”吳晗又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一九五九年就先創作出了京劇《海瑞上疏》，作為上海慶祝建國十周年的獻禮劇目公演。言下之意，就是你上海對自己先搞出的《海瑞上疏》不加批判，對北京後寫出的《海瑞罷官》反倒抓住不放，對此吳晗心裏感到憤憤不平。

### 我們全力配合姚文元猛攻海瑞戲

為了堵人之口，張春橋就親自趕到上海京劇院去，當眾批判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為民請命”，說什麼在戲裏出現的一把大雨傘，就是“為民請命”的“萬民傘”。張春橋還佈置我抓緊撰寫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以配合姚文元的文章。我和文學組的兩個成員奮戰了幾天，用“丁學雷”的筆名寫了一篇《“海瑞上疏”為誰效勞？》。我還給文章加了一個“編者按”，說《海瑞上疏》和《海瑞罷官》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文章硬把這個戲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誣稱它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瘋狂進攻。丁學雷的文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發表於上海解放日報。

文章發表後在上海京劇院掀起了一陣批判浪潮，同時揭發出一項重要“材料”：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揚以中宣部副部長的身份，在上海錦江飯店約見周信芳，建議他編一出以海瑞為主角的戲。周揚說：反右之後，大家都不敢說話了，寫海瑞戲，就是要鼓勵大家敢於說真話。周揚還把《海剛峰奇案》和

《丘海二公合集》兩部書送給周信芳。周信芳欣然接受了周揚的建議，組織人員編出了海瑞戲。這下子，張春橋、姚文元和我認為終於找到了《海瑞上疏》的“黑後台”。張、姚要我再寫一篇文章上掛周揚。我親自主持撰寫了第二篇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把這個戲的定性升格為“一棵不折不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文章裏點了“中宣部副部長”（即周揚）的名。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去北京參加中央的會議，我把文章署上了“方澤生”的筆名，給張春橋送去請他審查。張春橋特別重視這篇首次點周揚之名的文章，決定在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同天發表。頭一天晚上，張還親自前往人民日報社，最後修改和審定了這篇文章，發表時間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這時，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全國範圍展開了。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以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杭州和陳伯達等人談話時提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慶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還說：“如果再包庇壞人，北京市委要解散，彭真要向上海市委賠禮道歉。”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在上海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時又說：“《前線》（北京市委的理論刊物）也是吳晗、廖沫沙和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四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彭真主持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毛澤東指出：我們面臨嚴重的文化革命任務，吳晗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朝中有人”。姚文元得悉毛澤東的指示以後，就着手撰寫另一篇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猛攻北京市委。與此同時，我佈置上

海市委寫作班的歷史組、文學組、哲學組成員，全力配合姚文元，為他從《前線》雜誌和《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書刊中摘錄論點，分類注釋，編印成冊，提供姚文元在寫批判北京市委的文章時參考。

姚文元的文章寫成以後，原來的題目是《評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由張春橋轉給江青呈送當時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了文章，大筆一揮，把三個“反”的形容詞和“大黑店”等提法統統圈掉，直接定題為《評“三家村”》。

文章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在上海發表的當天早晨，姚文元一早就來到武康路二號市委寫作班，他還是穿着那身藍卡其的中山裝，戴着帽檐油光光的鴨舌帽，背着一隻草綠色的軍用背包。他興衝衝地來到樓下我的辦公室，進門就問道：“文章看了沒有？”

我回答：“剛剛看到。”

姚文元說：“今天又放了一顆‘原子彈’！”他的得意神情溢於言表。

說罷，他從軍用背包裏掏出一大包糖果，抓了一把，放在我的辦公桌上：“請吃糖！”

然後，他又轉身到一樓文學組和二樓歷史組、哲學組送糖果去了。

寫作班的人們都說：“姚文元請客，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過不幾天，姚文元就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到北京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了。

至於姚文元是怎樣當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其中也有一段曲折的過程。據戚本禹告訴我們：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後，戚本禹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的身份來到上海。當時戚本禹深得毛澤東的器重，所以他到上海時由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曹荻秋出面接待。戚本禹住在錦江飯店，約見姚文元。姚文元按時去飯店時戚本禹還在睡覺，姚文元就往外邊耐心等待，等了很久，服務員覺得過意不去了，才去叫醒了戚本禹。戚本禹見姚文元穿着樸素，談吐謹慎，對他印象很好。一九六六年年中，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周恩來、陳伯達都出席了，江青、張春橋、戚本禹也列席會議。會上，戚本禹提名姚文元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表示反對，理由是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在三十年代時作為左翼作家聯盟成員被國民黨逮捕後自首，並為國民黨做過一些事，因此姚文元不合適進中央文革。會上，江青沒有積極支持姚進中央文革，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張春橋則不作聲。倒是周恩來出來說，對一個人的評價應該主要看本人表現，不應看他的家庭出身。最後毛澤東表態了，毛澤東說：我們這些人也都是出身不好的，我還是富農家庭出身，還不是照樣幹革命？於是，一錘定音，姚文元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 姚文元丟了稿費、上交遺產

在這裏要敘述一個插曲：《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後，姚文元請我到盧灣區香山路他的家裏去。他當時住的是解放日報的宿舍，連同他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女兒，住在樓下；樓上是解放日報另一位負責人的家，家裏有很多孩子。

談了一會兒工作，姚文元告訴我：“最近發生了一件怪

事：文匯報給我寄來的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稿費不見了！”

我問：“多少稿費？怎麼不見的？”

姚的妻子金英走到牆邊，拉開梳粧檯大鏡子旁邊的一個小抽屜，指給我看：“前天剛收到的，一共八十多元，就放在這抽屜裏，沒有上鎖，昨天忽然發現不見了。”

姚家的三個小孩那時都很小，還不會用錢，當時鄰里之間都很信任，平時房門也不關的。這筆錢不是一個小數，抵得上一個科級幹部一個月的工資，我當時每個月的工資是八十二元五角。姚文元拿解放日報編委的工資，行政十六級，一個月只有一百元多一點。姚文元辛苦了八個月，市委領導和我們忙碌了半年多，文章發表了，戰鬥打響了，這篇文章的稿費卻不翼而飛了！

除此以外，我還處理過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留下的一筆遺產。

姚蓬子曾在上海開過作家書屋，解放以後拿過定息，稍後又在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家裏有一些積蓄，還有一批藏書。一九六九年，姚蓬子在上海胸科醫院因患肺癌去世。當時姚文元已去北京工作，姚的母親周修文住在另外一處地方，拿了戶口簿到附近的銀行裏去領取姚蓬子的存款，一共有七千多元，銀行看到數額較大，就向市裏作了彙報；過了兩天，銀行又反映姚蓬子還有存款三千元，兩筆加起來總共有一萬元左右。當時“萬元戶”是非常少見的。市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找到我，請示如何辦理。我覺得此事不便表態，只能告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由她徵求姚文元的意見。

姚文元和金英的家那時和我的家一起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裏，我們是樓上、樓下的鄰居，他們家的三個女兒和我的兩個女兒是小學同學，經常來我們家玩，還聽我講故事等，關



係很密切。我就直接去找了金英，把她婆婆要取存款的情況告訴了她。金英當時在上海盧灣區委擔任區委書記，她向正在北京的姚文元通電話後轉告我：姚文元的意見是存款全部上交，至於父親的藏書，姚希望留給自己使用。這樣，我就把姚文元上交存款的決定告知了銀行，由銀行辦理上交手續。與此同時，金英也把婆婆周修文接到康平路大院裏同住供養，直至婆婆去世。

姚文元由於寫了批判《海瑞罷官》和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得到了毛澤東和江青的讚賞，在搞垮北京市委一役中立了大功；我和朱永嘉由於配合得力，同樣得到了上海市委的褒獎。一九六六年上海市成立了市委文化革命小組，由張春橋任組長，楊西光、王少庸任副組長，姚文元、我和朱永嘉都成了市委文革小組組員。不久，張春橋調去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隨後，姚文元又被增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九大”以後，姚文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中國大陸的輿論總管。以我為支部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從此追隨張春橋和姚文元，捲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

### 《海瑞罷官》批判的悲劇

當我在上海市委寫作班配合與協助姚文元撰寫批判文章的時候，在我的家庭裏卻發生了一出因《海瑞罷官》批判而引起的悲劇：我有一個堂弟，名叫徐景熙，自小喜愛文史和寫作，考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以後，受到我從事寫作的某種程度的影響，經常撰寫文章向報刊投稿。大學畢業以後，他被分配到武漢地區的一所高校當教師，仍然在業餘時間從事寫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發表以後，二十四歲的徐景熙當即就在課堂上向學生表達了自己不同意姚文元的觀點。至十二月初，當他讀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轉載姚文元文章所加的號召貫徹《雙百》方針的編者按時，連夜寫了一篇觀點鮮明的批駁文章：《怎樣評價〈海瑞罷官〉——與姚文元同志商榷》，以筆名朱熙發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光明日報》上。他對姚文元把《海瑞罷官》定性為“毒草”的結論“不敢苟同”，提出兩方面的不同意見：一是如果姚文元否定海瑞的邏輯可以成立，無疑是說歷史劇只准寫歷史上的勞動人民，而不能寫統治階級內部的優秀人物；二是按照姚文元的邏輯，劇中寫了海瑞“退田”於民，就是鼓動人們否定人民公社，寫了海瑞“除霸”、“平冤獄”，就是替現在的牛鬼蛇神翻案，這種極端牽強附會的批評方法，已經並將在社會上引起不良的連鎖反應。

我的堂弟太天真了，他以為這是正常的學術、藝術問題的討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觸着的是一枚“政治地雷”。而我則是和姚文元一起，跟着毛澤東和江青、張春橋，在絕密狀態下謀劃批判《海瑞罷官》這篇矛頭直指北京市委的文章，在上海武康路二號的寫作班裏度過了八個月的封閉時間，根本無法也不准向外界傳遞信息，更談不上向我的堂弟透露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了。因此，隨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揭開，堂弟徐景熙成了向光明日報自投羅網的反對批判吳晗的典型，而在武漢的那所高校裏，這個年輕的教師更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徐景熙被作為“小吳晗”遭到大會、小會輪番批判。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評“三家村”》發表、全國範圍興起更加聲勢浩大的深·揭猛批“三家村”高潮後，徐景熙被中止了教學工作，剝奪了當教師的資格。報紙上連篇累牘的聲討，把他折磨得精神幾近崩潰。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

林彪事件以後，他的日子才相對好過些，江蘇南通的一個農場收留了他。而我自己，因為在上海市委寫作班立了功，又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當上了市委書記、中央委員。兩相對照，同一家庭的成員在同一篇文章上竟然引發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和前途，真是令人觸目驚心！

文革結束以後，堂弟徐景熙獲得了徹底平反，調到南通師範學院任教。由於他自己的努力，在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領域有所成就，成為了南通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南通市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我則因為江青一案在監獄裏度過了十多年的監禁生活。回家以後，堂弟從南通到上海來看我，兩個人唏噓之餘，得出一個共識：中國的學術和藝術要獲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一定要避免把學術問題“政治化”的錯誤做法。其實，從建國後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通過一次次的“戰役”，把學術、藝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已越來越深入到哲學界、史學界、文藝界、教育界等各個領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運動的“對象”、“動力”時有易位，但學術問題“政治化”的傾向則已積重難返，幾乎成了某些領導評價知識分子的條件反射式的“思維慣性”。文化大革命則是學術問題“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登峰造極的惡性大爆發，貽害無窮。

文革的教訓告訴我們：中國的學術和藝術要獲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一定要突破思想禁錮，提倡自由思想和獨立思考。社會的發展一定要讓個人的才智和創造性得到最充分的、自由的發展，而不能加以壓制和扼殺，更不能實行思想專制和文化專制。

這是世世代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標，有志者將為此作出鍥而不捨的努力！

## 第十八章

# 張春橋斷片

張春橋在政治上的冉冉上升，是因為他的一篇文章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這篇文章題名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發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號的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上。

張春橋當時專門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起草各種報告、文件和講話，是柯慶施的“筆桿子”。我們給張起了個外號，叫做“不管部部长”。柯慶施每到中央開會回來，就把毛澤東講話的精神給張春橋等人傳達。

一九五八年二月，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批評反冒進和發動“大躍進”為主題，講到了反對官僚主義，主張平等待人，毛澤東說：“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很要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他提出要消滅官僚主義，消除資產階級作風，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平等關係。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反對幹部的官氣，反對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的官僚作風。

張春橋獲悉了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就趕緊在《解放》雜誌上寫出了那篇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提倡以“供給制”為特點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說什麼“人們喜愛這種表現一種平等的相互關係的生活制度”，體現了毛澤東創立的軍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的處理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

根本原則，而“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對‘供給制’、對‘農村作風’、‘遊擊習氣’的攻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保護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

此文一出，馬上引起了正在熱衷於“大躍進”的毛澤東的興趣，毛指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撰寫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

從此，張春橋得到了毛澤東、柯慶施等人的進一步重用，《人民日報》轉載文章以後的第六天，毛澤東就下令調一架專機，送陳伯達和張春橋前往河南鄭州，到主張“兩年進入共產主義”的衛星公社進行調查研究，為中央召開的鄭州會議作準備。毛並提筆在關於衛星公社的報告上批道：“美妙如一首詩！我們的秀才伯達、春橋，可否去看一看？”

從張春橋身上，可以概括出當時中共“秀才”們的一種通病：悉心揣摩毛澤東以及上級領導的心思，然後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講得兇，我寫得比你還兇！在這方面，像我這樣從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

### 張春橋生活儉樸

張春橋在生活上自奉甚儉，他大概注意到用實際行動來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決裂。

文革以前，我有幾次和上海的一些黨員老作家，春節期間到幾個市委書記家去拜年。別的幾位書記家擺設比較有品位，

牆上還掛着字畫之類，招待客人時總有些拿得出的食品；而張春橋家則陳設比較簡單，只有兩盤花生招待客人。張春橋自己穿着一條藏青色的舊呢褲，屁股上還打着兩塊補釘，在客人面前談笑風生，不以為意。

我曾經想過：這是不是他的矯情，或是故意裝出來的？文革發動以後，我和他的接觸增多了，有了更近距離密切觀察他的機會。我發現他並不是禁欲主義者，有時候他也愛喝幾口酒，茅台酒或是自己家釀的楊梅酒都可以。他抽煙倒是一直抽中華牌，不帶過濾嘴的，他覺得這樣才夠勁。但他還是一貫地保持簡樸的生活方式。他到北京以後，長期住在釣魚台，但他住的那個樓和江青、王洪文住的樓大不一樣，他的房間陳設十分樸素，連個席夢思床也沒有。伙食也極簡單，每頓兩菜一湯，而且從來也沒有請我吃過一餐飯。這一點姚文元和他差不多，姚文元穿的一件棉軍裝，穿了好幾年，袖口都露出棉絮來了，但沒有人關心，還是張春橋給後勤部門說了才給換了一件。

我曾把復出的老幹部和新興的工人貴族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的狀況，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反映，張春橋也表示看不慣。他說，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和等級制度的影響，那些人把資產階級法權當作“臭豆腐幹”，“聞聞是臭的，吃吃是香的！”

一九七一年，我的岳母和我們住在一起，患了胃癌。我們把她送進醫院治療，住了好幾個月。她是無業老人，醫藥費都是我們自理的，最後醫治無效不幸去世了。當時的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室負責人張敬標看到我家花了不少錢，就向張春橋打了一個報告，請他批准補助我醫藥費和喪葬費一千元錢。那時我每月的工資只有八十二元五角，一千元錢可不是一個小數。但張春橋沒有批准，他表示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免得徐景賢被

動。我知道後領會了張春橋的心思，覺得這是他對我的愛護和嚴格要求。

### 毛澤東想恢復“供給制”

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澤東在會見一位歐洲國家首腦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改了。”毛澤東讓周恩來轉告：“要春橋寫這類文章”，“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張春橋體會到：毛澤東仍然不滿意現今的商品制度、工資制度，念念不忘一九五八年提出過的“供給制”時期的“平等”情結。張春橋決定重提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話題，因為這正中毛澤東的下懷。張春橋對我說，他只花了幾天時間，一口氣就順利地寫完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七五年三月號的《紅旗》雜誌。文章說：“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佔統治地位。……”張春橋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強調如果對資產階級法權不加限制，就會“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張春橋的文章，又一次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姚文元告訴我，當時他寫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寫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完成以後，送給毛澤東審查。毛澤東像塾師給學生批作文那樣，在文章題目上一連畫了五個圈，表示滿意。

文章發表以後，張春橋覺得還應該有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

實際行動：他佈置上海市委的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上海搞一次測算：算算在上海推行幹部的“供給制”，全家人吃飯、穿衣等都不要錢，將增加多少財政支出；如果要把工人的八級工資制，都改為“供給制”，又需要增加多少開支。此事由馬天水佈置上海市革會的綜合計劃組和財政局、勞動局等測算了好多天，由市委寫作組的經濟組負責聯繫各方測算結果：最後結論是財政開支要增加好幾倍，上海的財政根本無法負擔。報告送給了張春橋，推行“供給制”一事就此作罷。

### “我一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寫一部《毛澤東傳》”

我在文革期間最後一次見到張春橋，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釣魚台他住的九號樓，向他彙報毛澤東遺體的處理情況。他向我感歎了一陣在北京工作的寂寞心情，然後說：“我一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寫一部《毛澤東傳》。”

此後，他從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九八年被關押了二十一年，然後從一九九八年一月保外就醫實際仍軟禁於江蘇某市郊區，到二零零五年四月辭世這段時間有七年多，不知他的《毛澤東傳》動筆了沒有？假如有，他寫出來的《毛澤東傳》又將會是一本怎樣的著作呢？



## 第十九章

# 我在上海接待黑格將軍

一九七二年一月，為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基辛格博士的副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準將，率領十八個人的先遣小組訪華。

黑格將軍及其先遣小組的此次訪華，主要是為二月間的尼克松總統率大隊人馬訪問中國，從安全、禮賓、交通、住房、記者採訪、電視轉播等方面預作技術安排和後勤保障。

由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的決策，中美兩國改變了長期阻隔的局面，關閉了二十二年的中國國門，終於向美國總統打開了。黑格此次訪華，要從北京到上海、杭州，把尼克松總統將要訪問的城市，所有的路線全部走上一遍，落實各項技術措施。本來，這是一次技術性很強的訪問，不大可能有什麼意外發生。但是，就在黑格將軍訪華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節外生枝的事件，差一點影響到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的大局。

### 黑格帶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

黑格是一個典型的軍人，長得魁梧高大，穿着講究，風度翩翩，說話直截了當，和肥胖、矮小但談吐睿智、機敏過人的基辛格比較起來，顯然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黑格一九四七年畢業於美國軍事學院，駐過日本，在朝鮮戰爭中任少尉，在歐洲任阿爾蒙德中將的副官；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年在五角大樓任職，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在越戰中任陸軍指揮官，得過著名的十字勳章和國防部獎章、銀星勳章、紫心勳章以及歐洲各

國授予的獎章；一九六九年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一九七二年晉升為上將，後任陸軍參謀長，被尼克松總統任命為白宮辦公室主任，一九七四年被福特總統任命為美國歐洲司令部總司令；一九七九年退役，任聯合技術有限公司主席；一九八一年宣誓就職擔任美國第二十九屆國務卿，卸任後擔任環球聯合公司董事長。從黑格的履歷看來，他是美國軍人從政的典型。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黑格率先遣組到達北京，李先念副總理等到機場迎接。晚上，外交部長姬鵬飛宴請黑格及美方全體人員，賓主熱情祝酒，雙方都祝願這次訪問取得成功。宴會以後，黑格對姬鵬飛說：基辛格有重要的情況要他向周恩來總理指定的人談。姬鵬飛向周總理彙報後，周總理決定馬上親自會見黑格。

一月四日凌晨，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和黑格見面。黑格沒有想到周恩來總理會馬上會見他，神情既興奮又緊張，所說的話也比較零亂。黑格開門見山地說，他要以軍人的直率口氣轉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黑格談了印巴問題、美蘇關係問題和越南問題，在談話中，黑格說：蘇聯“企圖通過樹立一些你們的敵人或敵人的代理人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生存能力是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我是用軍人的直率語言在講話。”“我們非常肯定地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存能力必須得到維護。”黑格在談到尼克松訪華時再一次強調：“我們感到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在目前這種關鍵時刻作出共同努力”，“力圖抵消蘇聯對人民共和國的威脅，以維護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及其生存力。”黑格在反復強調了上述內容以後，特意提出關於尼克松訪華的重要目的：“我們認為通過這次訪問加強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這

對我們雙方都是有利的。”

周恩來總理認真地傾聽了黑格轉達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當然是聽懂了，但他說：“你剛才所談的不是很詳細，但總的意思我懂得了。當然，我還要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和跟同事們商量，現在不打算作正式回答”。周恩來暫時用這樣的方法來對待黑格傳來的口信，以便爭取時間研究如何答覆。

會見結束以後，周恩來立即叫來翻譯，找來各種權威的英語辭典，因為黑格的口信中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存能力必須得到維護”，黑格用了“viability”這個詞，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他要翻譯們查一查：“viability”是否確實譯為“生存能力”？在查閱辭典得到證實以後，周恩來說，他要駁斥黑格。接着，周恩來又佈置整理出黑格談話的記錄，並要負責接待的熊向暉等人起草了一份《對美方口信的答覆》，一併送毛澤東主席審閱。

### 毛澤東要“頂一下”美國人

一月六日晚，周恩來到毛澤東住所親自向毛彙報會談情況，聽取毛澤東的指示。一向珍視民族獨立、主權完整和國家尊嚴的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是讓別人來保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

當周恩來彙報到黑格說，蘇聯戰略改變，要利用南亞次大陸包圍中國時，毛澤東忍不住了，針對黑格所傳口信說美國要維護中國的主權和“生存能力”，他說：“包圍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麼了得！”毛澤東越說越激動：“它替我們擔心啊，是貓哭耗子！在次大陸對中國包圍，印度支那也是蘇聯包圍中國，你葛羅米柯(當時蘇聯外交部長)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圍中國啦！這就不得了啦，替我們擔心啊！還有

台灣呢，菲律賓呢，南朝鮮呢，那就不算包圍？統統要它保護，中國的獨立、生存能力都讓你保護，危險得很呀！”

當周恩來彙報黑格講到尼克松要加強自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時，毛澤東說：“美國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講國內有什麼親蘇勢力、親台勢力、官僚勢力都反對他，尼克松作為美國總統連美國領袖都做不成，他還要來做世界領袖啊！包圍，包圍，我現在只有人兩個，你們包圍吧！”毛澤東所說的“我現在只有人兩個”，是引用京劇《空城計》中諸葛亮的唱詞。

這時，周恩來取出我方對美方口信的答覆稿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說：“好，我看可以給他講。講了以後，無非是吹。他二十二年都沒有來，再等一百年嘛！這些美國人啊，睡了兩個晚上好覺，他又忘了，你不頂他一下，他就不舒服。……總而言之，無非是吹了。我看啊，過不了幾年他還是要來的。”

### 周恩來駁斥黑格的口信

一月六日晚十一時半，周恩來和黑格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會談。開始時周恩來問黑格今天喝酒是不是喝得多了，黑格笑着承認“喝多了一點”，氣氛很輕鬆。接着，周恩來根據我方的答覆稿發言，周恩來先談了隨着中美會談的臨近，某些敵對勢力不斷加緊破壞，蘇聯在亞洲的活動，是它一貫奉行的爭奪霸權政策的繼續，說不上什麼戰略轉變。接着，周恩來的講話切入正題，他說：“半年前尼克松總統把中國稱之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現在美方忽然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聲稱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令人驚訝。”周恩來嚴正地指出：“中國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和殖民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不斷抗擊外來侵略和壓迫的鬥爭中誕生

和成長起來的，並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中國早已說過，準備敵人從四面八方打進來，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奮鬥到底，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在談到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指出：“中美兩國關係並未正常化，但中國方面將以應有的禮儀接待尼克松總統，並將為謀求中美高級會談取得積極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美方口信表示，希望通過訪問加強總統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對此中方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於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中國從不認為有什麼自封的世界領袖。”

周恩來在談話中，也對美方先遣組來華後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經過中美雙方的分組會談，在禮賓、新聞、通訊、安全及專機、後勤等方面，為美國總統的訪華作了技術性的準備，包括租用美國衛星地面站以及尼克松總統抵達上海後，換乘中國專機和專車，不用美國的專機與專車等問題，都一一得到解決。美方對中國高度的工作效率，表示佩服。

在周恩來義正詞嚴的談話面前，黑格顯得有些意外和震驚，他聽了周總理的答覆和評論後一再解釋，說他是根據本人對口信總意圖的理解用自己的口氣轉達的，因此恐怕在許多地方，由於用了軍人的樸素的語言，收到了過分直率的效果，在一些問題上引起了誤解。

周恩來為了緩和談判的氣氛，介面問黑格：“下次來不來？”黑格回答：“總統和博士出訪時我總是看家。”周恩來說：“他們在家時，你方能出來。”黑格說：“我就是在這種時候出亂子。”周恩來聽出了話中之音，笑着說：“你還有機會，將來總統訪問後還要派人來嘛。”

至此，黑格一行在北京的訪問日程正式結束，他們即將赴上海和杭州訪問。

## 黑格一行訪問上海

我們上海早就接到了接待黑格一行來訪的任務，我們把它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看待。當時，為了接受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國共產黨對全黨全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先是公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吹吹風，讓大家從思想上有所準備。接着，經毛澤東批准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向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解放軍各總部和軍兵種、大軍區的領導，宣佈基辛格即將經巴基斯坦秘密訪華的消息，讓各級領導在思想上轉過彎來，接納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頭子”美國總統訪華。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在中央工作，上海工作由王洪文和我主持，中央通知讓王洪文和我都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做好準備。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的秘密訪華和十月的第二次訪華，都是首先飛抵上海然後轉去北京的，我們配合外交部做好了接待工作。如今，尼克松訪華的日期日益迫近，特派黑格前來打前站，進行各方面的準備，我們更要按中央的方針做好接待工作。

當時，中央一再提醒我們：外事工作無小事。而且，眾所周知，對於接待美國總統尼克松，中央有一個重要的方針：“不冷不熱，不亢不卑。”根據我們體會，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方針，它要落實到整個接待工作的全過程，貫徹到接待工作的各個具體環節中去；它又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方針，將隨着接待的進程作冷和熱的調整，這個調整的開關掌握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手裏。而我們這些具體接待人員，只是整個接待工作棋局中的一枚小棋，一切得聽令於棋手。

例如，在後來尼克松到達北京走下飛機時，他在舷梯上就急於伸出手來想和周恩來握手，但周恩來從容不迫，氣度穩重，小步上前，等他走下舷梯才伸手相握，結束了中美兩國領

導人二十二年不相往來的歷史。這種態度，真正體現了“不冷不熱，不亢不卑”，顯示了民族尊嚴和國家風度。當尼克松抵達北京時，由於兩國關係尚未正常化，機場上沒有出現儀仗隊；但等到訪問結束的時候，由於雙方高層會談取得了積極成果，周恩來臨時決定在機場上設儀仗隊歡送，表示對美國國家元首的尊重，這就顯示出由冷轉熱的升溫。八字接待方針，甚至還體現到接待工作的細節中，例如在歡迎宴會上，周恩來向尼克松敬酒時，特意將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後再碰杯，而他在和其它國家的領導人碰杯時，總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對方杯子的中間部分，以示對訪客的尊重。周對尼克松這樣做，是為了刻意體現對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總統毫無低人一等的諂媚之意，充分顯示“不卑不亢”的精神。至於這次黑格來訪時帶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其中關於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生存能力”等內容，已經涉及到有關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決定予以駁斥，頂他一下，這就在“不亢不卑”的天平上增加了“亢”的份量，不能顯得過於卑下，表現了中央掌握的高超的外交藝術和原則性。

既然中央這樣細緻入微地對待和重視接待工作，我們就應當更加戰戰兢兢地做好配合工作。上海事先成立了接待工作的領導小組，由王洪文、我和另一位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外事組負責人馮國柱牽頭，在錦江飯店北樓設了一間辦公室。外交部打前站的人員向我們介紹了黑格一行在北京會談的情況，並提出對黑格的迎送宴請規格不能太高。經請示外交部，黑格抵達北京時是李先念副總理到機場迎接，上海決定由市革會副主任馮國柱到機場迎送；北京由姬鵬飛部長宴請黑格，上海就由我出面宴請祝酒，宴會後舉行招待文藝晚會；北京由中聯部熊向暉、外交部章文晉、公安部於桑等當領隊全程陪同，上海則

由外事組另一位負責人張振亞全程陪同，參觀上海工業展覽館，並登上上海大廈觀賞上海全景。當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不公開出面，處在幕後和我們一起商量做好接待工作。

### 黑格對我“失禮”

上海的接待計劃報經外交部批准後，我們就加緊準備。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下午，黑格一行如期抵達上海，除黑格率領的十八人的先遣小組以外，美方專機組人員也參加上海的各項活動。七日晚上，我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設宴招待黑格和美方全體人員，北京和上海的陪同人員全部出席。宴會廳內燈火輝煌，地下鋪設了紅地毯，地毯上安放著致祝酒詞用的廣播話筒。我和黑格以及美國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新聞秘書齊格勒以及後來連續三任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等人，坐在主桌。

黑格當天穿着一身筆挺的西服，頭髮梳得很整齊，氣宇軒昂，情緒活躍，看得出他在離開北京以後，心情放鬆了許多，在宴會桌上話也多了，在言談之間，從他身上不時流露出一股傲氣，不知這是美國人的優越感還是軍人的特質。宴會進行了一刻鐘，我就和黑格打招呼，我要致祝酒詞，黑格領首。我不是站在宴會桌前祝酒，而是離開主桌走到紅地毯中央的廣播話筒前致詞，以示鄭重。中方翻譯章含之為我的祝酒詞做翻譯。我的祝酒詞很簡短，事先都經過外交部的審查，一字一句都不能擅自增減的。祝酒詞的大意是：祝黑格一行訪問上海取得圓滿成功，祝他們今後旅途愉快、身體健康等等。我致詞完畢後和黑格及主桌上的客人一一碰了杯。黑格善飲，他說他很喜歡中國的茅台酒，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接着，我們在宴會桌上聊天，我告訴黑格，等一下還有一個文藝晚會，上海的著名演員



將為他們作招待演出，地點就在宴會廳樓下的劇場。我的意思是：等黑格答謝祝酒以後，我們早一點結束宴會，還要看演出呢！誰知道，等了十分鐘，黑格無所表示；又等了二十分鐘，黑格還是毫無動靜，他照常喝他的酒。有人說：可能黑格不瞭解中國的宴請習慣，可是，在外交活動中，主人致祝酒詞，客人致答謝詞，這是國際慣例，是外交上的對等原則，也是最基本的為人禮貌。我當時想，作為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的高官，總不會不懂這些吧！

等了很久，我看黑格沒有致答詞的意思，就在宴會桌上問翻譯章含之：黑格在北京的宴會上是什麼表現的？章含之說：黑格初到北京時，在中方的歡迎宴會上，姬鵬飛部長致了祝酒詞，黑格是致了答謝詞的。我心想，黑格這麼失禮，是不是瞧不起中國的地方當局？是不是把在北京受的氣出在我們身上了？我又想：黑格會不會忘了致答謝詞？我和章含之商量，要不要當場提醒他致一下詞？章含之覺得不妥，我也覺得不太合適，這樣做等於我們向他討答謝，太卑屈了。可是，我又覺得很尷尬，一場盛大的宴會祝酒有來無回，如何收場？

在等待的過程中，我要在宴會廳裏的外事組負責人馮國柱和等候在錦江飯店接待辦公室裏的王洪文通了電話，通報宴會過程中的情況以及黑格的表現，王洪文也覺得很傷腦筋，最後表示：如果黑格一直不致答詞，只好結束宴會看演出。就這樣，從七點鐘開始的宴會一直等到八點半，黑格仍無表示，我只好和在場的北京領隊商量後宣佈：結束宴會，到樓下劇場觀看演出。

當晚的文藝晚會是在友誼電影院的劇場舉行的，參加演出的都是上海的著名演員，演出的節目有音樂、舞蹈和雜技等，節目事先都經我嚴格審查過。美國客人的情緒很高漲，坐在我

旁邊的黑格也不時為精彩節目鼓掌。歌唱家朱逢博的獨唱特別受到歡迎。那天朱逢博濃妝豔抹，穿着短裙，唱了一首《哈薩克人民熱愛毛主席》。也許因為受到觀眾熱烈反應的鼓舞吧，朱逢博臨場發揮，在唱到“咪咪咪……咪咪”這一段時，她忽然把身軀擺動起來，這在當時的中國歌唱演出場合是罕見的。美國人卻因此興奮起來，特別是那幾位專機組人員，在一曲終了的時候都狂呼鼓掌，黑格也跟着他們叫“再來一個”。我卻在心裏嘀咕：這個朱逢博，發什麼“人來瘋”？我覺得她是過於熱情了。

整個晚會的氣氛很好，我也沒有流露出對黑格失禮的任何不滿，直到晚會結束，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我還是彬彬有禮、笑容可掬地和黑格一行告別。當我來到錦江飯店的接待辦公室時，王洪文還等在那裏。我們共同商量把外交部的領隊和翻譯請過來，一起回顧一下接待黑格的情況。大家都覺得今天總的接待工作是成功的，氣氛是良好的，但黑格不予回敬祝酒的行為肯定是失禮的，而對他究竟為什麼這麼做，卻分析不出一個確實的原因來。而且，現在宴請已經結束了，也找不到補救辦法。北京來的陪同說要向外交部彙報一下，當晚的事情就此結束了。

第二天上午，原定由上海市革會外事組的負責人張振亞陪同美國客人參觀上海工業展覽館，在出發之前，發生了一個插曲：新華總社發來一條參考消息，美國同意台灣當局向美國購買武器。外交部的幾個領隊一商量，覺得這倒是一個帶原則性的問題，你一方面派使者來中國商量總統訪問事宜，另一方面卻要把武器賣給台灣，對此我們應該表明態度。但考慮到如果由外交部出面，份量太重，最後決定由上海陪同人員出面，向黑格提一個抗議。上海當然服從外交部領隊的決定，在這些對

外表態的重大問題上，地方當局是無權作出任何決策的。於是，在參觀工業展覽館的中途休息時間，張振亞代表中方向黑格提出嚴正抗議，黑格表示還不清楚華盛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答應作進一步瞭解後再說。當然，由於這一抗議，使黑格下半程的參觀情緒，趨於低落。

### 毛澤東決定“升溫”

接二連三的這些事件，加上黑格在北京的表現，可能使外交部的領隊覺得對黑格的接待需要降一點溫。他們決定在上海通知下一站杭州的接待部門，降低一些接待的熱情和規格。眾所周知，周恩來總理早就規定對外接待工作一切要通過外交部，地方無權擅自發號施令。即使在文革時期，上一站和下一站的接待也統統由外交部佈置，上海的接待部門是不可以越過外交部向杭州佈置工作的，杭州也不會接受上海的指揮，必須聽外交部的，這是最普通的接待常識。外交部的領隊通知杭州“降溫”以後，黑格一行當天下午到杭州時遭到了一些冷遇：接待人員面色冷淡，西湖遊船不設點心和水果，主人的冷面和湖上的陣陣冷風讓客人感到了寒意。當時，外交部的接待班子中有“老派”、“新派”，兩派對杭州“降溫”的意見不一，引起了爭論，年長的一派主張適當“降溫”，年輕的一派認為“降溫”過度。中方人員在杭州晚宴後，就在杭州飯店會議室裏召開會議，一直爭論到深夜，沒有結果。最後，只能直接打電話向北京彙報，通過王海容，請示周總理，再請示毛主席。毛主席一直十分關心美國人來訪的一切細節，他從接待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大局出發，指示立刻“升溫”，挽回影響。

我們在上海接到了毛主席關於“升溫”的指示，而且外交部通知我們，黑格從杭州到上海轉乘美國專機回國，本是過

境，原定不再舉行歡送宴會，現在決定就在虹橋機場專設午宴歡送，而且要提高歡送人員的規格，讓王洪文和我兩個人同時以上海市革會副主任的名義出面歡送，由王洪文致歡送詞。最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從上兩次接待基辛格的情況彙報中，得知美國人愛吃中國糖果，放在賓館房間裏的糖果經常“不翼而飛”，“吃”得光光的，連糖紙都沒有留下，估計是帶回美國去送人了。毛主席指示：由上海加倍送美國人糖果，每人十斤。

我們連夜佈置，加緊準備。益民食品廠的工人為生產這批特製糖果通宵加班。當時上海產的酒芯巧克力和高級糖果馳名全國。福建省的領導人韓先楚曾要我們派技術人員，到福建去指導生產糖果，後來他又曾問我們：為什麼同樣的原料、同樣的工藝、同樣的機器，生產出來的糖果味道就是不一樣？我們認為，這是由於上海工人長期積累的工藝水準和生產經驗所決定的。這次為美國人生產的酒芯巧克力，一顆顆做成小酒瓶模樣，外包巧克力，內裹各種美酒芯，一咬一口葡萄酒，一咬一口茅台酒，真令人愛不釋手；同時，還趕制了白奶油巧克力、果仁巧克力等，外加每人送一頭碩大的用巧克力製成的兔子，每份糖果足足有五公斤(十市斤)重。由於份量較重，糖果裝進玻璃紙袋容易破損，就由上海制盒廠的工人連夜做出了一批六角型的禮盒，外面用考究的織錦緞包裝，裏面正好放進這十斤糖果。早晨，糖果禮盒送到虹橋機場的時候，盒子上黏貼織錦緞的漿糊還未乾透呢。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臨近中午，黑格一行從杭州直達上海虹橋機場，他們原以為在這裏和主人告別後直接登上美國專機離境，誰知主人把他們引入候機廳的二樓。黑格看到這裏已經被彩帶和燈籠佈置得五彩繽紛、喜氣洋洋，還安排下了一桌桌

豐盛的筵席，上海市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等都來為他們送行。黑格喜出望外，情緒高漲。當王洪文代表主人祝酒送行之後，黑格忙不迭地站起來致答詞，慶賀訪華任務的圓滿完成，預祝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取得成功！他還特意走到我的面前和我碰杯，感謝上海的盛情款待。更令黑格等人感到意外的是：宴會的最後出現了高潮，當一個個精美的禮盒送到他們每個人手裏的時候，黑格打開禮盒，看到那麼多眼花繚亂的精美的糖果，他連聲驚呼：“Nice！Nice！（太精彩了！太美了！）”我看到專機組的一個黑人駕駛員，雙手捧着禮盒，歡呼雀躍，兩步一跨奔上舷梯登機而去……他萬萬不會想到，這盒糖果正是毛澤東的外交杰作之一。

一個多月以後，即一九七二年的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循着黑格一行走過的路線，開始了他的訪問中國的“破冰之旅”。

## 第二十章

# 批判周恩來的會議記錄為什麼要燒毀？

在高文謙著的《晚年周恩來》和在劉武生著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這兩本書中，都寫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來的擴大會議。高書寫道：“順便一提的是，有關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已經全部銷毀。”劉書寫道：“由於中央檔案部門沒有保存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塵封了整整三十多年的這樁歷史公案，只能從某些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中窺見。”

我看了以後感到很納悶：如此重要的會議的原始記錄，怎麼會“沒有保存”呢？如此珍貴的中央檔案，怎麼會“全部銷毀”呢？在高書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鄧穎超同周恩來傳記組的談話，倒是透露了一些銷毀的過程。據鄧穎超說：周恩來臨終前，曾向鄧穎超談了對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一件是伍豪啟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講了這次會議給他加的種種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結束後，鄧穎超和葉劍英聯名向中央寫信，要求給這件事平反，經由華國鋒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記錄後全部銷毀。

看了這些文字，並沒有解開我心中的疑團，我一直想要證實和探究這件燒毀檔案的重大事件，而覺得不能“順便一提”，輕輕放過。因為在任何國家、任何朝代，燒毀重要檔案、特別是中央的核心機密檔案，都是不能允許的。

## 批周會檔案已被證實全部燒毀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原秘書趙焯，在耿飆的女兒耿弘的陪同下，來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裏，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蘊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見面，見了面自然有說不盡的話題。趙焯已經有七十多歲高齡了，但她雙鬢微白、精神矍鑠，至今仍在各地講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生平事蹟。

在交談中，我向趙焯證實燒毀批周會檔案的事。趙焯告訴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經毛澤東親自決定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原始記錄，確實已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鄧穎超的直接監督下，由趙焯等人動手燒毀了！

趙焯對我說：政治局批周會，批得可兇了，鄧小平也在會上發了言，對周批得很厲害。批周會結束以後，毛主席說過要把材料燒掉，但是一直沒有燒。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復出了，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鄧大姐找葉帥商量，由兩個人聯名寫信給中央，要求平反，並說毛主席指示過要把政治局批周會的材料燒掉，要求照辦。經過華國鋒的批准，由胡耀邦從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取出政治局批周會的材料，全部拿到鄧大姐的辦公室。由我和小高(警衛員高振普)當着鄧大姐的面，把原始記錄全部燒毀，只留下一份簡單的目錄。

政治局批周會的檔案，終於證實已被全部燒掉了。關於政治局擴大會批判周恩來的情況，過去一直是嚴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極小範圍內的少數人知道。我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上海市委書記，在文革期間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會議。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從未向上海市的領導透露過任何有關信息。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在批判江青等人的過程中，才逐步

地把批周會的內幕揭開。

時至今日，在海內的權威出版物中，總算有了關於這次會議的介紹。例如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中寫道：“(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初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江青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達心地作了檢查。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誣衊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之後，江青將要求增補她本人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毛澤東。十二月九日，毛澤東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提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

從上述文字來看，政治局批周會就是江青、姚文元等人對周恩來的“圍攻”和“誣衊”，而且江青等另有野心，想當“常委”；毛澤東雖然提議召開此次會議，但及時發現了江青等人講的“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迫不及待”等錯話，“保護”了周恩來，並制止了“增補常委”的陰謀。既然如此，政治局批周會的原始記錄豈不正是揭露“四人幫”反對周總理、陰謀奪權的絕佳材料，妥善保存和大量引用還來不及，卻為什麼要在江青等人被捕、判刑之後急於燒毀呢？鄧穎超、葉劍英要求為批周會平反，這是合理的，中央據此作出平反決定就可以了，為什麼偏偏要把中央的重要檔案全部燒毀？此中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帶着這樣的疑問，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並找了相關的人員作了瞭解，終於對這宗疑案有了初步的結論。

### 批周會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的

批周會的起因全在毛澤東。

林彪事件以後，從一九七二年起，周恩來就着手在各個領域包括外交領域糾正林彪的極左影響。可是毛澤東擔心反對極左反下去會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找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提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周恩來的批極左就再也批不下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來要外交部對美蘇峰會進行研究，外交部當即出了一期《新情況》，認為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後，對世界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周恩來對這期《新情況》加以稱讚，毛澤東卻認為不符合他對國際形勢的一貫分析。七月四日，毛澤東不找周恩來，偏偏找正在籌備中共“十大”的張春橋、王洪文談話，對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評：“我常吹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名為批評外交部，實際點了周恩來的名：“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毛澤東“勸告”張春橋和王洪文：“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毛澤東在這裏把話說得夠重了：什麼“屁文件”，“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上他們的賊船”，“搞

修正主義”等等，完全把問題的性質上綱上線到“路線鬥爭”的高度。當天晚上，張春橋向政治局和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當然覺出了這個批評的份量，一邊撤回外交部《新情況》，一邊向毛澤東寫檢討。七月五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信上批道：“此類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但是，事情並沒有了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和周恩來作了四次正式會談，三次單獨會談。在會談時，周恩來都是嚴格按照毛澤東確定的口徑談話的。十一月十二日，基辛格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了毛澤東，基辛格說蘇聯要摧毀中國的核能力，而美國“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基辛格想讓美國替中國提供核保護傘，這使一向強調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的毛澤東感到極大的不快，他當場向基辛格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蘇聯“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毛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保護”。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周恩來和葉劍英同基辛格作了最後一次正式會談，商定了“公報”的措詞。“公報”全文送毛澤東審定。會談本已結束，基辛格也將在十五日上午離開中國。但是，就在啟程回國前幾小時，基辛格又突然提出，要單獨拜會周恩來，希望就中美軍事合作問題進一步交換意見。周恩來馬上用電話請示毛澤東，回答是主席已經服了安眠藥入睡了。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佳，不忍心叫醒他，但對基辛格又覺得不見不好，就在譯員唐聞生的陪同下與基辛格作了單獨會談。

會談時周恩來對於基辛格提出的問題，由於未及請示毛澤東，所以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只是答覆：此事需要進一步考

慮，等以後再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在基辛格後來寫的《基辛格秘錄》一書中，在“會談備忘錄”裏也記下了周恩來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周總理：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具體和十分複雜的問題，因此在同你方協商之前，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作為一國總理，這樣回答並未喪失原則，要說有缺點的話，就是沒有按照毛澤東的精神，當場頂回去，同時在事後又沒有把最後一輪單獨會談的情況補報毛澤東。

誰知，情況傳到了毛澤東那裏，就成了周恩來的重大罪錯。以毛澤東在民族獨立問題上的氣魄和敏感，他認為周恩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不向他請示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任務，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毛澤東對此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親自召見周恩來和外交部的有關人員，批評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還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毛澤東嚴厲地說：“當着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這樣，就決定由周恩來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周。

開了兩天小會，江青批判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接受美國“核保護”。周恩來對毛的批評作了初步檢查，也做了一些辯解。江青當場斥責他：“你這個人就是囉嗦！要談實質性問題！”周恩來的態度激起了毛澤東更大的不滿。毛澤東嫌政治局小範圍批周還不夠，要進一步擴大範圍、肅清影響，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除了年老多病的，20來人都要參加批周，連當時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也被指定列席會議。會場從釣魚台改到人民大會堂，擴大的名單由毛澤東親自擬定，計有：外交部的部長、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中聯部部長耿飆，再加外交部的四個“小字輩”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批周會改由王洪文主持，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的“幫助小組”。毛澤東還指定王海容、唐聞生做他的聯絡員，隨時傳達他的指示。

### 毛澤東為批周會定調

批周會開始時，為了讓與會者瞭解毛澤東的意圖，先由唐聞生原原本本地傳達毛澤東對周恩來和對外交工作的批評，前後整整講了八個小時。毛澤東指責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不執行他所制訂的外交方針。毛澤東還聳人聽聞地指出：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這就為周恩來的“投降賣國”的罪名定了調子。

在傳達時，王海容、唐聞生又對七月份毛澤東關於“上他們的賊船”這句話作了說明：毛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不要上喬老爺(喬冠華)、姬老爺(姬鵬飛)的賊船”。在談話記錄送審時，毛澤東把喬、姬兩人的名字刪掉了，這裏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喬、姬兩人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根本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闆，能夠當得上賊船老闆的只有林彪那號人物。毛澤東大筆一刪，便把周恩來和林彪相提並論，這又為“路線鬥爭的頭子”的頭銜定下了基調。

與會的人聽了毛澤東指示的傳達，都感到震驚。就像喬冠

華後來所說的，聽了聯絡員傳達毛主席的話，簡直“毛骨悚然”。

毛澤東一聲號令，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炮火連天，與會者紛紛指責周恩來“嚴重右傾”，“修正主義”，“屈膝投降”，“喪權辱國”，“目無中央”，“矇騙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華國鋒、紀登奎、吳德、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等無一不發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員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態批周。

與會的章含之後來在她的回憶錄《我與喬冠華》裏寫了一段話，說出了當時的心理狀態：“儘管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前程’，隨着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而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雖然說得躲躲閃閃，但卻道出了幾分真實，並且說明與會者“沒有一個”不對批周表態的。

至於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會上當然跟得更緊，江青嚷嚷的“投降主義”、“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頭子”，根據就是毛澤東批評周是“修正主義”的“兒皇帝”和“賊船”的“老闆”，只是上綱上得更高，差一點就可以把周恩來打倒了。

據原在王洪文處工作的蕭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訴我：王洪文當時主持批周會，每天深夜把會議的原始記錄從人民大會堂帶回釣魚台，便由蕭木和秘書小沈用鉛筆把原始記錄原原本本地謄抄成一號鉛字般大小的中字，呈送給目力不濟的毛澤東閱看。蕭木說：“原始記錄是一個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說明毛對這個會上的發言非常注意，每個人的發言都要看，他

是直接領導會議的。”為了保密，記錄不能送到印刷廠去排印，只能手抄。

由此可見，《周恩來年譜》認為批周會是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的“圍攻”、“斥責”和“誣蔑”，顯然是片面的，完整的說法應該是：“在毛澤東的親自策動和指揮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對周恩來作了圍攻、斥責和誣蔑。”

在這裏需要補敘一個插曲：過了一段時間，當時參加批周會的喬冠華在接待外賓時見到周恩來，向周當面表示自己在會上的發言對不起周恩來，請求原諒。周恩來慨然說：“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可見，周恩來對於誰要整他，完全是心知肚明的。

### 鄧小平既捧毛澤東又誅周恩來

鄧小平當時只是十屆中央委員，還不是政治局委員，但是毛澤東卻指定他參加批周會，要看他在會上的態度和表現。

鄧小平在會上發了什麼言？他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 文革歲月》一書中這樣寫道：“鄧小平剛剛恢復工作，連政治局成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會議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之後，到了最後一兩天，他發了一個言。發言一開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一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周恩來。但寥寥數語之後，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講怎樣看待國際戰略形勢的問題。”

照毛毛這樣說法，鄧小平只是“寥寥數語”批評周恩來，這能夠使毛澤東滿意嗎？事實上，毛澤東十分關注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在會議過程中，他專門向王海容、唐聞生瞭解鄧小

平的表現，一再追問他發言了沒有？毛毛自己也寫道：毛澤東聽說鄧小平發言以後，一時興起，想馬上把鄧找來作徹夜長談，只是因為當時已是深更半夜，一時找不到人，只好作罷。

這就產生了矛盾。鄧小平如果只是“寥寥數語”批評周恩來，怎能引起毛澤東的讚賞，並且馬上要把他請來作“徹夜長談”呢？

終於，我們從紀登奎的談話中知道了真相：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訪問了十屆、十一屆政治局委員紀登奎，作了一個談話紀錄。紀登奎說，鄧小平在會議快要結束時才作了發言，鄧小平“提醒”周恩來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鄧小平的“提醒”真是份量很重：你現有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距離主席是“一步之遙”，只有你有資格“可望而可即”，取毛主席而代之，希望你警惕。鄧小平不像江青說得那樣露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他說得更高明，更含蓄，既捧了毛澤東，又“誅”了周恩來，令周恩來更加有口難辯。事實上，十分本份的周恩來自遵義會議以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念頭，他一直非常小心謹慎，避免“功高震主”。所以，他對鄧小平和江青的發言感到非常委屈，最後只得在檢討裏寫上：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以表明自己的心跡。

鄧小平憑着和周恩來幾十年的交情，明知周沒有這樣的非分之想，卻偏要這麼講，完全是為了取悅於毛澤東。果然，毛澤東在得知鄧小平作了這樣有份量的發言之後，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這才動起了和鄧小平作徹夜長談的念頭。

鄧小平通過了毛澤東的“考試”，毛澤東才下決心重用鄧小平。十多天後，毛澤東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毛澤東在會上宣佈：“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

就在這個會上，毛澤東還不忘記繼續“敲打”周恩來，指責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呀！”他還借打仗說事：“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說明他餘怒未消，繼續向周恩來發出警告。

#### 燒毀批周會記錄原因何在？

在歷時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會上，周恩來受盡了侮辱和委屈，茶飯無心，夜不能寐，連鬍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來。他在會議期間，忍受着膀胱癌帶來的痛苦，一邊聽批判，一邊還要時時離席上廁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見毛澤東作檢討，毛不同意，要他在會上檢討。江青又不讓別人幫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寫檢查。周恩來向兩個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小字輩”提出請求：自己年紀大了，眼花手抖，記不下別人的批判內容，想請她們說明，又被斥為想通過她們摸主席的底。最後，周恩來對毛的定罪無法聲辯，他只得相忍為黨，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發作的病體，寫了一份言辭懇切、上綱上線的檢查。和周恩來一起參加中美會談的葉劍英，這次也“陪綁”一起挨批。葉劍英也寫了一份檢討，題目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他們兩人在會上作了檢查，又挨了一頓批。

至此，毛澤東看到人們稱道的“周恩來外交”的威風已經



掃地，對周恩來的氣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說林彪出事以後政治局總要有人負責，周恩來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來充“好人”了。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檢討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會見尼泊爾國王和王后時，毛澤東當着周恩來的面對這次批周會議表示滿意，認為開得很好，講清了問題，同時批評有人說錯了兩句話：“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迫不及待”。他對周恩來說：“總理呀，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還指着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還說：“總理可憐啊，被這幾個娘們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來，卻把責任推到“小字輩”“幾個娘們”頭上，難怪王海容、唐聞生等人心裏不服，只得背後發牢騷說：“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於是，一場高層的批鬥會至此正式落幕；時至今日，隨着內情的不斷披露，批周會的真相也逐步大白於天下。我們所探索的燒毀批周會原始記錄的原因，終於露出了端倪：

一、是為了替周恩來、葉劍英平反，把他們的檢討燒了；

二、是為了保護復出的鄧小平，保護“英明領袖華國鋒”等人，把他們批周的發言統統銷毀了；

三、是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歸咎於江青等“四人幫”；

四、是為了掩蓋中共高層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五、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就是保護了批周的總後台、總指揮——毛澤東。

墨寫的記錄是可以燒毀的，但是歷史卻銷毀不了。它鑄刻在世紀的崖壁上，隨着時間的磨洗，一筆一畫，越來越清晰地顯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實面貌。

## 第二十一章

# 我給毛遠新做“大媒”

毛遠新在文革期間是個名聞遐邇的人物。

革命烈士毛澤民的兒子，偉大領袖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在新疆，全國解放後到北京，長期生活在毛澤東和江青的身邊。在北京讀完了育英小學、一〇一中學，憑自己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一個學期後轉學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 毛遠新是怎麼聞名全國的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遠新從學院回中南海，七月五日，毛澤東和他作了一次長談，這就是後來由教育部發至全國的文件：《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

毛澤東對毛遠新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我曾經反復學習毛澤東的這些論斷，並預感到在文教戰線上正在孕育着一場大風暴。我也知道了毛遠新其人，為他能在毛澤東身邊親聆教誨而無限欽羨。

毛澤東啟示我們：“為什麼不反？”文革開始後，我在上海“反”了，毛遠新在哈爾濱也“反”了。他組織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成為東北地區的紅衛兵領袖。

毛遠新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寫了一張較有影響的大字報，分析了當時的保守派和造反派。

他寫道：“保守派中有一些過去享受榮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還有一官半職，手下也有一些群眾。這些人工作踏實，忠實職守，這是長處。但是由於他們經常聽上級的指示和命令，去指揮群眾，又由於他們能嚴格的遵守這些東西，而從上級得到榮譽，所以這些人容易養成唯命是從的奴隸主義，頭腦的框框就多些。這樣的地位會使他們過於相信自己，過於相信上級，以致對於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傳下來的私貨，對黨內那些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推行的與毛主席的政治路線相對抗的組織路線一概沒有異議，有些人則中毒較深。”

他又寫道：“造反派中到處是過去一些‘調皮搗蛋’的人，他們是處於被領導的群眾。這些人生活上有些散漫，是短處，但也有很多長處，這就是看問題尖銳，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敢於造自己認為是錯誤的反，他們是沒有地位，沒有榮譽，又不被重視，所以他們不怕丟掉什麼，也不想撈取什麼，他們敢想、敢說、敢造反。所以這些人一經被毛澤東思想所掌握，就會成為真正的唯物主義者。”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他的大字報分析深刻，鞭辟入裏。

## 我和毛遠新的交往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遠新擔任革委會副主任，以後又任遼寧省委書記、瀋陽軍區政委，這樣我們就開始了比較密切的交往。

每次中央開會，與會人員大都住在京西賓館，王洪文和我總要去看望毛遠新。他經常和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住在一

起，穿着一身空軍軍裝，綠上裝、藍長褲，因為他從哈軍工畢業後便參加了空軍，當過防空部隊的導彈兵。他比我要年輕八歲，中等身材，長相英武，雙目炯炯有神。他的嘴唇上有一處傷痕，據說是一次車禍造成的，縫了幾針，總算沒有破相。他抽煙很兇，房間裏全瀰漫着煙霧。每次去看他，總看到他在看書，有一次他在讀線裝書明代思想家李贄的《焚書》。據他說，毛主席非常推崇李贄，說古人中像李贄那樣的封建社會的反叛者是罕見的，他反對程朱理學和一切偽道學，否定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同情下層人民的疾苦。我聽了以後，回到上海也借了李贄著的《焚書》讀了起來。

毛遠新在談話時喜歡縱論天下大事，觀點很尖銳，口氣很大，有點“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味道。一九七零年中共舉行了九屆二中全會，林彪等人大鬧廬山。一九七一年四月，北京舉行批陳（伯達）整風會議，各省、市委書記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到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遠新在會上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大鬧廬山是一次未遂政變！”我當時覺得振聾發聵，很受啟發。林彪還在位，只有毛遠新敢於這樣講，我既不敢這樣想，也不敢這樣講。心裏對他很欽佩，把他的傲氣也當成優點看待。

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開會期間，請各省、市代表團提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我覺得根據我對他多年的接觸和瞭解，他應該有資格擔任這個職務，我就在上海組的會議上正式提名他為中委候選人。誰知道這個建議遞交上去不久，就下達了毛主席的意見，說是根據“親者嚴、疏者寬”的原則，毛遠新不宜進入中央委員會。為此，我更加對毛主席充滿熱愛，對毛遠新表示尊重。

## 我意外地成了毛遠新的“大媒”

過了一段時間，我竟然介入了毛遠新的婚戀，做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媒”。

我回上海以後，有一天，一位軍人持瀋陽軍區的正式介紹信到上海康平路市委辦公地點來找我。他是瀋陽軍區作戰部的陳部長，也是毛遠新的秘書。我在康平路小禮堂單獨接見了他。他是一個憨厚的東北漢子，直率地告訴我：毛遠新已經三十多歲了，大家都關心他的婚戀，但是毛主席有過指示：找對象不要找高幹子女，要找工農子女。這可不好辦了，平白地到哪裏去找工農子女做戀愛對象？這次有了一個機會，瀋陽軍區門診所有一位護士長，姓全，上海人，參軍到了瀋陽，人長得很漂亮，但她自己已經結婚了，她家裏還有好幾個姐妹，有一個小妹妹叫全秀鳳，在上海做紡織工人。別人鼓動她把妹妹介紹給毛遠新認識，交個朋友。毛遠新在軍區衛生所也見過這位姓全的護士長，從姐姐的相貌可以想見妹妹的模樣，而且妹妹又是上海的紡織工人，如果政治條件合格的話，他也願意接觸一下，雙方見一次面。

這位陳部長此次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要上海對全秀鳳的家庭情況、政治歷史、個人表現等作一個全面的瞭解，以便考慮是否合適由姐姐把妹妹請去瀋陽“相面”。我聽了覺得此事非同小可，我們要為毛遠新選一個合適的對象，實際上是為毛澤東選一個合格的侄媳婦，而且毛遠新長期生活在毛的身邊，毛對他視同己出。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慎重對待。

陳部長就住在延安飯店等待回音，我不敢怠慢，趕緊把王秀珍叫來商量。王秀珍說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也給她打了電話，希望上海促成此事。我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只能在極小範圍內進行。我們把市委組織部門的負責人找來，

叫他指定兩名可靠的幹部，集中時間對全秀鳳的全面情況進行瞭解，寫出詳細的書面材料。但我們根本沒有告訴組織部門這項任務的真實背景。

三天過去了，兩名組織幹部跑遍了所有的部門，整理出了一份詳細的書面材料，送給我面前。我仔細看了一下，這次真是查了三代了：全秀鳳的祖父，是上海的碼頭工人；父親是上海的運輸工人，當時是開三輪卡車的；至於全秀鳳自己，在上海的中學畢業後就進廠當了紡織工人，二十幾歲的年紀已經有三年工齡了，而且是共青團員。家裏的哥哥、姐姐等不但政治歷史清楚，而且個人表現都不錯。這樣的基本條件，可否當得上毛家的媳婦呢？

我把書面材料交給了陳部長，陳部長很高興，再三稱謝，帶上材料就回瀋陽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陳部長又來上海了，連稱書面材料已經給遠新看過了，政治條件是合適的，也符合毛主席提出的要找工農子弟做對象的要求，但還是要當面見了人再確定是否可以發展戀愛關係。這次他們設計了一個方案：由瀋陽軍區門診所的全護士長邀請妹妹全秀鳳到瀋陽去玩，住上幾天，找一個機會讓毛遠新和全秀鳳自然地見個面，再看他倆雙方的意思。所以，陳部長這次來上海，就是代表全護士長邀請妹妹並陪她一起去瀋陽的。

我看這件事有了初步的結果，當然很高興，但是我想：上海送去的只是全秀鳳的書面材料，至於她本人究竟是什麼模樣的，連我們上海的這些“娘家人”也不曉得，我想找一個機會和全秀鳳見個面，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數。我和陳部長商量，他要帶全秀鳳去瀋陽，她們姐妹多時不見了，這次會面總要捎些禮物去。當時物資供應比較緊張，上海的羊毛衫質地好，款式

新，是女青年的最愛，但是一般人買不到，只有友誼商店可以特需供應。我可以告知東湖賓館市委招待處的女幹部陪同全秀鳳一起去選購。

陳部長徵求了全秀鳳的意見，她果然同意買幾件羊毛衫帶去瀋陽。於是，約定有一天在東湖賓館市委招待處會合，我也按時到東湖賓館去。陳部長把全秀鳳向我作了介紹，我叫她小全，隨意地和她聊了一聊家庭情況和個人經歷。全秀鳳不愧是上海出生的姑娘，長得很俊秀，筆挺的鼻子上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說一口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顯得很大方，很得體，說話文雅，不扭扭捏捏，一看就討人喜歡。我心中有了底，覺得這樣的上海姑娘是有“台型”、有風度的。我們談了一會兒話，她就隨着招待處的女幹部到友誼商店去了。

之後，就是毛遠新和全秀鳳兩個人在瀋陽的多次接觸了；又過了幾個月，好消息傳來，說是他們雙方都彼此滿意；再過了一段時間，陳部長到上海，給我們送來一筐東北蘋果，還說遠新和小全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特別告訴我們，毛遠新已經帶全秀鳳到北京去拜見過毛主席了，毛主席對這位侄媳婦表示很滿意。我們聽了更是興奮和欣慰，上海做的這門“大媒”總算有了圓滿的結果。

### 毛遠新的大起大落

毛遠新和全秀鳳在瀋陽結了婚，成了家，我們沒有送過禮，也沒有喝上喜酒，只是有一次，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委負責人會議，我們在京西賓館遇上了毛遠新，我和王秀珍纏着毛遠新討喜糖。我說：“在我們上海，謝媒人是要吃十八隻蹄膀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也在一旁幫我們說話：“是應該謝大媒，買糖！買糖！”毛遠新拗不過我們，就到京西賓

館小賣部去買了一些高級糖果，請我們吃，堵了我們的嘴。

一九七六年，我到北京去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看到毛遠新身份變了，成了毛主席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別的中央領導人都難以見到毛，但毛遠新卻可以經常接近毛。毛關於批鄧的一系列指示即所謂的“十二道金牌”，都是通過毛遠新向政治局傳達的，毛遠新成了“欽差大臣”。他還告訴我們，他和鄧小平當面發生過尖銳衝突和激烈爭論，鄧堅不承認自己搞“修正主義”，毛遠新敢於當面批駁他。此時的毛遠新，給我的感覺不單是傲氣，而是有些張狂了。此外，我聽說全秀鳳已經隨毛遠新多次到北京去探望過毛主席了，我暗暗地為他們高興，同時，傳來訊息說全秀鳳懷孕了，我心中祝福他們有一個健康的寶寶、幸福的愛情結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我到北京去守靈，看到毛遠新在毛澤東的遺體旁邊忙碌。沒有想到：幾天以後，他就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起被抓起來了。

文革結束以後，毛遠新在遼寧的所作所為都遭到了清算和批判，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七年，他的妻子全秀鳳也被隔離審查，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女兒李莉，成了一個雙耳失聰的聾啞人。

毛遠新在被關押了十多年以後，於一九八九年保外就醫，開始時住在江西他的生母朱丹華和繼父方志純處，後來考慮到夫妻長期分居，領導批准他調來上海和全秀鳳同住。一九九三年毛遠新刑滿以後，被分配到上海汽車工業質量檢驗研究所，化名李實，這個名字還是他下鄉參加“四清”時毛澤東給他取的。他努力工作，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現在，毛遠新和全秀鳳都已退休。女兒李莉愛好美術，考上了上海聾啞青年技校美術班，畢業後參加工作，又考取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聾啞人成



人教育大專班，繼續深造。

作為“大媒”的我，至今卻慶幸毛遠新虧得聽了毛澤東的話：不找高幹子女做對象，找了工農子女。正因為如此，毛遠新晚年能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能和普通老百姓一樣過上平靜的日子。

## 後 記

遭受到景賢意外發病突然去世的打擊之後，家人們忙於喪事並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沉浸在極度悲傷中難以自拔。後來逐漸接受現實、緩過神來。當發現景賢留下的一些遺物後，我決定要為景賢做些什麼，便強打起精神，開始了搜集、整理遺稿《十年一夢》續集的工作。在這段日子裏彷彿依然與景賢相聚在一起——我們一起經歷風風雨雨，一起品嚐生活艱辛與苦澀。因為是在一起，自然也是溫馨的。直到校閱完了書稿的最後一頁，摘下老花眼鏡，揉揉發酸的眉間，這才像是突然一下回到了現實，回到了這個空蕩蕩的家，剩了一個孤寂的我。

我抬頭仰望景賢那幅掛在牆上的遺像，淚水又止不住流了下來。

2007年10月31日下午四時許，因突發急性大面積心梗，導致循環、呼吸系統衰竭，經120急救中心搶救無效，景賢在家中溘然長逝，沒有留下隻字片言。

當時的我，心如刀絞，腦子裏卻是一片迷茫。一直下意識地不斷呼喚着他的名字，彷彿他只不過是睡着了，我要把他叫醒。我要對他說，我倆生離的苦澀剛剛退去，好日子還沒有過夠，就此死別了嗎？！心有不甘！我要對他說，作為外公、外婆、父親、母親，我們還有許多希冀和祝福的話要對兒女們敘說。我還要對他說，作為剛剛過去的那個難忘的世紀的見證人，我們總還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更何況，執子之手，與之諧老，這是他從提籃橋監獄回家時親口答應過我的。他怎麼能獨

自一人、悄無聲息地就這麼走了呢？！

我不停地撫摸着他那涼涼的面頰，梳理着他那依然顯得黑黑的頭髮，我要叫醒他。因為我和孩子們都不能沒有他。

女兒、女婿們聞訊趕回來了。泣不成聲，流着眼淚，替爸爸擦洗身子，換上他平時最喜歡穿的衣服。

親友們聞訊趕過來了。致哀、告別，帶着無盡的哀思和惋惜，下樓而去。

這一夜，我就靠在他身邊，凝視着他安詳而顯得消瘦的臉龐，往事歷歷在眼前浮現……

我和景賢相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51年8月，剛剛高中畢業的他，因為市政工作建設的需要，被分配到我當時所在的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志同道合、意氣相投，使我們彼此由好感而相戀，五年以後，我們結婚了。

這一時期的景賢，由於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出色，倍受領導上的重用和培養。工作之餘，他喜愛寫作，曾先後寫出了報告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散文集《生命似火》等文藝作品和許多評論文章，頗受領導的讚賞和讀者的好評。他與陳耘、章力揮合作完成的話劇《年青的一代》劇本，還獲得過國家文化部頒發的優秀話劇獎。

好景不長。1966年“文革”開始了。先是一向被市委領導倚重的他，不知怎麼的竟成了領導們逃避群眾批判的擋箭牌和滅火機。常有這樣的揪心事發生：市委書記、市長們東躲西藏，卻要他出面去東推西擋。群眾自然不答應，指責他是走資派的鐵杆老保。後來，在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和寫作班同事們的促進下，他終於醒悟，放下了正在替曹荻秋寫的檢查，造反了。

誰知當“老保”不得安生，“造反”了還是不得安生。1967年1月29日清晨，我單位裏的同事電話告訴我，徐景賢於1月28日凌晨被一起造反的紅衛兵小將們抓起來了。還說好像關在復旦大學校園內。我趕忙去機關聯絡站找勤務組成員詢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頭頭都不在，有個工作人員告訴我，人是在被復旦紅革會抓走的，是不是關在復旦，卻說不準。當時機關聯絡站有人去復旦設法營救徐景賢，我即隨之同去探望，終於在一學生宿舍二樓見到了他，看到他還算安全，問了些情況，我就回家聽候消息。1月30日我聽說中央文革特急電報已到，其中第二條：必須立即釋放無理綁架的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負責人。景賢也打電話回家，說他已經回到機關聯絡站了。這時我才放心下來。豈知我這一生中，常人難以想像、難以堅持的苦難歷程，卻由此開始了。

隨着歲月的流逝，我慢慢地發現已經當上市委書記的他過得並不快樂。別看他在場面上笑容可掬、從容不迫，講起話來滔滔不絕，回到家裏卻時常心事重重，彷彿有天大的難事無法排解。後來才知道，他之所以不開心，全都是為了市委領導間的同而不和。表面上叫親密戰友，實際上爭權奪利、傾軋不斷。他看不慣從原工總司提拔上來的一些新幹部搞特殊化，想向在北京的張春橋反映情況。景賢畢竟是一介書生，雖有做好官的心，卻實在不是做官的料。正因為如此，他這市委書記當得也實在辛苦。可惜，這辛苦多半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用在許多瑣事的“內耗”上面了。

一晃十年。

1976年毛澤東去世還不滿一月，一場大禍，突然降臨到我們全家頭上。時任市委書記的景賢，一夜之間被說成是上海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組織者！後來，景賢被判十八年監禁的主要依

據，竟然就是組織反革命武裝叛亂這一條！

回想當時的情景，至今依然迷惑不解。那年的10月8日，多個渠道傳來消息，說中央出事了，作為上海第一、第二書記的張、姚又遲遲聯繫不上。又過了兩天，中央王、張、江、姚四個人被抓的消息，逐漸傳播開來。而市委領導們至此仍沒有收到黨中央下達的任何正式文件和通知，因此，大家既緊張又疑惑，搞不明白中央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景賢為此到處打聽消息，並召開一系列的會議商量，召集民兵待命，準備應付突發事件。10日下午，也是在沒有任何明確交代的情況下，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立即去北京開會。景賢到北京後，當晚打回上海的第一隻電話，就是通知上海市委，立即停止一切應變活動，穩定上海，一切等他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後再說。

當我還在疑惑不解的時候，景賢卻大包大攬的把這一切都承擔下來了！這又是為什麼？是為個人未來的命運考慮而患得患失？還是屈服於各種壓力？還是因為在中央專案組宣佈的上海第一批逮捕法辦的十個人中沒有他的名字而心存幻想？

驚魂未定，還沒有來得及與他商量、與他溝通，他便被專案組的人從家裏帶走了。沒有任何手續，不知帶往何處，也不允許家屬探視。接下來，就是抄家、搬家……當我獨自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這破碎了的家庭時，一度幾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氣。但看到尚未成年的兩個女兒，年邁的公公、婆婆，咬緊牙關，承受命中註定的這一切！我想，我是解放前夕參加革命的黨員，應該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早晚會有還景賢清白的一天！

惴惴不安中，到了1981年。就在王、張、江、姚案由北京特別法庭審結後不久。有一天，有關方面突然通知我去監獄醫

院探視徐景賢。來人簡單地告訴我，徐景賢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都不大好，要我去向他宣傳黨的政策，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懷着異常焦急的心情，趕緊收拾了一些必要的東西，跟着他們就走。因為我們已有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我要珍惜這次見面的機會。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許久不見，眼前的景賢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人瘦得脫了形，神情呆滯，看到我來，像陌生人一般，沒有絲毫愉悅的表情。見他這個樣子，我心疼得眼淚奪眶而出，曾經有過的一些疑慮，終於得到了證實。那就是特別法庭對王、張、江、姚一案的重判，徹底毀滅了他有可能因為態度好而受到從輕發落的幻想。他終於明白了，在對待王、張、江、姚一案的態度上，無論他怎樣積極表現，無論他怎樣竭盡全力配合乃至迎合專案組的調查，無論他怎樣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保持一致，其結果都是一個樣，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費。他因而失去了繼續往前走的信心，對於自己的未來，對於他本想爭取的較好結果，徹底的失望了。

他木然呆立在病房的鐵窗前，嘴裏說着看到大樹開花啦這樣的胡話。猛然間，我想到了瘋瘋癲癲的馬天水。我害怕極了，我的心抽搐着。此時此刻，去對他說黨的政策還有什麼意義嗎？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儘量平靜地對他說，會開花的大樹當然有了，那是廣玉蘭呀。我猜，你是想女兒了吧？家裏的人，爹爹、孃孃（指繼母）和兩個女兒都平平安安的，就是非常想念你，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家。那天，我特意給他帶了一些有很多風景畫的畫報，想讓他放鬆放鬆心情。我一邊翻動着畫報，一邊對他說，我倆結婚後，忙東忙西，總也沒有機會一起出去走走。將來等你回家後，我們一定要把全國的名山大川遊個遍。我囑咐他，身體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體，什麼都可

以從頭再來。我會等着他回家，不管等多久，直到再相聚首的那一天，誰也不許失約。

自從我去探視過以後，景賢的病情有所好轉。也許是親情在起作用？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在乎親情的人，也許是他終於從徹底失望的牛角尖裏鑽出來了？因為，我還知道，他對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不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只是需要假以時日。記得我們還在談戀愛的時候，就曾互相激勵，要時刻準備着去經受人生之路上風霜雨雪和荊棘叢生的考驗。……可能還有許多的也許，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無疑，他畢竟還年輕，經受的打擊雖然沉重，還不至於走上馬天水那條路。這是不幸中之萬幸。雖然團聚還在遙遠的將來，人在就好！

又過了一段時間，景賢從醫院轉至監獄服刑。他的刑期長達十八年。從他入監的那一天算起，監獄方規定，家屬可每月探一次監，會見時間只有一刻鐘。監獄的所在地離家很遠，路上來回得花三、四個小時。但是，為了能夠見上一面，為了能帶給他一些精神食糧(書報等)和物質營養品，就算路程再遠，就算天上落鐵，我也絕不放棄。因為，相見雖然短暫，卻是我們彼此能夠在艱難歲月裏堅持下去、堅持到底的精神支柱。我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長期來獨自挑起一副家庭重擔，時常會產生再也撐不下去的感覺。這種精神狀態，在探監的時候，難免有所流露。景賢就會拿李商隱的《夜雨寄北》來勸慰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這詩中“君問歸期未有期”，是最觸動我心境的一句，只要這句話一出他口，我便抑止不住滿腔的辛酸，淚如泉湧。這時，景賢想用他的手替我抹去眼淚，但冷酷的鐵柵欄生生地將我們隔開。在默默注視着對方的眼神中，我們都無可奈何的讀到了這樣的五個字：“但願人長久”，是啊，我和

他，除了還有這一點點的願望外，確實是什麼都沒有了。

願望總歸只是願望而已。到了1992年，十五年的牢獄生活，使景賢原本就有的胃病、高血壓、叢集性偏頭痛未見好轉，又加上長期蹲監獄睡地鋪而得的關節炎、腰椎間盤滑脫，真是雪上加霜。我也是心力交瘁，實在感覺支撐不下去了。萬般無奈之下，我給鄧穎超同志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當年，景賢任上海市委書記一職，是周恩來總理提的名。鄧穎超同志對景賢也是有所瞭解的。在信中，我向她反映了景賢被判十八年刑期以及入獄後身體狀況一直不好的情況，請求有關方面網開一面，允許他保外就醫。沒想到，鄧穎超同志的批示意見很快下達到了上海。這一年的六月下旬，監獄方同意景賢保外就醫的申請，但提出在刑期未滿的三年裏，一是他的生活費、醫藥費由家人自理，二是不允許參加任何社會政治活動。在我簽字同意後，景賢才獲假釋回家養病。

景賢在監獄裏待了整整十五個年頭。在這十五年中，家庭的變故可想而知。老父親久病在床，他沒能陪伴侍候，更無法盡到作為兒子養老送終的義務。兩個女兒結婚成家，他也未能到場祝賀……好在這一切的一切都已過去，我倆終於堅持到了再相聚的這一天。他離家的時候，一家還只四口；他回家的那天，已是全家八口圍在一桌吃的團圓飯了。兩位女婿，婚前婚後都曾陪着我去探過監，兩個外孫，雖然名字都是他起的，而且也偶然帶去見過外公，但終究小孩太小，印象不深。這時，八口人，三個家庭，團聚在一套三室的小居室中，大人們，甜酸苦辣的滋味湧上心頭，悲喜交加；孫輩們，用陌生的眼光偷窺着還滿頭黑髮、他們卻要叫他外公的人。此時的景賢已是年屆花甲之人了。養好身體，含飴弄孫，是我們全家交給他的兩大任務。儘管我們的家居相當擁擠，經濟也不寬裕，但有他樂



融融地陪伴在我們身邊，我感到安全、放心，感到心情無比愉悅，彷彿又回到了從前……。

1999年，景賢被判十八年刑期後，剝奪政治權利四年期滿。按照憲法規定，他應該是享有出版、言論自由等政治權利的公民了。同時，他在保外就醫後，經過全家人的悉心調養，身體狀況有了較大的改善。他喜愛寫作的願望重新燃起。他對我說，他要以他的親身經歷反思“文革”，把這段歷史史實公之於世，為當政者鑒，也對後人有個交代。我對此表示積極贊同。他在經歷了這麼大的起落之後，意志未消，鬥志尚存，我更是高興。

在克服了資料缺失、行動上受到相當限制等種種困難，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於2000年完稿。完稿後費盡周折，幾易出版社，終於於2003年底在香港出版，成為香港十大政治暢銷書，且名列前茅。讀者反響熱烈，有褒也有貶。有的說，他逃避了一些不該逃避的事情；有的說，他承擔了一些不該承擔的責任。但多數讀者的意見，認為這本書寫得比較真實可信，在眾多反映“文革”的書籍中，可算是一部信史。而且對他的可讀性也十分讚賞。這使景賢大受鼓舞、大為振奮。他在認真的思考了朋友們的批評意見之後，對我說，他要接着再寫，這次，他要把自己擺進去，寫得更真些，想得更深些。……

天不佑我！在《十年一夢》出版後的2004年、2005年兩年裏，景賢因右耳前庭疾患引起眩暈，連續兩次住院開刀，手術不算大，但都是全身麻醉，這對一個時年已過七十歲的老人的身體傷害很大。兩次手術以後，眩暈卻仍未解決，加上他原有的腰椎、關節等多種疾病，從此，眼看着他日見消瘦，背更駝了，再也不能方便的獨自站立行走了，非得依賴拐杖和旁人扶持。然而，即使是在病痛不斷折磨他的情況下，他只要能夠坐



2003年8月，與堂弟徐景熙（左二）、堂外甥女婿何志明（左一）攝於家中。

起來，就會趴在電腦桌前，用電子筆，筆耕不止。經常是，深夜我一覺醒來，他還在伏案寫作。我勸他，還是保重身體要緊，他卻說，他要對歷史負責、對黨史負責，儘量把當時的真實情況記錄下來，讓後人在研究中國文革史時有所參考。卻萬萬沒有想到景賢的第二部書稿還沒有最後完成，心願還未實現，他卻急匆匆地突然離我們而去。

2007年11月6日，在景賢去世六天後，我們全家與部分親友們在復旦大學醫學院提供的遺體捐獻告別場所，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五十多年來相依相偎、相濡以沫的親人，從此永訣！

回顧半個多世紀來，我們的一生是擔憂多於平安，患難多於歡樂，離散多於聚合。徐家的族人想為景賢編輯一本生平經歷的紀念冊，以志紀念。親友們的眷眷之情，讓我們母女刻骨銘心。



與堂弟徐景達合影。

景賢去世時雖然沒有留下隻言片語，但，我又怎能忘得了他深夜伏案寫作的情景？！又怎能忘得了他曾對我說過的那些話語？！又怎能不去想他要對後人有所交代的心願了了沒有？！於是定下心來，把景賢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大略整理一遍。終於陸陸續續的發現了他保存在電腦裏的一些文稿。但願景賢的這部遺作，能為“文革”提供更多真實的思考。

葛蘊芳

2009年10月31日

補充：

前數月在朋友敘談中偶爾聽到“當年黨中央確實是下達過對徐景賢決定不予刑事處理的紅頭文件，是陳丕顯對曾來接管上海市委的領導彭沖拍桌子、發脾氣，要求對徐景賢判以重刑，彭沖等領導向中央彙報，……”。又據另一位知情朋友說：“陳丕顯拍了桌子之後，上海方面向中央彙報，上海是執行中央的決定，中央文件中沒有作出對徐景賢給予刑事處分的決定，上海不好處理。……”但最終還是一律從嚴懲處。這也就是我們所遭遇和演繹了幾十年的一場大悲劇的來龍去脈！

葛蘊芳

2012年5月1日

# 父親的最後歲月

徐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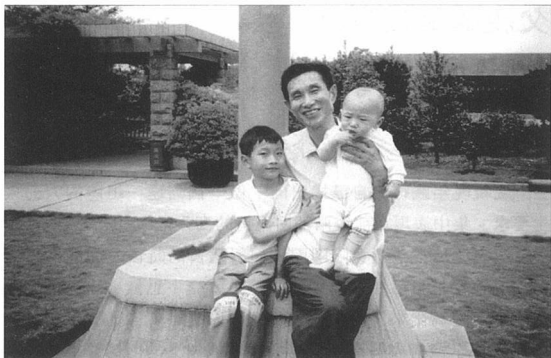
父親晚年踐行着自己提出的，做一個豁達、坦蕩的人的人生要求，集中表現在前後兩部回憶錄的寫作上。

這應該是當他還身陷囹圄、面對鐵窗的時候，就開始考慮過的。他要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感受、思索，坦誠地、並力求真實地寫出來，留給後人，留給歷史；就像他捐獻出的遺體任由科學機構去解剖、研究那樣，他留下的回憶錄也任由今人、後人去作出各自的分析、評判。

第一部就是《十年一夢》。

父親出獄回家不久，就開始着手找資料、列提綱做準備工作，整個寫作過程是極其艱難的。父親在那樣一種特殊處境下，當然不可能像那些享受離休待遇的老幹部寫“革命回憶錄”那樣，由本人口述，請一班子人來查閱檔案，收集、整理資料，最後由別人捉刀而成。他非但不可能有助手，更無權查閱檔案，就連當年自己的工作筆記、書寫的文稿，也全都被作為“罪證”沒收了。唯一能夠參考的，只有已經公開出版的少量相關書籍和圖書館保存的那些舊報刊。至於找人採訪，那更會觸犯“禁忌”，父親自然不敢那樣做。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主要憑藉自己的記性，硬是一點一點把幾十年前的事情慢慢回憶起來，先寫出素材，再整理成文。有些文稿往往要修改好幾遍，才在電腦上打印出初稿來。

春去冬來，年復一年，父親就這樣幾乎是夜以繼日地撲在



攝於1992年獲保外就醫剛回家幾天，與兩個小外孫合影。



2001年夏，與家人遊覽江西廬山。

書桌上，腰背駝得更厲害了，身體也更加虛弱了，經過近十年的辛勤勞作，到2000年底，第一部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才大體完稿。

上面說，父親回憶錄的寫作過程是極其艱難的，但其實真正艱難的還不是寫作，而是出版。

在這之前，父親在完成其中幾個單篇後，就試着向國內幾家刊物投稿。得到的回音都是“很感興趣，準備刊用”，“很有意義，希望繼續來稿”。但他們又都表示“需要向上級請示”。一“請示”的結果，不是原稿退回，就是石沉大海。而與此同時，市裏有關部門就不斷派人來向父親發出“警告”，不許他發表作品。父親據理力爭，說我現在已享有完全的公民權，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誰也不能剝奪。對方卻總是以“你的情況特殊”作答，根本不把憲法放在眼裏。

在那些年裏，父親碰到的這類事太多了，留在我們記憶中較有印象的是湖北《今日名流》雜誌那一樁。父親給這家刊物寄去一稿，很快發表了出來。《今日名流》是一本很好的雜誌，主編是位著名的作家，她親自給父親寫信，說刊物準備為父親開闢一個專欄，希望他繼續一篇一篇寫下去。父親很高興，列了一批選題，很快又寄去了一篇。誰知過了好幾個月也不見回音。據說《今日名流》雜誌因登載了父親的文章而觸犯了上面的禁忌，已被“勒令”停刊，刊物的主編和編輯人員也都因此而受到了“處理”。為此，父親一直感到深深的內疚。

出於無奈，父親不得不將堆得高高的書稿又從頭到尾校閱了一遍，刪去了某些敏感的字句，修改得儘量符合主流意識的口徑，希望能在領導審查時獲得通過。然後誠懇地寫上一信，連同書稿，請有關部門轉交給當時市委書記審查。在等待、企



1998年在北京與老伴參觀圓明園歷史遺跡。



2006年在紹興參觀魯迅故里。



盼了近半年之後，得到的批示大意是：

此書現在不宜發表，留着等今後傳給後代。

既然得不到領導恩准，只好自己找出路了。曲折而又漫長的尋求出版之路，就此開始。常常是已與出版商談妥了，連出書合同都簽署了，中途卻突然來一個莫名的變卦。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市裏有關部門作出了強有力的干涉。類似的遊戲，不斷重複上演。直到2003年底，父親的第一部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總算在香港某家出版社出版了。撫摸着出版社寄來的厚厚的樣書，父親百感交集，說了一句話：“不容易啊！”

《十年一夢》出版，反應頗好。不僅父親的新老朋友或打電話或寫信來表示祝賀，也少不得說說他們的讀後感：有肯定和讚賞的，也有指出不足的；還有境外、國外的一些朋友，許多從不相識的讀者，也轉來了他們熱情的評說，至於網上的議論就更加熱鬧了。這使長期寂寞中的父親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與此同時，好些朋友和讀者覺得《一夢》“意猶未盡”，“深度也還不夠”，希望父親能“再寫續篇”。父親自己隨着反思的深入，也覺得《一夢》主要還只是若干片斷性事實的敘述，有些敘述也不盡準確；至於從整體上的認識和反思，還沒有來得及進行。此外，十五年的獄中生活，回家後的和親人團聚，與友人敘談，也頗值得繼續寫寫。這樣，大約從2004年開始，父親又有了撰寫第二部文革回憶錄的打算。但此時父親已年逾古稀，加上體弱多病，長期的牢獄生活的種種後遺症又接連複現出來，上下樓梯要有人攙扶，走路拄拐杖也還是顛顛巍巍的。一次遙遙扶着他從椅子上站立起來，他苦笑着說：“遙遙，你說爸爸還能活十年嗎？只要能再活十年，我一定把第二部回憶錄寫出來！”我聽了一陣心酸，卻有意裝作很開朗的樣子說：“爸，你怎麼還是老腦筋呢？現在的老年人都長壽，你不



2004年7月，與朱永嘉等朋友在崇明東平國家森林公園內，在為原農場知青樹立的“青春無悔”碑前留影。

我自願在身後將遺體捐獻給上海市紅十字會，用於醫學科學事業請親屬遵照我的意願。

本人簽名：

徐景賢

請在自願者逝世後6-12小時之內，通知：

復旦大學

地址：醫學院路188號 電話：54237009 郵編：200032

所登記機構：

上海市徐匯區紅十字會

2006年3月徐景賢親筆填寫並簽名的遺體捐獻申請登記表以及市紅十字會頒發的《遺體捐獻紀念證》。

聽人家說嗎：七十小弟弟，八十多來西，九十不稀奇。何況爺爺都活到八十五歲了，你還是七十歲的小弟弟呢！長壽基因沒有遺傳在姑媽、叔叔身上，在你身上肯定會多體現一些的！”

經過一段時間醞釀，父親就開始第二部文革回憶錄的寫作，定名為《夢醒時分》。這一書名既表明它與《十年一夢》的聯繫，又顯示出與前書的區別：一個“醒”字，說明父親決心將對文革和文革中的自己，作出更真實的反映和更深刻的反思。開頭似乎進行得很順利，過了不到一年，案頭就積起了幾疊厚厚的書稿。但到後來，像是遇到了很大難題似的，常常長時間的在案前低頭沉思，或是凝神遙望窗外天空，不知在思考着什麼？

我們很想問問他，究竟碰到了什麼難題，又怕反而干擾了他的思路。

我們很想為他分擔點什麼，又怕自己文革時年紀還小，根本無法理解那場鬧嚷嚷的“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

但，如果當時就知道不久以後父親就將永遠離我們而去，那我們絕不會讓父親再那樣勞心費神，一定奪去他手中的筆，拉着他說：“求你啦，爸爸！別再白天黑夜寫什麼回憶錄了，我們一起出去玩玩好嗎？”

可惜啊，人生是單線的，它沒有“如果”。

因為沒有“如果”，它繼續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着——可怕地發展着！

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時，父親倒下了。就倒在他天天看書看報的沙發上，悄無聲息地離開了這個紛繁雜亂的世界。

## 一份研究上海文革史的珍貴資料

【景賢按】附錄在這裏的，是我在1968年組織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在時隔三十多年之後，這份塵封已久的《大事記》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真使我喜出望外，感慨萬千。

這份《大事記》在它誕生以後不久，就被張春橋所“禁止”，長期鎖在他的文件箱裏。而在文革結束以後不久，它又被專案組查獲並要我做出“炮製”這份“大事記”的交代，然後再次被長期封存進絕密檔案之中，不得查閱。

當我在撰寫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的時候，曾多次想過：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一月奪權，是毛澤東領導文革派和阻礙文革的對立派進行殊死較量的一場大搏鬥，也是毛澤東利用上海的經驗推動和指導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典型。上海一月奪權充分折射出在文革的關鍵時刻，各種人物、各個派別的心態和動作，值得詳細地加以敘述。所以我在撰寫這一部分回憶錄的時候，用了較多的筆墨作了如實的回顧。

《十年一夢》的書稿完成以後，北京中共黨史學界的一位知名人士看後有一個評價，他認為一月奪權是此書中寫得最好的部分，因為過去外界只知有一個毛澤東肯定的上海“一月革命”，不知其詳，看了該書才知道一月奪權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的評價令我高興，但我又深感遺憾。因為我在回憶和敘述這一段史實時，主要只能憑藉自己的記憶，而未能查閱過去的第一手資料。因為我的十幾本筆記本，以及我主持組織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都被封存在檔案裏。我幾次要求查閱，有關組織回覆是不同意，因為還不到檔案“解密”的

時候。某個作者自己的筆記本和他組織編寫的資料，進入檔案以後就要對其本人“保密”，這是一種何等奇怪的邏輯！

說來也巧，我的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出版以後，有一位新結識的朋友找到我，說自己密藏了一份“大事記”的手抄本。我細讀之下，果然是當年的文字。原來這位朋友是研究上海工人運動史的，在當年文革結束以後的清查工作中，有機會接觸到文革的檔案，她覺得這份《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頗有史料價值，但規定不允許複印，她就用了好幾天的時間，把這份資料原原本本地抄錄了下來。這份手抄的“大事記”，在她身邊足足秘藏了幾十年。

這位朋友把《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手抄本的影本送給了我。我覺得它能夠為願意瞭解上海文革的讀者們，以及為總結中國文革歷史經驗的研究者們提供一份具體而豐富的資料，所以我決定把它公之於世。

在這裏，我把當年組織編寫這份資料的經過，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抓緊籌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張春橋和姚文元回到上海，就開始抓上海參加“九大”的籌備工作。先是報請毛澤東和黨中央批准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為上海黨章修改小組的成員，着手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接着又成立有王洪文、徐景賢、王少庸等人參加的上海“九大”準備工作領導小組，遴選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在這個領導小組下，專設了“九大”材料小組，這個小組由我主要負責，集中力量起草上海參加“九大”所需的材料。

“九大”材料小組成立時，原市委寫作班的朱永嘉等人都

參加工宣隊去了，不能及時參與，我就調來原《支部生活》的編輯朱敬禹，由王洪文調來“工總司”的筆桿子李恩成，由他們兩人共同負責“九大”材料小組辦公室的工作。辦公室設在康平路市委大院東南部的一幢兩層樓洋房內，從榮昌路也有一個邊門可以進出。

我向朱敬禹、李恩成兩人佈置，要撰寫一份關於上海文化大革命歷史的書面資料，供上海的“九大”代表參閱。理由是上海的“九大”代表有八十多名，很多人沒有參加“一月革命”的全過程，即使參加的話也只知道局部的情況和某一段過程，不瞭解全貌，特別不瞭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是怎樣關心和領導上海一月奪權的。所以要為他們編寫一份全面瞭解這段歷史的書面材料。

我告訴“九大”材料小組，撰寫這份史料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要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對上海的關心和支持充分寫夠。毛主席的有關指示，一定要找到原話；對於沒有發表過的原始談話，也要找到可靠的記錄。關於張春橋、姚文元的講話，在他們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從中央返回上海以後，我就佈置市委、市人委的速記員當場做了記錄，所以大部分講話都可以去查閱記錄原件。

第二、對立營壘中雙方的活動都要寫明。不僅要寫造反的一方，而且還要把當時掌權的一方在奪權前後的言論、行動都逐一寫明，以便對照和比較。

第三、不僅要寫上層的活動，而且還要寫基層的活動。因為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發動的群眾運動，所以要把鐵路、港口、航空、水廠、電廠、煤氣公司、電話局、銀行、公安等系統的重要活動如實加以記錄。

第四、不單要寫政治運動，而且要詳寫城市的經濟活動。

要提供確切的資料，以說明“抓革命、促生產”和反對經濟主義的實際情況，並且證明無產階級掌握城市要害部門和經濟命脈的權力的重要性。

第五、避免為個人樹碑立傳、歌功頌德，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領導人的名字以外，其它參與上海一月奪權的主要人物如王洪文、徐景賢等人，一律不得提名。

寫作原則確定以後，“九大”材料小組辦公室的朱敬禹、李恩承等人就“開動機器”，調集資料，進行訪談，撰寫初稿。幸虧當時離一月奪權時間不久，雙方的當事人都在，比較容易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和檔案，從中整理出了一份十幾萬字的草稿。

朱敬禹把草稿送市委印刷廠，印成四號宋體字的厚厚的大字本，送我修改。我當時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三樓辦公，我改一次，朱敬禹就拿到印刷廠去重排一版。我覺得字數太長，就刪了一半以上，剩下六、七萬字左右；標上標題，初步定名為《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草稿)》；原始材料過於繁瑣的，就加以簡化；從《海瑞罷官》批判的一九六五年寫起，按月份寫，從奪權的一九六七年一月開始，按日記錄，有詳有略，一直寫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為止。

這份《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前後經我修改三次，為了慎重起見，改好後我不敢把它正式印出，也不敢向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及“九大”代表廣為散發。我只讓市委印刷廠打了三份清樣，一份報送在上海的張春橋審閱，一份上送姚文元(姚當時在北京)，另一份留存我處。這份材料給上海興國路張春橋辦公室送去不久，很快就傳來張春橋的嚴厲批評：“你們怎麼能搞這樣的材料？決不能向上海的‘九大’代表散發，所有的

清樣立即收回、銷毀！”

我想這下子壞了，張春橋一向小心謹慎，他肯定認為這份《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要是落到中央和各地的反對派手裏，一定會被作為攻他和姚文元的證據，指責他們在上海組織人員為他們撰寫歌功頌德的材料，替他們樹碑立傳。我幹了一件“蠢事”，挨了一頓批評，只得通知朱敬禹把全部材料銷毀，連同我自己手裏留存的一份樣稿也一起毀掉了。我主觀上以為：《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從此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誰知一九七六年底，張春橋被抓了起來，我也被隔離審查，專案組從上海張春橋的保險箱裏，找到了這份僅存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於是，他們還幾次盤問我，要我作出撰寫這份材料的過程的交代。據專案組人員告訴我：張春橋雖然通知別人銷毀了這份材料，自己卻很重視這份材料，還對其中幾處地方作了事實上的修正。在得到我的編寫此件的交代以後，專案組又把這份《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深藏進了絕密檔案。

要不是我的朋友的幫助，我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這份《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了。如今，《大事記》的手抄本又展現在我的面前，歲月流逝，那些歌頌毛澤東、美化張春橋、姚文元、損貶前上海市委領導人的詞句，和那個時代流行的語言格式，當然會被今天明眼的讀者們所過濾，但是，當時原始的史實，群眾運動的活動軌跡，上海各個系統的亂局，兩派對立組織的衝突，以及一些不可更易的數據和統計等，都給歷史留下了真實的記錄。

經過歲月的沉澱，這場驚心動魄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波詭雲譎的上海一月奪權，將會引起人們深深的思索，將會給當代和後世留下不盡的研究課題。

這就是我要公開發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的緣由。



#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

(草稿)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年1月

(注：原件為8開鉛印本)

##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直接指導下，張春橋同志具體幫助下，姚文元同志歷時八個月，修改十三稿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

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舊中宣部、舊北京市委，瘋狂抵制這篇文章的發表，從十一日到二十八日的十八天內，一直禁止北京各報刊轉載。以後在周總理再三督促下，才被迫轉載。毛主席在二十八日決定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印成小冊子，在全國發行。

陳丕顯、曹荻秋開動上海所有宣傳機器，吹捧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還將彭真反革命集團炮製的《北京農業大躍進》列為重點片，在全市同時放映，竭力抵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影響。他們還把發表這篇文章的內情向羅瑞卿告密。羅瑞卿立即向彭真報信。陳丕顯同時還把內情向陶鑄透露。

## 十二月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指導下，開始揭發了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羅瑞卿篡軍反黨的真面目。

毛主席在二十一日同陳伯達同志等說話時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彭真趕到上海，陳丕顯、曹荻秋再次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來頭”向他告密。陳丕顯在市政協四屆二次會議和市人代會五屆二次大會上，多次攻擊《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可能有些冒失”，鼓動周谷城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起來“反批評”。

## 一九六六年一月

彭真之流千方百計包庇羅瑞卿、吳晗等，伺機翻案，並故意隱瞞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的指示。

張春橋同志起草了《關於討論〈海瑞罷官〉問題的通知》，指示：“這個討論不僅是對一齣戲的評價問題，而是多年來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的新發展”。強調指出全市各級黨組織都應重視思想戰線上的大辯論，“推動意識形態領域裏的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但是，陳、曹的爪牙楊永直竟將最後這句話篡改掉了。

## 二月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於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寫出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劉少奇指使彭真於三日到十二日在北京背着康生同志炮製了《五人小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並盜用中央名義，發給全黨。二月八日，彭真在上海親自將這個反革命文件草稿交給陳丕顯並轉魏文伯看，他們看後都表示“沒有意見”。

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之流與“二月提綱”相呼應，不顧張春橋同志的堅決反對，通過組織，多次在內部演出黑話劇《大學風雲》。

陳丕顯在舊市委書記處討論姚文元同志批駁吳晗假檢討、真反撲的文章時，公然指責“這文章太尖銳了，要注意分寸”，並不准“牽涉到北京市委”。以後，又索性扼殺了幾篇文章。

## 三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二十八日到三十日同康生、江青、張春

橋同志的談話中，嚴肅批評了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和彭真問題。又指出舊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工作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

彭真又向陳丕顯之流打聽上海文化大革命情況，並說“二月提綱“除了左派整風這一條有點問題外，按照執行就是。陳丕顯、曹荻秋趕緊照辦。

## 四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修改三次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批發全黨。

張春橋同志向舊市委書記處傳達毛主席三次談話的指示，並提議以市委名義正式向中央提出對“二月提綱“的意見。曹荻秋立即反對，說：“要就是口頭說說，不正式寫。”曹荻秋並在另一次舊市委書記處會議上把文化大革命對象限定為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丕顯借生病住院，躲入幕後指揮。

## 五月

在江青同志指示下，姚文元同志寫成《評“三家村”》一文，但陳丕顯、曹荻秋之流乘張春橋同志不在上海的機會拒絕討論。直到《解放軍報》發表《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一文後，才匆忙“討論”，陳丕顯等提出不用姚文元同志名義發表。“討論”中，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揮舞板斧，砍去了文章最後指出“丟卒保本，丟車保帥”的要害問題，並

一會兒聲稱要先給舊北京市委打招呼，“免得他們被動”，一會兒提出要給“病得連報紙都不能看的”陳丕顯“審查”，千方百計扼殺這篇文章的發表。

五月九日深夜，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審閱了文章，親自將文章題目定為《評“三家村”》，並指示說，文章看了，很好，題目改短一些，問一下作者有無意見。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報紙立即排版發表。但是曹荻秋、楊西光公然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對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實行封鎖，使他們很長時間不知道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曹荻秋、楊西光還故意不讓姚文元同志參加最後一次校改。

五月十日，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批准下，《評“三家村”》發表。

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徹底清算彭、羅、陸、楊的罪行，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講話。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偉大歷史文獻，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下達。

陳丕顯、曹荻秋乘機利用《通知》附件《文化革命大事記》中關於上海市委的一些提法，擅自擴大傳達範圍，在機關幹部和大學生中普遍宣讀，無恥地貪天之功據為己功，大造所謂“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確的”社會輿論。曹荻秋、楊西光都競相出面往自己臉上貼金。同時，曹荻秋又有意混淆兩個司令部的界限，鼓吹“中央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意見也不一致”，叫嚷不能“大亂”，“要接受大躍進中的教訓”。

## 六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

上海的革命群眾紛紛貼出大字報，舉行集會遊行，把矛頭

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派。

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到處部署鎮壓學生運動，瘋狂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積極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鼓吹所謂“大字報要內外有別”、“要注意保密”、“不要讓學生上街”等。同時，還到處煽動“小事小非也可以貼大字報”，“有什麼問題搞什麼問題”，大搞打擊一大片。

國棉十七廠的工人在六月中旬起來造舊黨委的反。以舊市委派出的總工會副主任為首的“四清工作隊”進廠鎮壓。規定群眾貼大字報都要經工作隊“審查”、“批准”，遭到革命工人的強烈反對。

林副主席就工交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寫的一封信，在十九日公開發表，指出：“我國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的思想。”

## 七月

上旬，劉少奇經過上海，聽了曹荻秋的關於上海“穩定”的情況彙報後，打氣說：“貼市委的大字報少，說明上海市委是有威信的。”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更自以為得意，變本加厲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工廠，以生產壓革命，組織幾萬名工作隊去滅火。在學校大整群眾黑材料，準備“抓右派”。

毛主席回到北京，親自領導中央文革的同志，放手發動群眾，向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

## 八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並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宣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破產。

偉大領袖毛主席寫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八月十八日在北京第一次親自檢閱紅衛兵。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向全國全世界宣告支持新生的紅衛兵運動。周總理宣佈中共中央決定全國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聯。

紅衛兵小將走上社會，橫掃四舊。

陳丕顯、曹荻秋之流在上海瘋狂鎮壓革命的紅衛兵運動。先是聲稱“不提倡、不阻止”，以後又秘令“切實掌握”幾個紅衛兵組織“在自己手裏”，“有可能可以用來起糾察工作用。”陳丕顯並同曹荻秋、魏文伯秘密策劃，嚴密封鎖毛主席的大字報，組織圍攻來滬串聯的北京紅衛兵，對抗江青同志指導，死保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叛徒常溪萍，並由曹荻秋帶領舊市委書記處書記，常委，到師大、復旦等校煽動保守派壓制革命造反派。北京，上海的紅衛兵首次衝擊舊市委，發生了震動全市的“八·卅一”事件。

良工閥門廠(現名上海閥門一廠)等工廠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工人造反隊，積極支持紅衛兵。舊市委大肆污蔑這些工人造反隊是“牛鬼蛇神組織”。

## 九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不准各地組織工人農民干預學生運動的重要指示。

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聲援下，北京、上海紅衛兵再次攻擊舊市委，發生了“九·四”事件。通過鬥爭以及和北京等地革命紅衛兵串聯，上海大中學校的革命造反派在九、十月份逐步形成了炮司、三司、紅革會、紅上司、紅西南、紅東北、紅反會等幾個全市性組織。

南京路上好八連發表《同親密戰友紅衛兵並肩戰鬥》一文。

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之流偽造周總理指示，說“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確的”，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工人和學生的對立。並蒙蔽一部分勞動模範、五好工人打電報欺騙中央。他們還蒙蔽部分學生，策劃成立了全市性統一的大、中學校學生保守派組織。他們還公然發電報以“正常生產勢難保證”為名要脅中央下令停止全國大串聯。

## 十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國慶節檢閱一百五十萬革命大軍。林副主席發表國慶講話，號召全國革命人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堅決鬥爭。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毛主席、林副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陳伯達作了《兩個月來運動的總結》。

江青同志在會議期間兩次找陳丕顯談話，要他出來工作，接受群眾鬥爭的考驗。但他回上海後繼續裝病，躲在幕後策劃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陳丕顯、曹荻秋在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舊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不准宣讀陳伯達同志的報告，並惡毒攻擊說：“如果說大家都犯了路線錯誤，那麼中央怎麼辦？過去還不是毛主席領導嘛！”

國棉十七廠、良工閥門廠、國棉三十一廠、上鋼三廠、玻璃機械廠等單位工人革命造反派開始在同革命紅衛兵串聯過程中，互相串聯起來。

大專院校、文藝單位的革命造反派在十月下旬聯合批鬥了楊西光、楊永直、常溪萍、孟波之流。



## 十一月

偉大領袖毛主席前後八次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這是中國、世界革命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偉大革命創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於九日宣告成立。成立宣言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舊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鮮明地提出：“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宣言號召全市的革命工人和一切革命群眾，團結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周圍，集中火力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攻，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世界革命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慌了手腳，急忙根據陶鑄的黑指示，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採取“三不”政策：不承認、不支持、不參加。曹荻秋大叫：“今天的大會，社會上的渣滓都出來了。我就不參加！我參加就是犯錯誤。”上萬名憤怒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會後舉行了遊行，找曹荻秋算帳。曹荻秋頑固地拒絕見面。革命工人懷着滿腔怒火，決定“跟着紅旗上北京”，向毛主席控告舊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之流又惡毒地把上京控告的工總司隊伍分割成三截，中斷了滬京線的鐵路交通。幾千名工人造反隊員被堵截在安亭，沒有食物，沒有開水，沒有醫藥，也無法同中央和外界取得聯繫。但是工人造反派沒有被嚇倒，共產黨員都站了出來，自動把隊伍組織好，同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派來圍攻的幾萬受蒙蔽工人、幹部和工作隊員，進行了三天三夜的鬥爭。爆發了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偉大領袖毛主席派張春橋同志回來處理安亭事件。十二

日，張春橋同志冒着大雨在安亭聽取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控訴，並傳達了毛主席對上海工人運動的最大關懷。十三日，張春橋同志簽字同意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同時向中央文革作了報告。陳丕顯竟打電話惡狠狠地責問陳伯達同志：“到底中央文革給了張春橋多大權力？”當即受到陳伯達同志嚴厲批駁。但他竟在中央批准張春橋同志簽字後，還指使曹荻秋召開舊市委常委會對張春橋進行突然襲擊。張春橋同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警告他們不要變成陳獨秀。但曹荻秋仍然將陶鑄支持他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工人革命組織的指示到處傳播。

偉大領袖毛主席批准張春橋同志對安亭事件和工總司問題的處理，指示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毛主席親自支持了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從此，上海工人階級以主力軍姿態登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陳、曹之流慌忙蒙蔽一部分工人，挑動工人鬥工人。十九日到二十五日，曹荻秋就三次接見良工閩門廠、國棉三十一廠等三十多個單位的保守派代表，一再攻擊張春橋同志處理安亭事件“破壞了黨的原則”。二十六日，陳、曹一手策劃的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拋出一份“給陳伯達、江青同志的特急電報”，惡毒攻擊“雙五條”是“大毒草”，叫喊要張春橋同志立即回上海“檢查交代”。陳丕顯頻繁接見師大、復旦、舊教衛部保守派代表，煽動炮打張春橋同志。

經過陳丕顯、楊西光精心策劃，復旦大學一個保守組織，在十一月下旬公然提出“批判”市委寫作班在《海瑞罷官》批判期間“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稱要“追市委、中央的根子”，把矛頭直指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革命造反派揭穿了他們的陰謀，並乘勝將楊西光拉下了馬。陳丕顯又指使楊永直在電影系統刮起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妖

風，結果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楊永直被革命造反派揪鬥後走投無路，幾天換一個躲藏的地方。

## 十二月

工總司支持紅革會提出的《紅衛戰報》和《解放日報》同時發行的革命要求。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向陶鑄求救。陶鑄作了黑指示：《解放日報》就是停刊一個月，也不能同《紅衛戰報》一起發行。陳、曹、魏之流立即挑起大規模的群眾鬥群眾。工總司雖然事前不知道紅革會派人佔領《解放日報》社，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派出大批工人造反隊員進入報社和革命小將並肩戰鬥，頂住了十幾萬受蒙蔽的赤衛隊員的圍攻，並和赤衛隊展開了大辯論。從一日到八日，堅持八天八夜，最後終於迫使舊市委簽字同意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

陳、曹之流一手扶植的工人赤衛隊總部在六日正式成立。曹荻秋蒙蔽一些著名勞動模範去充當“顧問”。

陳、曹之流於四日一夜之間全部撤出全市各廠四清工作隊，並指使乘機私自銷毀整群眾的黑材料。接着挑起了紡織二十四廠赤衛隊圍攻革命造反隊的嚴重武鬥事件。工總司繼解放日報事件後，又一次粉碎了陳、曹之流挑動工人鬥工人的陰謀。

陳丕顯從中央工作會議被批後，就向舊市委各部門發出指示：“經濟上放寬一點，爭取政治上主動。”十一月底，他就指定宋日昌、石英、王克等人專門成立了“勞動工資接待小組”，打算調八個局長，二十個處、科長組織一個班子，大搞反革命經濟主義。曹荻秋密令這個小組：“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搞一個全面方案。”十二月十一日，陳丕顯第一次出場主持舊市委委員會議，根據陶鑄“要爭取主動”，對造反

派的物質要求“要儘量解決”的黑指示，對舊市委各部門負責人說：“群眾運動中政治鬥爭必然要衝擊到經濟問題，經濟制度、體制等問題勢必衝破，看來是頂不住的”；“要獨立思考，獨立作戰，靈活處理”。曹荻秋也胡說：“我們以前工作上被動，主要是經濟上掌握太緊。”並指示“要擴大物資供應”。他並傳達陳丕顯的黑指示說：“對紅衛兵經濟上放寬一些。我們不要看作是經濟接待，這就是政治接待。”魏文伯在錦江飯店一次黑會上侮蔑說：“學生是搞政治的，工人、農民是搞經濟的。”

市委機關的革命造反派，在上海和外地在滬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衝破陳、曹之流的重重束縛和破壞，於十二月十八日在文化廣場召開了“炮打上海市委”大會。在籌備過程中，紅革會、紅三司、新師大革命造反派讓出了準備鬥爭常溪萍的會場，北航紅旗組織了幾百名中學紅衛兵小將貼海報、造輿論，北三司幫助揪陳丕顯。開會時，工總司又派一千五百名工人造反派員趕來聲援。形成了革命工人、革命學生、革命機關幹部聯合起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的大好形勢。大會提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的革命口號，並把陳丕顯第一次從幕後揪到幕前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當晚，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宣告成立。

陳丕顯對後院起火極為驚慌，惡狠狠地說：“我對市委機關幹部過去估價太高，運動以後要好好整他們一下！”十九日，他就急忙地召見舊市委辦公廳保守派，秘密佈置他們趕快拉起各機關統一的保守組織，並要他們趕快搞一個十萬人的批判大會，拋出楊西光，李家齊和蘇超，丟卒保帥。於是“市委辦公廳捍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委員會”成立，並立即向舊市

委各部委“文革”發號施令。

工人赤衛隊二十三日召開假批判大會。事前，陳丕顯召開舊市委書記處會議，指示曹荻秋玩弄兩面派手法，在大會上表態“支持”造反派，結果曹荻秋在二十三日大會上先偽裝指責工人赤衛隊大方向錯了，最後卻又簽字同意赤衛隊把矛頭對準工總司的“八項要求”。陳丕顯次日又慌忙召開舊市委書記處會議，裝作“高姿態”，說曹荻秋簽字不能代表市委，並要他發表聲明簽字作廢。進一步大規模挑起群眾鬥群眾。

陳丕顯以舊市委書記處名義發電報給中央，要求張春橋同志回上海，妄圖使張春橋同志成為擋箭牌。接着，又發電報給中央，提名楊西光、李幹成、張文韜擔任市委書記候補書記，並企圖在舊市委辦公廳、黨刊編輯部的造反派中物色一個辦事班子，還策劃由部隊接管機關，說什麼“機關部門垮一個，由駐滬部隊接管一個”。

## 十二月二十五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毛主席非常關心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針對陳丕顯用“內外有別”的口號來壓制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起來造反的陰謀，毛主席指示：“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毛主席對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一二·一八”大會上提的口號很讚賞，對上海革命造反派講究鬥爭策略表示滿意。

工總司等八個群眾組織，在文化廣場召開《為奪取毛主席革命路線新勝利誓師大會》，批判陳丕顯、曹荻秋等上海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會

上，曹荻秋對二十三日簽字同意赤衛隊“八項要求”一事做了假檢討，聲明簽字作廢，並宣佈赤衛隊是“保皇組織”，聲稱“要對赤衛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革命造反派當場揭露這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新陰謀。

赤衛隊頭頭煽動一千二百名受蒙蔽的工人，在共舞台開會，決定北上“控告”舊市委。次日，赤衛隊壞頭頭王玉璽勾結鐵路局一小撮走資派，私自發出兩列火車把這些人裝往北京，使他們離開生產崗位達二十天。鬧事前，一個赤衛隊頭頭還揚言，如果曹荻秋簽字不實現，就要搞三十萬人的遊行，並要停工、停電、停交通。

來自六省一市的數萬人開始在南京西路、西藏中路靜坐示威。

宋日昌、王克、汪力田等連日根據陳丕顯、王一平的黑指示，起草關於將集體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和臨時工、外包工勞動福利問題的兩個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文案。

## 十二月二十六日

姚文元同志給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站負責人來電，傳達偉大領袖毛主席十二月二十五日對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給了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以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上午，陳丕顯跑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偽裝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一方面抵賴自己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責，說：“如果說這條路線以陳丕顯為代表，那大家研究去，是否與我的策劃有關係？我的秘書可以證明，我沒有策劃。開會、報告沒有和我商量。有些事同我商量，我還發過脾氣。”另一方面又替曹荻秋開脫罪責，說曹對張春橋同志代

表中央文革支持工總司“思想不通”，是因為“他認為多數、少數兩派中都有左、中、右，應該一視同仁”。並妄想摸造反派的底，問：“現在要和你們商量的是，荻秋這個人到底還有沒有救？”機關造反派代表當場拆穿了陳丕顯的陰謀，提出三個問題要他立即回答：(一)你對曹荻秋這個人究竟怎麼看？(二)你對舊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究竟怎麼看？(三)你負責舊上海市委後，同劉、鄧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究竟有什麼聯繫？陳丕顯聽到第三個問題時大吃一驚，說：“啊？！”接着，他就狡辯說：“劉、鄧與上海的聯繫現在還看不出來。他們長期在中央工作，市委這些人有什麼特別聯繫呢？”他並妄圖收買、拉攏機關革命造反派，說：“你們要什麼，我給你們辦，有什麼事找我好了，我保證隨叫隨到！”回去後，他就下令送一輛小汽車給聯絡站“專用”，並派他的秘書混在聯絡站不走，當即被機關造反派一一頂了回去。

晚上，陳丕顯約見楊永直、孟波，給他們出點子說：“臉皮厚一些，鬥爭歸鬥爭，工作歸工作。腿要勤些，下面多去跑跑。嘴要勤些，到下面多作檢查。”

赤衛隊頭頭召集各區負責人和部分工廠代表舉行緊急會議，擬了三項抗議和四項要求，並決定“為了挽回赤衛隊聲譽”，在二十八日上午十時組織一次全市性赤衛隊大遊行。

舊市委向全市各級黨委發文，要四清工作隊員全部回原四清單位進行“檢查”。打擊一大片，轉移鬥爭大方向。

##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海玻璃機械廠生產陷於癱瘓，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大部分北上“告狀”，僅鋼窗車間二十八個小組四百多個職工中就走了一百多，其中包括十八個生產組長及所有的調度、材料、技

術、工具、資料計劃的人員，鋼窗車間革命造反派貼出第一張奪權大字報，當場有一百多位造反派工人簽名支持。在這個車間造反隊領導下，發動廣大革命群眾，很快頂起了革命和生產兩副重擔。在這個車間帶動下，由各車間串聯了“奪權籌備小組”，並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成立了全市第一個“革命生產委員會”。

市委機關聯絡站同紅衛兵代表一起，迫使陳丕顯同意交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舊市委書記處的全部會議記錄和舊市委文化革命辦公室的全部檔案，為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進一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供了大量罪證。

晚上，舊市委書記處召開各部委、各區、各局負責人會議。事前，陳丕顯策劃“拋一個保一批”，要曹荻秋在會上就簽字同意赤衛隊“八條”一事做“檢討”，並佈置書記處其他成員表態同曹“劃清界限”。會上，陳丕顯還拋出一個“化整為零”的反革命方案，要到會幹部準備應付“象過去打遊擊時期一樣，上級和下級失去聯繫”的局面，“政治上獨立思考，獨立作戰”。會後，陳、曹等一小撮走資派全部轉入地下活動，就市委及各區、局負責人也溜個精光。舊市委陷於癱瘓狀態。

參加二十六日黑會的赤衛隊頭頭到舊市委“抗議”。楊浦區的上海電纜廠、玻璃機械廠、良工閥門廠等單位的工人赤衛隊員已被騙陸續集結到舊市委並設立了“現場臨時指揮部”。曹荻秋避而不見。

赤衛隊壞頭頭王玉璽召開公用、郵電、鐵路、普陀、長寧、安亭、靜安、閘北、虹口等九個系統、地區負責人會議，陰謀策劃在全市實行“三停”：停水、停電、停交通。會上，這一小撮壞頭頭還決定“逐步升級”，先停紡織系統，次停財貿系統，再停交通系統，再停外港，造成國際影響，最後全部停下來，甚至連市內清潔衛生也停下來，使上海變成一座“死



城”。妄想用這“最後一張王牌”，迫使中央“一定要派人來上海現場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叫嚷：“如果中央派張春橋來，我們不要，一定要周總理、陳伯達接見”。王玉璽於次日凌晨二時會議結束後，公然向黨中央、國務院發出要脅電報，要中央派專人在二十八日早晨七時趕到上海。

北方海運局黨委書記李廣簽字同意補發藝徒一年工資。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迅速蔓延全港。這天，北方區海港開始停工。

汪力田簽字同意郵電管理局一九五八年招入的家屬工的工資由三十元“調整”為四十一元。

舊市委勞動工資委員會簽字同意，“支疆革命青年家長造反隊”的十六點經濟主義要求。

##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機關報《工人造反報》創刊。

陳丕顯、曹荻秋一手挑起康平路事件。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假曹荻秋“把八十萬赤衛隊員打成反革命”為理由，調集大批受蒙蔽群眾到康平路包圍舊市委書記處。到晚上，已有一萬多名赤衛隊員進入康平路。

張春橋同志深夜來電，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應該立即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警惕陳丕顯之流及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借着“打倒曹老頭”的革命口號，乘機撈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奮戰得來的勝利果實。張春橋同志特別強調，要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提出更高、更鮮明的政治口號，揭穿這一小撮壞傢伙的陰謀，把矛頭針對舊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促使廣大受蒙蔽的赤衛隊員覺醒過來。

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立即緊急行動，決定抽調徐匯、閘

北、普陀、長寧等區的工人造反隊員，封鎖康平路四周交通要道，防止赤衛隊繼續往裏調人。同時動員全部宣傳車、印發傳單，在現場勸說受蒙蔽群眾回廠抓革命，促生產。

由於大批受蒙蔽的赤衛隊員離開生產崗位，楊浦區的紡織工廠開始部分停工，普陀、長寧等區的部分工廠也跟着陸續停工。革命、生產都受到嚴重損失。如國棉十七廠，由於二千九百餘名赤衛隊員被騙離廠，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十天中損失棉紗一千七百八十七點六一件，棉布六千二百八十一公尺，合計產值達一百五十六萬元。在印刷行業中，也由於大批赤衛隊員離廠，單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四天內，就少印了“老三篇”二十四萬冊，毛主席寶像十八萬張。

工人革命造反派出來頂受蒙蔽赤衛隊員撂下的生產重擔，國棉十七廠革命造反派採取加班，吃飯不停車，停人不停車等措施，決心把近三千名赤衛隊員離廠帶來的巨大損失抓回來。華東紡織工學院的革命師生，也自動組織起來趕去頂班勞動。革命、生產都搞得轟轟烈烈。

## 十二月二十九日

凌晨，張春橋同志來電指示，對赤衛隊要加強政治攻勢，從政治上瓦解他們。工總司等二十多個群眾團體立即在衡山飯店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統一指揮對赤衛隊發動強大政治攻勢。各區工人造反隊和紅衛兵小將，陸續集結到康平路周圍，封鎖了所有交通要道，集中了各群眾組織的宣傳車和廣播器材，向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宣傳十六條，動員他們回廠抓革命，促生產。一些革命群眾組織還連夜趕寫出了《炮口對準閻王殿》宣傳單，揭露陳、曹之流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

陰謀。這時，被騙進入舊市委書記處的赤衛隊員已有三萬多，除電話總機和機要室外，所有的樓房都佔領了，大院裏還擠得滿滿的。一天一夜下來，許多人又凍又餓又倦，早已人心渙散。不少人聽到造反隊宣傳，就自動回廠。到下午，盤踞在舊市委書記處內部的赤衛隊員仍有近二萬，包圍康平路四周的造反隊員約有五、六萬。

傍晚，曹荻秋才從躲藏的地方溜回舊市委書記處，同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談判”。赤衛隊壞頭頭指責曹荻秋“出賣了我們”。曹荻秋居然回答說：“我並沒有全面否定你們的大方向，如抓革命促生產。你們起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我也是肯定你們的。問題要作具體分析”。赤衛隊壞頭頭又說：“曹荻秋，你這個人就是形‘左’實右，是你自己拼命把我們培養起來的。現在你又一腳把我們踢開。”曹荻秋就洋洋得意地坐在那裏聽取“批判”。

晚上，陳丕顯從躲藏的西郊賓館親自打電話給曹荻秋的秘密，要他轉告曹荻秋：“如果赤衛隊提出要市委承認他們的組織是‘合法的群眾性組織’，可以同意。他們要求給予物質上的方便，也可以答應。”曹荻秋立即照辦。這就進一步煽起了赤衛隊員同革命造反派的對立。

在革命造反派強大的政治攻勢下，赤衛隊開始動搖，瓦解。有個赤衛隊小頭頭打了白旗到榮昌路60號前線臨時指揮部找革命造反派進行“和平談判”，於是就動員他對赤衛隊喊話。但這時，赤衛隊壞頭頭繼續進行頑抗，造謠說：“有十二個赤衛隊員被造反派打死了！”“如果中央負責同志不來，到(天亮)六點鐘問題還不解決，那上海就要停水、停電、停車了！”工人造反隊從下半夜兩點鐘左右開始向盤踞在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的赤衛隊進行衝擊。到六點多鐘康平路舊市委書記

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七點鐘，近兩萬名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六大堆。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傷至醫院治療。工人造反隊員還“繳獲”了幾百箱餅乾。

當晚，工總司乘大好形勢，迫使赤衛隊總部宣佈解散。

各區的大部分赤衛隊基層組織也被迫宣佈解散。

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刮到許多單位，市民政局走資派簽字同意將聾啞福利工廠平均工資從三十元調整為五十元，提升百分之七十。市勞動局走資派簽字同意補給地質局二百五十人工資六萬元。舊市委同意將臨時工日工資改為月工資制，使每月增加工資額八萬元。

## 十二月三十日

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繼續頑抗，調集了十二、三萬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分四路集結在外白渡橋、長寧區、西藏路橋和天目路。主力集結在北站附近，準備“北上控告”。在外白渡橋、北站等處都同工人造反隊發生小接觸。

工總司總部凌晨在衡山飯店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目前形勢，決定聚集在康平路的幾萬造反隊員立即回廠抓革命，促生產，對已走掉的赤衛隊員不要深追，要靠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對於已經解決的近兩萬名赤衛隊員，也決定立即動員他們回廠抓革命、促生產。

“康平路事件”發生後，赤衛隊鐵路聯絡站壞頭頭在王玉璽指使下，凌晨兩點多鐘打電話通知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調度所全部停下來，準備到康平路去”。又分別佈置各車站，機務段都停下來到康平路去。調度所八十多個人，除留幾人看家外，全部離開了調度台。從早晨五時起，調度完全停

止，機車不出庫，列車不開行，貨物不裝卸，正在路上跑的列車也停下來，滬甯、滬杭線全部癱瘓。到三十一日早晨，總共二十六個半小時中運輸無人指揮。這期間的損失是：上海站停開客車二十六列，五萬多旅客乘不上車；南京、杭州方向開來的二十八列客車停在沿線各站，五萬多旅客擱在路上，沿途小站吃喝都成問題；上海地區貨車三十八列，二千零二十五車貨物堵在車站；南京、杭州方向開來的二十二列一千一百十九輛貨車被迫中途停車；上海地區少裝車七百五十九輛(應裝一千一百二十八輛，實裝三百六十九輛)，少裝貨物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五噸；少卸車一千二百八十輛(應卸一千六百零八輛，實卸三百二十八輛)，少卸貨物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噸。三十一日後雖然局部復工，但正常生產秩序已被打亂，客車時發時停，絕大部分開不到終點；貨車滬甯、滬杭兩線加起來只開六、七對，不到平常的百分之十二。各地紛紛來電告急。工廠原料、海港運輸等都引起連鎖反應。西南、西北地方物資部門還來電告急。

早晨五點多，吳淞地區部分工廠開始停工。六點不到，郵電部門開始停工。公交系統也部分停工。舊市委各部、委，各區、縣、局，各基層單位的一小撮走資派，為了保護自己，開始大量簽字，同意補發工資、福利費、串聯費等。北方區海運局李廣對鬧補發工資的一九六二年進港的青工說：“我們做得不對，是應該補三年，等於你們錢存在我們這裏，但現在國家比較困難，我說嘛，還是補一年。”工人革命造反派堅決反對，上港七區革命幹部於興洲同志寧可受圍攻，堅決不簽字。

針對陳、曹之流挑動工人鬥爭一般四清隊員的陰謀，工總司發出緊急通令，號召工人革命造反派分清敵友，不要上當，同時支持廣大四清工作隊員起來革命造反。

##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些革命群眾組織，根據張春橋同志“要把矛頭針對市委”的意見，決定抓住“康平路事件”，籌備批判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提出“揪住陳丕顯，打倒曹荻秋”。

凌晨，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造謠說：“中央首長已來到上海，住在衡山賓館。”並派出少數赤衛隊員包圍衡山賓館，以誘使工總司調集隊伍去那裏，然後帶領數十萬受蒙蔽赤衛隊員“北上控告”。他們的“先頭部隊”數千人已到達昆山。接着，七、八萬赤衛隊員也陸續集合到昆山。開出了兩列火車，動用了數百輛生產車輛，使生產受到嚴重破壞。

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及時識破了這一大陰謀，號召工人造反隊員堅守抓革命、促生產的戰鬥崗位。同時，決定派出少部分造反隊員和大批紅衛兵小將，趕到昆山，勸說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停止北上，迅速回廠抓革命，促生產。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挑動農民，一起圍攻進行宣傳的革命工人和革命學生，造成鐵路中斷，公路堵塞。

深夜，總理、張春橋同志打電話給陳丕顯，責令他站出來同各造反組織開會，商量當前如何恢復鐵路交通問題，指出，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這樣才能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深更廣更透，要緩和一下，不要使事態擴大。這麼多人到北京怎麼行呢？可以派代表去。”總理責問道：“誰在幕後操縱赤衛隊？”陳丕顯公然進行欺騙，把責任統統推給張祺、楊士法。當被責問到他在機關裏支持保守派組織時，陳丕顯又狡辯這是“糊裏糊塗又犯了一個錯誤”。總理、張春橋同志又嚴正警告陳丕顯：“這是給你最後一個考驗的機會。”但陳丕顯拒不執行，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說請他們去東湖招待所商量，自己卻先跑到北站去同

鐵路局走資派策劃繼續進行破壞。

張春橋同志又給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打電話，扼要轉述了給陳丕顯電話內容，要他轉告各革命群眾組織：“這是給陳丕顯最後一個考驗機會。陳丕顯，你們要清算，以後算。市委和赤衛隊一小撮人既破壞革命又破壞生產。革命造反派就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張春橋同志強調指出：“革命造反派的鬥爭矛頭主要針對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指出赤衛隊壞頭頭王玉璽擅自同意發車，送大批赤衛隊員上北京，是違法行為，應予逮捕法辦，要陳丕顯嚴肅處理。又提出工人造反隊不要去昆山追趕，以免引起衝突，要多派些學生和機關幹部去對赤衛隊員做說服工作。

工總司等十五個組織立即深夜在東湖招待所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根據總理、張春橋同志電話精神，解決鐵路中斷、大量赤衛隊員上北京以及集結昆山等問題，並在次日凌晨四時聯合發出通告，指出：“鐵路交通中斷，昆山等處發生流血慘案，完全是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惡果。陳丕顯、曹荻秋一夥和他們操縱的工人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應負全部責任。受蒙蔽的廣大工人赤衛隊員無罪。”

陳丕顯直到凌晨三時才參加了會議。但他竟無恥地把中央負責同志的嚴厲批評隱瞞掉了，厚着臉皮宣稱：“總理、江青同志要我親自來處理這個事件。”當即被革命造反派揭穿。最後，還是由各革命群眾組織到昆山、蘇州去解決問題。而陳丕顯卻躲在招待所裏繼續策劃新的陰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發出了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展開總攻擊的偉大號召。

上海各革命群眾組織派出大批紅衛兵和機關幹部奔赴昆山、蘇州、無錫等地向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宣傳毛澤東思想，說服他們返回生產崗位。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不斷煽動赤衛隊員和農民借“辯論”為名，日夜圍攻革命造反派，把車胎的氣放掉，把車子砸壞。工總司主要負責人一起趕到昆山，代表工總司總部向受蒙蔽群眾表示造反派歡迎他們回廠參加抓革命、促生產，決不進行打擊報復的鮮明態度。經過艱苦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到三日為止，絕大部分赤衛隊員都陸續回來了，並紛紛聲明退出這個保守組織。

陳丕顯簽字同意撥給二兵團活動經費十五萬元，小轎車、摩托車、自行車一批，以腐蝕造反派，搞垮工總司，分裂工人運動。

深夜十二時，曹荻秋在極端秘密狀態下召開了“香山路黑會”。參加者有王一平、宋季文、宋日昌、張承宗、關建、杜淑貞、王克等八人。曹荻秋捧出陳丕顯“政治上獨立作戰，獨立思考”，“經濟問題寬一點，爭取政治上主動”的黑指示，煽動說：“現在這些問題，請示中央、國務院也沒有用，還是自己先幹起來吧！”王一平也惡毒地說：“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吧！”會議制定了所謂“討好群眾，穩定整個局面”，“緩和緩和空氣”的黑方針，訂出了一個黑五條：一、一九五八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廠安排工作；二、社會青年要積極安排工作；三、街道工業可以先戴“國營”的帽子，適當增加勞保福利；四、郊區五類地區的工資可考慮升到八類地區的標準；五、長期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曹荻秋在事前還要宋



日昌和勞動局長王克擬定了一個具體方案，保證黑五條的貫徹，在會上通過。從此，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迅速蔓延全市。

## 一月二日

工總司等二十多個革命組織，在武康路2號召開“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的第一次籌備會議。組成了工人、學生、機關幹部的革命造反派“三結合”籌委會，下設秘書、保衛、後勤、宣傳四組。會場初步確定設在文化廣場。會後，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

舊市委勞動局根據“香山路黑會”精神，召開幹部會，傳達曹荻秋黑指示和黑五條，制定了兩個黑方案：《關於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精簡回鄉支農職工和辭退的里弄工、臨時工以及社會待業人員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濟問題的初步意見(草案)》，《關於當前若干工資待遇方面問題的初步意見》。並宣佈立即付諸執行。

海港工人革命造反派堅決頂住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宣佈：“當權派個人不能代表黨委，個人簽字無效！”

從上月三十日到一月三日，在這個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影響下，全市刮起了一股搶房風。有些走資派帶領受蒙蔽群眾開卡車去搶房子；有些運動中被抄過家的牛鬼蛇神也乘機搶別的地區房子；甚至出現一家三口組織一個“造反司令部”去搶一幢三層樓房的怪事。據統計，五天內被搶佔的有新工房二萬二千多平方米，回收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資本家多佔房屋三十萬平方米，全市所有待分配的房屋搶佔一空。為了搶房公開化，他們還串聯組成一個全市性“住房困難戶革命造反司令部”，天天到房管部門去吵鬧，要使用證、房票簿、鑰匙及維修等等。

陳丕顯又跑到華山路招待所躲起來，給紅衛軍頭頭開介紹  
信去找無錫市長江堅，繼續玩弄兩面派手法。

### 一月三日

《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全市和外地在滬革命造反派堅決支持下，接管了《文匯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起，文匯報的革命造反派在紅衛兵小將和工人造反派的影響下，開始醞釀奪權。最後，外面得到工總司的支持，裏面得到排字、印刷工人造反派的撐腰，又利用舊文革一些成員對舊市委派來的所謂“三人領導小組”的矛盾，一舉奪下了報社大權。奪權後，由於比較注意大聯合，支持贊成奪權的各派都有代表人物進入臨時領導班子，所以在內部阻力較小，可以集中力量對付敵人。

張春橋同志在北京《解放軍報社》接見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等同志，指出：上海如果“三停”，也好，只要停上半天，他們全完了，赤衛隊也徹底完蛋。現在讓他表演表演，張春橋同志還說：曹荻秋要垮台，陳丕顯一直不出來，應該拖他出來幕前表演，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還指出：你們還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要抓緊，否則，你們不批判它，又給他解決問題，他們很高興。我看，還是抓緊批判。張春橋同志還強調指出，工人革命造反派要學習毛主席著作，研究工人運動中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經驗，現在工總司的幾個兵團是在安亭事件時按車廂分的，這樣不利於組織階級力量進行戰鬥，工人革命組織要按系統按部門實行革命的大聯合。還建議工總司把總工會接管過來，把總部設在裏面，同時不要搞大機構，要節約鬧革命。總部工作人員首先要把本單位的革命搞好，要經常回本單位參加勞動，保持同群眾的血肉聯繫。工總司負責同志回

滬後，立即在各系統、各基層進行了傳達，明確鬥爭大方向。

“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備工作緊張進行。工總司參加籌備的同志發揮了極大作用，同幾百個單位進行了交涉，動員搞分會場，並同一些單位故意刁難的走資派進行了堅決鬥爭，還發動了幾百名工人造反隊員連夜在各大馬路，交通要道接廣播線，安裝轉播設備，保證了短期內開大會。

宋季文向舊市委傳達黑五條，立即貫徹到外貿、商業二局、市經委、計委等所屬單位。頓時，銀行發生幾百個單位競相提款的現象，金額越來越大，有的單位一次提去幾十萬元。

陳丕顯找熊中節、夏明芳等去華山路招待所密談，要他們組織地下接待站，解決他許給群眾組織的車輛、物資、經費等問題。陳丕顯還打電話給南京的陳揚，要他接待去南京動員赤衛隊回滬的“炮司”人員，並替陳揚出點子，要他支持和依靠造反派。

## 一月四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派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以中央文革調查員身份來滬，代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一到上海，當天下午就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傳達了毛主席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極其重要的指示，聽取了聯絡站負責人關於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對經濟主義鬥爭情況的彙報，強調要依靠工人等各造反派革命群眾組織，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首先要把握要害部門、要害工廠、要害單位控制起來。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並對《文匯報》奪權表示全力支持，並提出《支部生活》要迅速恢復出版，這樣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有了自己的輿論工具了。紅

革會負責人到武康路二號見到姚文元同志便立刻找了全體常委，堅持要求接見。傍晚，姚文元同志接見了他們。在一個多小時中，姚文元同志耐心地聽完了他們的意見，並指出紅衛兵要向工人造反派學習。

工總司等十一個革命群眾組織聯合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印成傳單，在全市散發。這份重要文件，是一月一日凌晨由十五個革命群眾組織在東湖招待所會議上共同起草的。三日晚上，在最後通過並簽字時，市委機關聯絡站、二兵團、紅三司、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四個組織由於未通知到而漏掉了。

《文匯報》新生後正式出版。

工總司針對陳、曹指使赤衛隊壞頭頭搞“三停”的陰謀，責成舊市委書記處在錦江飯店召開局黨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迫使梁國斌等人簽字同意把水、電、煤氣等要害部門交給革命造反派掌握。工總司負責人警告他們，如果繼續暗中搗鬼，工人革命造反派將對他們採取革命行動，同時表示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對要害單位加強控制和保衛，決不允許人破壞。

陳丕顯一手策劃成立的舊市委辦公廳“捍革會”，按照陳丕顯的黑指示，策劃搶在全市革命群眾組織聯合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前夕，召開十萬人大會，拋出曹荻秋、李家齊和蘇超，達到“丟車保帥”的罪惡目的。舊市委辦公廳內陳丕顯的一些黑爪牙，全都積極奔走效勞，劉夫暢替他們搞會場，供應物質條件，方揚、吳雲溥替他們修改發言稿，蘇超本人居然向他們提供“炮彈”。他們還拉了交大一個保守組織“衛真兵團”替他們作廣告，表示他們是“真造反”。由於他們核心內部一位同志覺悟高，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揭發了他們的陰謀，這天機關造反派和進駐舊市委辦公廳的紅衛兵一起闖

進了他們正在秘密策劃的地方，並促使他們內部受蒙蔽的群眾起來造了頭頭的反，這個陰謀可恥地破產了。

陳丕顯親自出面煽動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簽字同意人力裝卸運輸工人“統一歸口”，把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致使生產停頓，造成嚴重的群眾鬥群眾。還胡說對各種群眾組織的物質供應“抓得太緊了”，“應該放寬”，要人準備五十輛廣播車，三千輛自行車，發給各群眾組織。曹荻秋也簽字同意民辦小學教師提高工資百分之七十。

這天上午，陳揚從南京打電話給陳丕顯，報告赤衛隊活動情況。陳丕顯再次指點陳揚：“你們要依靠造反派，同他們一起商量問題。我現在就是同造反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實際情況是，他和非法組織紅衛軍一小撮壞頭頭等，住在高級招待所，吃的高級點心，用物質收買的卑鄙手段指使他們替自己效勞。

深夜十二時，“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備委員會的工總司代表等，找到陳丕顯，責令他在五日下午六時前，把東躲西藏的舊市委、市人委部、局長以上人員全部集中到東湖招待所，以便參加大會接受批判，並當面勒令他自己準時到會，警告他如果敢溜掉將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陳丕顯無可奈何地一一答應。

## 一月五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十一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出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由新生的《文匯報》發表。在這個極其重要的文件裏，提出了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就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花招，號召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更堅

決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解放日報》奪權勝利。由於報社保守派力量很強，因此鬥爭很艱苦。在紅衛兵小將和工人造反派堅決支持下，五日晚正式宣佈奪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立即表示支持。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工總司及鐵路、海港等局造反派負責人，指出：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要加強海港、鐵路等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揭發走資派亂簽字、亂許願、破壞生產，從而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必須認清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也是對左派的一個考驗。並且指出：要教育群眾，你如果在經濟上得到一些好處，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不下去，國家就要變顏色了。同時，又提出要對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多做工作，少抓人。

“打倒上海市委大會”進入籌備的最後階段。在討論海報署名時，紅革會某些頭頭，表現了強烈的山頭主義，引起了廣大革命造反派的不滿。上午，在工總司負責人提議下，大會會場從文化廣場搬到人民廣場。深夜，被“捍革會”引進舊市委辦公廳壓制造反派的交大“衛真兵團”頭頭突然出來造大會籌委會的反，造謠說發言稿都是從“捍革會”那裏搶來的，是“假”批判，蒙蔽了一部分紅衛兵，提出大會不能開。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機關造反派介紹了大會籌備過程，用鐵的事實駁倒了“衛真兵團”的謊言，拆穿了他們破壞大會的陰謀。工總司堅持大會非開不可，提出三十萬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經連夜集會，許多遠的地區已經出發了，這樣鬧下去，如果大會開不成，“工人造反隊員非砸爛我們狗頭不可”。最後多數同志表示贊成，決定立即趕到會場繼續完成最後的籌備工作。這時離開會已只有四小時了。

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刮到頂點。凌晨，舊市委候補委員、北方區海運管理局黨委書記李廣，竟然帶領數百人登上工農兵十七號輪“北上控告”，使海港離開生產崗位的受蒙蔽群眾達到五千九百零四人，日裝卸量由九萬噸猛降為三萬五千噸。從一日到九日，這個局所屬上海地區各單位，就發出現金一百四十八萬元。九天中，平均每天有七十餘艘中外輪因無人裝卸而停產，有一天停了一百十四艘。為了賠償中外輪非生產停泊損失，九天中虧損了幾萬英鎊的外匯。同時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一個英國船長對我們公開挑釁說：“你們搞文化大革命生產下降了”，“我今年來過三次，一次不如一次。這不是一天天好起來，而是落下去”。當即受到我革命造反派的嚴厲痛斥。四日，有艘希臘船因超過規定時間兩個多小時才能解纜開航，船長竟將我國旗倒掛以示侮辱，把工人造反派的肺都氣炸了。由於上海港貨物堵塞，使北方海區各港口造成惡性循環。一日起，各港口紛紛停止發運物資，電力用煤、生鐵、木材等重要物資嚴重積壓，使生產受到重大損失，如輕工業局系統就有一萬名工人被迫停工待料。這天深夜，工總司海港指揮部負責人找到陳丕顯，要他對李廣問題表態，陳丕顯竟說：“凡是補發工資，按照中央指示，相符的就發，不符的請示中央嘛！”當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奪海港調度大權時，他驚慌得連說：“這可不行啊！”

銀行提款額越來越大。華東電業管理局提取補發工資一百二十八萬元，相當於該局四個月的工資總數。從一日到七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及所屬各區辦，七天中的補發工資、福利費、營養費、獎金、勞動防護用品費、串聯費等形形色色名目發出的現金，共達三千八百萬元。上鋼三廠，由於舊市委簽字同意一九五八年後轉入鋼廠的青年工資級別一律從一

級半升到四級，平均每人補發三年的升級工資八百元，就補發出了六十餘萬元，老工人也因青工升級而普遍調整級別，又補發了工資近一百三十萬元。

市場受到極大衝擊。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高級商品一搶而空。中百一店，在一日到八日，銷售總額比上月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點一，比一九六六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六點三。有些用戶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郊區及市中心都接連發生脫銷。

陳丕顯繼續公開對抗毛主席、林副主席關於復員轉業軍人不得單獨成立組織的批示，又擅自簽發一個“市委通知”，批准非法組織紅衛軍改名為“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員會紅衛軍指揮部”。重申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簽四點意見“繼續有效”，“一切活動經費，仍由市民政局供給”，並規定“各單位接到此文後，必須切實傳達”。紅衛軍一小撮壞頭頭也到處吹捧陳丕顯是“老首長”。揚言：“陳丕顯的第一書記可以打倒，但警備區的政委是打不倒的。”

在陳、曹之流刮起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腐蝕毒害下，一批“為‘私’造反”的組織紛紛出現，什麼“革命單身職工造反司令部”，“住房困難戶革命造反司令部”，“長住臨時戶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支疆青年家長革命造反司令部”，“墓屬革命造反委員會”等等，名目繁多，千奇百怪，專為解決老婆、房子、戶口和子女調回上海等問題而造反。後來，僅列入市革會財務監督清理小組登記的不三不四組織就有三百五十四個。這天，有個“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領一千六百人強行進入上海大廈，佔用四層樓房，揮霍國家錢糧達一個半月左右。一些牛鬼蛇神乘機鑽進去渾水摸魚，嚴重影響了上海的社會秩序。



## 一月六日

全市百萬革命群眾，冒着紛飛的大雪，勝利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中心會場設在人民廣場，另有三百六十九個分會場，其中包括二百五十二個大工廠，一百十七個工人俱樂部、影院、劇場和大專院校。四條大馬路、十二個交通要道安裝了上千隻喇叭。通過十四個廣播中轉站向全市廣播，並用電視轉播實況。大會有四千名工人造反隊員擔任糾察。宣傳大會的廣播車，遍佈十個區，海報、標語直貼到閔行、昆山。規模之大，是上海解放以來第一次。會前，當負責後勤的工總司同志將舊市委舊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市內電話局政治部主任揪來責令解決轉播設備時，他們都大吃一驚，說：“從來沒搞過！”可是，幾百名工人造反隊員自己幹，三天就搞成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一、楊西光、常溪萍、宋季文、楊永直等上海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以及舊市委、舊市人委部長以上幹部到會聽取揭發批判。許多單位自動把本單位走資派揪押來陪鬥。各個分會場裏都有這些大大小小的活靶子擺在那裏。工人、學生、機關工作人員等革命造反群眾組織代表，在會上用大量事實揭露和批判了陳、曹等一小撮反對毛主席，對抗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挑動群眾鬥群眾，瘋狂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破壞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會發出三項通令，宣佈上海人民不再承認曹荻秋為市委書記處書記和市長，由革命造反派對他監督勞動改造，並報請中央批准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勒令陳丕顯在七天內交代反革命罪行；建議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

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態度極其惡劣。大會開始時，到處找不到曹荻秋，最後發現他竟躺在東湖招待所的沙發上睡大覺，

憤怒的革命造反派將他揪到台上示眾。陳丕顯裝得很老實，第一個到會挨鬥。但大會以後，他立即由非法組織紅衛軍的一小撮壞頭頭以“保護老首長”名義接到衡山飯店窩藏起來，並馬上給曹荻秋打電話：“中央還沒有罷你的官，公開場合你不能工作了，還可以在後面做些事情。”魏文伯、韓哲一則在服務團點名勒令他們立即到會受審時，才灰溜溜地跑到會場。王一平在前一天就躲得無影無蹤，因而沒有到會受審。

大會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志氣，也深刻地教育了受蒙蔽群眾。中午，工總司海港指揮部立即奪了全港調度系統的大權，把抓革命促生產的指揮權，緊緊地掌握在自己手裏。國棉十七廠、良工閥門廠的革命造反派，對受蒙蔽的赤衛隊員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工總司良工兵團還作出“五不”決定，即對受蒙蔽的赤衛隊員不扣工資、不扣獎金、不戴帽子、不遊街、不批鬥，造反派負責人帶頭歡迎他們回廠抓革命，促生產。廣大赤衛隊員受到很大震動，紛紛倒戈一擊，國棉十七廠赤衛隊員聲明退出赤衛隊組織的大字報貼滿大字報走廊，回到車間後，加油工作，以彌補離開生產崗位帶來的損失。

反經濟主義的鬥爭迅猛開展。華東電業管理局的走資派，五日晚上簽字同意供電局提出的在全系統補發、增加工資福利的要求，這就要使全局立即發出二億元。六日大會以後，楊樹浦等發電廠革命造反派立即決定開展鬥爭，迫使造反派當晚就打電話通知各廠停止發放補發工資，並到各廠去檢討。該局財務處有個幹部，六日晚因局裏工資基金發光，受蒙蔽群眾包圍他要求動用六十萬生產基金，他足足頂了一夜，直到次日早晨各廠革命造反派聞訊趕來才解圍。這個系統的革命造反派還以歷史的經驗教育群眾。解放前夕，美帝在逃跑時為了破壞我國經濟建設，在舊上電系統大加工資，技術人員每人加到一千

元，工程師最高加到二千元，直到一九五八年才最後解決。這個例子大大擦亮了群眾的眼睛，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很快煞住。上海捲煙廠革命造反派在六日大會後，經過二天三夜的激烈鬥爭，把舊黨委從銀行領出作為補發工資的四十萬元生產基金，又敲鑼打鼓送回銀行。上海內河航運公司周家渡船廠走資派簽字補發十八人的工資差額達二萬二千六百元，有位女工夫妻倆就領到四千一百二十八元，六日大會後她立即全部退回，還主動去說服其他人，到次日十八人就全退掉了。

張承宗又簽字同意民辦業餘學校教師工資從二十二元增加到四十三元。

## 一月七日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及各區辦事處連日來受到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極大衝擊。到六日晚，各區辦的現金已發放一空。分行走資派姚國桐請示了馬一行，問市分行金庫裏的現金可不可以發。馬一行竟回答說：“你是行長，有權決定嘛！”姚國桐馬上就決定發光算數。這一黑指示遭到銀行革命造反派的強烈抵制。七日，市分行受到大批受蒙蔽群眾的包圍，同銀行造反派展開了激烈辯論。正在緊急時刻，工總司兩位常委帶領總部工作人員趕到，紅革會、北三司、炮司等組織一些革命學生也聞訊趕來。他們在工總司同志主持下，同銀行造反派一起向提款人宣傳《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一個一個地把擁在門口的幾百人說服了，有的當場把支票撕得粉碎。他們又向姚國桐等一小撮銀行走資派進行了面對面的堅決鬥爭，迫使這些傢伙低頭認罪。當夜，工總司主持起草了一份通令，宣佈從一月七日下午五時起，在沒有接到中央指示前，銀行不得發放補發工資和其他福利費用、工會會費、工廠基金、集體積累資金一

律凍結(這條到十日後修改為不得移作他用)。下午，閘北辦通過分行走資派同意，提取了現金一百萬元，將要裝車時，被革命造反派發現，堅決制止了。內河航運公司革命造反派，阻攔公司走資派動用生產資金十八萬元作補發工資用，並派代表到人民銀行市分行鬥爭走資派姚國桐。從今天起，通過銀行搞經濟主義的渠道被堵塞。

人民解放軍駐滬部隊派戰士趕到市分行門口加強保衛。

《工人造反報》發表社論《決不能轉移鬥爭大方向》，指出陳、曹之流企圖誘騙群眾造金錢和物質的反，夢想把嚴肅的政治鬥爭引向經濟鬥爭，向中央施加壓力。社論號召猛打猛衝舊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八天來，上海到北京的直達客車都在中途受到阻攔，沒有一列開到終點。上海鐵路分局第一列紅色造反列車由共產黨員機車司機張生堂同志駕駛，終於衝破走資派和赤衛隊頭頭的重重攔阻開往北京。

駐滬三軍指戰員、紅衛兵小將、機關工作人員，奔赴工廠、農村、車站、碼頭，同工人造反派並肩戰鬥，迎頭痛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

東海艦隊全體指戰員，公開表態支持《文匯報》奪權。

## 一月八日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代表，分析研究了全市當前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張春橋同志傳達了主席關於全國展開文化大革命重點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天津、第四東北的偉大戰略部署，說：“上海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處在很重要的地位，主席很關心上海，有關上海的材料都親自看了，所以派我和姚文元同志回來。主要任務是瞭解情

況，報中央，也幫助上海左派隊伍發展、成長、壯大，總結一些經驗。因此，要組織一個班子，協助搞些調查研究工作。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還指出，要看到形勢的主流很好，不要被逆流所迷惑。要把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放到要害部門，多抓好要害部門，如港口、發電廠、自來水廠、電報局、電台、郵局、煤氣公司、鐵路局、公交公司等。晚七時，工總司和東方紅、交大反到底、師大紅革會、炮司等學生組織舉行緊急會議，討論當前經濟戰線形勢。由於海港和鐵路基本癱瘓，引起連鎖反應，許多重要工業部門面臨停產的威脅。當務之急是解決煤的問題。全市楊樹浦、閔行、南市、閘北、吳涇、吳淞、望亭七個電廠，存煤平均只夠用三天，還在逐級下降。存煤情況是：一日，六.九萬噸；二日，六.八萬噸；三日，七.一萬噸；四日，六.二萬噸；五日，五.九萬噸；六日，五.九萬噸；七日，五.五萬噸；八日，四.七萬噸。最嚴重的是望亭電廠，存煤量只夠一天半，十一只爐子停了五隻，發電量從每天四百萬度急劇下降到二百萬度。沒電就沒水，自來水供應也受到嚴重威脅。生產、生活全都要陷於極大混亂。怎麼辦？到會的工人、學生革命造反派代表，決心把領導全市抓革命，促生產的重擔自己挑起來。

深夜，工總司所屬鐵路、海港、郵電、長航、交運、海運六局系統指揮部聯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成為全市抓革命，促生產的權力機構。全體工作人員就是七名工人，二名幹部和三十五名紅衛兵小將。

上海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開始了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大進軍。街頭上，銀行邊，貼滿了反對經濟主義的大標語，宣傳畫：“要政治掛帥，不要鈔票掛帥”，“革命不是為了錢！”“同志，當你拿到補發工資

時，你就上當了！”

這天下午，工總司、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紅革會、同濟東方紅、交大反到底、炮司等三十五個群眾團體負責人在錦江飯店十一樓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制止“三停”、“三風”蔓延，痛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問題。工總司二兵團負責人主持會議，陳丕顯被迫參加。到會的工人、學生、機關幹部革命造反派當面痛斥了陳丕顯之流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表達了誓死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堅強決心，並決心聯合簽署一個《緊急通告》。紅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臨時工、外包工組織）、農司、支農司三個組織頭頭不肯簽字，被趕出會場。

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革命造反派根據上海兩報消息自編新聞節目。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電台新聞廣播還是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發的消息為準。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的上海消息，有些是對內的東西，如果電台一廣播，就會在國外發生影響，是不是從明天開始就不再廣播內部的東西了。廣革會當時接受了。

工總司鋼鐵兵團頭頭陳鴻康等，早想另立山頭，二日就打算搞一個“工三司成立大會”，海報都印出來了，後來怕遭到各革命群眾組織的譴責，臨時中止。陳丕顯見有機可乘，就煽動他們說：“你們要錢可以的，但你們要有獨立的組織名字才可以簽字。”於是，鋼鐵兵團便從工總司分裂了出去，成立了“工三司”。

## 一月九日

《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發表了極其重要的編者按，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全文如下：

“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聯合簽署的《緊急通告》在《文匯報》、《解放日報》同天刊登。發表前，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審閱了《緊急通告》。

上午，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工總司、《文匯報》、《解放日報》等八個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並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說：“造了反，再登《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樣好文章，不僅對華東有影響，並且會影響到全國。”張春橋同志說，現在我們乘此大好形勢，從政治上進行反擊，擴展一月六日大會的戰果。各學生組織應該帶了《人民日報》往昆山，把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送到赤衛隊中去。大家到大街小巷去宣傳，使之家喻戶曉。要表揚高舉抓革命、促生產的旗幟，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先進單位和個人，其中包括工人和幹部。要相信赤衛隊中的多數人是好的，不要抓，要在報上宣傳起義的赤衛隊員的講話。毛主席還說，兩個報社要注意團結多數，主要是領導權問題，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裏，用人左、中、右都可用。張春橋同志說，只要兩報一刊搞

好了，中央的聲音就能傳達下去，關於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問題，要找幾個簽字最多的最壞的局以上幹部到廠裏去開鬥爭會，讓覺醒過來的赤衛隊員一起去鬥他們，《文匯報》、《解放日報》發消息。

中午，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展覽館電影院接見了學生組織，闡釋了《人民日報》上登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偉大意義和毛主席對這篇文章的評價，指出它是革命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的產物，要求革命學生能抓住階級鬥爭的綱，拿着《人民日報》和《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組成浩浩蕩蕩的宣傳大軍，到街道、工廠、里弄去宣傳，支持左派、團結中間派，孤立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會後，與會的學生當即上街進行遊行和宣傳。

晚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文匯報》社同造反派代表談話。張春橋同志傳達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對新生《文匯報》的關懷和支持，就辦好報紙的一系列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姚文元同志提出要緊追兩頭，一頭是毛主席的思想，一頭是革命群眾中先進的東西。最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傳達了陳伯達同志要他們和《解放日報》派代表去北京彙報奪權情況的指示。

工總司鐵路聯合指揮部接管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接着又和同濟東方紅聯合接管上海站。

上海鐵路局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最猖狂的要害部門之一。路局頭號走資派邵光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在同呂正操密謀後，第一個簽字同意精蠹職工要求復工補薪的協議。下面大小走資派立刻紛紛亂簽字。從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月九日，全局共簽發了六十三份工資福利協議，金額高達三千零五十萬元。就在《緊急通告》發表後，邵光華還簽字同意一



批一九六一年技校畢業生每人補發工資一千五百元，並聲稱這是“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各分局群眾群起效尤。一些機車司機、乘務員、扳道員、信號員、裝卸工都受了蒙蔽，停工去造經濟反。那時北京站竟四門大開，無一人檢票。這樣，邵光華積極配合陳、曹之流的“三停”陰謀，造成了嚴重的鐵路中斷事件。從一日到八日，上海開往南京、杭州方面的客車，按計劃是每天二十一列，實際開出每天平均只有十七列，而且誤點、中途停車事故每班都發生；開出貨車，按計劃應為二十三列，實際開出平均每日三列。貨物裝卸方面，裝車計劃為六百五十輛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噸，實際平均只有七十二輛二千六百十五噸；卸車按計劃也只完成百分之十一左右。三日到八日，南京、杭州方面開出的列車，每天平均有五十二列停在沿途各站，無法進入上海站。上海分局調度所是指揮鐵路運行的神經中樞，但是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赤衛隊，調度所主任王玉璽就是赤衛隊總隊頭頭，另外還出了一名赤衛隊總部常委。這個要害部門的權不奪，鐵路運輸就不能恢復。

中午，鐵聯決定奪權。革命造反派衝進調度所宣佈接管，並立即將赤衛隊頭頭拉下馬，頂上了十二名熟悉業務的工人造反隊員。三百名同濟東方紅的紅衛兵小將配合控制了整個北站。兩小時後，鐵路秩序就開始恢復。

《支部生活》宣告新生。

范佐棟等盜用《工人造反報》編輯部名義，企圖接管新生的《解放日報》。

工總司和國棉十七廠革命造反派把陳丕顯、馬一行、李廣揪到廠裏鬥爭。陳丕顯居然對工總司負責人說：“你們這裏很好嘛，我搬來和你們一起聯合辦公，只要給我裝兩部電話機，一部紅的，一部黑的，就行了。”工總司負責人立即戳穿了他

想躲到工總司牌子下逃避鬥爭的陰謀，並說：“我們這裏廟小，裝不下你這個大菩薩！”

## 一月十日

《人民日報》刊登上海兩報革命職工《向毛主席致敬電》。

晚上，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文匯報》、《解放日報》革命造反派代表。

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把瘋狂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到處大批簽字的陳、曹黑爪牙宋季文、張承宗等拉出來遊街示眾，給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以迎頭痛擊。

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成立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專門負責對雜七雜八的經濟主義組織進行鬥爭。

陳丕顯簽發關於人力裝卸運輸上由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的“市委文件”，繼續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這一文件送到舊市委印刷廠時，被機關造反派扣壓。

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企圖接管新生的《支部生活》，被革命造反派趕了出去。

## 一月十一日

毛主席決定向全國廣播《緊急通告》。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就《緊急通告》的發表，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發來賀電。賀電指出，《緊急通告》的方向、路線和提出的方針、任務、政策，都是完全正確的。並強調指出：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裏。”

賀電號召全國革命人民，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關於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文件，通知各地銀行一律由人民解放軍和公安部門負責保護。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於深夜十一時在黨校召開各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會議，有工總司等四十多個單位代表出席。張春橋同志傳達了中央賀電，並講了話。

張春橋同志指出，毛主席親自決定向全國廣播上海的兩個文件，指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發出賀電，這是解放十七年來從沒有過的大事，集中體現了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支持。

張春橋同志指出，我們剛取得了一點成績，中央就作出了這麼高的評價，說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給全國作出了榜樣。這與其說是評價，不如說是中央對我們的希望。我們作的還不夠，距離毛主席的要求還很遠，我們應該拿出行動，努力實現賀電提出的各項要求，不辜負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張春橋同志又說，正因為上海各革命群眾組織聯合了，才能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打退。但據我們一周的觀察，各革命組織的關係還不夠好，有些事做得不妥當。例如有的組

織為署名問題，登廣告問題，要“封”新生的《文匯報》、《解放日報》。毛主席剛肯定這兩張報紙的奪權，你採取什麼“革命行動”？如果要砸兩報和《支部生活》，全體革命群眾都有權起來保衛它。因此，大家應以全局為重，做團結的模範。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建議立即籌備一個歡慶中央賀電大會，並建議成立上海各造反派組織聯絡站，以更好地聯合起來，向反革命經濟主義鬥爭。各革命群眾組織熱烈響應，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全市幾十萬群眾大會的籌備工作，速度空前。

下午，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外地學生駐滬聯絡站代表。張春橋同志指出，紅衛兵搞軍訓很有必要，主要是搞政治訓練，要學習古田會議決議，糾正目前我們隊伍裏出現的錯誤思想。對於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首先不要怕，要充分相信廣大的工人群眾是聽毛主席的話，要大膽幹。但是，戰術上要重視它，應該把毛主席的話廣泛地到工廠、農村進行宣傳，讓工人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自發的工人運動總是要搞經濟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這方面的問題引導到政治鬥爭上去。姚文元同志在談到現在按行業、年級組織造反隊相當多時，指出，美國就是按職業組織隊伍，把工人階級的隊伍瓦解了。我們主張按十六條原則組織我們的階級隊伍，對出現這種按職業分的思潮要加以引導。

工總司總部舉行常委會。總部負責人傳達了張春橋同志的意見：各造反派組織，不論在哪種情況下，都要支持《文匯報》、《解放日報》；各革命群眾組織要以革命利益為重，從無產階級革命利益出發；以後各組織定期坐下來談談關係；全部精力都要集中在抓革命促生產。總部決定，當前主要任務是抵制反革命經濟主義的“三風”（經濟風、串聯風、搶房風），要

揭露曹荻秋臨死掙扎的陰謀，要大量搜集頂住“三風”的好典型加以總結宣傳。還決定，要認真整頓各區聯絡站的組織，對於有些區領導人中帶頭刮“三風”的，要及時處理。另外，還根據張春橋同志建議，決定由工總司正式接管上海總工會，總部搬到那裏去辦公，這次會議對於推動各基層更好開展反經濟主義鬥爭有很大作用。

紅三司奪市公安局的權。十日晚，紅三司在交大召開總部擴大會，各基層頭頭就紅三司未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一月六日大會上未署名等事“炮轟”總部。並決定次日奪市公安局權。十一日中午十二時，紅三司總部率四、五百人(也有紅革會的)，包圍並衝進建國西路三九五號市公安局政治部，有人的房間佔領、無人的房間查封。下午二時，紅三司又以三司、紅革會名義調集交大、外語、師大、復旦近千名紅衛兵衝進福州路市公安局，宣佈接管。這件事引起了一些群眾組織的不同意見，市局人員都很聽話的集中到禮堂開會。公革會事前不知道，事後即表示支持，結果以公革會為主接管市局。

連日來，由於魏文伯、宋日昌簽字同意社辦企業改國營，農村外出合同工的勞務副業收入由原來的公六私四改為百分之九十五歸己。這就造成了社員與社員，社員與合同工的嚴重矛盾。如寶山縣劉行公社沈宅大隊有個三十多人的縫紉組，如按此辦理，每人每年平均可分現金一千四百元，而同等勞動力的社員，全年實做三百八十個勞動日，卻只能收入現金二百八十五元，相差五倍。同時，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也嚴重影響郊區的年終分配。寶山縣羅店公社金星大隊杜家橋生產隊，全部現金三千六百元，而退還給外出工上交集體收入需六千元，社員年終不僅分不到現金，還倒欠二千四百元。該公社鎮南大隊每個勞動日值因此從去年的七角二分下降到只有三

角七分。社員氣憤地說：“走資派簽字，社員出錢，豐產不豐收，大家去造反！”

郊區來的農民將陳丕顯、宋日昌、劉粟等包圍在東湖路招待所，要他們安排近十萬來滬農民的食宿、交通問題。陳丕顯煽動說：“我哪裏有這些東西？東西都給別的造反隊拿走了，你們自己和他們商量去吧！”他又找紅衛軍頭頭策劃搞五百輛卡車供農民用。晚上，陳丕顯被憤怒的農民拖到風雨操場去揪鬥。

## 一月十二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全文刊登中央賀電和《緊急通告》，並發表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指出：毛主席親自決定向全國廣播上海的兩個文件這個大事，標誌着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

全市數十萬革命群眾，下午二時在人民廣場隆重舉行“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市區各工廠凡不當班的工人造反隊幾乎全起來了，人民廣場紅旗如海，有線廣播和電視的規模是一月六日大會外，還在十個郊區增設了十二個轉播站，收聽人數達數百萬，盛況空前。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張春橋同志向上海一千萬人民報告了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的特大喜訊，傳達了毛主席對上海文化大革命非常關心，同上海人民心連着心，並宣讀了中央賀電全文。張春橋同志說，毛主席對上海每出現一個新事物，都首先給予最堅決、最熱烈的支持，毛主席對上海有很高的希望。上海歷來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激烈搏鬥的據點之一，現在我們勝利了，但資產階級還會採取各種手段同我們較量。我們一定要在戰略上藐視他們，在戰術上重視他們，運用賀電這個最新最活的毛澤東思想，給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新反撲以粉碎性打擊。經過鬥爭使整個上海永遠成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我國革命人民的強大基地。姚文元同志在講話中，讚揚了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造反派在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中，表現了崇高的無產階級品質。同時憤怒地揭穿了陳、曹之流過去把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算在自己帳上，貪天之功為己功，現在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輝思想照耀下創造的成績算在自己名下，真是厚顏無恥。姚文元同志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動再次證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現在革命造反派應該挺身而出，把無產階級的各項領導權奪回來，使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顏色。

大會在熱烈歡呼聲中一致通過了《向毛主席致敬電》，還通過了《關於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聯絡站的倡議書》。會後，上海革命人民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次日，駐滬三軍也舉行了盛大的遊行，歡呼中央賀電發表，聲援上海革命造反派。

陳丕顯窮途末路，一面惡毒咒罵張春橋同志在大會上的講話是給造反派“定調子”，一面陰謀陷害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示早已被他收買的招待所管理員竊聽情報，並在生活上刁難張春橋、姚文元同志。

在革命造反派的奮戰下，鐵路恢復到每天發出客車二十一列。銀行造反派奪權後立即堵塞了經濟主義最後一個漏洞，停止發放所謂“串聯費”。長航局當晚奪權，馬上將已經停工數天的三十一艘大駁船和六條拖輪，全部啟航出港。受蒙蔽上京“控告”的上海第二製藥廠九名赤衛隊員，在人民日報社門口貼出一張《向毛主席請罪》的大字報，說明赤衛隊廣大群眾已開始堅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

郊縣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仍在蔓延。許多縣辦企事業及

社辦企事業走資派也大加工資福利、大發申聯費。如川沙縣補發工資福利等費用支出一百三十六萬八千元，金山縣一百萬元，嘉定縣五十二萬元。川沙縣財政收入為此下降百分之三十。嘉定縣有個工人要從五三年起補發追加工資，算算總數達近萬元，以後沒發。許多公社及農場人員脫產、停工進縣城成立各色各樣行會組織，如“初小畢業生造反總司令部”、“某某屆農中畢業生造反總司令部”等，僅川沙縣就有一百幾十個，使財政支出大大增加。特別在年終分紅上，舊市委一小撮走資派提出“發光、分光”，“實行大民主分配”等反動口號，許多生產隊都將次年生產資金也分光了，貧下中農和農村革命幹部紛紛起來抵制。

陳丕顯被嘉定農民造反派揪到馬陸公社去批鬥。

### 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錦江飯店接見各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決關於公安局奪權問題。上午，接見公革會代表，聽取了關於黃赤波之流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彙報以及對奪權的意見。下午，接見工總司、公革會、紅三司、紅革會等十五個組織代表，並講了話。

張春橋同志首先肯定了公安局奪權的大方向，指出：上海公安局不僅已經癱瘓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不少壞事，成了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如在康平路事件中，他們就是保了曹荻秋，而對柯老的家屬都攔在那裏不管，連情況也不知道。他們對好人也抓，還整理黑材料，在那裏不要說無產階級大民主、連小民主都沒有。公安局的權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



裏。紅三司衛公安局大方向是對的，應該得到支持，責備是不行的。張春橋同志強調說，現在階級鬥爭越來越嚴重、尖銳，必須加強專政機構。毛主席一貫指示專政機關要與群眾相結合，今後革命群眾要加強對公安部門的監督，內外結合。他建議各革命群眾組織聯合搞一個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言。張春橋同志還提出，所謂接管，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權已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如《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不能接管；誰接管，我們就派軍隊來保護。

張春橋同志又指出，對“長”字型大小的要做階級分析，不能認為十七級以上都是壞的，要把犯錯誤的幹部推上第一線，讓他們在鬥爭中接受考驗，改正錯誤。造反派要學會策略，極大的孤立敵人，要利用敵人的各種矛盾，決不要被敵人利用我們的矛盾。張春橋同志對復旦三派爭論的蔡祖泉問題發表了意見，指出要很好的爭取起義者，蔡祖泉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開始保，後來揭，毛主席幾次提到，講的好！他代表很大一個階層。

接見結束後，錦江飯店紅色造反委員會一小撮頭頭(後經查明其主要決策人是反革命分子)經過事前周密策劃，乘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下樓時，電梯突然倒開上九樓，強行要求“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當即對這種惡劣行徑提出嚴厲批評，要他們馬上將電梯開下去。但是“紅造”一小撮壞頭頭仍無理取鬧，將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攔截在電梯內半個多小時，才勉強開下去。還當面造謠，說周總理同意要張春橋同志接見他們。事後還蒙蔽群眾圍攻迫害敢於揭發策劃這次嚴重事件的壞頭頭的革命群眾。

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根據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建議，着手籌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並起草《保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告》。

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迅速取得很大戰果。

鐵路：已做到能夠准點開出。這天滬甯線發車十二列，到車十二列，貨運六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噸，客運三萬零八百零六人；滬杭線發車十二列，到車十列，貨運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九噸。有艘載有八百桶危險品的日本貨輪已因無車皮卸貨而停泊九天，由造反派給予解決。九日到十三日上午，上海站已送出旅客十七萬零三百七十一人。同濟東方紅的紅衛兵在站內工作主動，有的日夜不睡頂班，有的把草包當被頭，使過往旅客十分感動。

煤炭：這天棗莊、陶莊等已開始向上海發運煉焦製氣的洗粒煤三千二百五十噸。煤氣公司造反派採取措施，組織造反隊員，突擊搶運煤炭，使吳淞煤廠的庫存煤從一天的用量增加到七天的用量。

煤氣日產量從五十二萬立方米回升到八十萬立方米。

交運：除勞動車隊臨時工為要求轉為國營而繼續停工外，情況全部恢復正常。

內河航運：內河航運公司造反派已使三十多條拖輪，二百七十多條駁船投入生產，全力供應煤氣、焦化、發電等廠的工業用煤。但不少學徒鬧工資福利而外出串聯，還有三十多條駁船停工。

自來水：自來水公司所屬六家水廠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控制了調度、值班室、A機、泵房等要害部門，提出“保證不停一秒鐘水”的口號。楊浦、南市、長橋等水廠，造反隊員和老工人主動頂班，有的連續工作二十二小時。全市每天供水量一百四十萬噸，因有些工廠用戶生產不夠正常，雖略低於去年同期冬季低峰供水量，但已能滿足需要。十二日晚，公司造反

派在紅衛兵小將配合下宣佈接管整個企業，受到廣大職工熱烈擁護。楊浦水廠有個赤衛隊頭頭，前幾天還說：“交掉袖章不要緊，交不了我的心！”但這天一早，他就把剩餘的赤衛隊袖章交給造反兵團，表示要堅決跟着毛主席革命路線跑。

電話：郵電局和市內電話局走資派從一月三日起先後簽字發出串聯費二萬二千多元，批准二百二十六名行政、科研、生產人員外出串聯，又多次批發二百十七人的補發工資十二萬二千八百餘元，使全局百分之四十的人離開生產崗位，僅積壓的裝拆移工單三千餘張，九千多隻電話被竊被損，電話欠費近四十萬元無人催交，生產秩序嚴重混亂，市內通訊隨時有中斷的危險。中央賀電來後，革命造反派宣佈奪權，並聲明過去走資派亂簽字一律無效。受蒙蔽群眾紛紛提高覺悟，已有一百四十七人退回了補發工資、串聯費共三萬三千多元，其中郵電中專六一年畢業生四十三人集體退回全部補發工資一千七百多元。

從中央十一日賀電下達後，全市掀起向市、區、縣、局各種機構奪權的高潮。三天內，市、局、區、縣一級單位共四十九個被奪權，其中造反派上下、內外結合接管的二十二個(舊市委宣傳部、教衛部、財貿政治部、交通政治部、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政治部、商業二局、鐵路局、交運局、港務局、北方區局、郵電局、長航分局、公用局、房地局、華東電力設計局、設計黨委、園林處、物資局、華東電管局、手工業局、市教育局)，外單位造反派接管的五個(市人民檢察院、商業一局、市衛生局、勞動局、寶山縣委)，保守派企圖接管的七個(舊市委機關、市人委機關、南市區委、南市區人委、靜安區委、虹口區委、普陀區委)，政治面目不清的接管一個(岳陽路公安局長辦公室)，造反派單方面接管未成的三個(舊市委書記

處、科學院華東分院、盧灣區委)。政治面目不清組織接管未成一個(總工會)。

## 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發佈《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

上海警備區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一月十一日指示，派部隊保護銀行及各級辦事機構。同時，又派出部隊幫助鐵路維持交通。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就電台奪權問題作了三點指示：一、外邊來的人不准接管；二、電台各派自己暫時也不要接管，保持正常的工作；三、中央《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可以宣讀，請大家討論。如何有利於革命，可提出各種意見和方案，由我們向中央請示。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駐滬三軍負責人，就解放軍要支持革命造反派問題進行了座談。張春橋同志指出，上海的形勢很好，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陳、曹之流處處壓制造反派，以後，又大刮經濟主義妖風，他們的表演是很夠得了。我們相信，上海問題完全可由上海的革命左派自己來解決。毛主席對上海奪權鬥爭的開展很高興。軍隊要支持、保護革命左派，促進革命大聯合。對於一些要害部門，軍隊要保護起來，有的要接管。民航局不能由群眾接管，空軍應該把它管起來；廣播電台警備區可以管起來；這些事最好最近幾天就辦，宜快不宜遲。姚文元同志建議找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中學，搞軍訓試點。並指出搞軍訓要依靠革命左派，要走群眾路線。接見後，駐滬三軍負責人進行了研究，採取必要的措施，鮮明的支持革命造反派。

下午，工總司把曹荻秋押出來在全市各主要馬路遊街示眾。

陳丕顯上午被炮司揪去，下午慌忙躲到設在鉅鹿路的一個學生組織住地去。

郊區農民運動逐步興起，兩條路線鬥爭十分激烈。各縣差不多都出現農革司和貧司兩大組織。上海和外地在滬學生組織紛紛派人下鄉。川沙縣有個“四清”下台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拉了各縣農司七、八十人，來市區成立了“上海市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委員會”。

### 一月十五日

北京市革命群眾組織在工人體育場舉行“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同志出席大會。總理、伯達同志在講話中，讚揚了上海的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

凌晨二時半，二兵團、上三司等組織，帶領工人、學生二百多人，佔領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宣佈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並發佈了三項通令：（一）聲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罪行，宣佈接管，並上報中央；（二）任命張春橋同志為新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姚文元同志為新市委第二書記、副市長；（三）勒令原市委、市人委所有的機關幹部、馬上恢復辦公，開始工作。上三司派人接管了舊市委辦公廳機要室，要接收所有機要檔案、文件，同機要室工作人員發生激烈爭吵。通令發出後，他們又在馬路上到處張貼大紅喜報，散發傳單。

中午，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得到消息後，馬上找二兵團負責人談話。張春橋同志對他說：“這個問題比較大，要接管市委，至少要和其他兄弟組織商量一下。因為把上海市委打倒，不是一個組織搞的，這是全市革命造反派和全市革命人民共同體的事情。”晚上，二兵團負責人在衡山飯店召集參加接管的

各組織頭頭開會，認為各革命群眾組織大家都不同意這樣單獨接管，於是把隊伍撤了。趙全國也只好撤了。但撤出後，他立即搞了二張飛機票，到中央找中央文革告張春橋同志的狀，目的未達，很快又飛回上海，馬上着手策劃炮打張春橋同志。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當天就打電話報告了毛主席和黨中央、中央文革。

陳丕顯被市紅革會總部揪去。

### 一月十六日

毛主席接到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關於群眾組織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報告，非常關心，發表了極為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說：我贊成上海群眾推選市委書記、市長的辦法。這兩個人我知道的。但總不能只有這兩個人，總得有個名單，醞釀一下，報告中央。

毛主席又說，我也同意張春橋的意見，這個名單暫時不要宣佈，做一段工作，搞幾個回合，再宣佈。

毛主席要張春橋同志告訴接管的單位，讓他們知道，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做法的。

毛主席還說：群眾提名，這個辦法是好的。比以前改組北京市委的辦法好。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張春橋同志連夜找到二兵團負責人進行了傳達。張春橋同志還找過上三司頭頭趙全國，但他到北京去告狀了，沒有找到。

《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傳達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下午二時，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各中學生紅衛兵組織代表，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並指出：一、要狠抓革命大批判，深入里弄宣傳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反動性和危害性，使之家喻戶曉；二、紅衛兵還在建軍初期，要認真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搞好革命大聯合，並建議搞一個中學紅衛兵章程，努力實現林副統帥提出的三性，即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三、要艱苦樸素，警惕走資派以物質腐蝕紅衛兵。

中央發佈的《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和《關於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由各革命群眾組織迅速大量翻印。學生、機關造反派大量出動，集中向幾萬進城農民、幾十萬臨時工、外包工和街道里弄集體生產單位職工進行宣傳。報紙並將中央文件每一條精神都化為短評。

在中央賀電的巨大支持下，反經濟主義鬥爭進一步取得戰績。

港務局工人基本復工，日裝卸量恢復到八萬噸以上，生產基本正常。

鋼：一月份產量計劃為二十四萬噸。上旬由於大批人員離開生產崗位，焦炭供應不上，而使生產陷於停頓。《緊急通告》發表後逐步恢復，全月完成十八萬零三百噸。

鋼材：一月份計劃為十五萬六千噸，鋼鐵工人表示力爭完成。由於鋼錠跟不上，決定先保無縫鋼管、線材、冷軋鋼等軍工急需產品過關。到月底完成了十五萬七千五百噸，超額完成一千五百噸。

化工：一月上旬停工的工廠及重要車間有十一個，已半數以上恢復生產。

機電：生產都在逐步恢復。如上海內燃機配件廠，一月份產值計劃為一百四十六萬元，有把握超額完成。第三機床廠原

來全部停工，現已開足一班，主要是造反隊員和老工人頂班。

電力：一月上旬正常需要量為九十六萬六千瓦，一月上旬一度降至六十萬千瓦以下，從十四日起已恢復到八十九萬二千瓦。

煤球：從九日開始供應緊張，有謠傳說要定量供應，郊縣煤球首先搶購一空，農民紛紛湧入市區購買，使全市所有煤球店都排成一、二百人長隊，有人一下就買了九百斤(相當於五口之家半年多用量)，黃浦區在十日將常備的十天庫存全部賣光還發生脫銷。中央賀電下達後開始好轉。十四日從青島運出無煙煤六千四百噸。駐滬三軍派出指戰員搶運、搶做煤球。十六日，市區除盧灣、徐匯、楊浦等區個別地段外，已無排隊現象。全市日產量達五千噸。郊區寶山、上海、嘉定、川沙等仍很緊張。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組織調運前往支援。

糧食：庫存量達五億二千萬斤，其中包括大米二億一千萬斤，稻穀一億斤，麵粉五千八百萬斤，雜糧一億五千萬斤。正常供應量是一億九千萬斤，其中大米一億三千萬斤，居民積餘糧票約一億斤，可用來衝擊市場的約三萬斤，外地流動人口五十萬需一千五百萬斤。因此，僅庫存量就可支持兩個半月以上。上旬運輸緊張，到貨量只能滿足日銷量的百分之七十，中央賀電下達後，糧食系統革命造反派在全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下，採取幹部參加勞動突擊搶運等措施，基本做到不動庫存，保證供應。

中央賀電下達後，受蒙蔽群眾紛紛覺醒。郊區十縣內河運輸船工，原來鬧經濟問題陸續罷工。寶山縣運輸公司全部四十多條船(三千六百噸位)，從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停了半個多月。到十一日，十縣運輸公司輪駁隊已全部停航。賀電下達後四天內先後全部復工。崇明縣萬餘名到市區“造反”的支農下放工人和下鄉落戶青年，已決定在今晚全部回去。虹口區搶房



戶在看了賀電和《緊急通告》後，不待動員，就有百分之七十餘自動遷出搶佔的房屋。浙江象山來滬的“華東告狀團”決定回去就地鬧革命。

鬥爭依然十分激烈、艱苦。

陳丕顯在長樂路紅革會總部又簽字同意發給紅革會活動經費一萬元，並要市財政局立即撥款。

由於大叛徒譚震林悍然下令漁輪停港，上海市海洋漁業公司的一百九十八艘漁輪平均每天只有五、六對出海。全市魚及水產品庫存量只有九萬擔，每天供應市場只有一千多擔，不到平時的十分之一。春節預計供應的十萬擔鮮魚到今天仍全無着落。

工業原料問題嚴重。庫存生鐵只剩十二萬一千噸；僅供本月下半月用。煉焦製氣的精煤到貨極少，質量很差。甲醇的庫存只剩一百五十噸，去年外地欠交二千噸，今年同蘭州、太原等地簽定的四千八百噸合同也一噸未到，嚴重威脅農藥、塑料、醫藥等的生產。製碱、氯氣生產所需工業食鹽的庫存僅餘十天用量。今年所需大豆要求一億二千二百萬斤，糧食部僅分配六千萬斤，本月份計劃調入的九百萬斤，上旬十天只運來四十萬斤，已被迫動用儲備庫存，如調入情況不見好轉，則庫存在二月上旬將用光。

到今天止，華東局已有六省一市的“控告團”等，六個單位去宣佈接管，並組成了“六省一市接管華東局委員會”（後改為“奪華東局權委員會”）。還接管了存放重要檔案的華東局書記處及辦公廳所在地。

## 一月十七日

《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發表社論《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群眾裏面去》，號召革命領導幹部到群眾裏面去，同

群眾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廣革會頭頭違背中央《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在外部一些群眾組織支持下，擅自宣佈接管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當晚，上海警備區奉中央指示，對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實行軍事管制。

反經濟主義鬥爭在繼續前進。鐵路列車已能准點開出。東方紅造船廠革命造反派在中央賀電下達後，聲勢大盛，封閉了廠赤衛隊隊部，揪鬥了廠赤衛隊的後台老闆舊黨委政治部副主任，說服了受蒙蔽的赤衛隊員來廠上班，頂住了一九五八年臨時工來領補發工資福利費的吵鬧，成立了“生產管理委員會”，使所有車床開了工，革命、生產形勢大好。中百一店從九日《緊急通告》發表當天起，就有顧客來退還毛毯、呢大衣、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高級商品，這幾天電話詢問退貨問題很多，革命造反派表示打破舊規，能退就退，以便使這些人及時退還補發工資。新疆烏魯木齊市八一鋼鐵廠四十名上海支疆青年返滬已兩個月，看了中央賀電後表示“上了當權派的當”，“要立即返回新疆去，就地鬧革命，並主動去對其他支疆青年進行動員說服。

戶口倒流現象仍很嚴重。去年支疆青年約二萬人，下放郊區各縣農場青年約一萬多，支持安徽的幾千人，在走資派和壞人的挑動下，藉口文化革命中不得調動人員的規定，回滬要求報進戶口安排工作。他們鬥街道幹部，而街道黨委就領他們去找各區勞動局，而虹口區勞動局長竟同意有些人報進戶口。長興島各農場下鄉知識青年一萬多人，跑得只剩一百人，造成牛羊大量死亡。支內職工倒流情況也很嚴重。僅儀錶、化工、機電一局三個局近兩年支內的二萬六千名職工中，目前回滬的已近二萬。回滬原因主要是外地走資派煽動他們回上海“造反”，而陳、曹之流又簽字同意部分職工回滬重新安排工作。

結果，造成大、小三線許多重要企業停產，如西安變壓器電鍍廠，全部職工一千五百人，都是上海電機廠、上海電鍍廠調去的，現全部返滬；貴陽永陽電錶廠也都是上海職工，現在走得只剩下廠長、黨委書記各一人。還影響上海內遷任務完成，如江寧電機廠去年十二月支援江西的近百人，行李傢俱都已寄走，而馬一行竟同意“暫緩內遷”，結果都不願去了，把寄走的東西追了回來。大量支內職工返滬給本市生活接待造成很大壓力，有的闔家返滬，要求住旅館、買月票、發生活費等，還大門動員內遷的工作人員，甚至到家裏去抓人。

工總司楊浦區許多基層造反隊，根據總部決定開門整風。如國棉十七廠、三十廠、三十一廠都在今天開始。整風要求，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及中央最近文件、社論，提高覺悟，整頓組織，將階級異己分子從造反隊清除出去，並對受蒙蔽群眾和不同觀點的同志進行耐心幫助。凡是進行火線整風的單位，造反隊戰鬥力都有很大提高。

晚上，陳丕顯被舊市委保守組織工農兵總部和“中教司”搞到建國西路中教司司令部裏去。

## 一月十八日

《文匯報》、《解放日報》，根據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建議，同時重新刊登毛主席的光輝著作《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並分別發表了“告讀者”和“編者的話”，指出這一光輝名篇在當前鬥爭中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號召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革資產階級的命的同時，也要革自己頭腦裏資產階級思想的命。

廣革會在今天早晨又擅自播發所謂接管電台的聲明。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親自到電台找廣革會戰士談話。張春橋同志指

出，廣播電台是國家專政的工具，任何一個國家發生政變總是首先奪取電台。因此，電台奪權希望不要有反復，否則對黨和國家聲譽不利。要鬥爭在先，奪權在後。不許可各派有電台，電台只能播送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姚文元同志指出，軍管目的，第一是保護革命派，第二是怕壞人破壞了國家的聲譽，這是對革命派有利的。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要求革命造反派要和部隊合作，共同搞好軍管。

中央賀電下達後，在全市革命造反派反經濟主義鬥爭的強大政治攻勢下，經濟主義組織“上海支農工人回滬造反總司令部”內部發生分化：一部分頭頭在十七日發出《告全市支農工人書》，要求支農工人積極回應中央號召，分期分批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但支農司中一小撮壞頭頭竟大叫，“他們出賣了支農工人的利益”，並將那些頭頭強行扣押在他們佔領的上海大廈中通宵圍鬥。上午，支農司楊浦分部一小撮壞頭頭用總部名義通知各區分部馬上到人民廣場集中，並宣揚：“我們是老工人，不屬於當時精簡下放範圍，因此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不針對我們。”下午，被誘騙的六、七萬人，號稱十萬，到人民廣場靜坐示威，並帶去大量被子、草包，要脅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回答“支農司大方向是否正確”，“是否經濟主義組織”等三個問題。一小撮壞頭頭還煽動群眾大喊：“一天不見，一天不散！”“我們要復工，我們要飯吃！”“問題不解決，死也死在人民廣場！”工總司、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派代表，根據張春橋同志三點意見(一、工人支援農業生產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二、大批人員離開生產崗位衝擊城市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該把矛頭對準走資派，就地鬧革命。三、個別問題個別解決。)化為工總司意見，去同支農司頭頭談判。到深夜，他們勉強同意揪

鬥幾個走資派就散。次日晚揪鬥了汪力田、王克。但宣佈散會時下面忽然高叫“不同意”，一批人衝上主席台，大打出手，挑起流血事件，宣佈原主席團靠邊，重選司令部，並扣押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九十三人。經過一夜談判，第三天(二十日)凌晨又開大會，王克、汪力田簽字同意在“造反”期間吃住由原單位解決，勞動局負責把一九五七年以前進廠的下放職工情況報告中央並檢查執行劉、鄧路線的錯誤，少數人組織“北上控訴團”並負責一切支出等五條協議，整整鬧了三天，到二十日下午六時才開始散去。

上海港各裝卸區積壓物資又達三十二萬噸，一是水陸運輸跟不上，二是經濟主義又回潮。全港一千多名亦工亦農裝卸工，去年十二月宋季文簽字同意收入九五歸己，《緊急通告》發表後恢復到私四公六。但前一階段把農民惹火了，各生產隊拒收他們重新上交的六成收入，並停止口糧供應。上港一、四、七區和港駁公司的亦工亦農裝卸工提出不借錢就停工。港駁公司因此有一百五十艘駁船停產多日，影響物資積壓五萬多噸。另外，內河運輸公司一些船員堅持要求實行“四一一制”(即四天工作，一天休息，一天停止生產搞運動，實際連星期天是兩天休息)，宣稱不實行就全面停船，鬧了許多天，已使內河航運受到嚴重影響。

鐵路局在奪權後鬥爭仍然十分激烈。邵光華接連組織反撲。革命造反派接管調度所的當天深夜，他就召開局級幹部黑會策劃挑動原赤衛隊封路。黑會被造反派衝垮，他又挑動保守派鬧“聯合接管”。路局奪權的十二日下午，他馬上拋出“鄭重聲明”，叫囂“我是路局局長，仍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並拒不交出路局大印。當十三日中央軍委接見鐵聯報喜人員表示支持路局接管的消息傳來，他又立刻指使一個副局長給鐵道部打電話，

“就說我邵光華講的，為了不中斷工作，請鐵道部迅速派個局長來，或者軍隊來接管，否則會造成群眾鬥群眾”。革命造反派在十八日這天又狠狠批鬥了他，並將他拉到各站、段去遊鬥。

鐵路局奪權十天以來，迅速建立了革命、生產的新秩序。客車每天平均開出二十三列。貨車每天開行二十二列，比奪權前十天多開十九列。裝車數從奪權前的每天平均七十六輛提高到四百六十六輛。發送噸數從奪權前的每天平均二千六百十五噸提高到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噸。為了保證生產、生活急需物資供應，還根據火線指揮部決定，貨運優先給軍工、鋼鐵生產原料、外貿出口及吃、穿、用品的運輸讓路。革命造反派日夜苦戰，一人頂幾人，有的調度員五天不下火線，有的機車司機一天跑三、四次車去疏通線路。

上午，陳丕顯因為他的秘書表示造反不跟他了，在秘書和警衛員面前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唉！現在把我搞得妻離子散。”當場遭到警衛員的駁斥。

## 一月十九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佔領報紙陣地》，高度讚揚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這是一場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以醒目地位登載了《文匯報》、《解放日報》重登毛主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篇光輝著作的報導，並全文轉載了兩報的編者按。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於晚上接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聯合指揮部及上海鐵路局、海港指揮部、商業一局、二局、舊

市委生委、市糧食局等單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代表，傳達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說，上次你去的時候，造反派只有二千人，現在有一百萬人，上海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可阻擋的。毛主席說，上海最重要的經驗是革命大聯合，革命大聯合就是奪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聽取了上海經濟戰線情況的彙報，指出：巴黎公社是經過馬克思總結以後才肯定下來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也是經過毛主席的肯定才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現在的形勢很好，是我們勝利的時候了，對一般赤衛隊員要歡迎他們回來，不要叫“老保”的名字了，要鼓勵他們自己起來鬧革命。這對壯大革命隊伍有好處，不把多數人團結過來，總是危險的。有的人犯了一次錯誤可能反而好了，他們覺悟過來，可能成為很好的工人，再刮經濟風，就有了免疫力。工人階級應該按階級分，不應按年限分或按行業分。否則，就是經濟主義的，走資派就可以利用它來搞垮機關、工廠，分裂階級隊伍。上海的形勢能走到前面去，就是由於最大的工人隊伍在上海。這次上海工人造反派貢獻很大，特別是奪權。工人每天都在創造歷史。上海工人的天才，可能現在才開始表現出來了。奪權還要鞏固，要準備幾次反復，包括左派分裂，但出現分裂也不可怕，誰如果違背了毛主席思想還要繼續揭露。目前，已面臨把全市的權奪到手裏的局面。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是貫徹始終的。要警惕今後有人打着革命旗幟，甚至打着非常革命的旗幟幹保皇的勾當。火車鐵路、海港等指揮部可以向中央寫個報告，今後可能代替原來的市人委等機構。在談到學生在鐵路頂崗時，張春橋同志高興地說，這也是新經驗。學生和工人在鬥爭中結合起來了，對學生的改造有很大好處。

工總司、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新革會、同濟東方

紅、交大反到底、紅革會、紅三司、上體司、版司、上藝司、上醫司、小教司等幾十個群眾團體開始着手籌建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聯絡總站，在黨校開了第一次籌備會，推選工總司、機關聯絡站、新革會代表擔任召集人，推選機關聯絡站、新革會、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等單位起草一個宣言。一位紅衛兵小將提出，政治聯絡總站名字不響亮，容易跟一般群眾組織混起來，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叫巴黎公社，我們的組織是不是叫“新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初步定了名稱。在討論這場奪權鬥爭應該定個名稱時，有人提議，我們現在的情況跟蘇聯十月革命時期差不多，可叫“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贊同，把準備起草的宣言名稱定為《一月革命萬歲——新上海公社宣言》。

兩報一刊同時刊登了原赤衛隊總部委員、上海試劑總廠中心實驗室技術員李詩育的坦白交代，詳細揭露了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召開九系統黑會策劃搞“三停”罪惡陰謀的真相，在受蒙蔽的赤衛隊員中引起了很大震動。

陳丕顯又被舊市委工農兵總部和中教司“揪去”。

## 一月二十日

根據國務院來電，反經總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來同志當面彙報了上海反對經濟主義的情況。周恩來同志讚揚了上海革命群眾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並對今後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等二十七個群眾組織共同簽署的文件：《堅決支持革命農民運動，徹底摧毀反革命經濟主義！——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為此分別發表社論《歡呼革命農民運動的興起》和《熱烈歡呼革命農民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人民



日報》次日全文轉載。

郊區農民運動開始蓬勃興起。

川沙縣已成立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擁有農民造反隊員十二萬人，基本群眾都是貧下中農，青少年則組成了貧下中農紅衛兵。農司在每個公社都設一個司令部，共二十七個。在縣人武部的幫助下這個縣的革命大聯合也比較鞏固。革命、生產都搞得較好。

嘉定、上海、寶山等縣也建立了全縣性的農民造反組織。青浦、南匯則一開始就分裂為兩大對立組織。

工總司負責人到警備區，要求派解放軍同志到工總司幫助做政治思想工作，搞好思想革命化，使工人造反隊伍更壯大，更堅強。經警備區負責同志研究，決定派出一支小分隊，二月四日集中訓練，二月二十日進入工總司。

## 一月二十一日

《文匯報》根據張春橋同志的意見發表了記者述評，述評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權，抓革命，促生產，把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殺得落花流水的一派大好形勢。《人民日報》於一月二十四日轉載了這篇述評。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要特別注意團結受蒙蔽的赤衛隊普通隊員後，工總司負責人立即召開常委擴大會進行研究。當討論到可不可以吸收一般赤衛隊員參加造反隊時，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這些“老保”不能參加造反隊，他們有沒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還要經過長期考驗，現在吸收進來弄不好造反隊要被他們吃掉。一種意見，大多數赤衛隊員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本質是好的，他們受蒙蔽是因為走資派利用他們對黨的熱愛，把自己打扮成“黨的化身”，欺騙了他們，一般

赤衛隊員有八十萬，要允許他們革命，把他們排斥在外面倒使造反派有孤立的危險，因此當他們提高覺悟後，應當吸收參加造反派。最後通過決議，一般受蒙蔽赤衛隊員只要跟資產階級路線劃清界限，起來造反，就可以吸收他們參加造反派。

工總司等二十三個群眾組織發表了有關平反金銀財產處理問題的報告，指出：政治上應該平反的人，經濟上也應該平反；但為了防止由於經濟平反處理上的混亂，而給階級敵人有機可乘，通告規定對確實是被錯抄的金銀財物，也應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復旦大學“孫悟空”、“北京公社”和“反復辟”等組織聯合召開“批判蔡祖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上帖有“直追後台老闆”、“揪出蔡祖泉，直追黑後台”等巨幅標語。在發言中，以揭蔡祖泉為名，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張春橋同志。

## 一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上三司頭頭趙全國，帶領上三司、中三司(上海大中專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教司(上海市中教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兵團等四個組織，串通舊市委保守組織工農兵造反總部，再次宣佈接管上海市委。上午，趙全國率五個組織的二百多人，其中有七、八十人是上三司到上海縣七一等公社騙來的青年農民，分乘十多輛彩車，五、六輛小汽車，以一輛宣傳車開路，沿南京路等市區幾條主要馬路遊行，“造輿論聲勢”。中午一點半，進佔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趙全國隨即召集四個組織頭頭開了個小會，造謠說總理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有四點指示：(一)全市人民成立“上海市人民革命委

員會”；(二)在“人民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先成立“督管委員會”；(三)命令市委、市人委各當權派立即恢復進行工作；(四)在全市設立接管的監督網。下午三時左右，趙全國對參加接管的群眾發表講話，繼續偽造總理四點指示，並造謠說是陳伯達同志接見上三司駐京聯絡站代表時講的，由駐京聯絡站在今天中午來電傳達。在講話中，他大肆侮蔑張春橋同志，說：“張春橋到了上海，被幾個群眾組織控制住了，不下來和群眾見面，不把上海情況向總理，伯達和江青報告。”還說，“有人說市委內部已經有造反派了，你們為什麼還要接管？我說，不要看他們接管了，要看他們是什麼貨色：大老爺下台了，小老爺上來了！”他宣佈成立“接管委員會”，並馬上組織以上三司為主，參加接管的四個組織為核心的“督管委員會”——“上海市工農兵造反委員會”。他還說：“我們是真正造反派，工總司是保守號的。”會後，機關造反派找三司頭頭責問所謂“四點指示”的出處時，他們支吾了半天，也沒答上來。當天下午，上三司接管了舊市委辦公廳機要室，迫使一個工作人員交出了鑰匙，還同舊市委工農兵總部一起，佔領了舊市委印刷廠。

進駐舊市委辦公廳的同濟東方紅、新師大紅革會、哈軍工、西軍電等組織的紅衛兵，同上三司進行激烈辯論，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和做法。

晚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上海和外地在滬的三十多個主要革命群眾組織。詳細傳達了毛主席十六日重要指示。張春橋同志說，毛主席贊成群眾起來奪權，包括由群眾推薦市委和市人委的名單，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主席對上海革命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是那樣的關心和支持，而且那樣的細緻，短短二十幾天裏，就肯定了《文匯報》、《解放日報》新生，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的發表，以及接管、奪權等問題，今後，我們完全可以更充分的發揚革命首創精神，把群眾好的東西集中起來，然後再堅持下去，包括那些萌芽性的東西。可能這些東西開始看時不習慣，但卻是新生事物，可以轉請主席判斷。張春橋同志指出，關於奪權鬥爭，毛主席已把上海的事實提高到理論的高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現在是從一個個的實踐中逐步理解這場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張春橋同志強調說，現在的中心是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只有把這個鬥爭打勝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才能取得勝利。奪權不能離開這個鬥爭。考驗各個組織，究竟是革命的，不革命的，就看它在反對經濟主義鬥爭中採取什麼態度。

姚文元同志講話時指出，反經濟主義鬥爭是一個偉大的鬥爭，它促使了各個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大聯合，又促進了奪權鬥爭。奪了權，還有鞏固權、使用權的問題，也要在鬥爭中解決。各個革命組織內部的爭論，也非得在鬥爭中邊學習，邊解決。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還着重指出，當前階級鬥爭很複雜，今後還會出現嚴重的階級鬥爭。如果我們的同志認為現在勝利了，可以鬆一鬆，那就會在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措手不及。張春橋同志並指出趙全國所謂總理四點指示是偽造的。

在接見前，張春橋同志提出要趙全國來出席會議。他無理拒絕，在電話中仍然造謠說他們的行動得到總理支持，並躲在康平路繼續策劃炮打張春橋同志。到會的各革命群眾組織非常氣憤，認為這個人從一貫的表現來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應該馬上逮捕。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勸說大家再看一看。接見結束後，大家決定馬上去找他辯論。到康平路後，趙全國理屈詞窮，仍然堅持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反動立場，並侮蔑

去辯論的各革命群眾組織。引起群情激憤，立即集體將他扭送公安局。這次接管前後不到十二小時。

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在京舉行“反對經濟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周總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出席大會，親切慰問全體革命造反派戰士。上海代表向大會作了彙報。大會發出緊急通告，號召造反派聯合起來奪回一切權力，把住所有關口，同反革命經濟主義鬥爭到底。上海反經總部於當天組織四個調查組，分赴寶山、嘉定、金山、川沙四縣，對農村經濟主義妖風進行全面調查，事實證明這股妖風完全是陳、曹一手造成的。

國棉一廠楊富珍同志貼出大字報，揭發舊市委工作隊鎮壓紅衛兵運動的罪行，檢討在去年九月向中央發急電的錯誤，表示願意接受革命群眾的批評幫助，決心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

## 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傳達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毛主席的指示“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該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下午接見駐滬三軍負責同志，指出：關於解放軍介入、不介入的問題，現在很明確了，中央給上海的賀電中有軍委的簽名，這就是介入。用這樣形式簽名還是第一次。上海的形式很好，工人、紅衛兵、機關幹部還在聯合起

來，現在就缺少一個“兵”。駐滬三軍應該支持左派，應該站在左派群眾這一邊。部隊由不介入到介入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上海部隊出來支持左派，使奪權鬥爭的形勢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對全國會有影響。毛主席對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很重視。希望上海的部隊在支左的方面也做出榜樣來。老幹部不要憑老本吃飯，否則就有危險。一個人過去有過戰功，今天就要去動員群眾來保衛自己，就必然要垮台。革命不能靠別人保護，要靠自己過關。毛主席期望老同志都能過關的。一些老同志長期脫離群眾，與群眾的關係疏遠了，要好好學習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端正對群眾的態度，端正對部隊提出的要求，包括人力、物力的支援，要積極支持，首先在這方面建立起共同的感情來。只要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方面，大方向就對頭了，有些小的錯誤也不要緊。跟毛主席跟緊點，犯錯誤就不會太大。

毛主席關於“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最新指示當天下達到駐滬三軍。駐滬空軍七三四一部隊立即派出聯絡員，到工總司和市委機關聯絡站等革命群眾組織訪問，接洽支持革命左派的問題。

“新上海公社”籌委會連日開會，主要議題是哪些群眾團體可以參加作為組成單位。經過爭論，多數組織認為，一、二、三兵團是工總司所屬組織，不能作為獨立組成單位。紅衛軍是非法組織，它的一小撮壞頭頭幹了大量壞事，堅決不同意參加。紅工是經濟主義組織，不同意吸收。其中真正的造反派可動員他們參加所在單位的工人造反隊。關於本市學生組織，會上爭論得非常激烈，最後協議原則上是全市性學生組織才可參加，但有的學校組織早已殺向社會，起的作用和影響已經同全市性組織一樣，也可作為獨立組成單位。關於外地駐滬學生

組織，基本同意在上海貢獻較大的都可參加。

工總司部分常委、工作人員集會批判范佐棟、王文海搞分裂活動。提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狠抓大方向，不能成天忙於事務，決不能辜負毛主席的支持和廣大革命造反派對工總司的期望。范佐棟、王文海仍在積極活動，醞釀拉出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二兵團常委張富根同紅衛軍一小撮壞頭頭一起串聯虹橋機場一些人，策劃成立所謂“中國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員會”，扣押軍代表，奪民航的權。出動大批人馬在虹橋機場製造了二十次班機遲飛十二小時的嚴重事件。

晚上，復旦大學“孫悟空”等紅衛兵組織聚會，策劃炮打張春橋同志。曾經參加二十二日餘慶路會議的“孫悟空”頭頭獲悉二十五日批判劉鄧大會上有人建議成立新市委，因此提出要製造輿論，連夜兵分兩路，到南京東路、西藏路和淮海中路一帶張貼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巨幅標語。

## 一月二十四日

駐滬三軍指戰員熱烈響應毛主席關於“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偉大號召，在市內舉行盛大武裝遊行。如駐滬空軍就派出宣傳車二輛，六百多名指戰員分乘二十輛大卡車，到市區主要馬路遊行支持革命造反派，並派出安二飛機二架，由軍參謀長指揮，在市區上空散發傳單十萬份。警備區還組織所屬部隊指戰員向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紅革會、農司籌等主要群眾組織報喜，贈送毛主席著作和語錄。

駐滬三軍負責同志根據張春橋同志意見議決，立即派出大批車輛人員到車站、碼頭，幫助革命造反派搞好交通運輸。東海艦隊在一月中旬就已派出部隊到上海港碼頭參加裝卸工作，

現決定增派人員。駐滬空軍決定當天派出十輛卡車，數百名戰士，到海港幫助疏散物資。警備區派指戰員八百餘人和四十輛卡車分赴車站和碼頭，同時還派出三百人去幫助加工、運輸煤球。

上海發生第三次單方面向舊市委、市人委奪權事件。

下午，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代表在黨校討論“新上海公社宣言”草稿，審查要求成為公社組成單位的各群眾組織名單。參加此次籌委會的群眾組織有六十多個，是籌備過程中最多的一次。在會上，經激烈爭論，選出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新革會、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等八個單位的代表，組成“新上海公社宣言、文件起草小組”。由於紅革會小山頭主義的影響，上海的各主要學生組織決定一個也不參加，以免影響起草工作進行。紅革會代表認為是把自己排除出“核心”，在發言中點名攻擊了到會的三十多個組織，受到大會代表的嚴肅批評，紅革會代表陷於孤立，提出“最最強烈抗議”，退出會場。晚上，籌委會多數代表決定譴責紅革會的分裂行動，繼續討論。

市紅革會總部在“友好大廈”舉行了一整天常委會，分析近幾天形勢，有人認為全市出現一股所謂“反紅革會逆流”。下午討論了奪權問題，決定在新上海公社成立以前，爭取工總司、農司籌、市委機關聯絡站等三個主要組織支援，由各大專院校紅革會統一行動，把華東局、舊市委、舊市人委和十個舊區委、舊區人委的大印統統奪過來，搶先在《文匯報》、《解放日報》上發表“奪權通告”。

晚上，市紅革會總部第一把手親自坐了摩托車到舊市委辦公廳奪印。接着，華東局、舊市人委兩顆大印也搞到手。與此同時，市紅革會總部常委分頭帶人坐小汽車到十個舊區委、舊區人委收印。一夜之間就收了二十三顆大印。同時到兩報堅持



要求在次日從頭版頭條登載他們的“奪權通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親自打電話給紅革會頭頭，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行動，要他們克服山頭主義，風頭主義等錯誤思想，停止搞分裂活動。紅革會常委勉強表示同意，但拒絕交出已收到的二十三顆大印，並馬上討論決定，“追查”所謂“反紅革會逆流的根子”。

凌晨，“孫悟空”頭頭領了三個人，到外灘、南京路一帶鬧市區，塗寫了大量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和張春橋同志的大標語：“誰在蔡祖泉問題上欺騙毛主席決沒有好下場！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誰欺騙毛主席就打倒誰！警惕陶鑄、王任重式人物！”“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其中最惡毒的一條，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一·一六重要指示的：“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同時，復旦校園出現了《一問張春橋》，《為什麼？——二十個問張春橋》等大字報。

天亮，“孫悟空”頭頭等數人到黨校藉口請示問題，要求張春橋同志接見。

上午，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邀請各群眾組織與之進行辯論，要“孫悟空”擺事實回答為什麼要反對張春橋同志。“孫悟空”頭頭拒不作正面回答，狡辯說：“中國的語言是最豐富、最精確的，我們的標語充分表達了我們的觀點。”市“炮司”頭頭為“孫悟空”進行狡辯，市紅三司、市紅革會的一些頭頭態度曖昧。

## 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頒佈《關於保衛四清運動成果的通知》。

《解放軍報》發表《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左

派》，駐滬三軍的廣大指戰員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又舉行了遊行以示聲援。

海軍駐東方紅造船廠軍代表，根據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在保守派和革命造反派激烈鬥爭中，主動公開正式表態支持革命造反派。

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會”。有幾十萬人參加。揪住陳、曹等活靶子，狠揭狠批劉、鄧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駐滬三軍參加了“打倒劉、鄧大會”。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駐滬三軍第一次同革命造反派一起公開集會，向劉、鄧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猛烈開火。

上三司以“趙全國事件”為題，在全市貼出惡毒攻擊張春橋同志的巨幅標語：《警惕上海陶鑄、王任重式人物！》、《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人決沒有好下場！》、《揪出圍攻上海三司的後台老闆！》。

晚上復旦大學紅革會開會，炮製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的反革命宣言書——《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同時，復旦“紅三司”召開勤務組擴大會議，對張春橋同志的態度，一致的結論是：“我們不保”。“孫悟空”等組織決定立即整理炮打張春橋同志的黑材料。

市紅革會派出上海師院紅革會頭頭赴京，搜集炮打張春橋同志的材料。

## 一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節約鬧革命，保護國家財產》，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節約鬧革命”。上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紛紛舉行座談會表示堅決響應毛

主席的偉大號召。

在中央文革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熱情幫助下，工總司等六十多個群眾組織，排除資產階級派性干擾，在黨校繼續舉行新上海公社籌備委員會議。

陳丕顯這幾天一直住在長樂路的紅革會總部，他惡毒攻擊製造謠言，煽動紅革會頭頭說：“張春橋是兩面派。在處理安亭事件上，他在市委書記會議上說，你們要堅持鬥爭，不要簽字；在造反派那裏，他自己卻簽字了。”早在去年十一月中旬，陳丕顯在接見復旦大學保守組織——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復旦大學大隊部的某些成員時，就示意從市委寫作班子着手炮打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故意提出：“市委寫作班是張、姚抓的”，親自定下了從寫作班入手炮打中央文革的路子。

市紅革會在復興中路一三六七號舉行常委會議。竟然打電話，訛詐上海警備區派軍隊“保護”開會。會議認定炮打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是當前的“主流”，時機已到，立即起草了所謂《對當前形勢的幾點估計》，還炮製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大毒草——《三十六個為什麼？》等。復旦有的組織還刷出“決不讓上海的文化革命走過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正處在十字路口”、“懷疑一切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等大標語。

## 一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報》和《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上海工總司等二十九個革命群眾組織的通告：《展開全面奪權鬥爭，把革命農民運動推向新高潮》，標誌着上海的工人運動有力地推動着農民革命運動更迅猛地向前發展。《文匯報》、《解放日報》在刊登上述通告的同時，發表了記者述評，評述上海郊區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

市紅革會在長樂路一〇三九號繼續開常委會策劃炮打，提出“敢字當頭，猛攻寫作班，抓住材料袋，考驗張春橋”，決定不由市紅革會出面，讓復旦先幹。當晚，復旦紅革會、紅衛兵大隊部造反派召開各兵團會議，決定馬上採取行動，去綁架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等，進行“火力偵察”。會後，連夜派出五十多人趕往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抓人。

工總司幾次召開常委會討論為了避免工人運動分裂，爭取二兵團聯合對敵，決定同意讓二兵團頭頭擔任工總司第二把手。但由於二兵團一些頭頭堅持資產階級派性，幾次談判都未成功。

## 一月二十八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發佈。

陳丕顯之流煽起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二八事件”爆發。

凌晨一時許，復旦大學大隊部造反派頭頭帶領五十餘人到黨校找聯絡站負責人聲稱要反映復旦反張春橋同志的情況。當聯絡站負責人出來後，他們立即將其綁架往復旦。聯絡站立即打電話給警備區請求保護，同時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彙報。四十分鐘後，部隊一個連趕到黨校封鎖現場，帶隊的師政委和聞訊趕來的市文保會代表和在場的工總司代表一起同雙方開調查會。市紅革會總部頭頭被駁得理屈詞窮，被迫表示這一行動“不適宜”，同意馬上放人。警備區代表就決定把部隊撤走。但這時市紅革會總部另一個頭頭突然責問“誰調動軍隊鎮壓紅革會戰士”，要警備區首先完全徹底承認錯誤。又擋住部隊不讓撤，未成，竟強行將帶隊的師政委和參謀扣押下來進行圍攻。

上午，市紅革會總部頭頭要求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要聯絡站轉告他們，同意接見，但是要先放掉被無理綁架的人，同時指出綁架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首先是錯誤的，用扣留人質來要脅接見的做法更是錯誤的，希望他們不要堅持錯誤。

下午，市紅革會頭頭在“友好大廈”召開各大專院校紅革會負責人會議，提出所謂“解放軍出兵復旦事件”，進一步煽動紅革會戰士炮打中央文革。七時許，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為了對紅革會頭頭進行挽救，來到了他們的會場，耐心說明了事實真相，勸他們正確地處理這件事。但會議一開始，他們就進行了一場大圍攻，用對敵鬥爭的辦法來對付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持續達六個小時之久。

深夜，張春橋同志去解放日報社，召集當時在報社的部分學生群眾組織，就他們提出要對解放日報進行“第二次奪權”問題，進行座談。張春橋同志指出：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奪了權，毛主席肯定了。它現在的班子還不是很強。報社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知識分子成堆。能不能吸收一些新的成分，比如說在工廠、農村勞動過幾年，又能經常接觸勞動人民的，來一起辦報紙，要把報紙辦好，必須依靠廣大革命造反派。是不是需要進行第二次奪權，首先要看辦報紙的路線，方向是否對頭，報社內部的革命派有沒有這個要求；其次，還要看上海各革命群眾組織的意見，要聽取工總司、貧下中農和解放軍戰士的意見。至於對一些具體問題，如社論、文章的意見，可以通過辯論，最後取得一致。

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各部委造反隊員負責人會議，介紹了“一·二八”事件真相，要求機關造反派挺身而出，反擊炮打中央文革的逆流。有的造反隊態度很堅決，少數

造反隊負責人表示動搖，認為“新形勢很複雜，紅革會提的問題有一定道理，目前公開表態為時過早。”

## 一月二十九日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提出，市紅革會總部和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各向中央文革伯達、江青等發一份電報，說明“一·二八”真相，報告各自的觀點。市紅革會頭頭聲稱這是“大陰謀”，無理拒絕。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立即起草了一份電報稿，向伯達、江青如實彙報“一·二八”綁架事件的真相。但這封電報稿交舊市委辦公廳機要局拍發時，竟被舊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頭頭勾結紅革會頭頭私自扣壓，並將原稿搶去作為“證明”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欺騙中央文革，鎮壓學生運動”的“炮彈”。後由駐滬空軍提供保護，重新起草了電報，改用明碼發出。

下午，市紅革會頭頭惡毒侮蔑張春橋同志欺騙毛主席，要張春橋單獨接見他們，並立即搞飛機票讓他們到北京去“控告”。同時在各大專院校，在各大馬路上，大刷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標語。

晚上，復旦紅革會頭頭召開了“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在這個黑會上，復旦各組織頭頭競相登台表演，比賽誰的調子高。大隊部造反派、“孫悟空”、紅三司、復旦校友兵團、“紅教工”、赤衛軍以及市教革會總部等頭頭都趕快表態“完全支持”紅革會頭頭的觀點，有的人竟公然宣稱：過去我是兩面派，現在不做兩面派了，要做反張春橋的一面派了。”大批政治面目不清的本市、外地的人湧來參加會、遞條子，喊口號，鬧得烏煙瘴氣。在一片炮打中央文革的叫囂中，復旦原來對立的各派組織，忽然發現大家“觀點很一致，”實現了“大

聯合”，準備成立“新復旦公社”。會上，還決定第二天上午在全市遊行示威，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拉出去“遊街示眾”；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三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甚至發展到準備對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採取“行動”，並無恥地提出要警備區部隊“保護明天的遊行和集會”。

復旦的保守派“乘風破浪”、“北京公社”等組織頭頭紛紛出動配合炮打中央文革。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也全都神氣起來。

本市外地還有一些群眾組織其中主要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一些聯合組織，捲進了這股逆流。

工總司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堅決捍衛中央文革。

“一·二八”發生後，工總司內部正在為二兵團衝砸南市區分部而鬧矛盾，總部和二兵團各調集幾萬隊伍準備在南市區大幹一場。一看大局要出問題，總部首先把隊伍撤回待命，二兵團也撤了。晚上，總部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形勢，對紅革會頭頭的行動表示極大的憤怒。聽說紅革會要召開炮打黑會，總部連夜火速佈置各區各工廠工人造反隊把守全市交通要道，楊浦區分部把守在外灘一帶；二兵團和徐匯區分部把守在康平路附近所有馬路，嚴陣以待，防止任何事件，並及時勸阻受蒙蔽的紅革會戰士不要去參加次日的炮打黑會。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深夜到會場同工總司同志談話，指出，現在上海出現這樣好的形勢，是由於毛主席的支持，也歸功於廣大工人造反派。上海的局勢是工人階級在控制。但是我們打了大勝仗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陳丕顯還在活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工人階級內部會有所反映。這就需要我們加強團結，更要大聯合，把所有的黨政財文

大權都奪到手。我們的隊伍內部有矛盾，要協商解決，在談到炮打問題時，張春橋同志指出，炮打最早的倒不是紅革會，但他們為了搶頭功，就走到人家前頭去了。可見，一個人、一個組織如果有了一點成績，做了一點工作，就不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就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走向反動。

### 一月三十日

凌晨，中央文革一·二九特急電報發到上海，明確指出：“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在關鍵時刻，保護了廣大紅衛兵戰士，痛擊了陳、曹之流陰謀，極大地支持了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早晨五時，復旦紅革會得到消息，中央特急電報已到，六時決定：(一)停止行動(包括大會、遊行)；(二)撕下一切把矛頭指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和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大標語；(三)釋放綁架到的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市紅革會也被迫停止行動。但同時立即組織“北上控告團”，由紅革會、紅三司、“孫悟空”等二十餘頭頭，帶上黑材料，在市公安局“聯合兵團”頭頭幫助下，秘密轉到無錫上車兼程赴京“告狀”。

早晨，接到特急電報的駐滬三軍、工總司、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文匯報》、《解放日報》等七單位，都根據特急電報指示辦，出動宣傳車，大量印製傳單，在全市各處廣播散發。《文匯報》印了五萬份傳單，《解放日報》印了五十萬份傳單。駐滬空軍第一批趕印了一萬份，派人到市區散發。警備區、東海艦隊出動遊行隊伍，許多在逆流中嚴重動搖的群眾組織頭頭也開始轉變過來。



工總司等五十六個本市和外地駐滬群眾組織聯合發表通告，堅決擁護中央文革來電，並出動宣傳車，上街宣傳，迎頭痛擊這股反革命逆流。在中央文革的挽救下，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幫助下，紅革會戰士紛紛起來造某些頭頭的反。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關鍵在於大聯合》。上海十八個革命群眾組織發表《就當前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有關問題的聯合聲明》，號召革命造反派戰士破私立公，來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勝利地開展奪權鬥爭。

《文匯報》、《解放日報》全文刊載上海和外地駐滬三十三個革命群眾組織的一·二九通告，呼籲支農工人堅守生產崗位，就地同貧下中農一起鬧革命，堅決擊退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向全國播送了這個通告，《人民日報》也於次日轉載。到二月八日，十萬返滬支農工人中有八萬二千人迅速回到農村就地鬧革命。

有消息說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可能煽動部分群眾破壞鐵路交通，火線指揮部要求派部隊保護車站。駐滬三軍負責人立即討論決定，派部隊一千二百人進入本市鐵路沿線大小車站，保護車站、交通，並參加執勤。

## 一月三十一日

《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重要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的戰略任務，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代理人的決戰。社論說：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革命群眾把

它叫做偉大的“一月革命”。

《人民日報》發表首都三司的文章《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提出要同時進行兩個奪權鬥爭：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自己頭腦裏“私”字的權。《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分別轉載了這篇文章，並加了重要的編者按。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就上述文章的發表，接見了《文匯報》、《解放日報》負責人，指出，奪權應代表階級利益，不能代表一派利益。滿腦子私心雜念的人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奪權後還有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報紙是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專政的工具，不能代表一個派、一個組織的觀點。現在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尚未取得徹底勝利，火力應引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報紙要走在鬥爭前面，不要被歪風邪氣所左右。

市紅革會某些頭頭還執迷不悟，煽動一部分戰士在市內遊行，繼續張貼炮打中央文革的大標語。復旦等校部分紅革會戰士進行革命串聯，醞釀聯合起來造堅持錯誤的頭頭的反。

## 二月一日

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熱烈歡呼《紅旗》雜誌重要社論發表，各革命群眾組織、各單位革命造反派紛紛舉行集會和座談。大家普遍激動地回顧了“一月革命”的不平凡歷程，決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排除一切干擾，堅決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掌權。“一月革命萬歲”的大標語貼遍全市。“迅速成立新上海公社”的呼聲越來越高。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同十幾個本市、外地的學生組織代表

座談《紅旗》社論。會上分析了最近上海的形勢。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目前及早成立一個過渡性全市權力機構非常必要，只有革命大聯合才有威力。他們並提出把新上海公社改稱為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上海的階級鬥爭形勢很複雜，兩個階級的力量鬥爭很激烈，左派要聯合，右派也在集結，牛鬼蛇神也紛紛出籠，反革命勢力盡其所能在造反派內部找他們的代理人，紅革會頭頭搞炮打就是適應了陳、曹之流的反革命需要。因此，我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真正的革命者就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鬥爭中考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的口號，是反毛主席思想的口號。要防止壞人利用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揪鬥廣大的紅革會普通戰士。要堅持批鬥陳、曹之流的大方向，在共同鬥爭中鞏固革命大聯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行奪權鬥爭。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提出，不贊成分裂，但分裂也不可怕，有聯合就有分裂，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可以在這場鬥爭中看得更清楚。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說：“巴黎公社是在炮火連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這樣！”

在炮打中央文革的逆流中，曹荻秋突然居心叵測地給張春橋同志寫了一封信，說要跟張春橋同志個別談話。陳丕顯也囂張起來。非法組織紅衛軍的一小撮壞頭頭去找陳丕顯，說：“首長，我們保護你！你要多少人，我們就來多少人。”陳丕顯竟神氣活現地回答：“不要來多羅！來兩百人就夠了。”

## 二月二日

根據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提議，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恢復了由於紅革會頭頭搞炮打而中斷了六天的工作，在新華社上海分社舉行了一天的會議。參加籌委的有四十一個單位，其中

本市單位二十八個，軍事單位三個，外地駐滬學生組織十個。

會議氣氛非常熱烈。各單位代表一致認為，經過了一月革命風暴的偉大門爭，實現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建立代替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全市過渡性最高權力機構，時機已經完全成熟。會議決定：一、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過渡性最高權力機構，正式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二、發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定名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三、發表上海人民公社第一號通令，宣佈剝奪舊市委、舊市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宣判舊市委/舊市人委的死刑，宣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四、定於二月三日在人民廣場召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

會議確定上海人民公社組成單位的資格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經濟主義、實現革命大聯合，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廝殺大搏鬥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貢獻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組織。有以下情況的組織不准參加：經濟主義的行會組織，分裂革命群眾運動、破壞革命大聯合的山頭主義組織，違背中央規定成立的非法組織，炮打中央文革反動逆流中證明已走向反面的組織，“假造反，真保皇”的組織。會議逐個審查了參加這次籌備會的單位。許多單位代表提出炮司首先在上海掀起炮打中央文革逆流的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炮司代表堅持不認錯，激起各群眾代表義憤，多數通過決定不同意炮司為組成單位。最後決定上海人民公社由四十個單位組成。到次日，由於駐滬三軍作為三結合一方參加，減為三十八個。名單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

上海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委員會(農司籌)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上海市東方紅總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為主的大中學  
校紅衛兵組織)  
上海新聞革命造反委員會(新革會)  
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  
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紅三司)  
新師大公社  
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紅上司)  
紅衛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員會(紅反會)  
紅衛兵上海中專技校革命造反委員會(紅中技)  
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紅西南)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紅東北)  
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  
上海藝術院校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藝司)  
上海市科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科司)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  
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體司)  
上海醫務界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醫司)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小教司)  
上海市中等學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員會(教革會)  
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赤革會)  
上海市人委機關事務管理局革命造反兵團  
上海市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財聯)  
上海毛澤東思想工人革命造反總部(同“紅工司”對立  
的臨時工組織)  
新華社上海分社、《人民日報》上海記者站  
(以上本市群眾團體和單位)

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紅縱)

(以上軍事單位和軍事院校群眾團體)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駐滬聯絡站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滬聯絡站

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駐滬聯絡站

北京電影學院毛澤東共產主義公社駐滬聯絡站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

天津大學八·一三紅衛兵駐滬聯絡站

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文革臨委會駐滬聯絡站

(以上外地在滬學生組織)

晚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上海人民公社籌備委員會全體代表。代表們非常興奮地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報喜，詳細彙報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籌備經過，並請示中央批准公社的成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對上海人民公社在一月革命的炮聲中成立表示最大支持和熱烈祝賀，並告訴大家新上海公社宣言草稿已送到中央文革討論，中央文革支持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在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鬥爭中創造的革命新生事物。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人民公社成立了，要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為人民服務。區、縣的權也要奪過來，各工廠、學校的權也要奪。公社成立了，不是權奪好了，而是開始。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立即將上海人民公社決定成立的消息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作了報告。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詢問了組織情況後，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結合，要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擔任領導工作，要駐

滬三軍參加三結合。

深夜，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武康路二號召開上海人民公社組成單位負責人緊急會議，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批准上海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特大喜訊。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歡欣鼓舞，一致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張春橋、姚文元建議為了更充分地籌備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將成立日期推到二月五日。籌委會代表一致同意了這一重要建議。

二兵團等三十六個本市和外地在滬組織的頭頭在黨校通宵舉行緊急會議，在這個會上，紅衛軍、紅工司、挺進軍等非法組織或行會組織的頭頭拼命煽動二兵團負責人的資產階級派性，鼓動他帶頭搞大分裂。最後決定，三十六個組織成立一個“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同樣發佈宣言和通令，宣稱奪上海市的黨、政、財、文一切權力，同上海人民公社唱對台戲。會上起草了一份給中央文革的“緊急電報”，侮蔑上海人民公社“搞分裂”，“排斥老造反”，中傷工總司等革命群眾組織。三十六個組織名單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二兵團(二兵團)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一兵團(一兵團)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三兵團(三兵團)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原工總司鋼鐵兵團)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戰兵團

(以上是從工總司分裂出來的組織)

上海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紅衛軍指揮部(紅衛軍，非法

組織)

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工司)

上海毛澤東思想工人革命造反總部(同參加公社的是同一組織內兩派)

上海市學徒造反委員會

上海市“五八”兵團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一九五八年進廠的大、中學校畢業生組織)

上海減資興無鏟修挺進軍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挺進軍，小業主為主體)

上海外貿駐滬工人革命造反總部

華東地區紅藝兵上海工人革命軍司令部

(以上是經濟組織的行會性組織)

上海革命工人學生聯合委員會“戰到底”(在《解放日報》事件時，由工總司、紅革會分裂出來的極“左”組織，後混入紅旗軍，轉化為秘密組織)

國際工人革命軍上海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委員會(工革會)

紅衛兵上海工人學生革命造反委員會(紅工學會)

上海工人學生革命聯絡委員會(工學聯)

紅衛兵新上海司令部中學部

(以上是跨行業跨系統的政治面目不清的組織)

上海市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總指揮部

上海市公用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部

上海一二·三革命造反委員會(機電二局新新等保密廠串聯起的組織)

上海科技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科三司)

上海中教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教司)



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員會(人革會)

上海工農兵電影製片廠紅旗公社

上海市級機關革命造反委員會(市人委機關以極“左”  
面目出現的保守派組織)

(以上是部分系統、單位群眾組織)

首都紅衛兵第一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滬聯絡站

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駐滬聯絡站

北京醫學院“八一八”駐滬聯絡站

中國人民大學“人大紅衛兵”駐滬聯絡站

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公社聯合兵團駐滬聯絡站

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東方紅公社財貿造反團

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以上是外地在滬學生、臨時工組織)

在工人階級和全市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幫助下，廣大紅革會戰士都起來造頭頭的反。復旦大學紅革會戰士於凌晨宣佈接管勤務組，並舉行了“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堅決擊退反革命逆流的誓師大會”。下午，各大專院校及部分中學紅革會紛紛表示“請罪”。北上“控告”的某些人從北京發來電報，表示“請罪”。晚上，市紅革會頭頭在上海師院開會，向毛主席請罪。三日市紅革會“接管委員會”成立，四日，在文化革命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粉碎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誓師大會”。陳丕顯這個大黑手掀起的這股反革命逆流，最終遭到了可恥的破產。

## 二月三日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得到三十六個組織另搞所謂“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的消息後，立即在清晨找二兵團負責人談話。張春橋同志嚴肅指出：上海人民公社是上海革命人民共同鬥爭的勝利成果。我和姚文元同志已經參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們再要搞一個什麼大聯合委員會，只能和上海人民公社對立，就可能在關鍵時刻犯大錯誤。二兵團負責人表示願意考慮張春橋同志的意見，同時堅持要求三十六個組織都參加上海人民公社作為組成單位。

下午，上海人民公社籌備工作會議在上海圖書館舉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主持了會議，並講了話。

姚文元同志宣佈，南京軍區上海警備區負責人已決定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

張春橋同志正式宣佈了中央文革決定，他和姚文元同志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張春橋同志闡述了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重大意義，指出這是能不能把權真正奪到手的關鍵問題。有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有解放軍做後盾，就有權，有力，才能真正打擊敵人。張春橋同志針對在公社籌備過程中一些組織出現的錯誤思想，指出：奪權不能有“私”字。公社要公字當頭，不能搞個人主義，山頭主義等等。凡是“私”字當頭的人決沒有好下場。造反就是要樹立“公”字，打破“私”字。關於公社組成單位問題，張春橋同志指出，不能以組織成立遲早來做標準，而要看是否有貢獻，是否作了壞事。現在已經參加的，也可能不純潔，也可能有問題：還未參加的，也不一定就有問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希望所有已參加或未參加的組織，都不要反對上海人民公社，要警惕有人搞秘密活動。

會議還討論了公社體制問題，決定遵照毛主席“精兵簡政”的偉大教導，在公社臨時委員會下設七組一室，打破舊市委、舊人委那套重疊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臨時委員會及各組核心都採取集體委員所有制，除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外，都不以個人名義參加。臨時委員會初步協商出十九名代表：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駐滬三軍負責人、工總司三名、農民二名、學生一名、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一名、七個組的負責人各一名。七組一室的分工及職能初步進行了協商：

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組，負責工交戰線生產領導，由原來的火線指揮部繼續擔任；

組織組，負責公社成員及群眾組織登記審查工作，以工總司為主；

政治宣傳組，負責新聞、出版、文藝等宣傳領導，以新革會為主；

聯絡組，負責各群眾組織、各基層革命造反派的聯繫及調查，以同濟東方紅為主；

調查組，負責政策研究、起草文件等，以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為主；

保衛組，負責領導公安、司法等工作，由公革會及警備區為主；

接待組，負責接待處理群眾來訪及外地申聯人員問題，由交大反到底及市人委機關造反派為主；

辦公室，負責處理公社日常事務，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

到六日正式辦公時，又成立了後勤組，變成八組一室。每個組、室，都由參加公社的組成單位分別抽調人員擔任工作人員。

晚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武康路2號召開籌委會文件起草小組會議，仔細討論了成立宣言、奪權通令和《向毛主席致敬電》的內容。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指出，宣言要始終突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實行革命三結合，自下而上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思想，這是最新最活的毛澤東思想。還指出要突出把上海人民公社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張春橋同志應紅革會戰士的要求，就紅革會問題發表了三點意見：一、歡迎紅革會戰士起來造反。二、對於一般紅革會戰士來說，不是請罪的問題，而是造反的問題；要請罪的不是廣大戰士，而是少數頭頭，責任在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三、這一場鬥爭，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能否貫徹的問題，關係到上海運動大方向的問題。紅革會戰士要造反，就要徹底肅清少數頭頭對這次事件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郊縣的一些公社、農場在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侵襲下，大量人力外流，嚴重影響生產。如崇明的向陽、躍進兩農場，已經到了二月份，還有約十七餘萬斤棉花長在田裏無人收摘，有四十多萬斤棉花因未及時處理而霉爛變質，一萬五千畝水稻未脫粒，其中已霉爛或被野鴨吃掉的估計達十一萬多斤。工總司等三十一個群眾組織發出通告，號召郊縣革命農民聯合起來，粉碎階級敵人的新陰謀，“抓革命、促生產”，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

所謂“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的一些組織頭頭在紅衛軍、工三司、“戰到底”一小撮壞頭頭的挑動下，堅持分裂主義立場，繼續籌劃成立第二政權，並準備將所謂大聯合委員會更名為“新上海人民公社”，更露骨地對抗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市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根據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

義通知的精神，起草了一份關於取消舊市委一小撮走資派簽字同意的農村外出合同工收入改為九五歸己、恢復公六私四分配製的通告。尚未發出，被部分合同工偵知，兩天來組織幾千人圍攻反經總部，大叫這個通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圍攻持續了五天五夜。在全市和郊縣革命造反派支持下，對受蒙蔽群眾進行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終於使他們覺悟過來並在八日撤走。

## 二月四日

凌晨二時，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再次找二兵團負責人進行了長時間談話，說明他認識企圖建立第二政權的錯誤，並表示：如果你們執意要成立所謂“新上海人民公社”的話，那我們和駐滬三軍宣佈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看一千萬上海人民擁護哪個公社？二兵團負責人表示改變自己的想法，願取消所謂“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不搞第二政權。上午他召集三十六個組織頭頭開會，宣佈解散所謂大聯合委員會。一場即將引起上海分裂為兩大派、出現兩個政權對立的嚴重危險，終於避免了。

晚上，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在上海展覽館隆重舉行最後一次籌備工作會議。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主持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即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十八個公社發起單位負責人，駐滬陸、海、空三軍負責人和籌委會工作人員一百多人。會議對奪權宣言和第一號通令進行了熱烈討論。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充分聽取了各方面意見，最後又作了補充和修改。會議一致舉手通過了宣言和通令草案。

在這個極為重要的關鍵時刻，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為了堅持革命大聯合，避免可能出現的大分裂，說服各革命群眾組織

接受以下意見：一、把三十八個單位改稱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而不叫組成單位，這樣可使其他革命群眾組織逐步加入上海人民公社，避免形成兩大派和兩個政權的對立。二、發起單位一律不登報，不署名，避免爭名次，鬧派性。三、開慶祝成立大會的時候，不是發起單位的革命群眾組織也允許有代表上主席台。不論哪個群眾組織，包括受蒙蔽的群眾在內，只要是革命人民，都可以來參加慶祝大會，參加遊行，表示對新施政權的擁護，籌委會一致通過了這三點意見。

上海人民公社即將成立的特大喜訊，迅速傳遍了全市每一個工廠、農村人民公社、部隊、學校、機關、商店和里弄街道。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一千萬革命人民以無比歡欣鼓舞的激動心情，迎接自己的盛大節日的來臨。人們敲鑼打鼓，互相贈送喜報。“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熱烈歡呼上海人民公社誕生！”的鮮紅巨幅標語，貼遍了全市每一條馬路和街道。

陳丕顯被二兵團關押在嘉定一個農場的鴨棚裏，懷着無比陰暗仇恨的心理，絕望地看着革命人民將他扔進歷史的臭屎堆裏。

非法組織紅衛軍的一小撮壞頭頭，狗急跳牆，竟在深夜煽動了五、六百人包圍成立大會籌備處所在的上海體委大樓，瘋狂圍攻大會工作人員，大吵大叫“不准我們參加上海人民公社，我們就要調動十萬人衝會場。”被上體司戰士頂了回去。工三司的一小撮壞頭頭，也在所謂大聯合委員會解散後嚎叫他們被“出賣了”。深夜，他們又勾結紅衛軍“戰到底”等組織的壞頭頭，用欺騙手段調集了幾萬名群眾，搶先佔領了人民廣場台前最好的位置，妄圖在大會期間引起騷亂，在最後一刻破壞大會的勝利召開。

## 二月五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一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上海人民公社宣告誕生！

全市百萬革命群眾隆重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歡慶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這是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人民的盛大革命節日。朝氣蓬勃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從半夜起就一隊一隊奔赴會場。意氣風發的貧下中農、革命紅衛兵、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天沒亮就一群一群彙集在人民廣場。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一列一列地警衛着會場四周。大會開始前一個多小時，人民廣場已成為語錄和紅旗組成的紅色海洋。擴音器下，電視機旁，數百萬革命群眾在收聽大會實況。駐滬三軍嚴陣以待，遊行路線兩旁大樓上架起了機槍，黃浦江中心巡邏着炮艇，空軍部隊嚴密警戒天空，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搗亂的內外階級敵人。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

張春橋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最熱烈地祝賀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並宣佈他和姚文元同志從今天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張春橋同志說，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立，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但是，這不是一月革命的結束，而是上海無產階級有了一個統一的戰鬥的司令部，可以更好地遵照最高統帥毛主席的命令，繼續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這是鬥爭的中心，成敗的關鍵。我們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還被一小撮走資派竊據的權力統統奪回來。我們一定要堅決鎮壓反革命。我們一定要大抓革命、大抓生產。張春橋同志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們一定要加強和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的大聯合，一定要不斷地整頓思想，整頓組織，一定要打倒“私”字，確立“公”字，

使我們的隊伍不斷地革命化，使上海人民公社真正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姚文元同志讚揚了上海工人階級在一月革命風暴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指出：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革命大聯合，是自下而上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鬥爭勝利的關鍵。姚文元同志說，上海人民公社是在空前廣泛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基礎上，經過大聯合形成了高度的集中，代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代表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當前，奪了權，還有掌權、用權的問題，困難會很多，鬥爭會十分尖銳。只要堅定不移地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折不扣地貫徹毛主席制定的各項政策，用積極的態度去進行鬥爭，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阻力，把奪權鬥爭進行到底。姚文元同志指出，必須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對於反革命分子要堅決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時要嚴格區分兩類矛盾。姚文元同志強調說，奪權以後，一切革命組織都面臨着新的考驗，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克服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不斷提高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本市和外地在滬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也在會上發了言。

大會在熱烈歡呼聲中通過了《向毛主席致敬電》。

《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由大會一致通過。

宣言莊嚴地宣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宣言指出，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當前最中心的任務，就是進一步充分發動群眾，鞏固和擴大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展開全面的奪權鬥爭。宣言又提出了當前各項具體任務。

宣言強調說，奪取政權，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以後的鬥爭更尖銳、更複雜。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再有幾個反復，多次曲折，再打幾個大戰役，打幾次殲滅戰。宣言號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發佈的第一號通令，正式宣判舊市委、舊上海市人委的死刑，剝奪陳丕顯、曹荻秋等上海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一切職權。通令宣佈了實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軍隊支左、監督和保護無產階級專政工具、抓革命促生產、鎮壓反革命、正確處理幹部問題、正確處理各群眾組織關係等九條規定，即日生效。

大會以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和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全體成員，帶領群眾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從人民廣場經南京路到外灘，沿路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廣大革命造反派歡呼跳躍，伴送着“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的彩車前進。在外灘舊市委大樓前，工人造反隊員和紅衛兵小將摘下了舊牌子，掛上了象徵新生革命政權：“上海人民公社”六個鮮紅大字的新牌子。

“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在上海建立起來了。

## 二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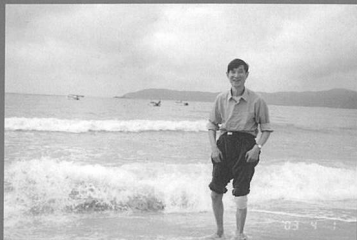
上海和外地駐滬三十多個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聯合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砸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大會”。工總司等各方面代表在大會上憤怒地揭發了陳丕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推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會發佈一項通令：指出陳丕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宣佈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日起，不再承認陳丕顯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等職務，報

請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 二月二十四日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切關懷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並得到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批准。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隆重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熱烈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照亮了前進的航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會，張春橋同志在大會上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報告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的經過，傳達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提出了當前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各項主要任務。大會宣讀了《當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着重指出：上海市地方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成立，決不是鬥爭的結束。我們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上海、建設上海，使它更好地為偉大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我們面臨着最中心的戰略任務，就是堅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繼續放手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定不移地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三結合”，在一切需要奪權的單位和部門，把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所竊據的黨、政、財、文大權，統統奪過來，並且掌好權，用好權，抓革命，促生產，不斷提高群眾的無產階級覺悟，提高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把上海辦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本書是“文革”時期上海市委書記、市委寫作班負責人徐景賢的遺著。作者曾參與“文革”從發動到結束的歷次重要事件。他在10多年前曾出版回憶錄《十年一夢》，但限於當時政治環境，對很多問題或是刻意迴避，或是語焉不詳。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為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記錄，他披露了許多驚人內幕。例如，毛澤東自始至終領導了上海的奪權鬥爭；毛澤東是如何一手提拔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尼克松訪華前的外交風波幾乎導致中美關係解凍的破局；鄧小平因批判周恩來而取得毛澤東的完全信任，才得以復出等。尤其是作者在本書中提供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更是罕見的珍貴文革史料。

江淹《恨賦》中的最後的兩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景賢飲何恨？吞何聲？我可以感覺得到，“飲恨”、“吞聲”也許會有種種其它，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這部尚未最後定稿的回憶錄續集。因為他還有許多材料需要補充，還有許多話要說，而生命卻在瞬間戛然而止！焉能無憾？！所幸，經過夫人蘊芳二年多的整理和補充，這部遺稿終於得以較為完整的付梓，該是可以告慰景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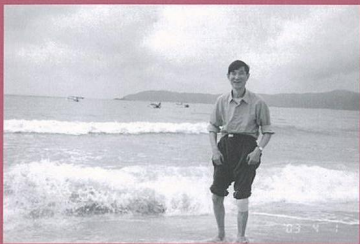
——朱永嘉

ISBN 978-988-99457-0-1



9 789889 945701

港幣\$140 台幣\$450



本書是“文革”時期上海市委書記、市委寫作班負責人徐景賢的遺著。作者曾參與“文革”從發動到結束的歷次重要事件。他在10多年前曾出版回憶錄《十年一夢》，但限於當時政治環境，對很多問題或是刻意迴避，或是語焉不詳。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為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記錄，他披露了許多驚人內幕。例如，毛澤東自始至終領導了上海的奪權鬥爭；毛澤東是如何一手提拔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尼克松訪華前的外交風波幾乎導致中美關係解凍的破局；鄧小平因批判周恩來而取得毛澤東的完全信任，才得以復出等。尤其是作者在本書中提供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更是罕見的珍貴文革史料。

江淹《恨賦》中的最後的兩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景賢飲何恨？吞何聲？我可以感覺得到，“飲恨”、“吞聲”也許會有種種其它，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這部尚未最後定稿的回憶錄續集。因為他還有許多材料需要補充，還有許多話要說，而生命卻在瞬間戛然而止！焉能無憾？！所幸，經過夫人蘊芳二年多的整理和補充，這部遺稿終於得以較為完整的付梓，該是可以告慰景賢的。

——朱永嘉

ISBN 978-988-99457-0-1



9 789889 945701

港幣\$140 台幣\$450